

挖肃灾难实录

巴彦泰 著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 整理

目 录

前言

第一编内蒙古“文化大革命”中的“挖肃”运动

- 1 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打倒乌兰夫
- 2 追源祸始“新内人党”是怎么挖起来的
- 3 郭以青凭感觉挖“内人党”
- 4 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
- 5 扑朔迷离 206 案件
- 6 向滕海清出首诬陷自己民族的乌兰巴干
- 7 砸烂公检法为“挖肃”鸣锣开道
- 8 滕海清讨伐“内人党”
- 9 敦促“内人党”登记第一号通告
- 10 敦促“内人党”登记第二号通告
- 11 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标语口号
- 12 彻底围歼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暗班子
- 13 中央首长六九年二月四日接见滕海清的指示
- 14 关于对待新内人党的若干规定
- 15 滕办主任李德臣勾画“内人党”演义

第二编中央《五·二二指示》挖“内人党”停下来，平反、放人

- 1 中共中央“五、二二”指示
- 2 吴涛传达中央对内蒙工作的指示

第三编“挖肃”所造成的民族灾难

- 1 “挖肃”惨状
- 2 死伤残案例
- 3 “挖肃”凶手入党提拔重用
- 4 牧区经济遭到摧残掠夺
- 5 牧区草原建设工作会议反映“挖肃”后果
- 6 滕海清挖吴涛是内人党第三套暗班子
- 7 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挖肃”状况
- 8 哲里木盟赵玉温的“挖肃”罪行
- 9 呼伦贝尔盟尚民在“文革”中的罪行

第四编广大干部群众反“挖肃”反迫害，要求平反昭雪的斗争

- 1 内蒙古文化大革命中在民族问题上进行的两条路线斗争
- 2 关于新内人党的所谓证据问题查证结论
- 3 内蒙古在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
- 4 滕海清的幽灵还在内蒙古游荡
- 5 关于新内人党结案问题的严正声明
- 6 军管保护的是哪一路的积极分子？

7 尤太忠一伙是林彪、四人帮路线的维护者和推行者

9 乌盟地区受害者群众的愤怒行动

9 关于达瓦所供“内人党”材料处理的一场争论

10 周恩来总理亲自阅批的一封信

第五编彻底平反“新内人党”冤假错案

1 华国锋彻底否定“内人党”的存在

2 内蒙古党委对挖“新内人党”所做的结论

3 内蒙古党委关于追究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政治责任向中央的报告

4 评内蒙古党委对“挖肃”所做的结论

5 所谓“平反一风吹”、“第二个扩大化”是康生、黄永胜制造的诬陷屁话

第六编对滕海清“挖肃”罪行的声讨

1 内蒙古党委对于滕海清“挖肃”罪行的结论

2 滕海清对其“挖肃”罪行的三次检查

3 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廷懋致信黄克诚

4 滕海清将军没有记取江西苏区打“AB”团的教训

5 中国古代酷吏周兴、来俊臣的逼供信

6 内蒙古运动办关于落实政策情况报告

7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落实政策工作的情况汇报

8 自我“正确”的领导人王铎袒护挖肃凶手

9 内蒙古有没有出卖领土的卖国贼

10 吴涛的一次辉煌的政策宣讲

第七编对滕海清发动的这场“挖肃”运动的思考

1 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历史

2 对于历史上的“内人党”及“民族分裂”问题怎么看

3 内蒙古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党群团体

4 内蒙古军区政治部阿民在平反大会上关于民族问题的发言

5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家牙含章批判大汉族主义

6 乌兰夫复出后对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

7 编者代表广大受难者致信感谢华国锋

8 内蒙古文化大革命没有全面彻底否定

9 反对两种民族主义

10 一九八一年内蒙古学生事件

前言

一九六八年，在内蒙古发生了空前的“挖肃”劫难，持续十年时间。内蒙古人民世代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场民族灾难。这场灾祸的制造者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将军。他的上边是康生、江青、谢富治，还有黄永胜，下边是广大“挖肃战士”。

“挖肃”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的？它是“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简称。其中心实质要害是挖所谓乌兰夫的“暗班子”——“反党叛国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内蒙古自治区是在一九四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五十年代称之为模范自治区。到了六十年代就被打成了“反党叛国”的自治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泽东主席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李雪峰召开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将担任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的乌兰夫，以“民族分裂的修正主义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打倒了。进而又打出了“乌兰夫黑帮”、“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自治政权解体垮台，区党委“左”派书记们争夺内蒙古领导权，局势大乱，两派官司打到北京，中央派出滕海清将军取代乌兰夫，执掌内蒙古党、政、军大权。从此，内蒙古人民的自治权没有了，生存权危机了，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滕海清以大汉族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以民族斗争取代阶级斗争。他说“内蒙古一千三百万人口，蒙族一百三十万。过去就是这一百三十万蒙人压在一千一百七十万汉人头上，胡作非为。你看，汉人那么多，蒙人那么少，还压在汉人头上，让他们掌权能行吗？”在他看来，自治政权压了汉人，汉人成了被压迫者。林彪死党黄永胜嗥叫“少数人怎能当多数人的家”，煽动处在多数的汉族人民剥夺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

滕海清为了改变他所认为的“蒙人压汉人”局面，就实施他的大汉族主义反动路线，把蒙族干部一批一批打下去。老的打完了再打新的；打完了西部，再打东部；打完“嫡系”，再打“旁系”；打完“明班子”，再打“暗班子”，原有的打倒了，后来的打倒了。“三里五界”统统打倒。为了继续再打，一个不漏，反复拉网，滕海清搬来江青讲话“因为敌人很狡猾的，他们有一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了一套，它又上来一套”。于是将“钻进”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里的星星点点的几个蒙族干部“吐”出去，揪出来，打倒了。

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从始至终围绕民族问题，贯穿了民族斗争这条主线。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内蒙古日报》编辑部文章极为明确地指出“同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之间的斗争，是我区两年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根主线。乌兰夫盘踞内蒙古整整二十年。他不仅完成了反党叛国的舆论准备，而且组织了一套套明班子和暗班子。经过二十年惨淡经营，一股股反革命势力，拧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乌兰夫黑线”。

滕海清为了全面扫荡内蒙古，摧毁“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社会基础，提出没边没沿的“乌兰夫黑线又粗又黑又深又长”的扩大打击蒙古民族的反动口号，发

动了罪恶的令人诅咒的“挖肃”运动。

按照毛泽东主席的部署，一九六八年“全国山河一片红”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而滕海清却响应江青“挖黑线”讲话，把斗争引向打击蒙古人的“挖乌兰夫黑线”上去，不顾一切地，竭尽全力扭转群众运动的方向，今天这里讲话，明天那里报告，擂鼓督战，全线出击。他的“滕办”组织“挖肃”笔杆子，在报纸上连篇累牍，鼓噪呐喊，以张声势。

滕海清为消除“北疆隐患”，“内人党”要挖到蒙古包里去，挖到羊群里去。为达此目的，“滕办”精心培植经营了一支强劲的“挖肃派”队伍。不管你是什么人，干什么的，不问你是什么出身，出于何种动机只要按照滕海清所指引的方向去挖，任何人都可以当这个“挖肃战士”。打出成绩来就有功，打错了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怎么干都行。挖肃分子们心中明白，听从滕司令员号令，抓好打蒙古人这个大方向，想揪谁就揪谁，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不要顾虑，不要怕错，不要怕宽，不要报批，不要证据，不要手软，不要怕死人，只要敢于出手，狠为基础，挖出血采就是好样的。于是流氓、无赖、恶棍、社会渣滓都成了“挖肃积极分子”。有的挖肃凶手扬言“滕海清说了，死几个没有么了不起。打死一个老鞑子是好汉，打死十个是英雄”。对于“反党叛国的内人党”消灭的越多越好。

开始挖“内人党”，很多人不明底细，稀里糊涂，盲目跟着挖，挖着看。锡盟有个造反派头头叫许名扬的说“叫你挖，你就挖，挖错了谁坐蜡，滕海清、李大麻”。他们玩世不恭把对一个少数民族来说，生死攸关的挖肃斗争当做儿戏。蒙古民族有个民谚“对于猫来说是戏耍问题，而对鼠来说是个生死存亡问题”。

挖“内人党”打“叛国集团”的运动，进行一个阶段之后。不少人退缩了。“不能挖了，再挖就要挖塌了！”。此时已经出现大量死人，一个人口很少的牧区兰旗就已死五十多人了。开始紧跟滕海清挖肃的核心小组成员权星垣看到“挖肃”挖到这个地步，发出感叹“现在的形势就是。凡揪出来的是蒙古人，不用问，打！”。高锦明(核心小组副组长)说“这就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但不能说运动就是整蒙古人”。可是滕海清他有他的立场观点，他说“从内蒙古的历史情况看，由于乌兰夫搞民族分裂，搞独立王国。从组织上培植了他的黑势力。这样，蒙族干部倒下去的要多一些，这是事实”。在滕海清这种打的就是蒙古人的思想影响下，就出现了：哲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讲的“哲盟敌情严重，光蒙族就有七十万！”、锡盟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讲的“把蒙古人都挖了，在全国也是一小撮”、呼盟军分区司令员尚民讲的“所有少数民族都是乌兰夫的黑线”的骇人听闻的极端谰言。

高锦明在他“挖肃到头”、“不能再挖了”的被滕海清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九·二五”讲话中，为他们的错误诡辩：“阶级敌人散布，文化大革命是整蒙古人的，先整西部，后整东部，完了再来东西部一起整。挖肃以后又说这是挖蒙古人的。精减以后，又说蒙古人都减下去啦”。然后他就进行批判“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他们把它反过来，拿民族斗争掩盖阶级斗争的实质”。对高锦明这个批判，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反过来给他们戴上这个帽子则是合适的，那就是滕海清等人以阶级斗争掩盖民族斗争的实质。哪儿有把整体民族都打为敌人还说成是阶级斗争的道理！有这样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吗？斯大林把某些少数民族整体大迁徙，那叫阶级斗争吗？不过这里还应指出，高锦明在挖肃当初，不管他是出于何种动机，而他的“九·二五挖肃刹车”

讲话，无疑是正确的。若在那时就停下来，不至于死伤那么多人。而且前一阶段“挖肃”还是较为“文明”实施的，深挖以后可就进入践踏人类文明的野蛮阶段了。

滕海清巡视乌盟，发现集宁地区挖出不少汉人“内人党”，他感到震惊，确如高锦明所说，真的挖到自己头上来了。他当即做出明确的指示“你们这里揪出的内人党，不少是汉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要调查一下”。滕海清觉得挖的方向出现问题了。于是他向“挖肃积极分子们发出号令：“要掌握斗争大方向，始终把矛头对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其实，挖到汉人头上，那是扩大化的必然结果。当时，内蒙古工学院曾报告“我们这里蒙族教职工都挖光了，再挖挖谁去！”

滕海清是带兵打仗的战将出身。“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不怕死人。他决心“扫北”消除“北疆隐患”，个人主义私心、野心严重膨胀。为了向党的“九大”献礼，立功心切。挖死多少人，在所不顾，谁的意见也不听，对周恩来的警告也当耳旁风，一心蛮干下去，终于酿成大祸，身败名裂，滚出内蒙古。

一九六九年春“九大”期间，周恩来发现内蒙古搞“挖肃”出了问题，报请毛主席批发“5.22”指示，严厉批评滕海清犯了“扩大化”错误。然而不到半年，受害者还没有得到平反，死伤残后果尚未收拾，康生、黄永胜又诬陷内蒙古犯了“平反一风吹、第二个扩大化”错误，拿高锦明顶罪。全区实行分区全面军管。

滕海清捅出大乱子走了，走马换将，郑维山将军来了，他的来势更凶。他是带着“尚方宝剑”以“征服者”出现在内蒙古，比滕海清还要霸道几分，一切都要听从他的军令，肃杀之气笼罩内蒙古大地。由于郑维山的军阀作风，“征服者”的颐指气使，带来的部队从上到下军纪败坏。出现于洪信之类恶行之徒。正如马克思主义者牙含章所批的“他们是一伙挂着共产党的牌子，披着解放军外衣的大汉族主义者”。郑维山来内蒙古“走遍四盟二市，没有发现一个好干部”。于是将内蒙古干部全拿到河北省各地办学习班，然后又从华北各省市调入 500 名干部、从基层调 500 名干部换掉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又说“牧民吃了亏心粮”，调进做马料的红高粱给牧民当炒米吃，组建开荒兵团，在广大牧区大面积垦荒。

郑维山认为滕海清干的拖泥带水，挖了几十万“内人党”，没有挖出真品实货，没有拿到真凭实据。为此，他要挖出真的来，打出证据来。于是停止平反重开挖戒，又死了不少人。内蒙公安厅党组成员、政保处长腾和就是在“五.二二”后军管中，为了从他那里挖出证据来，刑讯武斗，致使他死在监狱。不久，郑维山的“陈、李、郑勾搭在一起”紧跟林彪集团的事发，离开了内蒙古。郑维山走了，接替他来执行军管任务的也是北京军区付司令员尤太忠。滕、郑、尤三位将军，尽管在其它军国大事上有不同观点，而在内蒙古问题上一脉相承。郑维山接续滕海清的“挖肃”，尤太忠又维护郑维山的军管，不准揭批“陈、李、郑”的罪行。尤太忠来了之后，召开内蒙古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做报告，全面彻底否定并恶毒攻击污蔑了内蒙古革命斗争史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二十年。把共产党领导下所制定的路线和政策完全颠倒成民族分裂的二十年，反党叛国的二十年，搞大蒙古帝国的二十年。

尤太忠在内蒙古执政时间最久，长达八年。军管撤销后，他仍留在内蒙任区委书记。因为内蒙古机关干部在军管的配备下，已成为挖肃体系，他的周围亲信都是拥护军管的挖肃分子，所以他的思想观点一直没有转变过来。尤太忠一直到一九

七八年十一月，还在讲“要十分注意挖新内人党时期的积极分子工作，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反过来，他又另一幅面孔，压制“挖肃”受害者不准提“挖肃”问题，更不准揭批，不准追查凶手。谁若说了批了，那就是“破坏民族团结”。他们就是以这种强权歪理推行大汉族主义路线。尤太忠在他主持内蒙工作八年时间里，听从挖肃派的观点一直坚持着“毛主席批的是扩大化，未说没有内人党”，不做认真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可是他们却向中央多次反复上报“挖新内人党有关平反落实政策等问题已全部做完了，误伤群众都非常满意”。

内蒙古“挖肃”灾难，主要发生在军人手里，“挖肃”开始，黄永胜向滕海清面授机宜，指出“内蒙古的军权不在我们手里，内蒙古部队不是我们党领导的”，而后他就向内蒙古加派六百二十五名营团以上军队干部来夺权开展“挖肃”运动。一九六八年冬，滕海清深挖“内人党”又调入二百名营团师级军人进驻革委会机关，开展深挖运动。滕海清如果没有军权他也挖不起来。没有军队做后盾，“挖肃派”也不敢那样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以挖肃取乐。滕海清在牧区的“挖肃”队伍中，还有一支劲旅，那就是六十年代初，因“大跃进”、“人民公社”挨饿时期，跑到牧区谋生的流民，人们都叫他“盲流”，他们在原籍大都是不安分之徒。这些人在滕海清挖到蒙古包里去的号令下，真是天赐良机，夺权造反，大打出手。他们把牧民挖出来隔离之后，掠夺财产，霸妻奸女，无恶不作。下到牧区的知识青年队伍里，也有不少人干坏事而入党、提拔受到重用。尤太忠的秘书××就是从这些人里选拔任用的。

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漫长岁月里，广大受难者呻吟痛苦，亡者不能昭雪，伤者不得治疗，孤儿寡母饥寒交困。他们在茫茫草原上，翘首仰望星空，长叹哀鸣。“忽报人间曾伏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宣告“文化革命”结束，人们有了希望了。一九七八年，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从嘎如布僧格案的批示，彻底否定了“新内人党”的存在。于是胡耀邦将尤太忠等人叫到北京去写出文件。全面彻底平反昭雪，收拾善后。这场“挖肃”灾难才画上了句号。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发生的这场冤案，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得到了彻底平反。表明共产党有能力纠正自己所犯错误。蒙古民族永远不会忘掉华国锋的大恩大德。

挖“新内人党”已历经三十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幕真相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现在可以断定这是一桩无中生有，上下齐手，虚构编造出来的历史性假案。它是对一个民族整体的诬陷迫害，是蒙古民族永远难以平复的伤疤。

“反党叛国”的“内人党”冤案是平反了。然而，它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一个弱小的民族整体受到了摧残，死伤残者大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英雄模范、各级干部，是民族的精华。一个刚刚兴旺起来的落后民族的元气大伤，民族尊严受到凌辱，民族经济遭到破坏。谁来承当罪责？从内蒙古广大受害者来看，滕海清应该是制造这场灾祸的主犯。他的上边虽然有康生、江青、谢富治，但是谁也没有叫他必须这么挖。所以，他是犯罪的主体，应受法律制裁。然而，他仅是空担罪名，没有实受。在黄永胜等人的包庇下，去唐山学习班做了“斗私批修”之后就“打靶回营”官复原职了。最后，实受“挖肃”罪责的是两个蒙古人。在尤太忠主持下，推出吴涛来承担领导“挖肃”责任；拉出乌兰巴干来承担制造冤案的责任。万人大会上进行了声讨批斗。乌兰巴干判十五年徒刑，这个坏分子罗织“内人党”冤案罪该应得。可是与乌兰巴干应该同罪的丁振声却得到保护，没有受到审判。吴

涛这个替罪羊，挨了声讨批斗之后不久死去了。那些千万个以残酷手段打死人的凶手们，受到当权者的保护。都没有论罪。况且尤太忠、王铎多次出来讲“挖肃罪责由革委会核心小组那几个人承担，广大挖肃群众是没有责任的，入党、提职、晋级仍然有效，而且还要信用他们”。这种保护政策，将对民族团结产生历史性的消极后果。

为给世人留下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避免悲剧重演，特编此《实录》。
谨以此《实录》做为在这场“挖肃”劫难中丧生的亡灵致以三十年之祭

一九九九年九月

第一编 内蒙古“文化大革命”中的“挖肃”运动

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打倒乌兰夫

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是内蒙古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在这个会上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打倒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华北局第二书记的乌兰夫。乌兰夫是自治区领导人，也是蒙古民族的领袖，“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这一倒，蒙古民族的自治权、生存权随之发生了危机，陷入深重的民族灾难。这个会议从五月二十一日开始，到七月二十五日结束，开了两个多月。参加会议的内蒙古各级干部 146 人。会议重点日程是：

六月二日 华北局书记解学恭在巴盟、伊盟小组会上点火。他说“四清”运动自始至终狠抓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狠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内蒙古却宣传民族问题是阶级斗争的本质，反对大汉族主义，不反修正主义。

六月三日 会议揭发出：一、乌兰夫下令巴盟、乌盟停止“四清”，以生产为中心（注：实为抗灾保畜。是年干旱无雨春风一起牲畜饥荒）二、召开民族工作会议，大反大汉族主义，以民族问题冲淡了阶级斗争。

六月五日 解学恭等人批乌兰夫印发《三五宣言》是搞民族打裂活动。在全区大反大汉族主义，反汉实质上就是反华、反其、反社会主义。

六月七日 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讲话，指出内蒙古党委的错误严重，强调反大汉族主义，不强调反修；强调民族问题，不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学习《三五宣言》，不强调学习毛主席反地方民族主义谈话。我怀疑区党委有一帮修正主义分子在那里操纵。

六月八日 李雪峰决定从华北局机关派出二十三人参加领导内蒙组的会议。此外还有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春。

六月十四日 乌兰夫检查说有民族偏见。

六月十九日 土默特籍干部云成烈,因乌兰夫挨整,气赶火头,“要上山打游击”。华北局紧急派回权星垣控制局势,内蒙古军区的“左”派领导人也跟随回去稳住军队;同时召回在呼盟搞“四清”的公安厅副厅长孟琦回来主持公安厅工作,维持社会秩序。

六月二十二日 华北局紧急通知在张家口地区的“四清”工作团六十多人立即返回北京,去内蒙夺权。凡去内蒙夺权的人先到前门饭店参加会议。会上气氛极为紧张,说乌兰夫已经宫廷政变,成立了“五大委”、“代常委”,安排了乌兰夫的亲信和土默特籍的蒙古人担任主要领导。要搞“内外蒙合并”,乌兰夫要利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搞政变,嫡系部队是骑兵第五师。

七月十五日 高锦明系统揭发批判乌兰夫:

——乌兰夫犯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推行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破坏祖国统一的错误。乌兰夫是想把内蒙古从祖国分裂出去,与蒙修合并起来,建立一个大蒙古国。他想把元朝灭亡以后三百年来蒙古民族未能统一的局面改过来,统一在乌兰夫手里。他要在历史上完成这么一个丰功伟绩,成为当代成吉思汗。

——拿着《三五宣言》向兄弟省区要帐,要实现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划给蒙古,和蒙古合并。

——只宣传毛主席反大汉族主义,而不讲反地方民族主义。毛主席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乌兰夫反过来说,民族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实质。

——反对“四清”反对阶级斗争,拿民族问题冲击“四清”,提出“四清”运动始终抓民族问题。放下“四清”抗灾保畜,以生产压革命。

一提出修正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论》。政治基础要多发展蒙古人党员,说有汉族党员,也有蒙族党员,就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是要农牧结合,解决农牧矛盾。蒙人放羊,汉人也放羊;汉人种地,蒙人也种地,这样就有了共同的经济基础;文化基础是蒙人学汉语,汉人学蒙语。你说蒙古话,我也说蒙古话。你说汉话,我也说汉话。强调汉人学蒙古话,说语言通了就有了共同感情。这三个《基础论》不讲党的领导,不讲社会主义,不讲阶级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

——推进机关民族化,搞宗派主义活动,搞反革命政变,篡夺内蒙古党政大权。搞“地下书记处”、“代常委”、“五大委”,掌握专政机关公安厅和政法领导小组,大量安排自己人,重用延安民族学院的主要是土旗的蒙族干部,再一个是重用紧跟他的一些当地汉人。对外来的军队干部不欢迎,想搞一个单独的蒙古人的军队。军队开点荒种点地,打点黄羊都不同意。

——在土旗亲自蹲点搞“四清”,与“二十三条”唱对台戏,另立“四清”验收标准,增加一条“民族问题解决了没有?”并且说,这条做不好。四清顶多说做好了一半。

七月十九日 华北局书记解学恭在总结讲话中对乌兰夫的错误定性为“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

七月二十五日 会议结束,高锦明讲话。他说在中央和华北局直接帮助下,对乌兰夫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内蒙的工作要从这个会议以后发生一个大的转

折、新的转折。到会的人不都是左派。有左派，有右派，也有中间派。我们要过社会主义关，要过民族问题的关。这次会议暴露了一批在乌兰夫影响下的小修正主义分子、这一批人就是乌兰夫私党。对这场斗争华北局继续领导、支持我们，并从山西、河北调二百名干部支持内蒙。如果没有这场斗争，这些同志是进不去的。我们这里的民族分裂主义和苏蒙修唱一个调子，内蒙有蒙修、苏修的情报员，十几年来没有断过，内部进行挑拨，到处造谣言。二百名干部去内蒙，每个旗县都有人，要热情欢迎，创造方便的工作条件。七月二日，少奇和小平同志和乌兰夫同志谈话，要传达到十三级干部。呼和浩特市要从修正主义手里夺权。

七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华北局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定了五大罪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七月二十八日 华北局各部委抽调八十余人，中央组织部十余人，国家民委十余人，加上从山西、河北调入内蒙古夺权的二百人，共计三百人的队伍于七月二十九日开进呼和浩特。领队的是华北局书记解学恭、财办主任李树德，还有河北省委调来的康修民。

注：从山西、河北调内蒙古来的这一百八十名县委书记、二十名地委书记，到一九六七年动乱中跑到北京上访。中央李富春接见时说，你们这二百人调内蒙古工作，没有经过中央批准。是华北局决定的，你们可以各自回到原省地县工作。

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对乌兰夫所定的错误，除在组织路线上有无宗派主义错误外，其它那些罪名，不消说都是不能成立的。而且按照拨乱反正后，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政治标准，非但不错，还是正确的。李雪峰发难乌兰夫领导的内蒙古阶级斗争一潭死水，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停止“四清”，抗灾保畜，在牧区社会主义改造中坚持“稳、宽、长”政策。这些都没有错。他们指控乌兰夫“制造民族分裂”、“搞内外蒙古合并”，“建立大蒙古帝国”、“想当成吉思汗”，那更是无稽之谈。乌兰夫为了增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提出政治、经济、文化的《三基论》，有啥错误。让汉人也学蒙古话就不行啦！

乌兰夫为何印发《三五宣言》，因为六十年代以来，邻省不断蚕食内蒙地界，年年往内蒙古边界里拱进，内蒙古是一让再让，已经到了不能再忍让的地步。自治区民政厅老厅长乌力图，那几年马不停蹄，今天这里，明天那里，穷于周旋。“文革”运动初期，“左派”们把他打成乌兰夫的“疆域大臣”关进牛棚。打“黑帮黑线”的人们，说乌兰夫与邻省争地盘“寸土必争，寸土不让”。那么慷慨大方的要哪里给哪里是正确的吗，那还要划定省界、县界、村界干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进来，我哪儿去！”。解放前由于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落后的少数民族顶不住先进的大民族的推进。“你进来，我就退”，退进山里、沙漠里。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民族平等了，没有压迫了，还要退让吗！一九五四年蒙绥合并，实现了内蒙古的统一自治。然而也并不是按照《三五宣言》中讲的“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别旗”全部划归内蒙古。从哈尔滨到长春、沈阳、锦州至长城，原先都是内蒙古领土。热河承德原是喀喇沁领地，奉献给清室建离宫。划到区外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的蒙族群众，一直向往着回到内蒙古。一九五七年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大庆座谈会上，辽宁省的代表阿英嘎就提出

过回归内蒙古的要求。存有大民族主义思想的人是体察不到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情感的。乌兰夫早年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延安又受到党的培养，早已树立了马列主义民族观，他担任自治区党政军一把手是应该信得过的，他是忠于国家统一的，他根本没有“内外蒙合并”的想法。五十年代，新中国刚刚草创，防备国民党的反攻大陆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国家在战略上划分一二三线地区，内蒙古是处在三线。而到了六十年代，中苏交恶，内蒙古由三线转变为“反修”前线。不信任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者李雪峰、解学恭等人对于乌兰夫的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是不放心的。所谓“乌兰夫不抓阶级斗争”是虚的，怕乌兰夫把内蒙古拉出去“搞内外蒙合并”那才是实的。因而，必须把他打倒，将其封疆大权削掉。乌兰夫被打倒，内蒙古的自治权也随之消失了。

追源祸始“新内人党”是怎么挖起来的？

提出存在新内入党的第一人是郭以青。时任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的郭以青，一九六五年五月就向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多次写密信报告“我怀疑东部蒙族干部中有一二百人的民族分裂集团，也就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是有“新内人党”之说的第一次出现。一九六七年滕海清来内蒙古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也是郭以青第一个向他讲“内蒙古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内人党有长期搞民族分裂活动历史”。

炮制“内人党”假案的第二个人那就乌兰巴干了。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建立《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开始动手挖内人党。他带上大口罩去郭以青家，密谋策划内人党假案，然后到各盟市，以及东北、北京、南京等地有关部门和档案馆搜集历史资料，然后运用篡改、捏造、歪曲手法炮制了一百二十七份材料，编造出了遍布全区的反党叛国的新内人党分布网络，两千名党徒名单，报送“滕办”。

第三个人是丁振声了。乌兰巴干由郭以青引线与“滕办”联系与陈晓庄挂上了勾。通过“滕办”向公安厅开出介绍信查阅敌特档案。这时的公安厅已是“砸烂公检法”之后的第二次军管，京字 411 部队进驻执行挖肃任务。这个部队的政委任家骥任军管会主任，积极配合乌兰巴干，不久他就任专挖内人党的二办主任。此时政保处的处长腾和已为“挖肃”先期身陷囹圄，他手下有个科长叫丁振声，正想为“挖肃”出力立新功。乌兰巴干进入浩如烟海的档案库中，不知从哪儿下手，正在发怵。立功心切的丁振声便将政保处对外绝密档案资料搬出来交给乌兰巴干，并给予指点。乌兰巴干喜出望外，意想不到能从公安机关有人出来合作，实在庆幸。从那以后二人密切合作，为罗织新内人党假案作出了奉献。后来所谓“内人党变种组织”的创作发明权是属于丁振声的。他同乌兰巴干联手，很快显露头角，当上了专挖“内人党”的“二专办”的副主任。

第四个人就是高锦明了。乌兰巴干、郭以青合谋炮制内人党假案，一九六八年三月的一天，郭以青向滕海清汇报情况，中间高锦明插话说“乌兰巴干那些材料很重要，对揪哈特势力、挖内人党很有价值”。郭以青在内蒙古大学有他一伙搞挖肃的帮派势力，对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组织攻势突击，几天的车轮战就攻下了，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郭以青领着他的小分队向核心小组报捷：巴图的内人党连

同 206 案件一起突破了。滕、吴当时不在家，高锦明听完汇报就作出决定，对巴图供出的鲍荫扎布等十六名厅部盟市级干部秘密逮捕分别成立专案进行突审。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在专案组长刘占龙主持下，从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到第二天上午十时，经十八个小时的严刑拷打连续作业，终于叫鲍荫扎布按照他们的需要编好的口供抄写下来签了名字。鲍荫扎布供出三十多名内入党之后，军区立即向核心小组报捷。根据“突破”巴图、鲍荫扎布的口供，“滕办”主任李德臣当即起草《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报送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这个报告是高锦明签发的，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那一天高锦明还签发了呼盟尚民“发现”的《蒙古统一党情况报告》。对于开挖内入党，高锦明在唐山学习班检查中承认，挖内入党的底子是他打下的，当时的确有怕火烧到自己身上来的担心。在此以前，有人搞“内入党”的问题，高锦明曾表示过“内入党的底子都很清楚嘛！”但是时间不久，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怎么变的呢？就是他前边讲的“怕火烧到自己身上来”。什么“火”？区党委机关有些人要算他十七年的帐。其他书记都倒了，唯有你高锦明和权星垣是“左派”书记。高锦明怕后院着火，于是转移方向，揪“哈、特势力”挖“内入党”把群众火力引向东部区干部。高锦明其人，精明干练，头脑机敏。运动初期打“乌兰夫黑帮”他严格划定范围，不能把土默特籍老干部都打倒，列出名单来保他们。他说如果都打倒了，适得其反，那就坏事。对此《无产者》造反派曾“炮轰”过他。当挖内入党进行一个阶段，出现死人之后，高锦明就提出“挖肃”刹车意见。他心中明白，“内入党”哪儿有那么多，而且他也不一定相信有“内入党”。然而，滕海清把他也打下去，滚滚向前推进的火车刹不住了。

第五个就要说到“滕办”了。“滕办”就是滕海清个人办公室，有三四个秘书加一个主任李德臣。秘书之中有个飞扬跋扈的陈晓庄。别看他是小小秘书，他的一言一笔足令内蒙古地动山摇。“狠为基础”是他加的，“挖到羊群里去”是他说的。滕海清认为内蒙古干部都要“反党叛国”，不可信任，更不相信内蒙古军区干部。所以他自己设置“滕办”，建立信息网罗，直接与“挖肃派”取得联系。乌兰巴干、丁振声等人早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就与滕办挂勾走动了，还有马伯岩、孙玲玲等各路挖派头头，踏破了“滕办”门槛。那个时候，“滕办”俨然是个“小军机”，揽权夺势，炙手可热。中央曾批评滕海清“搞秘书专政”，不听核心小组集体意见，只听他“滕办”几人意见。内蒙古的大事很大程度上坏在这个“滕办”手里。挖肃指挥中心实际上就操在“滕办”手中。核心小组专管挖肃的李树德，事事都要拉上“滕办”主任李德臣。“滕办”在挖肃中所起的作用路人皆知。中央命令滕海清“你的滕办要取消”。

第六个人是李树德了。滕海清委以他专管挖肃重任，对于挖内入党，他始终没有发生过动摇。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在原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那几个负责人的策划下，成立了挖新、老内入党的工作小组。这个工作小组不仅研究新、老内入党的性质和活动，还负责对所谓有内入党嫌疑的单位和地区的挖肃运动进行指导。因此，从真正的目的来讲，所谓挖肃，实际上就是挖新内入党的开始。“挖肃”从它开始的头一天起就是要挖乌兰夫“暗班子”内入党的。挖了一段之后，李树德主持起草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并在内蒙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上做了深挖新内入党的说明。文件断定，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成

立后，内入党便转入地下，规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按反革命论处，一般党徒勒令自首登记。

第七个人就是挖“内入党”承担首要责任的罪魁祸首滕海清了。滕海清的主要责任在后期，但是开挖“内入党”他也难辞其咎。他的“滕办”早在成立革委会之前就与乌兰巴干、丁振声等人联络策划挖内入党。乌兰巴干到新城宾馆六号楼向滕海清当面汇报“内入党敌情”。滕海清当场表扬了乌兰巴干的工作，并指示他同几个“挖肃”组织联合起来搞，叫他们不要怕，派军队问题可以考虑。一九六八年冬，群众专政指挥部经侦察发现乌兰巴干有很多问题，认定他是个阶级异己分子，报请逮捕。经李树德、李德臣审查也认定是坏人，决定逮捕。可是送到滕海清那里，批的是“不能捕，还要用他”。一九六八年一月召开革委会第二次全委会，滕海清按照江青“挖黑线”讲话做了开展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斗争的动员，并在这次会议中间“砸烂公检法”，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为全面展开“挖肃”斗争铺平道路；一月十日成立挖“内入党”工作小组；二月四日去京向康生、江青汇报“内入党”有新的活动，并准备挖“新内入党”，得到康生首肯支持：“内入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于是一场腥风血雨的“挖肃”运动在内蒙古全区范围内展开了。

注：郭以清这个“敌情”是从哪儿来的呢？可也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六十年代初，开办内蒙古大学，内地支援边疆来了一个叫××的历史教师，他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陆陆续续翻阅内蒙古历史档案及半官方材料。他不知道内蒙古革命志士接受共产党领导之后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过程。因而他认为原先的“内入党”头目都混入了共产党，在自治区机关里把持着领导权。于是他向校党委书记郭以青密报所获“敌情”。郭以青其人，是一个极左的机会主义者，他感到这是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极好机会，于是他就施展了他的政治投机。

郭以青凭感觉挖“内入党”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看人相面就能点出谁是叛徒，谁是特务，谁是反革命。内蒙古也出了一个“小康生”。他凭感觉就可报出内蒙古地区民族分裂的动向。这个人就是原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郭以青。

一、早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他就感觉到内蒙古党政军机关里有个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遂多次向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写密信报告：“种种迹象表明，自治区（特别是文教界）似乎有一个反动派别，或者政党”，“又有一种说法，就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搞内外蒙合并的，并且牵涉到法院的特木尔巴根，我怀疑东部蒙族中有一二百人的民族分裂集团，如特古斯、巴图等”。郭以青将他的感觉和设想讲述之后，提出了对策“假如面对着我们的是一个有组织、有准备、有国际背景的阴谋集团，就必须针锋相对的做出全面部署，下决心一下打乱他们的阵势，才有可能各个击破”。

二、一九六七年，滕海清来内蒙古担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郭以青不失时

机地向他灌输“内蒙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是民族团结同民族分裂的斗争”，“内人党有长期搞民族分裂活动历史，和日帝、蒙修关系都很深，他们是有很长历史和国外势力一直有联系的民族分裂集团。解放后其骨干、首脑还在，这个势力还在，必须加以彻底揭露和清理。对这个反革命集团，我一九六五年就有所感觉”。

三、当“挖肃”运动进行一个阶段，滕海清捉摸“挖肃到底”，这个“底”的标准时，郭以青以为滕海清的挖肃要停下来了。为了，促使滕海清下定决心挖下去，他捶胸顿足进言“只要有百分之三十是真的就继续挖，挖错了再来再来平反。挖十个有七个是假的，三个是真的，最后给七个磕头陪礼；挖十个有一个是真的，九个是假的，也是了不起的成绩！，，。由于郭以青的民族斗争观念很强，挖“内人党”坚决，受到滕海清的赏识，不久就取代权星垣当上了内蒙古革委会政治部主任。

四、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央指示滕海清挖“内入党”停下来平反、放人的时候，郭以青慌忙于五月三十一日给核心小组滕海清、吴涛、高锦明写信说：“我听到三位同志的讲话中似乎有根本否定内人党有地下反革命活动的提法。如说拿不出可靠的人证、物证来。我总觉着对这个问题慎重研究。我是不了解情况的，但根据平常的感觉，总是怀疑其有！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时期搞的这么严重，结果都是口供，没有拿到可靠证据，因而就一概否定”。“我总觉着除对广大群众坚决平反外，还应对一部分重点案件做反复的调查研究工作，不要轻易完全否定”，“退却是为了进攻，坚决地退是为了坚决地攻”。

五、六九年八月三十日对郭以青这个“左”派的历史进行审查。处在停职审查中的郭以青一九七〇年向吴涛写信为自己表功，并感到受了委屈。他说我从八届十中全会就开始和内蒙地区的民族分裂活动及苏蒙修的颠覆活动作斗争。从一九六六年二月开始，我看到了乌兰夫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对他们进行了揭露和斗争。文革背上了反乌兰夫、顶二月逆流、挖肃三个包袱，每当与乌兰夫死党放在一起斗争，便痛心万分”。当他看出吴涛是个不管事的傀儡之后，不止一次地给军管“前指”写信，仍然兜售“民族分裂”是内蒙古主要矛盾的反动论点不放，并标榜自己是“内蒙部长级高于中反民族分裂最坚决的一个，”还说“军队同志看问题简单，容易上当，放纵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现在民族主义在某些方面又有发展，阶级敌人一定会从中挑动，值得严重注意”。

六、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中，受害的干部群众在民族问题上批极左路线，要求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时，郭以青极为恶毒地说“这些人是从北边(指外蒙)指挥的”。粉碎“四人帮”后，郭以青唆使内蒙古大学他的帮派体系的人注意收集民族问题材料。他说“滕海清把党二十年民族政策弄光了。这样，民族主义就不好办了。有些人正好利用这些搞东西，你们不要受干扰，写点东西，等把民族问题是调正过来以后再说”。

七、郭以青离间、挑动东西部蒙族干部团结。“文革”前一九六五年，他向乌兰夫多次写密信：“我怀疑东部蒙族干部中有一二百人的民族分裂集团”、“他们共同特点是反对乌兰夫”，导致乌兰夫决策失误，整肃东部干部，撤厅局建委办，以机构改革措施调正干部，拿西部干部换下东部干部，以延安出身干部换掉“伪满出身”干部，引起东部区干部的动荡。这时郭以青也受到重用，提到自治区党委代常委兼宣传部长的位置上。不久“文革”开始，在《前门饭店会议》上，郭以青又

成了反乌兰夫英雄，他说“从一九六六年二月开始，我看到了乌兰夫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攻击乌兰夫搞“五大委”、“代常委”是“宫廷政变”要“搞独立王国”。同时他还转过脸来拉东部打西部，在会议期间拜访已经离开内蒙古去北京做了政协驻会常委的东部区领袖人物哈丰阿，告诉他乌兰夫已经倒了。其险恶用心，可见一斑。一九六五年他主持召开六十多次会，诬陷批判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搞“民族分裂”。《前门饭店会议》乌兰夫一倒，他就从会上给巴图写信说“乌兰夫正了你，而你是对的”，回来后还对巴图说：“乌兰夫倒了，你的问题好办了。他不仅整你，也整特古斯、整我”。他在内大全体人员大会上宣布：“没有一事实证明巴图同志搞了民族分裂”。一九六七年成立革命委员会，郭以青反乌兰夫有功当上了常委，在“红色政权”里有了发言权，他又要大干一番了，暗中勾结乌兰巴干，罗织“内人党”假案，向滕海清汇报。郭以青左右开弓打完西部再打东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郭以青匆忙来向核心小组报告：“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是内人党常委，连同 206 案件都已经被我们突破了！高锦明表扬“内大又立了一功”。继巴图之后军区政治部“突破”了鲍荫扎布，郭以青兴奋不已“同我老早就想的直属机关总有乌兰夫的那么一股势力的想法是吻合的”。高锦明再次夸奖：“这个暗班子是郭以青向我提供的。发现这个暗班子内蒙消除了“一个隐患”。由是运动正在按照郭以青设想进行着，先打西部“乌兰夫黑帮”，再打东部“哈特势力”，最后挖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内人党”，东西部“一勾烩”，蒙族干部全部打下去。

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

编者按：挖“内人党”开始，按照郭以青的策划，对巴图、鲍荫扎布实施车轮战，逼出了口供。于是立即由滕办主任李德臣起草，“杀良冒功”上报中央，声言突破了“206”案件、挖出了“新内人党”，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由中共内蒙古核心小组付组长高锦明签发报送中央文革、毛泽东主席。

在一九六三年，内蒙古公安部门在邮检中发现了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名义给泽登巴尔的一封信，信中恶毒攻击和咒骂我党，并要求“内外蒙合并”。这个案件在乌兰夫、王再天等人包庇下，几年来不但未能破案，案情完全向阶级敌人暴露，而且长期制造与论，似乎一九四六年承德会议以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已不存在了，这个叛国案件也是不存在的，造成了很大假象。文化大革命初期，曾试图破案，后因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冲击，未能完成。在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斗争中，广大群众起来揪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一些骨干。此案昨日(二十五日，上午初步突破。证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存在的，而且长期与我为敌，一直大搞民族分裂主义。据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乌兰夫死党、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鲍荫扎布供认：一九六三年七月或八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内蒙古大学的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巴图到他家，他给鲍讲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一九六三年代表大会的宣言和代表名单。这个名单中包括七十人左右，现在鲍还记住

的有内蒙古语委主任额尔敦陶克陶等四十五人。这个民族叛国集团约在一九六三年二、三月间，在集宁以合法会议为掩护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中特古斯、哈丰阿讲话，通过了宣言。宣言的中心大意是反对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内外蒙合并”而斗争。这个宣言可能由特古斯起草，额尔敦陶克陶负责油印。他们给泽登巴尔的信暴露后曾组织退却。巴图曾找鲍荫扎布策划，当时决定依靠公检法的“三长”捂盖子过关。因为特木尔巴根就是其中的成员，公安厅副厅长可以争取，他们应不害怕。

以上情况是初步突破，除有些问题与我们掌握的材料相同，某些情节与巴图交待吻合外，还不能完全肯定鲍荫扎布交待口供的可靠性。选定鲍荫扎布、巴图、额尔敦陶克陶、特布信、旺丹、玛尼扎布为重点：

编者：206 案件原件写的是“蒙古人民革命党”，而在这个报告中已成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个“内”字是“内人党”的炮制者们做的手脚。

扑朔迷离“206”案件

“206”案件从 1963 年发案到 1968 年的“挖肃”运动，由暗到明，由秘密到公开，演变成了内蒙古的瘟灾。此案原本是一个玩弄政治把戏的个人作案。然而由于一些民族迫害狂政治投机者们的炒作，愈演愈烈，终于酿成祸及全区的民族灾难。

这个“206”案件，1963 年 2 月 6 日发生在乌兰察布盟所在地集宁市，署名《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呼吁“内外蒙合并”、“争取蒙古民族统一”的一封信：原件是在一幅兰绿彩印的梅兰芳画屏背面纸上用兰黑色钢笔手写的旧体蒙文。因为邮局工作人员在 2 月 6 日这天在检信时发现的，故编为“206”号案件。案发后，立即报到内蒙古最高当局。内蒙古领导人立为重大案件责成有关部门组织力量侦破，并上报中央。信中讲“蒙古人民革命党于 2 月 3 日在集宁召开了有 43 名代表参加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是侦察破案工作第一步就从这“2 月 3 日”、“43 名代表”的“开会”、“住宿”、“会场”人手开展侦查工作。走过集宁的人都知道，这里是寒冷的“灰腾梁”高地，阳历 2 月 3 日，正是数九寒天。集宁是个县级小市，盟公署有个小宾馆，市政府有个小招待所，还有些民间小旅店。会是刚刚开的，才过两三天，四、五十人的会议在哪儿开的，连个影儿都没有。中外人们都知道，六十年代的中国，毛泽东思想如日中天，群众思想觉悟高，政治责任强，阶级斗争的弦绷的紧，不可能有作案条件。第二步是查字体对笔迹，在集宁、呼和浩特两地全面查对会写蒙文的干部，也没有发现作案者。于是稽侦工作做出结案，认定为个别分子作案，不存在召开“代表大会”的可能。结案意见上报中央并抄报华北局备案。因为否定了召开“会议”的可能，个人作案也就没有必要继续查咎下去了。可以结案了。然而阶级斗争觉悟高、民族斗争意识强的“左”派人士仍然将它做为悬案，借 1965 年的文化系统正风时又查了一通，摸查了好多干部。接着“文化革命”来了，“挖肃”斗争开始了，民族迫害狂们把这个“206”案件又搬出来做为开挖“内人党”的引线。内蒙革委会成立第二专案办公室，专门挖“内人党”。这时的“206”案件，按照“挖肃”需要发生了变化。

不知道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哪一个人做了手脚，有人居然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前面加进了一个“内”字，变成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于是挖“新内入党”就堂而皇之顺理成章了。为突破“206”案件，从1967年冬至1969年春，以自治区直属机关和乌兰察布盟为重点，先后拘捕哈丰阿、特古斯、特木尔巴根、木伦、鲍荫扎布、巴图、嘎如布僧格、额尔敦陶克陶、图布新、留金锁、旺丹、葛瓦等人，突击审讯大搞车轮战逼供信，迫使内蒙古大学党委付书记巴图和内蒙古军区政治部付主任鲍荫扎布供认“内入党”在集宁召开过代表大会。滕办和高锦明收到这个口供后如获至宝，认为“挖肃”有了重大突破，立即上报中央，确认“内入党”的存在，从而掀起挖“内入党”的恶浪狂潮。

前面曾提到“蒙古人民革命党”变成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个“内”字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是1968年4月26日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上报中央《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中。文件的起草者是滕办主任李德臣。为了证实“蒙古人民革命党”演变成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个变化，将“206”案的原件附在下面。

尊贵的奥依德布道尔济同志

为了迅速合并内外蒙古，我党最近隆重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我党认为建立繁荣富强自由幸福的内外蒙古合并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您奥依德布道尔济将此件呈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

亲爱的奥依德布道尔济同志，我会将同样的五封信发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给您的这封信是其中之一。我们相信您将此具有重要内容的信定会迅即呈递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即便您不给呈递，其他同志也一定会呈交的。但您是位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人，我们想一定呈送的。您要知道，内蒙古人民的命运全在这封信中。我们把党命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其理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能够实现时，以免防止就为了党的名称而发生其他问题，同时也是标识着我们为达到目的，要坚持接受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并认为我党中央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之下设立驻内蒙古工作委员会。我们至今还是处于地下活动状态，没有武装力量。正因为这样，一直未能与你们接上关系。

下边是信函主件

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大呼拉尔主席团、部长会议

1962年12月26日签订的中蒙边界条约极大地妨碍了内外蒙合并。1961年11月26日召开有22名代表参加的首届党代大会以来，党员由852名增加到2346名。但经中蒙边界条约签订五天后，党员数额下降为1892名，内外蒙合并的希望已成泡影。我党根据上述两点情况，最近在二月三日召开了43名代表参加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主要讨论通过了我党今后工作任务、方针、政策。与会代表一致表示，内外蒙要合并，并且满怀信心。

往下是有6000字的恶毒攻击批判中国共产党的言论(略)

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蒙古人民革命党委员会

1963年2月4日

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206”案件在1978年内蒙古党委对“挖肃”所做的结论中仍然认为“没有破案”: 这就埋下了“存疑待查”的祸根。不定哪天有那么一个“左”派领导人又要翻出采折腾了。

向滕海清出首诬陷自己民族的乌兰巴干

乌兰巴干丧心病狂诬陷残害自己民族, 受到世人唾弃, 在历史上留下了千载骂名。蒙古民族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出现过他这个民族败类。

“文化革命”结束, 拨乱反正, 华国锋于一九七八年给“反党叛国的新内人党”假案彻底平反之后, 对于诬陷炮制“新内人党叛国案件”的乌兰巴干追究刑事责任, 判处十五年徒刑。乌兰巴干活罪虽已受到惩处, 他的死罪也不能免除, 在他死后, 对其罪恶亡魂“俄日勒戈汗”也要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 使其永世不得超度。

古往今来, 在世界民族历史上, 像乌兰巴干这样丧尽天良诬陷迫害自己民族绝无仅有。不管是先进民族还是落后民族, 做为一个民族成员, 人的天然本性应是爱护自己民族, 维护本民族利益。就是一个动物畜群, 它们的本能也要呵护种群, 何况是做为高级动物的人呢。中国几千年正统儒家思想也认为“未有对民族不忠, 而忠于国家者”, 一个不爱自己民族的人怎能谈得上爱国呢! 乌兰巴干为了追逐个人名利, 不惜采取残害自己民族的手段去向滕海清邀功请赏, 他的人性禽兽不如。对于乌兰巴干这个野心勃勃的政治骗子, 当时社会上已经广为非议, 他的名声已是狼籍。可是世间就有那么一些人, 自欺欺人, 相信他的鬼话。这也如同商品黑市上贩卖毒品, 有卖的就有买的。乌兰巴干这个政治扒手, 嗅觉灵敏, 滕海清来内蒙古主政不久, 他就窥察到滕海清怀疑内蒙古党政军都要“反党叛国”的心底。于是就小说家的谎言虚构编造勾画出他的“现行的、反动的、叛国的、遍布全区的、猖狂活动的新内人党的上百个设想蓝图奉送给滕海清将军。乌兰巴干还绘声绘色地向滕海清报告: “啊, 滕司令员啊! 内蒙古到处都是嘀嘀哒哒敌台的声音哪!”。怀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滕海清深信不疑, 就拿这些荒诞无稽的东西去开挖子虚乌有的“反党叛国的新内人党”。当然, 滕海清等人挖“内人党”的决策来源不只是乌兰巴干的报告, 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

“谎言说上一百遍就会令人相信是真的”, 乌兰巴干为了让人相信他的谎言, 到处讲演:

“乌兰夫二十年来, 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发展内人党, 内蒙古草原遍地都是内人党。

“啊! 可爱的呼伦贝尔啊, 可惜! 如今只剩下呼伦了。那贝尔哪里去了呢? 叫乌兰夫、嘎如布僧格出卖给蒙修了!

“内蒙古自治军把辽河两岸的汉族都杀光了, 血流成河

“伪满蒙古军铁血部队屠杀河北唐山汉人成千上万”。

随即他就声嘶力竭举手高呼“为汉族同胞报仇!”

乌兰巴干做为一个蒙古人，竟然煽动汉人，激起他们对自己民族的仇恨。对这种歇斯里的疯狂是难以被常人所能理解的。

早在“文革”运动初期，当人们还在迷惘彷徨的时候，乌兰巴干就杀出来造反了。他感到过去紧跟乌兰夫，坏事，现在乌兰夫已经倒了，需要赶快改弦易辙，是政治投机的时候了。于是上窜下跳，招摇撞骗。他跑到北京去，在地质学院《东方红》小报上以《愤怒控诉乌兰夫黑帮对我进行可耻的阶级报复》为题发表文章说“我参加革命二十年来，一直遭到内蒙古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乌兰夫及其一小撮同伙哈丰阿之流的政治迫害。乌兰夫的狐群狗党，疯狂地对我进行了诬蔑和诽谤，欺压和凌辱。”这个政治骗子在文章中还吹捧自己，抬高身价说“运动一来，把我以内蒙最大的反动权威来打，最后被打成黑帮、党外走资派，遭到残酷的斗争和无情打击”并将他自己描绘成一个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革命同志的“英雄人物”。

“泄底最怕老乡亲”，对于招摇过市撒出弥天大谎的乌兰巴干，他所在单位内蒙古文联的《翻江倒海》战斗队散发传单戳穿他的谎言，扇了他的丑恶咀脸。

乌兰巴干，科尔沁左翼中旗人，原名宝音达赖，汉名吴凤翔，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当年秋后，在一次战役中，东北民主联军、东蒙自治军通辽联军分区司令部叫他带两名战士给下乡工作团负责人哲盟领导人乌力图送三件密信。乌兰巴干胆小怕死，没有按照派定任务去工作团被半包围形势下的孙家窑村，而转路去了胡仁达窝堡他亲戚家。乌兰巴干就在这里，叫敌人从被窝里拉出来，当俘虏了。他向敌人跪下磕头，哭求饶命，“枪马都交，只要留我一条命就行”，加上亲戚给他求情。这时炮台上有人喊“八路兜上来了”，于是敌人把他扔下跑了。此情此节，乌兰巴干在其入党时作了隐瞒。一九四九年在党校学习时组织上发现他的变节行为，取消了他的候补党员资格。从此他再未能入党。对此，他对处理过他的人耿耿于怀，伺机报复，“挖肃”运动一来，他就成立《揪叛联络站》把特古斯等人抓起来，挖他们是“新内人党”。所谓“乌兰夫黑帮”对他进行“政治迫害，欺压凌辱”问题。“文化革命”前，乌兰夫当政时期，乌兰巴干已经很“红”了。他写出小说《草原烽火》，尤其是第二部以乌兰夫的革命活动为背景的小说《燎原烈火》动笔之后，乌兰巴干的前程有了转机。一九六〇年内蒙古第二次文代会上安排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九六一年在国家困难时期，全国没有提高工资情况下，单独给他提了两级工资。一九六三年乌兰夫亲自提名乌兰巴干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常委。一九六五年机构改革成立“五大委”时，由布赫提名安排为内蒙古文联付主任。可以说乌兰巴干是扶摇直上，几年工夫由一个一般文化干部爬到了厅局级档次的位置，官位、社会地位名利兼收，在报刊广播中给他广为宣传，成为风云人物。开会叫他上主席团，又叫他传达全国人代会精神。一九六六年《内蒙古日报》元旦专号上以“各族各界先进代表人物”刊登乌兰巴干微笑的大幅画面，乌兰巴干出尽了风头，这时的乌兰巴干意气风发，逢人便讲“我之能成为人大代表，能有我的今天，全是乌兰夫主席的培养关怀”“这次成立五大委，我当了文联副主任，证明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乌兰夫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对内蒙古革命事业有过巨大贡献，是民族政策的权威。是蒙族革命的领袖，成立五大委是乌兰夫的英明决定”。乌兰巴干说过这番话不久“文化革命”开始，乌兰夫被打倒，成了“黑帮”。曾几何时，乌兰巴干这个

变色龙翻云覆雨，黑白颠倒，大骂“乌兰夫狐群狗党”对他“政治迫害”、“疯狂欺凌”。人们不禁要问世间还有这种“迫害”吗？乌兰夫“欺凌”乌兰巴干的结果是提官、晋级当代表，上主席台。

乌兰巴干在“挖肃”中为滕海清效力卖命，跑南京窜北京，日以继夜加工赶制“叛国案件”，辛苦劳累，“挖肃”产品源源不断送往“滕办”。乌兰巴干作贼心虚，带上大口罩，蒙住咀脸，出没于郭以青、“滕办”之门，鬼鬼祟祟，独来独往。他向滕海清叫苦报怨，说他如此卖力，可是理解支持的人太少。他每天提心吊胆，怀里抱着一大堆材料睡觉，担惊受怕，要求派兵保护，并要求发给他枪支弹药以防身。对于乌兰巴干的摇尾乞怜“滕办”不加理会，只是在暗中听他汇报，收他材料，什么也不给他。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批示打“内人党”要订下来放人。这时乌兰巴干成了丧家之犬，“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无处躲藏，平反放出来的受害者到处捉拿乌兰巴干。有一天晚上堵到他家门，愤怒的群众乱棍打了一顿，屁股上扎了几刀。人们听到之后拍手称快，然而又评点干的不好，只叫他皮肉受苦不够劲儿，应该把他耳朵、鼻子割掉，令他精神上受辱，羞见世人。

一九六九年八月，中央在北京空军学院办“挖肃派”、“批滕派”两派头头及受害者代表学习班。乌兰巴干窜到北京想找黄永胜挤进学习班，妄图论证“内人党”的存在，他藏在西郊苞米地里想跟“挖肃派”取得联系，被巡逻民兵抓住遣送回内蒙古。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厚颜无耻之徒。内蒙古军区也有个同类人物叫吉尔的蒙古人。不知他们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莫名其妙的人性心态，在广大受害者同声齐呼没有“内人党”的时候，独有他们却要证明其存在，你说怪也不怪，因为乌兰巴干之流叫嚣有“内人党”，所以挖派就有人制造“挖内人党是蒙古人自己挖的，我们知道啥，他们说有就挖呗！”。一九六九年“五、二二”后全区第一次平反落实政策会上，内蒙古卫生厅“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负责人×××就是这么讲的。乌兰巴干是坏，坏透顶了。然而充其量他是个党外群众，编造谎言的小说家如果不是滕海清，乌兰巴干的谎言屁话能起个什么作用呢！曾在“挖肃”初期，早有人预言“内人党”挖塌了，必定要拿乌兰巴干顶罪。这话果然应验。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起诉书

[87]内公(审)8号

被告人乌兰巴干，又名吴凤翔、宝音达赖，男，蒙古族，现年五十八岁，家庭出身经营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原籍哲盟科左中旗巴彦塔拉乡，文化程度大学，捕前系内蒙古文联干部，住内蒙文化厅宿舍。

主要简历：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三年在原籍上学；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在伪满陆军兴安(王爷庙)学校上学；一九四六年在我辽吉军区参加革命；一九四七年调兴安军区政治部任宣传干部；一九四八年调内蒙古报社任编辑；一九五〇年调内蒙古日报(东部版)任组长；一九五七年调内蒙古党委宣传部任干事；一九六〇年入内蒙古大学文研班学习；一九六四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副主席；一九六五年任内蒙古占文联副主任；一九七〇年到内蒙建设兵团劳动锻炼；一九七二年下放至乌盟察右中旗乌兰公社那日斯大队；一九七五年以后没有分配工作。

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因制造“新内人党”假案的罪行经自治区党委批准由内蒙古公安局拘留，同年九月二十九日依法逮捕。

被告人乌兰巴干一案内蒙公安局本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就移送起诉内蒙古人民检察院,同年十月七日内蒙人民检察院起诉到呼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九八一年九月七日内蒙党委运动办调走乌兰巴干的案卷进行统一审查,故法院未做审理。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根据内蒙党委政法委员会(1986)31号文件意见,又将该案交公安厅再次审查。经过进一步的审查,证实乌兰巴干犯有下列罪行:

被告乌兰巴干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在内蒙古大学召开会议,研究建立跨行业组织“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简称“揪叛站”),乌兰巴干任站长,受到了原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的支持。

“揪叛站”组建之后,被告乌兰巴干就大肆搜集所谓“内人党”的历史和现实材料。并派人到各盟市、东北、北京、南京等地有关部门和档案馆搜集历史资料,采取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篡改、歪曲内蒙历史和颠倒事实的恶劣手法,泡制了127份材料,提出有一个“新内人党”反革命集团,上报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制造了“新内人党”大假案,对全区挖“新内人党”造成严重的后果,起了很坏作用。乌兰巴干自己也在“我的检查”中承认“挖‘内人党’的号角就是我第一个吹响”。

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乌兰巴干亲笔给李德臣、李树德写信报送的《内蒙反动党团及敌伪情报系统简介(一)》,长达一百一十页,列举了七十六个组织,点了一千三百五十一一个人的名,其中不少是内蒙各级领导干部。同年四月十五日报送的《内蒙反动党团及敌伪情报系统组织简介(二)》,特意注明所指反动组织的时间是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至一九六二年。上报以后,很受当时领导人的重视。(李德臣、李树德批示)同年六月一日乌兰巴干以个人名义给李树德写信。报称“内人党一九六三年在呼市财贸学校恢复了组织活动,经调查研究,认为这个案子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与蒙修领事馆特务集团有直接联系”,“财校内人党支部的全称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财贸干部进修学院委员会’是六三年六、七月间在财校开会等建,九月一日正式成立”:一九六八年二月,乌兰巴干到北京,向“滕办”秘书李良递交了《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锡盟苏蒙修特务叛国集团分布例》,两图中标有情报据点、电台线索、越境方向等一百九十八处。乌犯等绘制报送的《内外蒙合并图》、《蒙修情报系统在北京活动简图》,捏造了蒙古大使馆通过北大外贸学院留学生与呼市、锡盟、呼盟、海拉尔等等所谓叛国集团相联系的活动情况。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上报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什么货色》,捏造“在乌兰夫之流保护伞的包底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不仅名散实存,而且越来越发展扩充其党徒,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证明,该党到一九六三年就已经发展到两千多名党徒,他们转入地下,继续猖狂地进行民族分裂、叛卖祖国、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反革命活动:由乌兰巴干于六七年十月三日整理上报的《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国集团的罪行的简要报告》,无中生有地捏造“实际上人民革命党是蒙修设在内蒙的大特务组织”,“四十二人委员会实际上是原人民革命党蒙修特务组织”,“语委是乌兰夫以哈、特为首叛国集团活动的舆论黑店,实际上成了乌兰巴托的分所”。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上报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现行叛国罪行的报告》,又捏造“在乌兰夫和王再天的直接庇护下内人党党魁和骨干也纷纷钻进了公、检、法掌握了政法大权”。“在我区形成叛国集团、苏蒙修情报系统、内人党,及其它反动党三位一体的反革命网,直到现在仍猖狂活动”。

被告乌兰巴干从一九六七年十月至六八年五月以“揪叛站”站长的身份,先后到呼铁局、呼铁公安处看守所、内蒙古财贸学校、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工学院、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内蒙古军区步校、内蒙古农科院、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内蒙团校、呼市警备区等二十多个单位作所谓“内人党”的产生、发展和现行活动、内蒙地区有乌兰夫叛国集团的“三股势力”,内蒙党、政、军、团的所谓“四个演变”或“四个改编”的报告,即:内蒙的共产党由“内人党”演变的;内蒙的干部由王公贵族演变的;内蒙的军队由内蒙古自卫军或日伪铁血部队演变的;内蒙的共青团是由“内人团”演变的。为挖“新内人党”大造舆论。在这些报告中乌犯还散布了大量煽动民族情绪,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动言论,甚至高呼“为华北汉族同胞报仇”等挑拨性口号。乌兰巴干在内蒙医学院中医系作报告时当场指名该系主任、党支部书记包孟武同志是“内人党”,“民族分裂集团成员”,并讲了大量的挑拨民族关系的言论,这个报告挑起了该系蒙汉学生间的武斗,致使包孟武同志惨遭迫害。六八年四月二日在内蒙古财贸学校作报告中煽动说:“内人党这个组织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文化大革命前还在集宁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久财贸学校就成立了“新内人党”专案组,齐木特、浩特、刚格尔等同志被诬陷为“新内人党”而遭到迫害。在蒙专作报告时威胁师生们说:“我在这儿讲话,内人党分子就在这里”,致使这个学校的一些同志遭到长期刑讯逼供,造成了严重后果。

被告乌兰巴干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期间曾参与对通福、宝根沙二同志非法抄家和把布和巴雅尔同志抓到内大生物楼武斗的活动。党中央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关于内蒙停止挖“新内人党”的批示下达后,被告乌兰巴干坚持原来立场逃到北京、张家口等地继续进行活动,对抗中央五、二二批示。

一九七八年五月乌犯被捕后,很长时间仍拒不认罪,直至八二年六月后对其罪行才有了些认识。但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保外就医后,又擅自离呼,赴京上访,严重违反了有关犯人保外就医的法律规定,说明仍没有完全认罪伏法。

综上所述,被告人乌兰巴干是“新内人党”假案的积极制造者,捏造了大量的所谓叛国材料,指名道姓的诬陷了为数甚多的干部、群众,后果严重,影响极坏,犯有诬陷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现将此案移送审查依法起诉。

此致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厅长 石占宽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7)呼法刑一判字第 31 号

公诉人: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侯曦光、王洪峰

被告人:乌兰巴干,曾用名吴凤翔、宝音达赖,男,现年五十八岁,蒙古族,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大学,内蒙古哲盟科左中旗人。住内蒙古文化厅宿舍五号楼

十四单元八号。原任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副主席，内蒙古文联副主任。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因参与制造“新内入党”假案由原内蒙公安局拘留，同年九月二十九日依法逮捕。现在押。

辩护人：苏日鲁克(系被告人乌兰巴干的儿子)、刘雅华(系被告人乌兰巴干的女婿)，为被告人乌兰巴干辩护。

被告人乌兰巴干因诬陷一案，由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八日公诉来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侯曦光、王洪峰出庭支持公诉，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一日在乌兰恰特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乌兰巴干于一九六七年十月成立跨行业的群众专案组织《揪叛国集团联络站》简称“揪叛站”，乌兰巴干任站长。该站成立后，明确制定工作重点是揭露“内入党”的现行叛国罪行。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揪叛站”向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报送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现行叛国罪行的报告》中，捏造“新内入党”是根据蒙古“内入党应地下化”的旨意，一九四六年二月宣布解散内入党，三月又成立了“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哈丰阿、特古斯、戈更夫参加起草“新内入党”党纲和党章。并编造“新内入党”实际上成了蒙古的特务组织，积极地为“内外蒙合并”效劳。“新内入党”于一九四六年三月秘密改组，设立了东蒙党部，哈丰阿任秘书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为副秘书长，选出十三名执行委员，包音扎布、特古斯、木伦、纪锦涛、义达嘎等人担任执委。在报告中并诬陷乌兰夫极力推行所谓“从旧到新”的路线，首先将“新内入党”改编成共产党，从哈丰阿开始，几乎将“新内入党”的党魁及骨干分子全部拉进党内，将“内入党青年同盟”改编成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内人团，将日伪兴安骑兵、铁血部队(内入党的武装部队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的前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乌兰夫用“从旧到新”的政策，将“日特”、“蒙奸”、“法西斯党徒”、“刽子手”、“反动军官”、“新内入党”的党魁和骨干全部包庇下来，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合法身份后，更是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从此出现，许多“内入党”的变种——几十个反动组织。并诬陷朋斯克、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敖喜尔、包音扎布等二十多名厅局级干部，为蒙修的文化侵略大开绿灯，大搞叛国投修活动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揪叛站”报送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个什么货色?》中捏造说：“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反对、拒绝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在报告中还编造说：在乌兰夫之流保护伞的包庇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不仅名散实存，而且越来越发展扩充其党徒，到一九六三年就已发展到两千多名党徒。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一日，“揪叛站”在上报《关于现行活动的“内入党”综合报告》中捏造说：根据蒙修指示，由蒙修派遣蒙古籍特务，协同内蒙的“蒙修特务：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重新纠集了一批“蒙修特务”，如阿思根、义达嘎、木伦、特古斯、包音扎布、纪锦涛、戈更夫等在四六年三月一日秘密组织了“新内入党”，由此可见，“新内入党”就是由蒙修中央和蒙修内防部直接操纵和指挥的特务集团，蒙修就是“新内入党”的总根子。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被告人乌兰巴干起草了《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国集

团的罪行简要报告》，并在报告中捏造说：乌兰夫“黑帮”集团将哈丰阿“叛国集团人民革命党”、“蒙修特务”几乎全部拉进党内，包庇重用，安插在党、政、军、文化界、青年团主要领导岗位。二十年来，他们披上了共产党员的外衣，进行合法活动。一九五六年七月，哈丰阿、特古斯在乌兰夫的旨意下，派额尔敦陶克陶为首的一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出国，去蒙修以“内外蒙语言文字统一”为幌子，大谈特谈“内外蒙合并”的问题，公开进行叛国活动。在这份报告中，还诬陷巴图、王海山、巴图巴根等三十一名领导干部是蒙修设在内蒙古的大“特务”组织。

被告人乌兰巴干主持编造《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锡盟苏蒙修特务叛国集团分布图》、《内外蒙合并图》、《蒙修情报系统在北京活动简图》，并在这些图上捏造出反动据点、暴动地点、电台等，就《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一图上就编造标出苏蒙修情报据点在我区有七十二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外蒙合并委员会”等反动组织活动地区十七处，“叛国集团”据点二十九个，“民族统一党”计划武装暴动地区三处。

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被告人乌兰巴干在“揪叛站”担任站长期间，还到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工学院、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内蒙古文化局、呼市警备区等几个单位作有关“内入党”活动的报告，在报告中捏造说：“内入党这个组织一直没有停止活动，文化大革命前还在集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等。在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作报告时，当场诬陷该系主任、党支部书记包孟武是内入党、民族分裂集团成员，致使包孟武遭到迫害，一九六八年五月，被告人乌兰巴干在内蒙古文化局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在提到“新内入党”组织在内蒙古直属机关分布情况时，诬陷福祥是“内入党”执行委员，还说福祥又发展了乌力吉巴雅尔、岳斯图等人，煽动电台对福祥应采取措施，致使福祥受到迫害。

综上所述，被告人乌兰巴干在“揪叛站”担任站长期间，领导和主持编造上报大量的假材料，篡改和歪曲内蒙古历史，诬告陷害内蒙古的干部和群众，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构成了诬告陷害罪。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确保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以诬告陷害罪判处被告人乌兰巴干有期徒刑十五年。

刑期：从判决之日起计算，即：自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起至一九九三年四月三十日止。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 庭

审判长戚宏毅

审判员乌力吉

代理审判员 夏伟林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宫静

砸烂公检法为“挖肃”鸣锣开道

公检法是保卫人民震慑敌人的国家专政工具，是我们党夺取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行使职能的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专政机关。然而，滕海清把共产党的公检法当做“内人党”的公检法来砸，把一个好端端的公检法机关，砸了个稀巴烂。他说“内蒙古公检法是镇压革命人民的闫王殿，是公开包庇坏人的合法机关，是一个黑窝子”，掌管政法的书记王再天是“活闫王”，“乌兰夫统治内蒙古二十年，他的黑线又粗又长，流毒全区，反革命势力遍及全内蒙，文教卫生、公检法、党政机关是重点，特别是文艺界、公检法是重点的重点”。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委会上，滕海清发动“挖肃”运动。这是在运动初期打完西部区蒙古族干部之后，现在要转向打东部区蒙古族干部的新的动员。滕海清在其动员讲话中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乌兰夫推行反革命政变的骨干力量大部分已被揪出来了，但并不是都揪出来了。在文化大革命纵深发展的时候，一向活动比较隐蔽、伪装比较巧妙的乌兰夫残党余孽也已经开始暴露了。他们当中，有的已经钻进了革命队伍，甚至披上了“左派”、“革命领导干部”的外衣。滕海清在这里点的“披上左派、革命领导干部外衣”的人指的是谁呢？就是特古斯和王再天。他俩参加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后来滕海清就把王再天、特古斯称之为“乌兰夫的第二套暗班子”：

由于历史、地理上的隔绝，内蒙古分为东部、西部。哈丰阿在东部区首先发起开展自治运动，随后乌兰夫从西部区到乌兰浩特主持召开“五·一”大会，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这是历史形成的东西部两个地区的蒙古族干部队伍。运动初期打“乌兰夫黑帮”把默默特籍的延安民族学院的老干部全都打倒，连同群众以“土家村”、“云家店”全都扫了。这样，“挖肃”运动劲头儿实际上是冲着东部区干部来的。滕海清在其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二次全委会结束讲话中不打自招地承认说“他们打起反动的民族主义破旗，煽动和利用民族情绪，恶毒地叫喊什么文化大革命尽打蒙古人，先打西部，后打东部；先打乌兰夫，后打哈丰阿。企图把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引向反动的民族主义歧途。不是已经出现了什么成吉思汗战斗队、嘎达梅林野战军了吗！还有的公开打起为乌兰夫翻案的旗号，甚至搞秘密活动”。这是滕海清自编自唱的拙劣表演。他本来就是这么干的，还要倒打一耙，说蒙古人“打起反动的民族主义破旗”反对他的“挖肃”。你拿大汉族主义狼牙棒乱打蒙古族干部，蒙古族干部反对和抵制一下就不行吗！从发动“挖肃”的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起以揪出王再天、滕和来做为砸烂公检法的象征，同时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取代公检法机关的部分职能，公安厅的职能转成为“挖肃”工具，公安厅军管会主任任家骥就任专打“内人党叛国集团”的自治区革委会第二专案办公室主任，公安厅政保一处帝国特侦察科长丁振声任副主任。滕海清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呼铁局学代会上讲“揪出王再天、特古斯之流，各个单位对本单位的坏人实行了群众专政，问题越揭越深，线索越来越多，运动更加深入了”为他砸烂公检法的行动效果叫好。《内蒙古公检法专揪王再天小组》按照滕海清的旨意以《王再天包庇坏人反党叛国罪责难逃》为题，内蒙古公安厅“挖肃派”以《旧公安厅是包庇坏人的合法机关》为题在《联合战报》上发表“彻底砸烂旧公检法之一、之二、之三、之四”。

砸烂公检法，其实砸的是公检法机关中掌权当政的民族干部。众所周知，内蒙

古的自治，起初是高度自治，公安政法部门当然都由蒙族干部担任，直到蒙绥合并才发生，变化。这个历史也成了砸烂公检法的依据。《专揪王再天小组》数落“活阎王”王再天的罪行有下列五项：

——打着自治机关民族化幌子招降纳叛，把坏人拉入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教育部门，作为他们的老班底。伪满官吏哈丰呵任副主席，老牌民族分裂分子、蒙修特务朋斯克任公安部长，内人党魁、老牌民族分裂分子特木尔巴根任法院院长，日伪旗长乌力图任民政厅长，蒙修特务毕勒格巴图尔任公安厅长，出卖祖国大片领土的卖国贼嘎如布僧格任外办主任，还叫木伦、云世英、腾和等任侦察处长。一九五七年内肃反时，王再天以自治区五人小组名义规定“解放初期，由于民族主义而参加或组织各种民族主义性质的党派活动，均不以反革命论；在敌我拉锯形势下，曾反复叛变，但最后还是归顺人民的，或者在解放后因对我党政策不了解而叛变骚动后回归者，也不加追究。这样，就把这些坏蛋全部保护过关。”这就是“活阎王”王再天保护坏人的证据。

——在牧区推行无阶级论政策，王公贵族、牧主、喇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牧主被拉入公私合营牧场当副场长，从青海接回来的参加反革命暴乱的数百名反动喇嘛都分散安置在召庙。

——以内蒙古是一个民族地区，又是一个和平起义地区搞特殊论包庇重用坏人，将数百名人员安插为自治区副主席、厅长、处长、科长等各级领导职务。跑到阿拉善旗的数百名德、李匪帮人员，被王再天、毕力格巴图尔包庇下来不准押回原地处理，有的还安排为政协副主席。

——以“友好”为名勾结蒙修特务头子，引狼入室，对我国进行情报策反颠覆活动。王再天勾结蒙修，就是为了内外配合，分裂和颠覆我们伟大祖国。

——文化革命中，蒙蔽群众，包庇乌兰夫残党余孽，千方百计保护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干将毕力格巴图尔等人。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下达后，他披上革命领导干部外衣，在公检法积极安插亲信，继续控制公检法，紧紧捂住公检法阶级斗争盖子，妄图在新生的红色政权中继续控制公检法。

滕海清及其挖肃派，拿出了述五条罪状做为打倒“活阎王”王再天以及砸烂公检法的根据。对于这些东西，内蒙古的老人知道，王再天主持内蒙古政法工作在文化革命前的二十年中是执行了“左”的政策。对他以前经手的好多案件，在文化革命以后重新做，从宽处理，不是纠宽，而是纠严，何谈“包庇坏人”！

滕海清砸烂公检法之后，形成了清一色的“挖肃”骨干队伍，为其深挖“内人党”扫清了道路。这些挖肃骨干队伍在毛主席“5.22”批示下来以后，他们的认识也不转变，仍坚持“内人党”的存在。郑维山执行军管以后继续挖，要挖出“真”的“内人党”来，以致把腾和打死，把毕力格巴图尔重新打成“新内人党头子”。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对“新内人党”做了彻底平反，以××为首的公安厅这些铁杆“挖肃”分子们消极抵制，不主动作平反工作。华国锋、胡耀邦对嘎如布僧格的“内人党现行反革命案”做，批示之后也拖延不动，不得已，还是由受害的蒙族干部包福德(公安厅)白成章(政府办公厅)查找材料起草平反决定，由受害者给受害者关心平反。本来这是犯有“挖肃”错误的干部向受害者认识错误挽回不良后果的极好机会，可是他们却不干。由于他们对“内人党”平反昭雪有抵触情绪，对于中央这个平反文件不予归档，随手销毁丢弃，因而再也查不到这个有胡耀

邦、华国锋批示的重要原件了。

滕海清讨伐“内人党”

一、乌兰夫有一个暗党，他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他是内人党。乌兰夫暗党这个班子是很大的，很强大的一套班子，是暗班子，掌权的套班子，这批暗班子有些已经混到革命委员会，在革委会里掌权。这个内人党很危险，他比叛徒、特务还危险。叛徒、特务他们不会组织一个支部，组织一个党委，组织一个特务党委、叛徒党委。他的内人党有党委，有支部，有领导小组。

——滕海清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在华建讲话。

二、“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里通外国的，专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反革命组织，实际上已成为帝修反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情报组织、特务组织。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滕海清签发的

《内蒙革委会深挖内人党领导小组第一次碰头会纪要》

三、阶级敌人利用民族问题大作文章，他们打起反动的民族主义破旗，煽动和利用民族情绪，恶毒地叫喊什么“文化大革命尽打蒙古人，先打西部，后打东部；先打乌兰夫，后打哈丰阿”企图把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引向反动的民族主义的歧途。

——滕海清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

革委会第二次全委会上的讲话

四、当前领导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右倾。一是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特别是对“内人党”这个反革命组织估计不足，不少领导同志在关键时刻就犹豫动摇，持怀疑态度，怀疑有没有“内人党”，因此就不敢勇敢地领导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二是看支流多，看主流少。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在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指手划脚、批评指责，一个劲反对，泼冷水。“内人党”是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工具，是里通外国的，让这样的人掌握枪杆子、印把子不害怕，群众起来了，出点问题有什么可怕的！广大革命群众就是好，特别好，好极了！如果你不是“内人党”，难道群众非要把你打成“内人党”不可？

滕海清于一九六九年二月六日

在北京汇报会上的讲话

五、“内人党”有没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有多少？要相信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什么角落都冲到，揭发出来就好办了。要弄清有多少，没有什么必要，有多少挖多少。是否面宽了？谁有数字可以说明，谁能肯定我那个单位五百个挖出来一千个。如果“挖肃”斗争按高锦明那样做，那时就刹车，这几十万坏人就抓不出来。

——滕海清于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在

内蒙革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六、今天这个汇报,主要是交流经验,大家做了好多工作,做的很出色。要把工作做好,困难还会很多。只要发动群众,我看时间不会太长。讲几点意见:

(一)、“内人党”总后台是乌兰夫。这一点不容发生什么怀疑,不管西部的,还是东部的,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搞民族分裂,都是要背叛祖国。乌兰夫要搞“蒙古共和国”,他在1947年4月20日讲话就讲到这个问题。特古斯交待的材料,就避开了乌兰夫。

(二)、“内人党”不可能不靠乌兰夫,“内人党”几股力量都要靠乌兰夫,乌兰夫要背叛祖国,他一个人也不行,必然要有一个为他服务的工具,共产党是不可能为他服务的。搞宫廷政变的,除四个汉人外(郭以青也是跟乌兰夫的)基本上都是“内人党”的核心骨干。这个问题乌兰夫不可能不会想的。

(三)、“内人党”的特点大部分是特务,是和特务联结起来的,是个特务组织,好多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都是日、苏、蒙、美、蒋特务。一股是伪满时代的以哈丰阿为代表的;一股是蒙疆的,如乌力吉敖喜尔、毕力格巴图尔,都是日本特务;土旗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好多也是搞特务的;一股是蒙藏学校的,是国民党特务。这些家伙没有一个不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他们都经过乌兰夫钻进共产党。

(四)、“内人党”四六年实际没有解散,承德会议后不几天乌兰夫就把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拉入共产党内。到61年前这段发展不大,没有形成全区性的东西,全区性的东西是61年后形成的,特古斯首先到乌盟,接着到伊盟、巴盟、呼盟,把各地的地方组织恢复起来进行了,大发展。他们把当时国内国外情况结合起来,认为共产党要“垮台”,所以在这以后有了个大发展。现在,军内问题搞的比较清楚些。要搞清楚,首先一个要充分发动群众,把“内人党”的组织彻底摧垮,不仅上层的,下层也要摧垮。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动摇。不能光靠专案要充分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是摧不垮的。再一个要从政治上批臭,这一点一定要坚持搞。通知的几条基本是正确的,缺点是前面纲领性的东西没有写。怎么搞?

1. 重点首先是打击首要分子,如特古斯、哈丰阿、朋斯克、乌力吉敖喜尔、嘎如布僧格、都固尔扎布、鲍音扎布等,首先把这些人搞清楚,其他人就好搞了。王再天说他62年才和“内人党”接触,他有些交待是假的。特古斯有些交待是合理的,但有些问题没交待。鲍音扎布很狡猾。交待好就要区别对待,要多讲这个问题。要集中一些水平较高的有经验的骨干搞这些人,光有热情没有经验是搞不动这些老特务的。

2. 支部书记骨干至少也有上千以上,重点要搞最反动的民愤大的。有些虽然不是骨干,但罪恶很大也要狠狠搞。“内人党”内的双料货。搞他主要的,这类人定案处理按他的最大问题定性。

3. 对一般“内人党”徒要通过办学习班弄清问题,就是要他交待问题。不弄清问题,就不可能和“内人党”组织上割断联系,思想上划清界限。交待清楚问题,处理从宽,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有的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内人党”员,“内人党”是反共产党的,共产党员参加“内人党”就是反党,反党不弄清楚怎么能行呢?不交待怎么行?马马虎虎是不行的!你拥护共产党为什么加入“内人党”?不交待,群众怎么相信你,组织怎么相信你?通知中指的农村、牧区的基层干部是指的不脱产的基层干部,机关干部多少是掌权的,好多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搞清,松松快快就过去,就得不到教育。

4. 政治上要有压力, 没有压力他就不愿交待, 压力不是去扣人, 压力就是讲毛泽东思想, 讲政策, 讲事实摆道理, 发动群众。

5. 争取一些人起义, 过去表现好, 这次运动表现也好的, 只要交待了就大胆解放, 解放后并可和我们的骨干结合起来, 放到火线去考验, 但要防止串供, 考验的好就更加信任。有些人可以去叫他做些平常工作。有的骨干分子能交待好。能给我们做工作的, 也可利用。不要怕, 他交待了, 我们对他有底。怕什么? 再干坏事再搞他。当然要看清楚, 他交待的真是假, 我们心里要有数。押在我们的骨干里去让他们做工作, 不能让他暴露案情。

6. 家属子女工作要跟上去, 办学习班, 这些办法都好。要给出路, 利用他们, 方法要对, 方法不对, 说明我们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要掌握活思想, 不要失掉战机……李树德)要抓住战机做工作, 这些人在学习班里, 脑子是很紧张的。

7. 兵力很薄弱, 还是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吃饭还是要一口一口, 有些党徒没有搞放在那里, 不要急, 把首要分子、骨干分子突破了。把一号、二号、三号人物突破了, 搞得心中有数了, 将来那些人好搞。

我们搞敌人, 敌人总是要吹风, 不要怕敌人跳, 也不要怕人家说右倾或“左”倾。

8. 队伍要经常整风, 三两天总结一 F, 正顿一下, 交流经验再战。搞一个时期, 骨干训练他几天, 研究敌情, 研究战术. 研究办法, 这样看起来慢, 实际上是会快的。

——滕海清在核心小组二月二十日召开的

“内入党”学习班经验汇报会上的讲话。

七、“内入党”牵涉面这样宽, 有的说是, 又不是, 说不是又是, 现在没有办法否定是, 还是不是。这个问题是个问题, 值得研究。目前还是集中力量抓首要分子, 首要分子搞清楚了, 下层也就清楚了。我们要培养骨干, 要研究战术。打仗有几种办法, 一是先打外围, 打软的, 再打硬的; 一是先打主要敌人, 力量强还是先打主要的。主要的就是首要分子、骨干。现在打仗心中没数, 到处是敌人, 这个仗怎么打。肯定某些单位可能坏人比好人多, 从全局说还是好人多。怎样使用骨干, 除了可靠的骨干外, 还有没有可以给我们工作的, 应不应该争取一些。七十个人怀疑七十个人, 这个仗就没法打了。就是这七十个人都有问题, 总是还有个轻重, 要很好分析. 要向骨干讲清道理。“内入党”徒咬了那么多人, 先不要动他, 该用的还是要用, 让他工作, 考验他。他是“内入党”就不会那样的挖敌人, 他就是“内入党”徒, 他愿意挖“内入党”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不可以用呢! 心中有数你怕什么, 不要上当。真正的“内入党”把挖肃积极分子都咬成“内入党”。要考虑真要是敌人他那样挖肃积极是不可能的。党委、人委坏人不少, 不这样看不对。但是总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好人。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晚在内蒙

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汇报会上指示。

八、集宁地区揪出的“内入党”不少是汉人,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有没有那么多, 要调查一下。当然, 汉人也有加入“内入党”的问题。有的是自觉的, 有的不是自觉的。中国人也有当汉奸的, 给外国人当特务的, 他也不是日本人, 很多是受骗的。

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下午听取乌盟
革委主任周发言汇报后的指示。

敦促“内人党”登记第一号通告

通 告

编者按：对莫须有的“内人党”采取对待反动会道门那样，以乌云压城之势逼迫怀疑对相进行登记。这种令人发指的行径，是由滕办主任李德臣提出，指令呼和浩特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马伯岩干的。马伯岩其人曾在“5.22”指示中，周恩来点过他的名字。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光辉照耀下，我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群众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当前，我区同全国各地一样，正处在伟大的斗、批、改高潮之中，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彻底胜利。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转政法委员会《关于对“内人党”进行登记的几个具体问题意见的报告》指示，对一九四七年“五一”大会后，“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都是反革命组织，其成员必须进行登记。现就登记工作通告如下：

一、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登记工作，在内蒙、呼市两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登记工作办公室。登记办公室在呼市工代会三楼，电话 2267：办公室下设五个登记站。分别设在：东风区公安机关军管小组，新城西街派出所，红旗区公安机关军管小组，向阳区公安机关军管小组，郊区公安机关军管小组，负责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全部登记工作。

二、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登记工作，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是彻底摧垮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夺取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重大措施。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行动起来，打一场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人民战争积极检举、揭发“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成员。检举揭发的广大革命群众到各登记站和登记工作办公室口头反应情况或书面形式都可以。

三、一切参加“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成员们，你们已经处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你们逃不出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你们要认清形势，选择出路。必须起来检举、揭发“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一切参加“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成员，必须立即坦白交待进行登记，并积极起来检举揭发，才是唯一出路。拒不交待，定要严惩。

四、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成员，必须履行登记手续，填写登记表。在登记时，必须携带一寸免冠照片 2 张，填写登记表两份，填写时一律使用钢笔，按表内要求，认真详细填写，字迹整齐清楚，不得任意涂改。填写完毕后，由负责登记工作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查，不合乎要求者，重新填写。

五、一九四七年“五一”大会以后，参加“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成员，凡

居住在呼市地区的,必须按单位所在地,各公安分局所管辖范围,去登记站进行登记。

六、凡一九四七年“五一”大会以后参加“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成员,必须在10月11日至11月21日前进行登记。抗拒登记者,加重惩处。

七、其支部委员和相当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或虽无明确职务,而实际起骨干作用的分子,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如能彻底坦白交待,检举揭发,可以从宽处理;立大功者,也可以不按反革命分子论处。

八、一般成员,不按反革命分子对待;但拒不变待揭发或过期不登记者,从严处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

注:到《通告》规定的最后期限,呼市地区共登记了七十人。其中,一九四五年加入的二十三人,一九四六年的三十三人,一九四七年的十人,而所谓一九六二年以后加入的只有四人。这些人都是被追逼才来登记的。

敦促“内人党”登记第二号通告

按:到了此时,各各单位都已经将怀疑对象隔离关押刑讯逼供因而也就用不着去登记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关于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的第二号通告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发出反动透顶的“内人党”及其各种变种组织的辉煌成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内人党”及其各种变种组织,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统一领导、统一指挥、规模庞大、活动广泛的反革命组织,就是乌哈死党长期以来推行民族分裂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党叛国阴谋的罪证。因此,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必须进行登记,坚决取缔。对抗拒登记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严厉镇压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68年10月18日发出通告,并在10月20日至11月21日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在内蒙古、呼市两级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呼市群众专政总指挥部、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检举揭发,充分发挥我党的政策威力,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有一大批党徒、骨干分子进行了登记,其中对主动交待、和抗拒登记的,我们实行了政策兑

现,他们分别受到从宽和从严处理。但是,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小撮“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顽固分子,仍对我党政策置若罔闻,负隅顽抗,同时,在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工作中受到右倾翻案暗流的严重干扰和阶级敌人的破坏,阻碍登记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央十二中全会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精神和当前内蒙地区正在开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势,为了粉碎右倾翻案暗流,彻底摧垮和肃清“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反革命势力,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登记工作延期一个月,并特发如下通告:

一、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工作从11月23日至12月23日延期一个月

二、凡在1945年8月18日至1947年“五一”大会前参加“内人党”组织的成员,已作交待和未作交待的,但仍有活动者都必须进行登记,继续隐瞒,严加追究

三、凡在1947年“五·一”大会后,参加“内人党”及其所有变种组织的成员,必须在此通告期限内进行登记,拒不登记者,严加惩办。

四、凡参加搞民族分裂,搞内外蒙合并,破坏祖国统一的一切秘密组织集团,都是反革命组织,其成员一律进行登记,违犯登记严惩不贷。

重申我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严重警告你们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们:你们是争取从宽处理呢,还是顽固到底!何去何从及早抉择!!

1968年11月23日

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标语口号

最高指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各基层革委会、工宣队、军管会(组)、各指挥部、内蒙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并各分校、呼市“五、七”干校:希望你们立即动员、组织群众、迅速在本单位和市区各街道书写张贴如下标语口号:

1、全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打一场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人民战争!

2、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检举、揭发“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成员!

3、“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都是反革命组织!

4、“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成员必须在限定日期进行登记!过期不登记者,严加惩处!

5、“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成员,坦白交待,进行登记是你们的唯一出路!

6、对抗拒登记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成员一律从严惩处!

7、对能坦白交待、检举、揭发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成员,均可以从宽

处理!

- 8、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者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
- 9、全市革命人民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进行捣乱和破坏!
- 10、彻底摧垮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 11、谁搞民族分裂就坚决打倒谁!
- 12、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
- 13、彻底粉碎反革命右倾翻案暗流!
- 14、打倒美帝!打倒苏、蒙修!打倒一切反动派!
- 15、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 16、坚决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
- 17、彻底清算右倾翻案暗流的流毒!
- 18、坚决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
- 19、挖出“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20、挖出“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 21、挖出“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 22、打倒刘、邓、陶!
- 23、打倒乌兰夫!
- 24、打倒哈丰阿!打倒特木尔巴根!打倒王再天!
- 25、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 26、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
- 27、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 28、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 29、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30、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31、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32、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呼和浩特群众专政总指挥部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彻底围歼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暗班子

闻一兵

《内蒙古日报》1968年12月24日

编者按:下边选登的这篇文章是“滕办”在内蒙古寒冷的冬天将“反党叛国”的“内人党”徒们关在黑房子里,天天搞车轮战严刑逼供追索证据的严峻形势下,

组织“挖肃”写作的班子拿出来的杀气腾腾的围歼“内人党”的文章。所谓“暗班子”也者即“内人党”是也。从1968年初到年底,在这一年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几乎每十天就有一篇此类敲锣战鼓的催命文章。“内人党是乌兰夫的暗班子”,这是滕办主任李德臣提出,高锦明等人对这个提法很欣赏,当即予以肯定。张鲁问高锦明“怎么定成暗班子?”高说“乌兰夫的暗班子就是新内人党中央委员会嘛,这是个重大发现”。李树德说“这不亚于又抓了一个乌兰夫”。

随着各族革命人民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狠揭猛批那个为“二月逆流”翻案、为乌兰夫翻案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区的“挖肃”斗争出现向纵深发展的崭新局面。一年来,我们大打了扫荡战,秋风落叶,战果辉煌,横扫了一大批乌兰夫死党分子、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现在我们要乘胜前进,打一场围歼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暗班子的人民战争,把那些隐藏很深的坏蛋统统挖出来。对于混入新生的革命政权机构和革命群众组织的坏人更要坚决的挖。我们的胜利,并不能改变敌人的本性;我们的强大,只能使敌人更加狡猾,一定要集中力量,把他们彻底围歼。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同以乌兰夫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矛盾,仍然是我区目前的主要矛盾。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要害问题,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搞民族分裂,投修叛国。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乌兰夫却背道而驰,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但乌兰夫不是一个人,是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他搞民族分裂,反党叛国,复辟资本主义,惨淡经营了整整二十年,他有一大帮子人马,有一套的搞民族分裂的班子。对于他的暗班子,至今还有好些同志估计不足,认识不清。

这个暗班子,由来已久了。它是乌兰夫为实现他反党叛国的罪恶目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拿党的政治原则作交易,不惜拉进党内,由公开转入地下,改头换面发展起来的。它是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中一支凶暴强悍的别动队,一个地地道道的地下王国。这个暗班子,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活动极其广泛,实际上是内蒙古地区最大的反革命集团,它紧紧配合着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猖狂地进行民族分裂的罪恶行径,或者借着他们窃据的职权,进行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勾当。

这个暗班子,有五花八门的变种组织,然而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各族人民的团结,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把内蒙古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

这个暗班子过去是掌实权的,它的黑手伸到各个角落,有不少已经混进了革命群众组织,甚至已经钻到革命委员会,又在那里掌权了。

一切革命的同志,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暗班子,这是长期埋藏在内蒙古地区的大隐患。不把它彻底摧毁,不砸烂这个地下王国,不消灭这支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别动队,乌兰夫死党分子就不可能绝种,无产阶级阶级队伍就不可能纯洁,民族分裂主义的根子就不可能铲除,祖国的北大门就不可能巩固,时机一成熟,他们就会一轰而起,实行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反革命叛乱,分裂我们伟大的祖国。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排除一切干扰,彻底揭开这个地下王国的黑幕,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把他们挖出来!

那些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人，极力捂住阶级斗争盖子，拼命扼杀伟大的“挖肃”斗争，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保护这个黑班子，不准你触动它一根毫毛。你要挖它，他就要整你。有些顽固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本身就是这个暗班子的干将。我们一定要结合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深入开展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大揭发、大批判，把路线斗争抓紧抓到底，这是搞好对敌斗争的前提和基础。不粉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不能夺取“挖肃”斗争的彻底胜利。

围歼这个暗班子，是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要调动千军万马，打真正的人民战争。敌人又狡猾又毒辣，他们一直挖空心思地制造什么“挖肃”斗争是“老保翻天”、为“二月逆流”翻案之类的鬼话，企图导演一场群众的右倾分裂主义的把戏。我们务必百倍地警惕他们这一手，广泛地把群众发动起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一致，协同作战。如果现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再分成两大派，这不是前进，而是开倒车。我们一分裂，敌人就可以钻空子，蒙混过关，我们团结起来，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一个也溜不掉了。

围歼这个暗班子，要打进攻战，全面出击，分兵包围，一鼓作气，各个突破。同时把我们的斗争水平提高一步。要讲究政策和策略，善于分化瓦解敌人。要依靠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注意证据，谨防阶级敌人捣鬼，故意搅乱我们的视线。只要我们在斗争中很好地体现稳、准、狠的原则，再难攻的堡垒，也能攻破；再狡猾的敌人，也跑不掉。

一个围歼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暗班子的强大攻势，已经发动起来了，有的已经突破，有的正在突破，形势大好。“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我们警告这个地下王国里的难兄难弟们，你们已经处在广大革命人民的层层包围之中了，你们应该立即弃暗投明。否则你们必须将遭到人民的严厉制裁！特别是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应该立即回头，主动坦白，积极检举、揭发，争取立功赎罪。如果抱着侥幸心理，想躲过这场人民战争，或者继续顽抗下去，把自己推到一小撮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的行列中去，那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中央首长六九年二月四日接见滕海清的指示

滕海清同志二月八日在内蒙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传达记录整理。

我简单的向中央文革汇报了自治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中央首长对内蒙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了解的，非常关心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对内蒙各族人民和解放军给了很高的评价。当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很多缺点。下边传达中央首长的指示：

康老：你们十月三日的电报，请示增加副主任、常委、委员问题，我看过了，我认为增加副主任、常委，还要再看一看，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后再增加更有把握些，所以，没有批。

姚文元同志：内蒙清理阶级队伍搞得比较早，也有不少经验。

康老：内蒙敌人很多，有伪满时代的，有蒙疆的，有付作义的，还有乌兰夫

的。

谢富治同志：乌兰夫包庇了不少坏人。

这时康老拿出一份电报说：你们发了个电报，说我们对挖“内人党”问题有个电报指示，我没记得发过这么个电报，是不是我们内部传达的？

总理：你们不要把我们某些话作为指示。

滕海清同志：中央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

总理：内蒙很复杂，内部有敌人，外部有修正主义，乌兰夫在内蒙搞了二十年，他要搞独立王国。内蒙问题，要全部解决，有个时间问题，你们时间不长，搞得不错么，你们不要太急了，中央从来没有催你们。有些地方，我们说他们，怕步子太慢了。你们哪儿，我们怕步子太快了。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学习政策，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江青同志：革委会刚成立起来，混进少数坏人，是难免的，只要领导心中有数，没有什么了不起，对这些坏人，可以不采取很快做组织处理。防止反复。

春桥同志：你们内蒙形势好，对这些人处理，没有什么影响。在其它地区，可能有反复。不要只看内蒙问题，可能对外部有影响，起码对山西有影响，要顾全大局，防止阶级敌人对革委会各个击破。

江青同志：“内人党”是专门搞破坏活动的。

总理：对“内人党”的首要分子，也要做争取教育，总会有个别分子起义。

江青同志：“内人党”一般党徒，只要登记清楚就行了，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谢富治同志：“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

康老：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样的部队要改造，那有“内人党”的部队，你们能掌握吗？

江青同志：你们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

康老：内蒙就象拉丁美洲的智利那样长，打起仗来怎么指挥？

总理：已经有了个决定，准备把两头划出去。

康老：有这个决定？我还不知道。

总理：文化大革命以来，内蒙跑了多少人？蒙族有多少？

滕海清同志：没跑几个。蒙族有 140 多万人。

总理：你们比新疆少数民族还少么。

康老：内蒙归北京军区领导，还是单独的？

总理：早就划归北京军区了。

康老：谢富治同志，你是政治委员，你应该管，毛主席接见时，你把滕海清同志忘了。

总理：你们在北京开会，对“内人党”问题要很好的研究一下，你们搞了个文件，还不够，要搞一个好的文件给我们看一下。

康老：对一般党徒，要教育，蒙古族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加入“内人党”，多数是受蒙蔽的，要教育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蒙古族干部要培养，革委会要吸收一些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参加进来。

春桥同志：这个问题怎么搞法，又不能脱离生产，是否采取轮换办法？

我看内蒙古日报报头上没有蒙文，新疆日报有维吾尔文。

总理: 不要使人感到乌兰夫打倒了, 蒙文也不要了。现在内蒙是不是用斯拉夫文?

江青同志: 乌兰夫会不会讲蒙古话?

总理: 不会讲。内蒙是很复杂的, 敌人很多。

康老: 边防线这么长, 敌人到处可以跑。

江青同志: 现在有通过沙漠的汽车?

伯达同志: 草原要很好保护, 赫鲁晓夫把草原破坏了, 现在还未恢复。

总理: 要很好地保护草原。

康老: 呼三司头头叫什么?

总理: 郝广德。

康老: 现在怎么样? 学生开始造反时是有贡献的, 但要注意, 他们爱搞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滕海清同志: 已经下放劳动了。

总理: 对, 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你们把劳改农场人员分散到各地, 这个办法好。

康老: 高锦明的错误很严重, 历史问题不清楚, 还有三反言论, 去年又搞了反复。

总理: 高锦明搞反复, 当时你们常委怎么样? 现在转过来了没有?

康老: 高锦明搞反复, 就是看支流多了, 这样, 他必然要犯错误。历来, 群众运动总要出些毛病, 是不可避免的。高锦明对支流问题看多了, 对你们有好处, 使你们有警惕。

总理: 地方现在结合了多少干部? 对结合的干部, 要有个政策。

春桥同志: 地方干部胆子小, 不敢大胆工作, 你们要知道, 人家犯了错误, 怕再犯错误。

总理: 对这些干部, 要有个政策。

康老: 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滕海清同志来北京很长时间了, 一方面我们工作安排不好, 另方面我感到内蒙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主要的。

滕海清同志: 我们生产建设兵团搞不搞?

总理: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毛主席已经批了。

滕海清同志: 国家没有给拨钱和物资。

总理: 那好办, 可以报一下。

春桥同志: 内蒙形势很好, 清理阶级队伍成绩很大, 应当肯定。

康老: 运动中出些些支流是难免的, 高锦明的错误严重, 要做检查。要把“内人党”组织搞垮, 搞臭, 打击少数, 教育多数。

总理问滕海清同志: 你最近回去吗?

春桥同志: 他回去一下有好处, 出来后谣言很多。

中央对我们的工作再三鼓励, 我们不要骄傲自满, 在北京已经给盟市负责同志讲了这个问题。

编者按: 三个月后, 中央在“5.22”指示中严厉批评了滕海清的残暴, 并指出从这件事要吸取教训, 今后向中央汇报工作不能一个人来。

滕海清主持制定的《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

“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下简称“新内人党”)是一个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集团。

“新内人党”是在一九四六年春由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一小撮民族反动派为首,笼络了一些民族上层分子和蒙族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内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乌兰夫,利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机会和他窃取的权力,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极力网罗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把“内人党”的头目哈丰阿等人陆续拉入共产党内。从此,他自己成为“新内人党”的总头目,“新内人党”则成为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工具,成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集团,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它的首要分子都是地、富、王公、贵族、蒙奸、反动军官,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特务、叛徒。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一九六〇年后,“新内人党”进入了组织大发展时期。当时,帝、修、反联合反华,西藏、新疆民族反动派搞叛乱,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反动派武装入侵,加上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他们便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一个严重的危机”,于是大搞反革命活动,并极力扩大组织。经过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一些农村、牧区建立起“新内人党”的组织。

“新内人党”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它的纲领就是“新内人党”党章所规定的“为实现内蒙古的统一和民族统一、独立……第一步统一内蒙古,继而逢相当的时机在合理的条件下实现我们全蒙古民族的独立统一。”其步骤是先自治后自决,先独立后统一。就是在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的这一天,“新内人党”总头目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会上公开宣称:“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内蒙古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策略是不公开的。将来我们广播到全世界,争取进步人士。如今天独立时国际上不承认,但是我们将争取国际上的同意。”这就是“新内人党”二十多年来进行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反革命活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二十多年来,“新内人党”猖狂地进行了民族分裂,背叛祖国的罪恶活动。他们利用已经窃取的权力,大肆宣扬反动的地方民族主义,公开叫嚷“成吉思汗的子孙团结起来”,大量散发《三五宣言》,提倡“民族自决”,煽动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大反所谓“大汉族主义”,制造民族分裂。他们打着“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的幌子,叫嚣要“踏出自己的路”,拚命推行“三不两利”、“稳、宽、长”等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极力宣扬反动的“三基论”。他们还大搞所谓“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实行“机关民族化”、“干部民族化”,搞“民族军队”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为了分裂祖国,实现“内外蒙合并”,复辟资本主义做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新内人党”还是一个庞大的苏、蒙修的间谍特务组织。长期以来,他们组织情报机构,采取各种手段,通过各种渠道,盗窃我国、我区大量的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大搞里通外国的特务活动。

乌兰夫等“新内入党”的首要分子为了实现分裂祖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利用合法身分,大搞“宫廷政变”,组织地下黑书记处、“代常委”、“五大委”,并在呼市等地区搞反革命夺权,大搞反汉排外,把“新内入党”的头目、主要骨干统统安插到要害部门掌权,阴谋实现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目的。

总之,“新内入党”反动透顶,罪恶累累,是我们伟大祖国北部边疆的一大隐患。我们必须更加充分、更加深入地发动群众,把这个反革命集团从组织上彻底摧毁,从政治上彻底搞臭,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它的流毒,不达目的,决不收兵。“新内入党”有首要分子,有骨干分子,同时也蒙蔽了一部分群众,使他们失足加入了“新内入党”。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区别对待,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的指示,贯彻执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打击首要,争取胁从,挽救失足。就是对首要分子也要分化瓦解,作政治思想工作,争取起义,不能把他们看成铁板一块。在具体政策上应执行以下几条:

1、坚决打击证据确凿的首要分子(上层领导机构成员)和支部书记以上有重大罪恶的分子。对于这些分子也应区别对待,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对于坦白交代好的并有立功表现的应从宽处理,贯彻执行“给出路”的政策。

2、一般党徒要通过办学习班搞清问题,只要他们彻底交代,就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虽系一般党徒,但有重大罪恶,民愤很大,而态度恶劣、拒不交代的分子则应严惩。

3、对工人、贫下中农(牧)、农村牧区的大、小队干部、青年学生、干部家属和职工家属中受蒙蔽参加了“新内入党”的人,坚持正面教育,开展对“新内入党”反党叛国罪恶的革命大批判,启发教育他们主动交代,并给他们开办学习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只要他们从组织上、思想上与“新内入党”划清界限,就不再追究。

4、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如发现有混进来的“新内入党”分子,应上报材料,经领导机关批准,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5、对“新内入党”分子的子女,应坚决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通知的精神执行;对“新内入党”分子的家属也不应歧视。

6、挖“新内入党”的活动,主要在公社以上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农村、牧区也要把“新内入党”挖出来,但主要应采用正面教育、办学习班的方法进行。

7、凡是由“新内入党”骨干分子操纵的、它的纲领与“新内入党”基本一致的组织,如“统一党”、“兴蒙党”等均为“新内入党”的变种组织,一律按“新内入党”对待。

关于对待“新内入党”问题,过去自治区所做的有关规定凡与本规定有不符之处,按本规定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滕办主任李德臣勾画“内人党”演义

按：1968年4月26日，李德臣向中央起草报告说“突破了二〇六案件，发现了新内人党的存在”。1968年12月，滕海清的深挖运动取得了“辉煌战果”，李德臣又起草了《关于内人党问题的汇报提纲》，滕海清拿到北京，于1969年2月4日向中央文革汇报，产生了《二月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指示》。到了1969年3月，滕海清的“挖肃”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要向中央写冒功报告。于是李德臣在1969年2月30日、3月22日两次“给写作小组谈内人党问题”。他将那些支离破碎的所谓证据，驴唇不对马嘴的那些口供，随心所欲的推理编排，汇编成一部演义报送中央。可惜，报告刚上去，形势发生变化，功败垂成。

李德臣在历时一年的“挖肃”运动中发生过两次动摇。第一次是在1968年9月跟高锦明的右倾跑了，受到滕海清批评之后又跟着深挖下去了。第二次是1969年“5.22”后杀了滕海清的“回马枪”。顽固坚持“挖肃”观点的“保滕派”恨他“反水”，因而将他这个口授记录散发了传单。

李德臣同志 1969.2.30

给写作组谈‘内人党’问题(记录整理)

内人党是有个发展过程的。1925年受大革命影响，蒙族中的知识分子，民族上层起来搞内人党。参加内人党的有革命的，也有别有用心。当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政党，有二重性，不可能巩固，1927年发生了分化。郭道甫跑到外蒙，‘九·一八’后投降日本。1936年乔巴山勒令解散内人党，把郭道甫关起来。后来枪毙了。1936年—1945年，内人党瓦解，没有活动，许多人变成日特、蒙奸。你们写时把这段甩开。

日本投降后，靠山倒了，自己起来搞建党、建政、建军活动；打着高度自治、内外蒙合并的旗号出来，拉拢青年，采取政治流氓手段，赠送党令，搞签名运动等。派人到北京找李宗仁，要求国民党支持他们搞内外蒙合并。同时派人到外蒙找乔巴山，又到白城子找共产党联系，拒绝共产党进入东蒙。1946年“四·三”会议，是共产党为了进入内蒙东部召开的。会上主要争论是在内蒙建什么党问题。哈丰阿、特木尔巴根拼命抵制建立共产党。说内蒙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不适宜建立共产党，最适宜建内人党。乌兰夫搞了投降主义，把哈车阿拉人共产党内。以后逐步把内人党骨干分子都拉入党内，变成隐藏在共产党内的一个反革命派别。

1946年3月1日成立了新内人党。哈丰阿亲自写了党章，开始有计划地对付共产党。新内人党从出现的那一天就是反动的。这是第一。

第二。新内人党从成立就是反动的，而且从来没有解散过。“四·三”会议后作法不同，有所收敛，但还积极发展。“五·一”大会又是一场大辩论，中央正式表态，在内蒙不组织内人党，接受共产党领导。他们把内人党头面人物拉入共产

党内，使内人党名亡实存，从没宣布过解散，只是宣布停止活动。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转入了地下。1947—1960 年是地下潜伏期，作了大量政治思想准备，对个别组织进行秘密发展和恢复工作。乌兰夫“四·二·0”讲话既是内人党最低纲领，又在中央明令解散那一天，不是偶然的。1960 年后进入大发展时期，这是由当时国外状况决定的。他们认为中共已进入严重危机关头，国内发生叛乱。另方面乌兰夫的活动逐渐暴露，华北局已有察觉。1960 年、1962 年内人党开过会。在登记的一万多名内人党员中，1960 年以后参加的占百分之七十五还多。这么大的发展，为什么不出叛徒，没被发觉？第一、确实发觉了。但乌兰夫当政，要害部门控制了，又蒙蔽了群众，说内人党与共产党一致。如 1962 年陶那松案件，就是乌兰夫包庇下来了。1963 年 206 案件，毕力格巴特尔、腾和去集宁破坏了。1964 年文艺整风，发现通福、布仁赛音统一党问题。内大、师院、医学院也发现了民族分裂问题。但都包庇下来了。

第三、乌兰夫与内人党关系问题：我们认定乌兰夫就是内人党的总头目。从政治上、组织上说他们都是总头目。组织上的根据：①乌兰夫自己填表说他 1925 年加入过内人党，他从未加入过共产党；②在内青团出的宣传材料发现，1925 年乌兰夫在张家口参加过内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也是新内人党总头目的根据是：①1947 年 4 月 20 日讲话是新内人党的纲领，既是内人党转入地下的布署，又是以后的纲领。②大量民族分裂罪证。

第四、新内人党罪恶活动要充分写，政治、思想、组织准备是怎么搞的，他的一系列政策，如吹捧成吉思汗，鼓吹“三·22”宣言，民族自决，三百年前问题，蒙古人拿着金碗讨饭吃等，挑拨民族关系，造成对立。理论根据，抓“三一五”宣言。要注意随心所欲，以长城为界，向中央要地盘，制造边界纠纷。乌兰夫最感兴趣的是“三·五”宣言盗用的是主席名义。借四清之机抛出来，打马列主义旗号搞民族自决。这正是内人党的纲领。政治上，网罗势力，推行一套修正主义政策，大反毛泽东思想，篡改主席言论，说阶级斗争说到底是民族问题。有人说，不能把这些都说成叛国的，这是不对的。组织上，安插亲信，排除异己，进行一套叛国准备，是老牌民族分裂。间谍情报活动：中央绝密、内蒙绝密，百分之百送出国了。河西每次试验结果送出国了。乌兰夫 1945—1951 年一直与蒙修电报联系，乔巴山曾指示乌兰夫回国后与大特务乌力吉敖喜尔联系。文化革命以来，内人党基本上处于守势，采取两面派办法，串连起来站到造反派一边，往红色政权里面钻。如鲍音扎布提供了可结合人名单，利用军权整顿机关打倒老干部，地方上也有这样的情况。最后，人头很重要，骨干都是些什么货色，如出身、政治面目、在内人党内的地位等。主要用事实说明问题，也要有分析，采取刺少奇罪证的办法，印上证据。

李德臣同志 1969.3.22 日
向写作组谈新内人党问题

基本的是对内入党怎么看，想到这些是应该的。要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历史考察。没把握就不写。如吉日格郎图搞出十几万斤粮食，并不等于就是搞政变。乌兰夫有权有势，不必要这样搞。如象伊犁一样，闹事是可能的。应进行分析，原则：

一条乌兰夫是总头，内人党是他投修叛国的工具。要把乌兰夫民族分裂罪恶与内人党联起来。乌兰夫拉进一批内人党，内人党从来没有宣布过解散。乌兰夫重用内人党的这些家伙。这比十万斤粮食还重要，乌兰夫是总头。来自四面八方的口供都有。乌兰夫的所作所为、出身历史可以证实。一点不用口供不可能，被大量事实证明的口

供可以用。根据一种现象推断，就写到里边不好。

第二，对内蒙要有个基本看法，以此来估计和批判内人党。内人党既是乌兰夫是总后台，就不可能也不必要在蒙族里肆无忌惮地、放肆地发展党徒。他既要反革命又不可能不发展，重点是放在搞政变有关的单位、党里、军队里、政府里、公检法、领导层里。也会在下边打着红旗反红旗，使一些人失足，受蒙蔽。组织那么大不可能不暴露。内蒙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千万不要相信那些口供。既是秘密组织又大发展？一个人说出多少人？二〇六不可靠，乌兰夫不会使用这种办法。

第三，间谍情报组织，内人党的主要头目大部分是特务、情报员。乌兰夫本人就是里通外国搞情报活动的，国民党特务，给蒙修搞过情报的。47年—51年换过七部电台与蒙修联系。外蒙来过电报。有一份指示乌兰夫与乌力吉敖喜尔谈话。与北平伺兆麟能对上。乌力吉告他一状。这是经得起考验的，不会错的。用这类的有把握。张巴图交待不可靠。张巴图为什么不给乌兰夫报告？乌兰夫要搞蒙古国是自己承认的，只是谁当头的问题。代表团去蒙古回来汇报过。为什么用那种办法，多危险。一问就问住了。不能用，弄出去以讹传讹。

第四、1960年后大发展是确实的，否认没道理。“五一”大会后确实有潜伏期。特古斯交待合情合理。当时国际国内情况都是组织增多，叛国案、陶那松、二〇六、真理党、统一党相继发现。乌兰夫起来抓，一抓就灭火。大量是六〇年后发现的。登记的比例数不是不可参考的。62年后参加的占78.5%，可以信服的。

第五、关于历史的研究分析：“四三”会议写不写均可，不关重要。发展沿革有道理的，那次拉进二个，以后拉进很多。“五一”大会乌兰夫采取投降主义态度。可以大胆想，大胆提出怀疑，辩论。经得起历史推敲，别今天理直气壮，明天就爬下了。报告里好多是打问号的。如内蒙军区大部被控制也不行。有些部门是可信的，窃取的权力是一部分。外边不能要。有根据的说，没根据的不要。文件水平再提高一步。叙述多，批判少。口供不能一点不用，必须用，但不能完全是口供的堆砌。对中央要负责，对群众要增加对内人党的仇恨。组织上已经摧垮，政治上没批透。六〇年后特古斯口供可用。乌兰夫与王维舟去蒙古，单独见泽登巴尔。东西蒙合流。

第二编 中央《五·二二指示》挖“内人党”停下来，平反、放人

中共中央“五、二二”指示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9]24 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内蒙古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根据“九大”精神, 团结一致, 共同对敌, 迅速纠正前一时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扩大化错误,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稳定内蒙局势, 总结经验, 落实政策, 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最高指示

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 大会以后, 在全国取得更大胜利。

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
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和十六日中央找我们来, 对内蒙当前形势做了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中央对内蒙的极大关怀, 极大爱护, 我们深受教育, 深受感动, 对于中央的重要指示。我们完全拥护, 坚决贯彻执行。

(一)

内蒙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地处反修前线, 在当前国际、国内阶段斗争的新形势下, 保持内蒙局势的稳定, 这是人民利益的需要, 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我们一定遵循中央指示,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迅速按照“九大”精神, 加强团结, 纠正错误, 总结经验, 落实政策, 稳定局势, 共同对敌。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 内蒙各族革命人民,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工人、贫下中农(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各级革命委员会, 狠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狠抓阶级斗争, 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内蒙出现了大好形势, 这是运动的主流和本质。

滕海清同志从一九六七年四月到内蒙后,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做了大量工作。是立了新功的。但是, 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以来的一段时间里, 由于我们领导核心中资产阶级“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滋长, 违背中央多次对内蒙工作的指示, 尤其是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方面要注意防止扩大化的指示; 严重的骄傲自满, 自以为是, 宁“左”勿右, 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 错误地把高锦明同志的防“左”的正确意见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在全区进行了批判, 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 夸大乌兰夫的影响, 过重地估计敌情, 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工作中, 产生了“左”的倾向, 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 在宣传工作上也犯了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左”倾错误; 对待群众, 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在领导制度上犯 j, 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错误, 等等。这就造成严重的后果: 混淆了两类矛盾和阶级阵线, 伤害了不少基本群众, 损害了了

族人民的团结,一些革委会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一些地方的革命大联合遭到破坏,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阻碍了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落实。我们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们的信任,对不起内蒙一千三百万各族革命人民对我们的重托。

在“九大”期间,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同志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育下,对前一段工作中的错误,于四月十九日向中央作了检讨。这对于我们团结一致,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内蒙这一段工作中所犯的 error,滕海清同志应负主要责任,核心小组其他同志也各有不同程度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勇于承担责任,团结一致,积极做好工作,迅速纠正错误。下边的同志是具体执行的问题,只要坚决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吸取教训就行了,不要责怪他们。

(二)

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重要指示,是我们搞好内蒙工作的指导方针。

我们一定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九大”发出的“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做好下列工作:

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九大”所做的多次极为重要的讲话,深入宣传贯彻“九大”精神,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坚决纠正我们前一段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团结广大群众,深入开展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搞好团结首先是我们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的团结、自治区革委会常委的团结,这是解决当前内蒙问题的关键我们决心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紧密的团结起来,共同纠正错误,落实政策。这次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当面教育启发下,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以大局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虚心接受群众批评,认真检查改正错误,团结一致,决不给敌人以挑拨、利用之隙。否则,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加强解放军内部的团结和保持部队的稳定,这是当前稳定内蒙局势的重要因素。部队各级领导同志应积极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在内蒙地区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艰苦奋斗,取得了很大成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中,出于内蒙革委会领导上犯 r 严重错误,使参加“三支”、“两军”的有些同志受到了影响,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这个责任应由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承担。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继续加强拥军工作,继续大学人民解放军,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

必须正确对待群众,加强群众工作。对我们前段工作中犯的严重错误,群众中有不同观点,这是正常现象。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批评我们的错误,是对我们的革命监督,是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热诚欢迎。各级革委会在认真落实政策中,应就地解决问题,不要矛盾上交,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劝说群众就地闹革命,不要进行大串连,尽量减少上访。

我们对不同观点的群众都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批评和帮助我们改正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不同观点的群众不要互相指责。由于内蒙地处反修前线和目前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我们要继续说服群众今后在批评我们的错误时,都不要采用

大字报、大标语上街、登小报等方法。

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和干部的绝大多数，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在前一段清理阶级队伍中，误伤了一些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应坚决彻底予以平反，信用他们。积极培养、提拔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

必须迅速地、坚决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当前我区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应立即停下来；对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因“内人党”问题被关起来的，除确有证据和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查外，其余都立即放出来。该解放的干部要迅速解放出来。

各级革委会和领导班子必须迅速充实、健全起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错搞为“新内人党”而停职、撤职者，应迅速平反，恢复工作。各级革委会和领导班子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一元化领导。

(三)

这次中央把我们找来，当天给予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对我们教育极深，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尽管在落实中央指示中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我们坚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有全区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决心和群众在一起，完成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

当否请指示

滕海清吴涛高锦明

权星垣李树德李质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

附：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同志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的检查。

最高指示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同志的检查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在央文革、军委办事组：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扩大化的错误，对高锦明同志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衷心接受，认为这是对我们的爱护，对内蒙的关怀。

我们核心小组来开会的三个人又进一步学习了上述指示，检查了自从清理阶级队伍以来，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的这一段工作，深感错误严重。我们的错误集中到一点上，就是没有事事听毛主席的话，处处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在内蒙落实得不好，这说明我们对毛主席不忠。

我们的错误突出的是：

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违反了毛主席关于“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教导，相当普遍地产生逼、供、信，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这个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以后，发展成为全区性的。在革委会四次全会以前，内蒙就挖出了十三万多人，这时已发现个别单位有武斗和逼、供、信的现象；革委会四次全会反右后，在农村、牧区、街道等普遍展开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这时本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起来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但仍继续开展反右斗争，结果造成了扩大化和逼、供、信的错误。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十五日又挖出了二十五万多人(包括“内入党”六万八千四百多人)，其中有极少数是坏人，但误伤了很多好人，蒙族干部和群众被伤害的面更大，造成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的局面。多数人是在逼、供、信的情况下打成“内入党”的。例如，集宁市一个不足二百人的机关学习班，就挖成“内入党”一百四十四名，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出身很苦的干部和共产党员(已平反)。据对内蒙古军区机关、骑兵五师、独立二师等单位了解，蒙族干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打成了“内入党”。当时曾出现了许多极端错误的论调。例如：“共产党的支部就是内人党的支部”、“边防站是内人党的边防站”，“内入党是没有什么证据的”等等。

中央早已多次提醒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注意扩大化的问题，我们本应认真遵循，可是直到二月初，在北京开的一次有各盟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小会上，滕海清同志仍错误地提出：主要地还是反右，右倾仍是主要阻力。以致使“左”倾思想继续泛滥，造成人人怕被说成“右倾”的局面。

二、在解放干部问题上，政策落实很差。

毛主席曾多次指示：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口头上也说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但说得更多的是内蒙被乌兰夫统治二十年，他要叛国，必须培植自己的庞大的反革命势力，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对毛泽东思想在内蒙占绝对统治地位，内蒙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发生了动摇。内蒙解放干部的工作，本来就是很落后的，在去年六月到十二月，总还解放了一些；但从挖“内入党”以来，不但没有解放，就是原来已经解放的和参加了“三结合”的干部，又有一些被揪了回去。比如盟市一级的干部，去年十二月份统计，被打倒的有百分之五十八点四，到今年三月十五日却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原自治区党委、人委机关的处长和盟市机关的部长一级干部，不完全统计有一千七百二十七人，参加了“三结合”和解放了的只有四百九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全区正副县(旗)长、党委书记共有七百零五人，参加“三结合”和解放了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我们没有很好执行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致使解放干部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造成干部的极端缺乏，使工作和生产到损失，使犯了错误的干部感到没有出路。

三、对待群众组织，犯有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我们对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做到象八三四一部队那样，坚持三条原则，九个一样，而是对亲自己一派就亲疏自己一派的就疏，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就压。因而加深了两派对立。类似这样情况，在乌达煤矿、巴盟、锡盟、呼市的许多单位中都是存在的。

四、在第四次全委会之前，高锦明同志提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要注意防“左”

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却错误地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公开批判,并停止了他的工作。高锦明同志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在前门饭店会议上批判乌兰夫和顶住“二月逆流”中都是有贡献的。对他这样做,没有得到中央批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五、在宣传工作中,我们有一些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引起了思想混乱。例如在《内蒙古日报》的一篇社论上,散布了“狠是基础”的错误论调,从而助长了“左”的思想。

我们所犯的错误,基本方面是“左”。这是因为我们对内蒙的情况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进行阶级分析,而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造成的。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关怀下,本来内蒙的形势是很好的,如果我们不犯这种错误,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内蒙的形势会更好。我们感到很痛心,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觉悟很迟,中央严肃批评后,我们也没有完全理解,还想慢慢地克服就是了。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批评的那样,我们有私心,有骄傲,总是看成绩多,怕否定大方向,怕否定了成绩,怕影响威信,没有很迅速地痛下决心。检查、改正错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鼓舞下,现在内蒙地区对落实政策,已初见成效。

我们的错误对革命损害很大,它混淆了阶级阵线,伤害了一些好人,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程,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造成了严重混乱。我们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爱护。经中央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后,我们已初步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愉快地承担一切责任,打掉一切私心杂念,决心改正错误,坚决地、忠实地、迅速地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坚决完成“九大”规定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更大的胜利。

以上检查还是肤浅的,认识是不够的。我们将在工作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认真读毛主席的书,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不断改造世界观,决心把内蒙的工作做好。

不当之处,指示。

滕海清 吴涛 李树德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九日

吴涛同志传达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听说各个会场来的同志很多,都很热心地要听取中央的指示,这个情况很好。现在我要传达中央首长的指示,特别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内蒙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批示的几点意见》和对于在九大期间四月十九号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个同志的检查这两个文件的批示,在这里边要向同志们首先讲毛主席的批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中午的批

示:

照办。毛泽东

(热烈鼓掌, 高呼毛主席万岁! 万万岁!)

中央的批语: 内蒙革委会、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关于内蒙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的指示的几点意见》。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根据九大精神, 团结一致, 共同对敌, 迅速纠正前一时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扩大化的错误,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稳定内蒙局势, 总结经验, 落实政策, 争取更大的胜利。(热烈鼓掌)

中共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下面传达中央对当前内蒙工作的指示。五月十三日下午总理来电叫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四同志到中央汇报当前的情况, 五月十六日中央又叫滕海清、吴涛、肖应棠、何凤山、刘树春、李德臣六同志到中央。从本月十三日到十九日, 这七天时间里, 中央政治局接见了四次。对当前内蒙的工作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头两次, 接见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四同志参加。后两次内蒙十位同志参加, 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肖应棠、何凤山、刘树春、李德臣十个人参加。中央这次把内蒙一些领导人叫到北京去, 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们副统帅林副主席批准的。中央对当前内蒙的局势是异常关切的。这点使我们深受感动。总理关于叫我们一些同志到中央去的报告送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后, 马上就批准了。马上就派飞机来接, 到北京以后马上就接见。每一次接见都是耐心地听取我们的汇报, 耐心地给以教育, 每次接见都在五小时左右, 尤其是“五一六”这一天接见了我们两次, 约十二小时。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同志接见了我们, 参加接见的还有北京军区郑维山、陈先瑞等同志。我没有向同志们传达这次中央对内蒙当前工作指示之前, 让我们向大家汇报我们这次赶上的一件大喜事, 这就是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时三十五分钟, 是我们一生又一次永远不忘的时刻。我们和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一些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一起, 见到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烈鼓掌, 高呼: 毛主席万岁!)我们伟大领袖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 (鼓掌, 呼口号)红光满面, 神采奕奕, 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幸福。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我们一定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 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丰席为副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紧紧地团结起来认真总结经验, 纠正错误, 落实政策, 把内蒙的工作搞得更好。下面根据我们我们理解的向同志们传达中央的指示。这里不是用一个一个同志的讲话, 而是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的精神综合到一起的。

第一, 这四次接见总的精神是要求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迅速按照“九大”的精神, 加强团结, 纠正错误, 总结经验, 落实政策, 稳定局势, 共同对敌。中央领导同志认为, 内蒙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但是在前一阶段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中, 主要是在挖“内人党”的工作中, 犯了严重的错误。当前关键的问题, 是要团结起来, 纠正错误, 落实政策, 稳定局势。要欢迎群众来进行批判。这有利于纠正错误。不纠正错误, 就不能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群众起来批评错误, 是对领导机关的革命监督, 是帮

助改正错误,是必要的。对群众的批判,如果抱有抵触情绪,是错误的。有人说批判滕海清同志的错误,是反革命逆流,配合帝修反,自毁长城,这是错误的。要纠正错误,还必须稳定局势。因为内蒙地区地处反修前线,面对苏、蒙修正主义,有四千多公里的边防线,保持内蒙局势的稳定,这是人民利益的需要,是当前对敌斗争的需要。纠正错误,稳定局势,是相辅相成的。借口稳定局势,而不纠正错误是不对的,为了纠正错误把局势搞乱也是不对的。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嘱咐要把这个精神告诉大家,告诉内蒙的革命造反派。中央领导同志说,内蒙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人民群众是听毛主席话的,是听中央话的。中央领导谆谆告诉我们,要我们顾全大局,最重要。团结起来,纠正错误,稳定局势,共同对敌。中央领导同志强调指出,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高举团结胜利的旗帜,搞好四个团结:核心小组的团结,军队的团结,民族的团结,群众的团结。林副主席曾经指示过我们,投有团结,就没有革命,不团结就等于取消革命。我们认为,中央指出这点,非常重要。核心小组和常委的团结,团结一致是关键。军队的团结和稳定是最重要的。

第二部分,内蒙的各族人民群众是好的,群众工作也是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造反派的头头是好的,是听毛主席话的,是听党中央的话的。内蒙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那里的群众中伤了好多人,那里的群众没有向外蒙跑的。他们都是心向毛主席、心向北京、热爱祖国(热烈鼓掌)、热爱社会主义的,这是你们纠正错误的有利条件。内蒙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我们对你们的成绩估计得高了一些,表扬的多了一些。乌兰夫在内蒙统治二十年,是搞两面派的,如果他公开反对毛主席,他一天也不能存在。毛主席的威望在内蒙各族人民心中是绝对的!(热烈鼓掌)内蒙有敌人,但总是极少数,不能把乌兰夫的黑线说得又粗又长。“内人党”有老根子,它要搞阴谋活动,他是一个隐蔽的、秘密的组织,人数很少。我们觉得你们提“挖肃”这个口号,是混乱的。挖乌兰夫黑线,面上就没有办法控制了。风一下子就吹到下边去了,一直刮到蒙古包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历次肃反,曾经有过扩大化的问题,但是毛主席没有把它提成为路线的问题。因为路线是包括四个方面的。在滕海清同志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内蒙犯了严重的逼、供、信,扩大化,违反政策的错误,比延安整风的时候还严重。滕海清同志也参加过鄂豫皖苏区打改组派,但是这个沉痛的教训他没有吸取。中央对内蒙要注意防左和扩大化的问题,曾有多次指示。第一次,一九六八年二月,在怀仁堂接见滕海清同志时指出过,你们要进行阶级分析,注意面不要搞宽了;第二次是六八年国庆节前,总理接到一个下放到内蒙边境的知识青年来信,说在十几户的人家里,只有三户不是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总理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北京军区陈先瑞同志,陈先瑞同志告诉了滕海清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扩大化;第三次是康生、江青、姚文元同志对呼伦贝尔盟清理阶级队伍一个报告里边,曾经批示要注意防止扩大,这个批示曾经由北京军区给内蒙军区发了一个电报,后来又派北京军区张副政委到内蒙检查落实政策的情况;第四次是六九年二月四号接见滕海清同志又谈了这个问题,并指出要吸取苏区、江西苏区打 AB 团、鄂豫皖打改组派的教训。第五次在“九大”期间,中央负责同志找滕海清、吴涛同志谈话,严肃地批评内蒙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同时也谈到了关于高锦明同志的问题,并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对中央屡次指示,滕海清同志,没有全部传达,没有坚决地贯彻执行,滕海清同志几次向中

央汇报内蒙的问题，没有检查，反而企图说明自己是正确的。所以中央领导同志说，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谈话不要只找一个人，要多找几个人同时在场，以前只找一个人谈，要吸取这个教训。中央并没有把右倾当成内蒙的主要倾向，内蒙所出现的问题都是“左”，“左”是一步一步加高砝码，武斗，逼、供、信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过去出现这些问题，不要在社会上扩散。被打错了的好人因为不是在敌人的法庭上，刑场上，所以你打他，没办法，他就说了。逼、供、信的错误、扩大化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不宜提成形“左”实右的方向路线错误。恰如其分的说，是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因为形“左”实右，实际上还是右，那得还要反右，就不反左了，实际上也就没有左了，那就要导致左比右好。立三路线是“左”但王明反立三路线是左的形式，右的实质，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左”在客观上也是帮助敌人的。也能造成很大的损失。毛主席说刘少奇的形“左”实右，那是揭露了刘少奇的本质是右。刘少奇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你们打乌兰夫，挖内人党这个大方向还是对的。现在对挖内人党的问题，你们第一要停止下来；第二，要给搞错的平反；第三，要放人。（这个运动从现在起始，这个挖内人党的工作要停止下来，这是中共中央决定的，第二个要给予平反，第三要放人，下面还要解释。）高锦明、权星垣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高锦明同志去年八九月份发现了有“左”的倾向，提出了要防“左”的意见，但是滕海清同志把高锦明同志本来不错的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九月暗流”等，无限上纲，加以批判，这是错误的。而且不报告中央就停止了高锦明同志的工作，使我们很被动，我们不好讲话了。你们把事情搞翻了，黄、王、刘、张没有事了。发生这些错误，今天以前，主要责任在滕海清同志。在纠正错误中，关键是滕，要作沉痛的检查。在滕检查了错误以后，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转到了你们几个同志了。你们要好好的工作，团结一致，共同纠正错误。有人整吴涛同志的材料。吴涛同志是可以信任的，前门饭店会议，是反乌兰夫的，绝不能说吴涛同志和乌兰夫有什么别的关系。中央领导同志说，你们的报纸，有许多的错误，《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那篇文章把历史搞翻了。还有一篇社论，提出以“狠”字为基础，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社论的内容很多地方是自相矛盾的。毛主席说：稳，准，狠，只讲狠就“左”，只讲稳就右，所以关键是在一个“准”字。这不是中间路线，是辩证的关系。从报纸文章上来看，你们报社里还有不少没有改造的知识分子。中央领导同志说，滕海清同志的工作作风很不好，独断专行，违反民主集中制，不听核心小组集体的意见，不听军区党委的意见，搞秘书专政，只听滕办几个小家伙的话。你的滕办要取消，把几个秘书调北京军区学习班学习（鼓掌）。马伯岩带头冲击革命委会，围攻核心小组成员，滕海清同志当面不批评，是非常错误的。你是革委会主任，又是军区司令员，对部队干部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制止，这是要把部队搞坏的。听说你们军区还有造反派的说法，军区、军队都是造帝修反的反的造反派嘛！军区、军委早就规定了不搞战斗队嘛！党委领导嘛！另外组织什么战斗队、造反派，在军队是不允许的。还有的人，要级别，要待遇，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对马伯岩为什么不严肃处理？要办学习班把他们集中起来学习（鼓掌）。部队要学古田会议的决议，学习毛主席五·二二指示，内蒙所犯的错误，主要由滕海清同志负责，但核心小组其他同志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通过几次接触来看，你们几个同志是顾全大局的，有团结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你们过去坚持

原则不够,斗争性不强,有“私”字,明明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向中央报告,发不了电报写个信也可以嘛。现在纠正错误。你们不要以错误的态度对待错误,不要走滕海清同志的老路,就是说原来有扩大化错误,纠正错误要防止扩大化。责任由上边来负,不要下边来负。

第三部分,内蒙局势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团结一致,迅速改正错误,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另一个可能是乱一下,出个反复,当然反复也不要紧,但会阻碍“九大”精神的贯彻。我们当前任务,是力争实现第一个可能,避免第二个可能。只要按照毛主席“九大”方针办事,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就能实现第一个可能。争取第一个可能,你们是有条件的。首先是核心小组的团结。接触几次,其他同志都是抱着团结的愿望的,能否做到,很重要的关键,是滕海清能否深刻的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滕海清同志是老同志,有功劳,但要看到自己做了一些工作,责任大了,有人捧你,骄傲了,不能听不同的意见,独断专行,你必须深刻地认识这一点,否则是危险的,对待自己的错误,不要先从一个具体的事实、一个具体的事实去想,首先要从整个思想上来考虑。“九大”期间你们向中央写了,检讨,回去为什么不向革委会和常委、军区的党委传达呢?不能抵触。中央对你的批评,你不讲,这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有些问题你承认了,这好,其他同志也指出来你有进步。首先是你的思想要闹清楚。要沉痛地、诚恳地与人谈心,要正确地对待群众的批评,即使同志们的批评有过火,也要正确地对待,总比你把人家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过火吧!你即使方向对,政策犯了严重错误,也不能认为责任不大。核心小组你是负责的,而且独断专行,团结,首先你要负责,你必须自觉地把错误立场、思想、态度、作风改过来。采取老实、诚恳、改悔的态度,其他同志当然也要帮助,一个人有错误,要他一下子完全适合大家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主席讲要等待嘛!只要他愿意改正错误。都要帮助他。其他的同志要主动的团结他。你们核心小组要定个集体领导制度,发文件,处理问题不能个人说了算,要集体决定。过去集体领导不好,滕独断专行有责任,你们其他几个同志也有责任,为什么不坚持原则,进行斗争,也不向中央反映?恐怕是有“私”字吧!你们核心小组首先要团结一致,军区党委要团结一致,革命委员会常委要团结一致,军队内部要团结,上下团结,群众团结,民族团结,做到迅速按照“九大”精神,团结一致,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共同对敌,第二,要做好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工作,滕海清同志应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对于你的错误群众中有两种不同观点是正常的,对正确的东西都应该支持,对错误都应该批判。滕海清同志应该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你应该到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众中去工作。怎么样做,检查错误就是很重要。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挺起胸脯来承担责任,对于下面,对于军分区那些同志,你们也要承担责任,要讲清楚道理,解决活思想,如承担错误是不是否定成绩?其实改正错误,就更发扬光大成绩,否则就会损害成绩。又如多伦(锡盟多伦县)来电报,总理中央接到电报,说扩大化是敌人搞的,这就把这个错误说成完全是敌人搞的。个别敌人可能有,会利用我们的错误,但说成是都是敌人搞的,这不又是打击了我们的干部和同志吗?这样说就把他们自己也否定了(这个电报是错误的,说扩大化是敌人搞的,这里边或者是有个把敌人也有可能,假如说是敌人搞的,就把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干部、清理阶级队伍的积极子,也说成是敌人,是错误的,而且写电报的人也把自己否定了。)还有把

群众批滕说成是逆流，说高锦明是头子，遇到这种事情，滕海清同志要明确表态。群众批评你的错误，是应该的，不是高锦明同志搞的，不是搞的阴谋，报复、翻案，更不是逆流。这点要坚决说清楚，中央对滕都是批评了嘛！中央可以批评滕，群众为什么不可以批评滕呢！支持滕，中央都支持了嘛！这次还选了当中央委员嘛！但是对滕的错误就不能支持，不执行中央指示是不对的嘛！正确的东西就要保，错误的东西就要批，大家都批，都保。马伯岩那样的行动滕海清同志要到处去讲，批评他这个错误。你们讲话口径要一致，事先要商量好遇事立刻表态要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毛主席说要细心地工作。首先要欢迎他们的批评，这个批评不是逆流，要热诚的欢迎。这同中央的要求都是一致的。其次，讲清楚如何批评错误，应该接受一个教训，滕海清同志在挖“内入党”的问题上，批判高锦明的问题上，对形势的估计的问题上，挖“内入党”扩大化了，过头了，不合乎实际了，因此，我们在纠正这个错误的时候，就不能又用扩大化的办法，重复以前批判另一个倾向的教训。现在纠正错误也不能扩大化，不要两个过头。还要考虑到，由于内蒙地处反修前线和当前对敌斗争的需要，在批判的时候，不要采取大字报上街、登小报的方式。要回答错误性质的问题，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政策办事，是犯了政策上的严重错误。所以这样结论，就是要落实政策嘛！毛主席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了，没有说路线的错误。对批滕这一方面要做工作，批滕是为了纠正错误，如果把纲上得高了，就会复杂化了。同时反乌兰夫、挖“内入党”、清理阶级队伍，方向还是对的，不能说内蒙没有敌人嘛！当然要警惕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犯错误，不利于我们纠正。当然，既然扩大化了，必然要影响到其他方面，有后果，但不能说成是形“左”实右的路线错误。主席说刘少奇形“左”实右，是指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右，目的是打击一大片。瞿秋白、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左”实右，实质是右，如果是右，还要反右，那就更“左”了。滕的这一段错误，看来是“左”的错误，不是形“左”实右的错误。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政策掌握不好，就容易扩大化。反右的风一吹下去，下边就顶不住了。第三，内蒙、呼市革命造反派的觉悟是高的（几个中央负责同志都讲总理、伯达、康生同志都讲），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很好。当然，要防止他们骄傲。这是你们做好工作的银好的一个条件。第四，纠正错误，要积极、坚决、迅速，又要有步骤地进行。当前挖“内入党”要停下来，搞错了的人，要彻底平反，做好善后处理。因内入党问题被关起来的，除确有证据和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查以外，其余的立即释放出来，没有定案的一律照常发薪金。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央负责人的教导，撤消滕办，滕办的四个秘书同志到北京军区学习。马伯岩两次冲击内蒙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破坏了军政关系，损害了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为了拥政爱民，为了维护我们军队纪律，为了挽救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决定马伯岩停职检查。（鼓掌）今天下午已经照办了。高增贵同志（呼市革委会主任）照常工作。（鼓掌）

第三编“挖肃”所造成的民族灾难

“挖肃”惨状

全区挖“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三十四万六千六百五十三人；死亡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伤残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八人。这是 198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数字。而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1989 年全区落实政策总结中公布数字为四十八万多人。此外，边民内迁七千九百五十户，至死千人。

这里死亡人数是“挖肃”当时现场打死、逼死之数。放出来回家之后由于伤重陆续死去的为数不少，未做统计。

锡盟“挖肃”打死、逼死一千八百六十三人。刑法多种多样，低头、拷打、吊打、舌头扎钉子、光脚在火上跳舞、用铁钳子拔牙等几十种。在逼供信中，很多妇女被奸污。东苏旗几个知识青年“群专”女人，头上套水斗子进行强奸，有的都怀了孕。兰旗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借干阿迪亚，圈起来拷打奸污，然后开除。

伊盟打“内人党”十五万人，占当时七十四万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挖死一千二百六十人，伤五千零十六人，残二千三百二十二人，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七百三十九人。挖死旗县委书记十一人，科级干部一百五十多人，大小队干部五百多人。杭锦旗受害者四千多人，死一百一十八人，其中三名旗委书记。乌审旗死一百四十九人。

乌盟死一千六百八十六人，伤八千六百二十八人，残四千六百五十人。察右后旗是挖“内人党”的“先进”单位，打死二百多人。这个旗的乌兰哈达公社赛汉塔拉大队，在进驻的军宣队、贫宣队指挥下，十八天内死了十八人，打残三十三人。凶手都是外地人，军宣队、贫宣队，还有知识青年以及盲流人员，打完抬屁股就走了，造成的后果无人收拾，生活困难由生产队负担。

巴盟挖八千四百一十五人，死三百六十三人，重残三千六百零八人。

哲盟挖四万八千五百人，死三千九百人，伤残一万四千人。

呼盟挖四万七千五百人，关押一万四千三百二十九人，死两千三百零七人。

内蒙古军区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二百三十五人，挖“新内人党”三千五百六十七人。军区机关挖“新内入党”：司令部一百六十人，政治部一百九十五人，后勤部二百一十七人。

达茂旗蒙族人口一万零八百人，挖“内人党”八百三十一人，叛国集团打了五十三起，死了二百六十六人。在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四年的十年间，从达茂境内外逃二十五人，没有一个蒙族。

察右前旗一个蒙古村十九户，全村遣散，房子都拔了，挖过以后想迁返没有房子住。

达茂旗一九七零年军管后，将两个边境公社三百六十户，一个晚上内迁一百四十四户，占百分之四十。牛羊无人放牧，放进四百名知识青年接替，拟由武川县迁移农民，时过境迁未能实现。白彦花公社白音查干大队的支部书记也内迁了。有的一家人蒙汉通婚，蒙族内迁了，汉族留下了。

军管对牧区当地牧民都认为是反党叛国不信任。如乌拉特中后旗巴音公社伊和

宝力格生产队共有六十户人家，除了十五户汉人外都属不可靠的。这个队是由巴盟军分区和旗武装部抓的点。

察右后旗边境牧民内迁七十五户，同时从农区迁去农民接替了他们。生活用具损失三十六万元，无处出这个钱。

边境牧民内迁是，在一天晚上突然开大汽车去，按名单强令上车，扔上去简单生活用品，拉到公社去宣布内迁，牛羊、房屋、财产全部扔下。仅据乌盟一地这一项就需赔偿四十二万元。

四子王旗白音敖包公社达赖生产队原有蒙族二十三户，汉族二十一户。六八年九月将蒙族内迁了二十户，七三年十二月末，全队已增到八十一户，新的外来户增加五十七家。其中九户三十一人是盲流来的。

达茂旗召河公社一千八百口人，死了四十九个人，重残五十多个，老小寡妇一大群。

内蒙古军区打“内人党”死了五十二人，仅政治部一个单位就死十个人。

土默特左旗巴什公社沙尔沁小队是一个有二百来口人的蒙古村，全村男女老少都被打成“内人党”。

苏尼特右旗查干和硝大队 26 户牧民，划了 20 户牧主，是外来盲流把当地人都划成牧主，然后叫牧民扫地出门，由他们占领据有。被赶出来的牧民没有住处，没有衣服，在地洞里生活了五六年。

达茂旗边境满都拉公社挖死 15 个人，其中 6 个人是上吊死亡，伤残 9 个人。死者中有 4 个是喇嘛。军管后内迁 63 户 218 人，移去汉民补充。贫牧巴达嘎，女，因其弟道尼要被内迁拿走而害怕上吊。女牧那布吉玛被挖挨打怕被强奸跑了，三岁小孩子索要拉图冻饿没人管死了。

锡盟军管宣布“5. 22”批示后平反无效，继续“挖肃”又死了 13 人。黄旗农牧部长道布钦，因挺不住武斗咬了几十个人，广播大会上自认“内入党”，“5. 22”后不敢推。军管后拿到学习班做样子，以示真有内入党，因其内心亏疚而自杀。

锡盟兰旗宝沙代小学建立于 1916 年，是内蒙古牧区建立最早的学校之一。解放后发展成有 350 名学生寄宿制小学，经营的财产项目有千头畜千亩地，还办有牛奶厂和碱厂，以减轻学生负担，成为牧区教育战线上的一面红旗。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文革”中被打成“民族分裂的摇篮”，校田扔荒，畜群抢光。教学设备，宿舍里的毛毡、板床、厨房里的器具全部被挖肃分子抢掠一空。十几名党员都被打成“内入党”，支部书记岗普日布的胳膊扭断，耳朵撕掉，教导主任武斗逼死。

呼和浩特铁路局系统蒙族职工四百四十六人，挖，四百四十四人。其中死了十三人，伤残三百四十七人，女职工流产五人，小孩子死了四人。集宁机务段十三名蒙族职工全部打成“新内入党”。仅有的一名共产党员被打死，其余的程度不同的伤残。赛汉塔拉机务段司机曹都连同其妻子一起隔离武斗，将怀孕四个月的胎儿用铁丝掏出来，还说什么“生下来还是个内入党，留他做什么用”，一九六六年同苏蒙修挑起的国际列车事件进行坚决斗争，受到苏蒙修迫害，光荣受到中央领导接见，《人民日报》报导的 3、4 次蒙族国际列车员戴金声被逼死。“一二·一九”军管以后，郑维山破坏中央《五·二二》批示，把内蒙革委会和呼铁局发的平反落实政策文件宣布作废，个人的平反也宣布无效，重新挖开了“新人入党”及其“变

种组织”。把一九六八年那时逼供信打出来的什么“春萌小组”、“内外蒙合并委员会”、“集宁外贸会议”、“蒙训班”、“中蒙铁路联欢”等等东西又翻出来，把不少人又隔离起来办学习班强令交代。集宁机务段政工组负责人王相才说“关于新内人党虽然给平反了，但事实是存在的。从赛汉、二连、呼和、包头、东北四面八方来了很多材料，证据确凿。只是为了照顾和挽救你们少数民族贫下中牧子弟，叫你们在学习班上交代，交代了就算完事，可以不送司法机关了……，我们单位不存在扩大化，六九年给你们平反是错误的。当时你们没有上访，就是说明你们有问题”、“你们这些老蒙古，参加铁路工作虽然二十来年了，所以没把你们提升为司机，是因为集二线离苏蒙修近，提升为司机还了得！把车开到蒙古去了怎么办？过去你们这些人工作干的都不错，那是为了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以便搞你们的反革命勾当”。军管组长董振旅说“根据内查外调和以前的材料，证据是确凿的，你们这个组织是有的。只要交代出来就没事了，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否则矛盾就要转化，就得交司法机关处理。”白云鄂博站军管负责人说“你想翻案吗？除非乌兰夫回来你才翻案吧！你别高兴太早了，内人党问题还没完”。该站群专头吴龙祥说“内人党过去打，现在打，将来还要打”。铁路局党委和公安处把蒙族职工视为反动社会基础，对他们建立耳目，指定专人掌握动态情报，定期汇报。集二线，几年来，蒙族职工开除七名，退职回家十六名，精减六名，打死八名，调离三十六名。集宁公安分处，原有九名蒙族干部，只留一名。对被误伤的优秀职工不予平反、信任。而对“挖肃”中践踏党的政策打死人、逼死人的凶手，却提拔、信任、重用。白云鄂博站，纳新四名党员，全是挖“内人党”的“积极分子”。有好多司机打“内人党”以后不再叫他们开车了，改换工种干别的去了。有不少副司机，已经十七、八年了，就是不给他们转为正司机。同期、同工种蒙、汉族职工转正考试时，实际操作技术水平和政治觉悟相等情况下不能一视同仁，蒙族职工因汉文不通，用汉文答不上卷来就不予转正。蒙族职工之间用蒙语交谈，就有人出来质问“你们竟说黑话，干些什么黑事？”呼铁局建局以后，自治区选送了一批蒙族干部，都被压低使用。对原来搞人事的改调其他行政工作，第一把手改为第二把手。不久前，呼铁报上报导了一则培养提拔一名蒙族干部苏龙的消息。而这个苏龙同志在解放初期就是当区长的，运动前是集宁车务段的副书记，现在“提拔”后是这个段下边的一个小厂的副书记。呼铁局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是以汉文、汉语程度要求；其次是不提民族问题方面意见的“老实听话的”。对执行民族政策的干部则动辄以“民族分裂分子”或“民族情绪”对待。

原骑兵五师被误伤的基层干部 200 多名，因为被挖误伤身心不好，没有到岗位上去坐着，军管后以“无政府主义”错误给各种处分的近百人。到 71 年底 200 多名干部几乎全都复员，留在部队的就所剩无几了。反之，对在扩大化时打错人、打死人，关押人家 7、8 个月的不但不处分，还提拔使用。

哲盟革委会主任、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参加滕海清深挖内人党的会议回去后放炮“哲盟敌情严重，光蒙族就有七十万…”科左中旗科局长、公社书记社长级干部 210 人，打进内人党 190 人，占百分之九十。挖肃分子审讯看管受害者每夜发三角钱辛苦费。运输站 26 人，23 人都是内人党。巴音他拉公社 26 人，25 个是内人党。看管不过来，人手不够就雇用临时工，每天 2 元。旗教代会代表，晚上出去在墙角刚蹲下，就被挖肃人员抓去当内人党关一夜，吓的他三天拉不下来。组织部干

事崔文被打重伤，送旗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胡大夫写病历，在死因栏里写了个“因外伤引起死亡”就被关起来，说他替内人党说话一定也是内人党。蒙达公社支部书记韩珍是个劳模，他被打内人党的两条罪状，一是栽的树多，是乌兰夫叛国的拴马桩子；二是储备粮多是为乌兰夫叛国用的战备。于是树都砍了，粮食都分了。烟灯吐公社挖肃总指挥，5.22后拿上公社2600元，400斤粮票也“上访”去了。赵玉温从汉族县、区调大批贫宣队到蒙族地区去挖内人党。给他们讲“岳飞杀鞑子”。他说“岳飞是英雄，成吉思汗是狗熊！”。他还下令被挖蒙古族群众“不许说你们那个驴话！”

在呼盟，商店柜台上写着“喂！你是内人党，还不赶快去登记！你就是内人党，快去登记，赶快去登记，快！快！快！”车站售票口贴着“你是内人党，你想逃跑吗？你逃不掉！快去登记吧！”在满洲里理发，一坐上座，照镜子，镜上写着“你看什么？你就是内人党！”莫力达瓦旗挖肃指挥员汇报“我们苦战十四周夜，把达斡尔全歼了。”

锡盟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说“我见蒙古人就恶心。把锡盟老蒙古全挖了，在全国也是一小撮。”

滕海清对乌盟挖肃战况说“你们挖出那么多汉人内人党。要考虑！”他担心挖错方向。

深挖阶段“滕办”紧催战况，内蒙工学院汇报说“就那么几个蒙族干部全挖了，还挖谁去呀！”

巴林右旗白音汗公社，蒙族近三千人，被挖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人三百六十四名。公社十六名蒙族干部全被挖。六个牧业队党员一百三十四名，九十八人被打入“内人党”。挖肃分子煽动民族仇视说“内人党叛国集团是单一蒙族组成的，时机一到他们就会杀我们汉人的头”他们不准说蒙语，一讲蒙语就训斥“顽固不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不改内人党的本性”责令他们“要说中国话”。

科右前旗挖一万多，死五百来人，其中好仁、乌兰毛都公社就死四十八人。旗军管会验尸，验了七个人，六个人是被打死的。归流河公社光明大队三十户蒙族挖出内人党七十多人，蒙族户全是内人党。汉族中传“蒙族要叛国投修，杀汉人”。蒙族中传“汉人在正蒙古人”。武斗刑法有坐火炉、解膀子、过电、扎大头针、烧乳房、开水浇身、肛门打气、香火烧字(烧内人党三个字)轮奸、内人党二十四节体操。好仁公社一小教教员死后，军宣队不承认是打死的，他父亲把死者脑袋拿来给军队领导看，血衣也在。人死后，挖肃分子们在坟堆上插了一个白旗，上写“乌兰夫死党分子”。

科右中旗全旗六十六个共产党支部，有四十四个被打成内人党支部。被打成内人党的一千六百四十七人中有一千三百三十一人是共产党员。

内蒙古教育厅二十七名蒙族干部，四名达斡尔族干部，被挖只剩一名。他们明目张胆地践踏党的民族政策，在刑讯中骂“你妈那个×的，你们几里哇啦的说些什么？以后不许讲！”、“把你的黑话全部交出来”。

内蒙古人民银行一百七十七人，挖出内人党七十九名。共产党的党组、支部、小组都被打成内人党。挖肃分子制造了“一张名单”、“一部电台”案件。所谓“一张名单”是在刑讯逼供下假造出来的，上边开列了二十一名内人党徒名字和加入日期。这个名单经滕海清亲自过目，加以肯定。于是成了全区第二个最完正的內

人党原始名单。所谓“一部电台”案件是，内蒙公安厅设在银行 38 号房间的秘密业务电台。挖肃分子宣布“破获了一个长期以来里通外国。为蒙修直接提供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的 38 号案件，搞出了电台、密码、呼号”。于是把一大批党员干部连同打字员都打成了，既是内人党又是情报特务的“双料反革命”。

乌盟卓资县挖内人党一万三千名，怀疑两万三千人，死了九十五人。所用刑法一百七十余种并强奸轮奸妇女。马连坝大队支部书记女人被四十多个挖肃分子轮奸。刘光窑大队把一个大姑娘隔离关押打成内人党并进行轮奸。

西苏旗是德王的家乡，滕海清亲自到那里点燃挖肃烈火，并指派×××部队执行挖肃任务，叫旗武装部配合，还指出“你们那里叛国投修的不会少，他们统统是乌兰夫线上的，我们抓阶级斗争，就是要与他们斗争。你们西苏旗复杂，但总还有百分之四五十是好的吧”。于是残酷的行动开始了。很快挖出了“内人党”、“统一党”、“沙窝子党”、“黑虎厅”、“白虎厅”等三十多种反动组织。挖出成员近八千人，占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死一百零九人。挖肃指导思想是以民族划分，以赛汉乌力吉、布土木吉、诺干敖如三个公社为例。革委会蒙古族干部全部挖出，生产队长全部重新安排来历不明的汉人担任。散布反动民族观，诺公社军管的李司务长说“过去乌兰夫重用的都是你们蒙古人。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头也被杀了，你们吃的穿的都是共产党的，你们是对不起共产党，过去是乌兰夫天下。现在是毛主席天下，你们要老实交待”。敖干希里大队六十七岁的老人达木丁曹，听说蒙古人都必须去登记，不然就被批斗，于是反复背诵“统一党”三个字。然而到大队登记站又被吓忘了，只好返回去背熟记牢再去登记。全大队十四岁以上蒙古族全去登记。

中共伊克昭盟委员会落实政策办公室简报第三期，一九七八年八月五日编印。京字 x x x 部队一连在图克公社挖“内人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案、惨案。这个公社 2961 口人，挖“内人党”929 人，占懂事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一，被怀疑的 270 人，挖死 49 人，严重伤残 270 人。所有党员、团员、民兵、除几名汉族党团员民兵外全部打成内人党。草库伦被说成“大蒙古帝国放马基地”，浇灌草场的大口井被说成“搞政变打仗马匹的饮水井”。蒙古族干部全被挖，派汉族社员当指导员，从陕西来的流串毡毛匠也被当做挖肃积极分子来依靠。×××部队在打砸抢分子配合下所用刑罚五十多种，听了受害者的控诉，令人毛骨悚然。烧火棍烫人，将女牧民剥光衣服，用烧红的湿柳棍烫肚皮，肠子露出来，再烫阴道，外阴烧坏，变成不男不女。狼牙鞭打人，皮鞭上缠铁丝，变成带刺鞭子，抽打一下即勾下一条皮血，连打二十多鞭后，脊背皮血被勾掉露出椎骨，伤口腐烂不给治疗，这个人就活活臭烂而死。打甩鞭时血肉横飞。甩在墙上腥臭气味呛人。烂肉上撒盐面，皮鞭、棍棒打坏人，在伤口处撒盐面。或用盐开水浇，受害者疼得发疯、昏死。铁箍缠脑，用八号铁丝将受害者头脑缠住，再用老虎钳狠狠拧紧，铁丝箍在头皮里。四五个人连起来围火炉烘烤，动不得跑不了也死不了，活受罪。将铁锹在火炉上烧红，烙在受害者头顶上，将头发、头皮烧光。露出头骨，烙出的血和油流在脸上，也被烫坏。将两手腕向后捆住，吊上梁去，然后猛往下拉其两腿，受害者两肩关节立刻脱臼，再一招是把人倒吊起来，猛然放开绳子，受害者的头撞在硬地上，脑震荡、昏死。毛绳拉锯，将妇女剥光衣服，令其骑在毛绳上，然后两个人前后拉锯，把阴道、肛门拉通，连尿带屎混合而出。这个×××部队除用各种刑罚害人杀人外，还干了不

少坏事，打死男的奸污妻子，霸占军妻，强奸少女，抢劫民财。有一个战士抢走牧民一块手表，一直追到盟里还不给。这个部队也不能说都坏，也有两位好人。他们反对武斗，“为什么打人，你们说他反革命有证据吗？你把人打坏怎么办，你养活呀！”可是，这个部队一撤回去，这两名战士就背行札复员回家了。

锡盟东乌旗额合宝力格牧场，原领导班子全被挖，领导权全部落在进场不到半年的北京知识青年手里他们说“我们来牧区就是整你们蒙古人来了”、“蒙古人要杀汉人的头，要是打起仗来蒙古人往北，汉人往南”、“牧民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内人党黑线，不可信”。

营盘弯煤矿也大挖“内入党”，蒙族工人、干部无一幸免，死十二人，伤三十多人。刑罚有压杠子、吃炉渣、火柱烫、镇冰块、穿指甲、装裤裆、掏肝脏、压油板、拔人河、打秋千、猴掏牙、捅鼻子、扣乳房、上吊、打夯、木棒刺阴道等二十余种。

乌盟土默特左旗是乌兰夫家乡。运动初期打倒乌兰夫之后，土左旗广大蒙族群众都被打成“土家村”、“云家店”，接着“挖肃”；乌兰夫成了“内人党”总头目，于是土旗蒙族又都被打成了“内人党”。此老公社十一个党支部，八个被打成“内人党”支部。保含少公社二十多名干部，除三人外全被打成“内人党”，十个大队，八十多个队干部全被打成“内人党”。只几梁公社赵连璧受四十九种刑罚，昏死过五次，双手双脚捆住吊在梁上，下边地上铺火红炉炭，脱光衣服烧烤。公社革委主任给凶手打气“不要怕，打死一个单摆开，打死两个垛起来，死的多了扔东海（哈索海）”。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莎仁惨遭一百五十四天的毒打迫害，对她用了十八种刑法，什么斗熬鸡、跑刺丝、压杠子、老虎凳、喷气式、钻桌子、挂铁块、燕别×、揪面片、跪板凳、揪头发、抽烟卷、坐三条腿凳子、冻冰棍、老驴背炭、火勾烫、钢鞭抽，打的她浑身是血，逼的她两次绝食、两次触电、一次上吊、一次刀杀，表示了她宁死不屈的决心。

哲盟军管会宣布“公检法是烂掉单位，内人党的组织机构健全”，百分之九十以上干部被推上审判台，坐等待审，集中办学习班，出布告下勒令，用分秒限期自首登记交待，大搞逼供信，乱咬乱供，在长达几个月的严刑拷打中，死伤残严重。你要叫他们执行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要他们重证据，他们就举起鞭子说“这就是证据”。要他们核实，他们就叫你脱光衣服毒打“给你核实！”，军管会主任杜诚公然挑动武斗“由于你们顽固抵抗，挨打由你们自己负责”。军管会管学习班的李国珍现场指挥武斗，破口大骂“草他妈的，叫你们顽固，把你们的骨头砸烂，交待也得交待，不交待也得交待”。盟公检法八十一名干部定内人党五十七名。在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指挥下，将共产党的一切工作活动都打成内人党的罪恶活动，公检法成了内人党的情报机关，民兵战备训练成了内人党的反党叛国的军事准备，干部的调动、提拔成了内人党反党叛国的组织落实。

镶黄旗公检法共三十三名干部，其中蒙族三十名，全部打成内人党，剩下三名汉族干部。军管组副组长王××宣布“你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乌兰夫的得力干将”。军管组长纪××坐阵指挥十六处“尖刀班”十六处隔离班，重伤死亡一百二十人。

锡盟军分区司令员赵××在六八年五月开始挖肃时就说“内蒙部队上上下下坏

人最多，特别是政治机关一个好东西没有，在这次运动中把所有的蒙古人狠狠地整一整，蒙古人没有一个好的”。深挖以后又说“把蒙古人百分之百打成内人党没错，这些家伙死几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死一个少一个”。在他指挥下四九四七部队排以上干部全部打入新内人党学习班，通过逼供、诱供、劝供各种武斗都打成“内人党”，打完之后以复员转业为名处理了三百四十三人，其中蒙族二百一十人。

××××军宣队进驻西苏旗支左领导挖肃，领队的是副政委陈××、副参谋长邱××、副教导员高××。陈、邱、高讲“我们决心早已下定，把西苏旗刨地三尺，也要把统一党挖出来。经过三百天的挖肃，确实刨了数十家的地，搜查了上百家，挖了八千人。党政口支左的王排长迷惑不解地说“蒙古人搞民族分裂有情可原，汉人为什么也加入统一党？”布叶木吉公社支左的刘班长说“蒙古人死光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南方人多的很，把这些蒙古人剥着吃算了”。军宣队在无任何证据情况下通过公检法三次公开宣判了五十四名“统一党”分子，向全盟发通告。

札来特旗阿拉塔尔图公社莫尔格策是全国劳模，八大代表，去过苏联、朝鲜，毛主席五次接见，全家十一口人九个被打成内人党。他的劳模、代表、出国都成了乌兰夫安排的内人党活动，隔离关押两个多月时间里车轮战六次，最长一次五天四夜，刑法十几种，烤炉子二十四小时之长，全身伤痕、吐血拉血，已经六十二岁的人了，精神肉体受到严重摧残。

西苏旗白音诺尔大队牧民×××六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单独一人上访反映解放前他一家六口人三口被国民党土匪杀害，是共产党救了他弟兄三人，掉脑袋也要跟着毛主席走，可是把他关起来残酷武斗了一年，他怀着一颗对毛主席的忠心硬顶，暴徒们剥光他的衣服，找来十八、九岁姑娘观看现场，强迫他向毛主席低头认罪。还有顿达乌苏大队敦德格上访说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日把他拿到公社“黑学习班”同巴图陶克套、德力格尔三人的头发剪成女人阴毛式取乐，向毛主席请罪。

挖“米吉斯共和国”情况。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流域中国境内居民中有两三千中俄混血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安分的劳动者挖肃一来把百分之九十以上户都打成“米吉斯”（译为父母不是同一血统后代），然后又打出了一个“共和国”叛国投修组织，不准说俄语，不许穿裙子，骂这些人是“二毛子”、“二串子”、“人还没进来鼻子先进来了”、“馒头好吃还是面包好吃？叔叔亲还是舅舅亲？”

在大兴安岭里的鄂伦春旗狩猎民族只有一千零一十五名，还打出了一百九十二名内人党。仅有八十一口人的诺民生产队就挖出四十三人。在甘奎公社古里生产队，把几个猎民拷打之后，套在车上，大骂“你们是牲口，这就是你们的下场！”二月二十五日把所有“内人党”集中起来，强迫他们爬地下“四条腿”一边爬一边学狗叫、狼叫、再给一顿马料吃。就这么几个少数民族还死了八人，伤残一百多人。

莫力达瓦是达斡尔族自治旗，在这个少数民族地方重点打的是“统一党”。旗革命委员会二十二名委员中十二名达族全部打入“统一党”。十七个公社一百九十名委员中达族九十五名，打“统一党”八十五名。旗级原领导干部十名，达族七名，汉族三名。七名达族全部打“统一党”，三名汉族干部未揪。全旗环节干部二百〇一名，达族八十九人打“统一党”八十八人。将革委会副主任额尔登札布、

常委孟赛样关起来逼着要名单，他们将战备计划当暴动计划，把共产党员名册当“统一党”交出。在残酷的武斗中，挖肃派们说“你们老鞑子要翻天了，叛国投修去外蒙吃牛奶杀汉人”商业局挖派尚××说“你们老鞑子三十年不能翻身了”。×××××部队一个班长揪斗山民说“不许说你那个驴子话，你们那个牲口话谁也听不懂”，其实山里猎民就是不会汉语。有的挖肃凶手说“滕海清说了，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打死一个老鞑子是好汉，打死十个是英雄”。夏××说“别看你们以前吃香，现在不行了，你们想翻是不行了”。他又说“我们苦战十四昼夜，商业系统达族全歼了，”。

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是地缘、血缘较近的三个森林、草原民族，各在一个聚居地有个自治旗。在海拉尔市南部区的就是鄂温克旗。在这里打的主要也是“统一党”，从旗里到大队，凡是鄂温克族各级干部百分之百都打人“统一党”。原旗委书记图门巴雅尔、旗长乌尼满都被打死逼死。全旗副科级以上干部一百五十五名，打成“统一党”一百五十二人，占百分之九十八，死了二十人。使这个旗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摧残。南屯公社牲畜死亡一半左右，改良品种全部死光绝种。前进队二百八十头牛死了一百三十头，五十头改良牛全部死亡，一千只羊只剩四百三十四只。

一九六九年召开“九大”，上边部署由巴林右旗出一名牧民代表，可是找来找去，从四万多蒙族中就没有找到一个牧民代表，因为蒙族全被怀疑成叛国投修的“内人党”，非但巴林右旗没有找到，全昭盟蒙人中也未找到可以参加“九大”的牧民代表。

内蒙古公安厅，早在运动初期就把厅长毕勒格巴图尔、副厅长云世英打成“乌兰夫黑帮”。“挖肃”开始“砸烂公检法”，打倒原政法书记王再天做为夺权象征。滕海清调京字 411 部队开展“挖肃”，公安军管会主任是这个部队的政委任家骥，他又兼任自治区专挖“内人党”的内蒙革委会第二专案办公室主任，挖“内人党”专家丁振声任副主任。公安厅职能转成全区“挖肃”工具。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开始深挖，任家骥宣布内蒙公安厅是“内人党指挥部”、“内人党保卫部”、“苏蒙修情报机构”，“国际间谍组织”，接着又宣布在公安厅挖出“新内人党”十二个支部，六十八名骨干，二自余名党徒，“内人党”组织已经摧毁。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办公厅党组文件

内革办党组【1979】14 号

关于彻底推倒原自治区人委办公厅“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等冤错假案，为受害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

在文化大革命中，原内蒙古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等，紧跟林彪、“四人帮”，颠倒黑白，混淆敌我，

在我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新内人党”冤、错、假案，疯狂迫害各族干部和群众，造成了空前的浩劫，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滕、吴、高、权、李的直接指挥下，原自治区人委办公厅是遭受他们严重迫害的重灾单位。在运动初期揪所谓“乌兰夫黑帮”和“挖肃”中，办公厅被无中生有地扣上“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长期盘居的顽固据点”等等帽子并在《内蒙古日报》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所谓揭批文章，流毒极广，后果严重，全厅副处级以上蒙族干部，全部被打成“乌兰夫黑帮”。在所谓挖“新内人党”中，大批党员和干部，特别是蒙族干部，几乎全部被打成“新内人党”及其各种名目的“变种组织”的“党徒”、“成员”。

在挖“新内人党”中，办公厅，“大受害的同志，被强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关押隔离，严刑拷打，惨遭摧残。嘎如布僧格等四位同志被残酷迫害而含冤死去，几十位同志被折磨致伤、致残，更多的同志政治上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并株连了他们的家属、子女和亲友。滕、吴、高、权、李的倒行逆施，颠倒了敌我关系，分裂了革命队伍，践踏了民族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粉碎“四人帮”以来，广大干部和群众揭发批判了他们的罪行，并强烈要求昭雪平反。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关于为“新内人党”彻底平反的指示，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关于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彻底平反的批示，拨乱反正，恢复了内蒙古历史的本来面目，砸碎了束缚各族干部群众多年的精神枷锁。

现根据中央两次批示的精神和自治区党委的有关指示，革委会办公厅党组作以下平反决定：一、原自治区人委办公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办事机构，文化大革命前十九年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原办公厅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特别是大批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是在我党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培养和成长起来的。各族干部和职工，在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原自治区党委领导下，团结一致，共同战斗，为发展自治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所谓原办公厅是“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长期盘踞的顽固据点”、“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参谋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卖命的独立王国”、“云家店”、“三家店”、“乌兰夫的暗班子”等等，统统是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彻底推倒。恢复名誉。

二、原办公厅的所谓“新内人党”一个总支、三个支部，纯属捏造，根本不存在，予以彻底推倒。所有被诬陷为所谓“乌兰夫叛国集团”、“乌兰夫黑帮”、“乌兰夫死党”、“土旗联社后台”、“新内人党”、“统一党”、“兴蒙党”、“民族党”的骨干、党魁、党徒、党员、成员以及“苏蒙修特务”、“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等等而受到迫害摧残的同志，给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在这期间形成的一切材料，一律作废、销毁，个人检查材料退给本人，并为受株连的家属、子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三、强加给原人委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同志的所谓“内入党中央委员、联络部长、秘书长”、“乌兰夫死党”、“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出卖领土的卖国贼”、“苏蒙日三料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为惨遭迫害致死的嘎如布僧格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向他的家属、子女表示慰问。

强加给原办公厅信访处副处长喜仁布和同志的所谓“内人党骨干分子”、“苏蒙修特务”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为严重逼供致死的喜仁布和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向他的家属、子女表示慰问。

强加给原办公厅基层党委副书记朝克同志的所谓“内人党骨干分子”、“内人党锡盟盟委委员”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为严重逼供致死的朝克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向她的寡属、子女表示慰问。

强加给原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干部莎兰同志的所谓“现行反革命”、“内人党”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为逼供致死的莎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向她的家属、子女表示慰问。

我们希望办公厅全体党员，蒙汉各族干部职工，把共同的仇恨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顾大局、向前看，求大同、存小异，消除隔阂，增强团结，同心同德，积极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加速我国和我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卫祖国的北部边疆，努力奋斗。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办公厅党组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编者按：自治区人民政府(文革前为人民委员会，文革中为革命委员会)办公厅56名蒙族干部全部被挖。死了四人，重伤残十七人。还有四名汉族干部被挖为“内人党”。因为他们反对“挖肃”同情蒙族干部遭难。

额济纳旗挖了“土尔扈特党”

内蒙古自治区西端巴丹吉林沙漠中的额济纳旗是由新旧土尔扈特部组编。“文化大革命”中“挖肃”阶段。把从东边去的蒙族干部一百来人都打成“内人党”，把当地土著干部则打成“土尔扈特党”。为挖出这个“土党”先行隔离两名旧职人员。一个是在解放前任旗扎萨克的秘书，解放后任旗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的藏德明；另一个是解放前任旗扎萨克官员，解放后任人民法院院长的赛音宝音。后来又把妇联主任色林敖德也隔离查究。她是解放后我党培养的共产党员。三个人在严刑逼供下都承认了“土尔扈特党”。挖束挖去最后认定旗长额尔登格日乐为“土党”头子，投进监狱，他受尽各种酷刑摧残，坚不承认有“土党”，更不承认是头子。他是原额济纳旗扎萨克塔王的长子，解放时二十岁，在我党培养下进步很快，一九五七年入党。在“挖肃”中他不顾个人生死。坚不承认“土党”的存在，蹲了七年监狱。一九六九年，额旗革会上报酒泉地区革委会(那时已划出内蒙古)拟判处死刑，地区革委报到甘肃省革委，省里认为证据不足退回，以后将其放到酒泉养鸡场劳动改造。一九七三年释放后，又以边民内迁，将其家属迁到肃北县。一个仅有两千人的土尔扈特部在这场运动中死了二百人。

“一网打尽蒙古佬！”。这是内蒙古地质系统区测队革委主任李国道的挖肃行动口号。滕海清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召开第四次革委会议，深挖“内人党”的动员布署下去之后，长年在野外作业的地质队伍以为蒙古人都要“反党叛国”了，于是匆忙准备，整顿队伍，定好日期，统一行动“一网打尽蒙古佬！”。区测队革委主任李国道于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召开秘密会议，布署零点行动。全队查点共有八名蒙族职工，于是组编八个三，：二十四个行动小组：负责抓人的八

个小组;执行抄家的八个小组;突击审讯的八个小组。任务和目标明确,是蒙古人就抓,蒙古人都是内人党、用不着审问是不是内人党,只问他交代罪行。他们边打边说“你不是内人党抓你来干什么!”,“不老实交代就叫他灭亡!”。抓来的人没有房屋关押,寒冬季节启动泥水工程,柳笆抹泥,冰冷潮湿,真可谓名符其实的“牛棚”。这些“内人党”徒如同牛羊一般,非人待遇。挖肃专业战斗队人员昼夜三班倒。发加班费,个个积极争先,严刑逼供,打出成绩火线入党。各个专案组用刑各有花样,“狠为基础”敢下毒手。

共产党员陶柱受种种酷刑,血肉模糊,不能进食,奄奄一息,家属亲人认不出来,就在生命垂危时,凶手们如同拎一只死狗一般,揪起来摔在批斗会场上,以不死不认罪的内人党就是这个下场。乌俊孝已被打的没有人样了,还说他顽固不化,将他的头塞进炉坑里“让他化为灰烬!”,灰火呛烫快要死了,拉出来浇凉水。谓之曰“清醒头脑”。乌受此刑之后,呼吸道严重损伤,造成残生永久痛苦。

宝贵贤是蒙古黄金家族统系后代,他被挖肃队称之为“成吉思汗的徒子徒孙,乌兰夫的顽固铁杆”,打的体无完肤,边打边骂“老蒙古骨头硬,看你能不能硬过镐把铁棍!”,“你们老鞑子完旦了,让你们成吉思汗子孙见鬼去吧!”、“如果你们叛国得逞,我们汉人要人头落地!”。他们以如此“民族仇恨”下毒手,致使宝贵贤腰椎骨折,胸椎损伤,肾脏破损,尿不出来。人都昏死过去了,还骂“装死”。造成难以医治的后遗症。

边福成不受屈辱讲理争辩,招致木棍、镐把、铁条、三角带毒刑,打的他七处骨折,腰椎横突,胸椎打断弯曲,肋骨折断,耳膜穿孔,面部烧黑,腿肚压杠迸裂,浮肿流黄水。他痛不欲生,号啕恸哭,泪流满面,哀号“老天为何把我生在内蒙古,遭此灾难!,拚命与凶手们抗争“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为什么搞这样残酷的民族迫害!如果我不是蒙古人,你们绝不会抓我,你们是针对蒙古人下这样毒手!”从而招来武斗更加升级,如同杀猪一般,手脚捆作一团。有个叫赵明的凶手,口里喊着“边福成如果不是内人党,我把自已眼珠挖出来!”然后他就“压杠子”,“摔瓜旦”,把睾丸打碎,胯裆里肿的比头还大,难以走动。抢救治疗的医生说“打的强心剂,注进去刚拔针头,药水就从针孔冒出来,肌肉没有弹性,变成了死肉”。一个叫曾昭贵的凶手叫喊“你们这些内人党不被打死也得枪决。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大年初一送死尸还家。有个叫朱光礼的专业知识分子,除夕之夜被打死,大年初一凌晨送回家交给他爹娘。这真是惨绝人寰。他的父亲在平反昭雪大会上哭诉:他是土默特旗后山以驼山货挣钱供孩子朱光礼上学,1957年考上北京地质学院,本科毕业后回内蒙古成为第一个搞生物的专业技术干部,业绩卓著,与各省市交流技术,受到专家好评,当爹娘的有这个争气的儿子,倍感幸福。儿子每年春节都要赶回家过团圆年。一九六九年春节又到了,仍和往年一样,准备好年货,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天天等日日盼,等到大年三十还不见回来,连个信息也没有。已是除夕之夜,不见人还,当妈妈的首先熬不住了,莫非有了什么事,予感到有不祥之兆,准备上路去找。阿爸说再等会儿,也许正在路上。全家人虽然忧心忡忡,还在包饺子,边包边等,老太太无心包饺子了,不由的抽泣抹泪。除夕之夜万家灯火,进入凌晨烟花四起,鞭炮齐鸣,家家户户喜气洋洋,而这一家人却沉浸在泪水之中。儿媳妇强忍着惦记丈夫的急切心情,勉为其难的,以孝敬老人的心意将煮好的饺子端

上来放在桌上，公婆哪有心吃下饺子。早已看出媳妇忧伤心情，情不自禁的全家人哭成一团。小妹出来进去观察哥哥进院门来了没有，忽而见有人进院来，她就打起精神迎上去。却是两个穿工作服满身汽油味儿的陌生人。这俩人走进家门就大喊“谁是朱光礼的父亲！你儿子朱光礼到家了！”这是震雷一般的信息呀！然而人们却不见朱光礼在哪儿。一家人惊呆了，四下观望，哪有朱光礼的身影，只见门外有一辆汽车，车里不见有人。来的俩人跳上车抬下朱光礼的尸体之后，一溜儿烟开车走了。五雷轰顶，全家人经受不住突如其来的打击，喊天呼地哭叫起来。全村人闻耗赶来，只见朱光礼全身伤痕，面目全非，认不出来。全家人等待期盼，活生生的人死着回来，父母哭儿子，媳妇哭丈夫，儿子哭爸爸，妹妹哭哥哥。一家人的擎天柱倒了。这一家人怎么活呀！

人世间也真有善恶报应的事。这个区测队的挖肃领导人，挖死四条人命，打伤致残十九个人的革委会主任李国道上山去打猎，摔死山涧。人们举杯庆贺。

在这个野外地质队还发生过一起全区没有过的怪事。夫妻两个上海人在没有受到任何触动情况下竟然去找专案组自首登记为内人党，要求保密，坦白交代可得到从宽待遇。这是滕海清打“内人党”的震慑力量造成的精神恐怖所出现的怪事。其实，按照滕海清的大汉族主义立场观点根本怀疑不到他们这个从上海来的汉人能加入“内人党”。

阿巴嘎旗有一个牧民老大娘，每天拿去批斗令其交代内人党她不懂汉语，她听出大意是向她要“内人党”这个东西，她以为是个什么物件。有一天她早早起来，赶了一头自留牛，去供销社卖掉。然后到柜台上说“买个内人党”。售货员说“我们这里没有内人党，也不卖内人党”，老人执意要买“你们要多少钱都行，无论如何给我搞一个”。对此情景，在旁的人给她说明买不了的东西才失望的离开柜台回去了。

还有个牧民严刑逼供，承认了内人党。可是承认之后还完不了，继续折腾他，叫他交待其他党徒。无可奈何，他就将他家的猫，狗都交待了。还是过不了关，于是将吃饭的碗、筷、桌子、凳子等都交待了，这样勉强过关。因为挖他的都是汉人，以为都是人名。等到后来在平反时，先给这个牧民平反，然后准备再给那几个毛如(猫)，敖海(狗)，阿义嘎(碗)，沙布哈(筷)平反时。他说用不着给他们平了。来的人说那不行，必须都要平反。于是将他们领到猫狗前面说就是它们。

察右前旗煤窑公社巴彦大队共三十七户人家，一百四十六口人，被挖八十八人，致死十七人。公共积累两万两千多元。挖过以后欠款一万七千多元；赛汉乌苏公社牧业队，三十四户人家，一百五十五口人，二十岁以上的全部被打成“内人党”，致死十人。

死伤残案例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吉雅泰，一九二二年参加的老革命，一九六八年在身患重病期间被一群“挖肃战士”强拉硬拖，斗死在街头。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哈丰阿是开创东部自治区的民族领袖。哈丰阿早

年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一九三二年在日寇殖民统治下，经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介绍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伪满官吏身份做隐蔽工作。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活动，抵制蒋介石国民党势力进入内蒙地区，为我党我军进入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做出过巨大贡献。哈丰阿于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共，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任自治区副主席，文化革命前调离内蒙古送北京，安排为全国政协常委，“挖肃”伊始，由挖“内人党”的“二办”以“内人党”党魁揪回内蒙，长期批斗、隔离关押。重病不得治疗，折磨致死，死后给戴了四项反革命帽子。

原内蒙古省委常委、高级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加入苏共。一九二九年奉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瞿秋白的派遣，回国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一九三六年被日寇怀疑拘捕，经哈丰阿等人多方营救而释放。一九四六年承德“四、三”会议加入中共。他是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先驱者。“文化革命”一开始他就被打倒监禁，开展“挖肃”之后又以其老“内人党”重新审查，使其精神和身体长期受到摧残，在一九六九年一月，深挖“内人党”的高潮中致死。

自治区民政厅老厅长乌力图是个平民出身的民族上层人士，是哲里木盟地区自治运动开创人。他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以内蒙古人民代表团团团长身份参加了我党初到东北在沈阳召开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受到东北局领导人李富寿、彭真、林枫、吕正操、陶铸等人接见谈话，决心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民族解放的道路，首任哲里木盟盟长、内蒙古骑兵第二师第一任师长。哲盟地处西满门户，内蒙古东部区开展自治运动的前沿地区。在国民党大举进攻的严峻形势下，乌力图无所畏惧，对于国民党高官厚禄策反拉拢毫不动摇，配合西满军区坚持艰难的自卫反击战，为我党我军建立稳固的西满根据地做出过重要奉献。他是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过来的，而且入了党成了一名共产党员。然而在“文化革命”中还是受到了政治审查。民政部门是管行政区划的。在那些年分邻省农区不断向牧区推进，边界纠纷经常出现，内蒙古是一再退让。可是“挖肃派”硬给乌力图扣上“乌兰夫独立王国的疆域大臣”的帽子，说他执行了“乌兰夫寸土必争”政策，把他打倒了。“文化革命”进入“挖肃”阶段，更是在劫难逃，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被隔离，关到黑房里逼他交待“新内人党”问题。他是在一九四五年哈丰阿“八、一八”宣言恢复“内人党”活动之后加入的，也就是“老内人党”。滕海清的“挖肃战士”们要把他打成“新内人党分子”，经七天七夜的刑讯武斗，于十二月十九日死去。人死之后，“挖肃”凶手们扬言是自杀。丽家属在医院太平间所看到的是全身伤痕。法医鉴定结果一直以“保密”不给死者亲属见面，到最后彻底平反昭雪也未给拿出来看看。毁证灭迹。

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是很有才干的民族精英，文化革命初期被鲁志浩等人诬陷为“出卖领土的卖国贼”、“乌兰夫黑帮”受到残酷武斗。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挖肃战士”藏海贤、吴春舫等十来名专案组人员，为突破嘎如布僧格是“内人党”中央执行委员、秘书长，在十一天内刑讯武斗了十三次，低头弯腰、拳打脚踢、揪头发、打耳光、来回推打、车轮战，手脚全都捆上，在水泥地板上长达九小时不松绑，不给吃，不给喝，臧海贤狠狠踩其胸部，叫喊“打翻

在地。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参加武斗的还有两个汉族女干部。此时嘎如布僧格已经神经失常，军管小组成员、连队文书计风用大头鞋踢脑袋，以枪探捅口腔，撬打牙缝，打掉三颗牙齿，捅破舌头、喉咙，咀巴、肛门两头流血不止，全身浮肿像皮球，人快死了，神志已经不清，挖肃分子们说他有反动言论，报由内蒙革委会“挖肃”负责人李树德批准以现行反革命逮捕，送到监狱时手腕已经溃烂。进监狱两天未吃来喝，送医院四天，于一九六九年一月五日死去。死因诊断为“急性败血症，中毒性休克，继发性酸中毒，电解质失调”。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内蒙实行全面分区军管后，以“现行反革命定案结论，不准翻案”。凶手吴春舫由一般干部提拔重用为乌海市组织部副部长。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派人来查，报送中央，华国锋主席批示“什么新内人党？不存在，彻底平反”。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副主任哈斯之妻内蒙物资厅人事处女处长金雪云，被挖“内人党”，于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日凌晨五时残死于刑讯室刑具上。死后解剖，腰背断裂二公分八，右边肾护油拧碎，肺内脏出血，左耳撕裂下垂。经追究凶犯查明，耳朵是凶手社文俊用铁钳子扯裂的。凶犯团级转业干部高祥顺，提酒瓶打头，用劈柴拌子打屁股，头朝下在桌楞上倒垂，大头针扎神经。在多日的车轮战武斗以及不给吃喝情况下，死者曾以全身的气力爬到暖气管下，口接锈红的滴水，饮润干裂的咀唇。最后一天，由凶犯秦永恒、王一平二人将金雪云架到椅子靠背上，仰面担腰，两个凶手坐在两边休息。经过一夜的动刑，凶手们也累了，将快要交接换班的时候，一个回民女共产党员已经静静地死去了。

内蒙古公安厅党组成员政治保卫处长腾和是在军管中死的，一九六八年二月“挖肃”伊始，滕海清宣布内蒙公安厅是包庇“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形形色色民族分裂案件的黑窝子、闫王殿，于是号召“挖肃派”砸烂公检法，随即隔离王再天、腾和。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腾和送进监狱。在深挖“内人党”期间，对腾和进行了连续十天的车轮战武斗。军管以后为了从腾和口中突破“内人党”，刑讯逼供武斗，于一九七零年五月十九日死去。死时头颅已变形，左耳后边塌陷，身体萎缩，医院诊查肺内感染，系外伤所致。死因病案由军管专案人员销毁不留痕迹。一九七零年五月二十一日军管当局所做结论中仍然列有“包庇二十七起民族分裂案件”的罪名。

内蒙语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戈瓦是蒙古学著名学者，经受种种酷刑之后成了“十不全”干部。他从头顶到脚底，无一不伤，无处不残，全身上下没有完好部位。

伊盟蒙族干部小白秀珍被毒打不省人事的时候，那些兽性发作的凶手们轮奸作乐，将炉钩子插入阴道，肠子都拉出来，然后扔到井里扬言“自杀”。

东胜县武装部副部长陈福廷经受了四十七种刑法，“刺刀见红”即达十六次之多。伊金霍洛旗苏泊汉公社苏泊汉大队支部书记弓巴岱被割了舌头，成了哑叭。

西苏旗自音朱日和公社巴音塔拉大队贫牧哈日拉老人一家四口被打“内人党”，凶手们将她们衣服剥光，强迫其儿子同生母交配，公公与儿媳交配。致使老父跳井了，儿媳上吊了，儿子用刀自杀，老妈疯死。。

东乌珠穆沁旗宝力格公社挖肃积极分子们将老牧民策布格札布老两日抓来，荐把他们儿子小俩口也抓来，当众强行把四人的衣服裤子剥光，强迫母子、公媳性

交。当他们反抗并提出抗议时，凶手们动手，先把母亲按倒在地，然后将其儿子压到他母亲身上。对公媳二人也是如此。凶手们一边动手一边狂呼乱叫：“你们还怕羞吗？你们蒙古人历来不都是这样吗！”其母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污辱，放回家后立即自杀了。

四子王旗白音敖包公社党委秘书敖如布札术苏，被隐瞒富农成份的坏分子邮递员潘秀玉用刀将其背部割开，把食盐揉进去，再用烧红的烙铁烫平伤口，谓之曰“焊人”，如此开心把人弄死之后，又将其妻子道尔吉苏抓来，进行多次奸污后，把炉钩子烧红插入其阴道，活活捅死。俩口子被杀死后，家里仅有的一个不到五个月的孩子冻饿而死。

达茂旗水电局技术员任德存，是个富农子弟，在挖“内人党”中，他问被挖的人“你是什么成份？”，当回答贫农时，他就一边打一边说“爷是富农成份，再分不分我们了？”。

西苏商业局的国民党兵痞宋洪恩，提着一条旧皮带，一边打一边说“我这个皮带有二十多年没有吃着人肉了”。西苏都和木公社，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朝格松札布的儿子斯仍那木吉拉，将贫牧呼和阿尔斯楞打死后，将其女儿霸占为妻。

二连浩特市长包国良的妻子被挖“内人党”，凶手们用绳子拉大锯，将其阴道和肛门拉通，成了终身残废。

×盟一位盟委书记的老婆，被凶手们打得半死，然后在她阴道中放炮，使其致残。

四子王旗朝克图公社治保生任被打死，凶手将其尸体悄悄埋入雪地里，声言死者“叛国外逃”，对其家属以“叛属”专政。开春后，狗从雪地里将“叛国外逃犯”的尸体却从中国领土里趴出来了。

达茂旗白音敖包三队的仁钦道尔济被挖肃积极分子用镐把将其阴道捅烂而死。

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桑根达赖公社牧民丹巴一户，俩口子都被挖死，留下四个孩子，掉水淹死一个，冻死一个，疯死一个，剩下个由亲戚收养。

达茂旗白彦花公社白音查干大队的盲流不务正业的坏分子兰米拴，把一个牧民打成“内人党”之后霸占了他的妻子，过了两年之后，于一九七二年军管期间，这个坏旦竟去被他欺侮的牧民家中要孩子说：“你那个孩子是我的”，强拉硬抱，逼的那个牧民疯了。

东苏旗白音宝力格公社社长土木特被打死，妻子将其尸体一直保存不葬。她说“生产队里死了一只羊羔还有人问，死了人却无人过问，不平反落实政策就不处理尸体。”直到粉碎“四人帮”平反昭雪之后才安葬。

东乌旗盐池公社供销社主任东日布，在挖“内人党”中失踪。当时印发了一千分通缉令，并有人扬言“该人于某一天领着蒙古边防部队，在边境上巡逻。”于是将其家属列为“叛属”进行专政。可是到了一九七二年，拉盐的人在盐池中挖出了他的尸体，因盐中保存完好，没有腐烂，所以完全可以辨认。事实表明，东日布不是“投修叛国”，而是被打死后埋进盐湖里。

达茂旗白音敖包公社的杨秋远，他在原籍曾因加入一贯道，有劣迹，盲流来牧区，在挖“内人党”运动中大打出手。他把抓来的男女“内人党”徒们的衣裤强行剥光，在男人的生殖器上拴绳子，叫女人们牵引绕蒙古包围着转，边跳舞边唱《北京有个金太阳》。此杨秋远在军管中调转工作移往他地，受到保护。

西乌旗巴其公社党委书记却札术苏,性情刚烈,不承认是“内人党”,被凶手们吊打、火烤、刀割,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最后被一名“接受牧民再教育”的女知识青年李秀荣用铁器猛击,脑浆崩裂死去。他的妻子杨吉玛上访告状,无人受理。杀人凶手李秀荣追到盟里,扬言告状就再把她孩子也杀死来相威胁。

原巴盟盟委统战部长苏德宝,在被挖“内人党”的武斗受刑中,头顶上打进一颗钉子,因钉入大脑神经里,不能手术拔出,只好每天吃药止痛延续生命。

乌拉特中后旗的吴清云,在受刑中因喊了一声“共产党万岁!”被凶手们割去了舌头

东苏旗有一个复员军人,为革命立过战功,身受七处伤残,打“内人党”的凶手们将其七处伤痕重新打烂,高呼“这就是对你的第二次庆功嘉奖”。

潮格旗一户牧民被隔离武斗,他的妻、女被挖肃积极分子强奸,气死。

四子王旗邮电局宝日召以“内人党”关进监狱,受到严刑逼供,高高吊起来,挂七十斤重的石头,手指夹棍,施以种种酷刑,最后用了电刑,遂精神失常。一九七零年二月,邮局军管小组指派武斗他的两名凶手刘玉柏、尤学忠带去呼和浩特精神病院检查,旋即报告宝日召失踪。受害者的老母亲闻讯儿子没有了,从库伦旗赶来查问如何失踪,挖肃积极分子们不但不说明情况,反而召开几百人大会批判其老母。

四子王旗一户牧民,父母隔离,小孩子在蒙古包里生炉子,失火烧死了。还有一户牧民,儿子隔离,春节没有回来,上吊死了,他二儿子知道后也死了。另有一户牧民,家人都隔离、群专、一个老太太无人照顾,冻死在蒙古包里。

达茂旗白音敖包公社四队,一户牧民,因父母被隔离,七岁小孩子冻饿死了。

潮格旗乌力吉图大队贫牧德力格尔巴图,隔离十几个月,抄家两次,没收物品两千五百元,妻女被挖肃积极分子章爱良强奸多次,老婆气死。

巴盟,在挖“内人党”中,有一户男的打死了,女的强迫遣返农村改造,刚生下的孩子,说是“小内人党,你要他干啥”,强迫送人。

四子王旗白音敖包公社党委秘书夫妇双双被打死。先用刀将背部割开,撒上盐,又用烧红的火钩子烫。女人被强奸后再用火钩子烫。死后五岁的孩子还扒在他妈身上找奶吃,孩子括活饿死。

托县中滩公社哈拉板申大队五小队王三小一九六二年盲流到达茂旗白音珠日和公社满都拉大队当羊官,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他当上了“挖肃”专案组长,他干的第一件事是将患有流血病的四十二岁妇女劳勒玛强奸,造成严重后果。接着又将其十五岁少女乌云同拉嘎强奸,然后虚报年令强行婚配,以行凶威吓顺从,不准离婚,过了一年生了孩子,严格管制,不准出门。他还随便花用生产队积累的公积金两千多元。对这样的一个无赖坏旦,军管不管。直到七四年军管撤销后才由旗法院判决离婚,乌云同拉嘎才得见天日。

《内蒙古日报社》博力雅特蒙族党员杜尔玛礼布被挖“内人党”跑出去卧轨而死。报社“左派”们未征求死者亲属意见,火化后骨灰扔掉,像死了一条狗一样处理了。杜的妻子胡吉雅,新城医院医生,拉扯三个孩子生活困难改嫁,为此带着三个孩子去呼盟杜的老家,向亲友交代杜的死因情况,同时让亲人们认认孩子。这样做是人之常情,可是报社当权者江波等人不给报销路费,更不用说抚恤了。

呼和浩特商业系统职工阿日本札,被挖当中失踪,是跑了还是打死灭尸了情况

不清,有关单位做除名处理,其父母想念独生子一个眼瞎了,一个精神失常了,生活无着。

凉城县人委办公室主任那木斯来,被武斗打死,妻子跳井,大舅子也被打死,剩下一个女儿,名叫杜达古拉,十六岁,“5.22”批示后随同寡妇上访团来自治区要求平反昭雪。对此,“挖肃派”们大造声势“寡妇上访团里还有姑娘”。以次诋毁“寡妇上访团”是坏人组织起来破坏“挖肃”运动。

乌审旗图克公社死了四十九个人,遭受严刑摧残的一百九十人。图古勒台大队陈文奎、马兰芳夫妻二人私设刑堂,动用五十多种刑具,以各种刑法取乐开心,在这俩人手里三个牧民丧命,三十多名牧民身受重伤成了残废,公社干部东如布,受十二种刑法吐血尿血,还强迫他与驴交配,凶手骑到他脖子上叫他学驴叫。还逼牧民潮乐蒙、巴拉登等人和驴、猪交配,骂他们是畜类。把大队书记巴图色仍打成内入党后,又毒打他妻子,叫她承队肚子里的胎儿也是内入党。梅林庙大队支部书记丹森被打成内入党书记,受完酷刑之后带上嚼子当马骑他,进行污辱,最后用刺刀刺杀了。牧民希地一家上自八十三岁老爹下至四十天婴儿共六口人全被打成内入党,严刑拷打妈妈的结果,婴儿死亡了。军属图们吉尔嘎拉刑讯中逼他儿媳妇骑到他脖子上污辱。公社党委女副书记朝鲁门拖进刑讯室衣裤全剥光,赤身裸体武斗五天五夜。公社党委副书记萨木全家五口被武斗死了四人,只剩一个九岁的女孩。他们的口号是“死一个少一个,少一个就节约360斤粮食。内入党死一个我们少操一份心!”。在“挖肃”运动中按他们表现,有七名打人凶手入了党。

营盘弯煤矿干部郝祥瑞在关押的一个月里车轮战二十七天,打的腰断背折,用烧红火柱穿捅鼻子,又用铁器猛打,当场致死。矿医院会计孙庆恒,车轮战十几天,受尽刑罚全身血肉糜烂发臭,不给休息、喝水,干渴难忍,哀求喝水。刑讯者用广告色碗从痰盂里舀一碗痰鼻涕往他嘴里灌,当即吐血不止,奄奄一息才抬进监狱“休息”,次日即死在牢房。

巴林右旗益合诺尔公社书记拉布杰,在武斗中四个钉子砸进脑袋里,带着钉子斗了十二天。巴音敖拉公社兽医站干部胡其吐被活埋,并将他十八岁女儿揪打之后被凶手们轮奸。他们武斗女人时都剥光衣裤再行凶。巴音汉公社怀孕六个月的斯琴高娃挨打之后流产双胞胎,还有的凶手硬逼着当母亲的说“我是母驴”,再叫当儿子的说“我是叫驴”。

固阳县两千名共产党员,被打内入党一千八百六十名。死了八十三人。磴口大队挖肃凶手们,把男女“内入党”徒关在一起,男的脸上画女人生殖器,女的脸上画男人生殖器,然后对面打;叫做“男女内入党结合”。新建公社水上大队刑法花样三十多种,挖肃分子逼着挨整的内入党徒互相指着对方的咀问“这是什么?”,对方必须说“必!”不这样说就挨打。逼着儿子对他父亲说“你是我做下的做你的时候如何如何弗劲”,于是他的父亲还必须承认“你说的对我就是你做的”。找来妇女月经血裤子顶在挨正人的头上罚站,他们叫做“红运临头”。东胜永公社副社长张锁柱于1969年1月12日开始被阶级复仇分子于胜利下毒手,先将他棉衣脱掉,拉到冰天雪地里冷冻,冻僵之后再拉回屋里拿到通红的火炉子上去烘烤,并把炉盖第二圈扣到头上烧,昏死过去之后浇冷水,反复折腾。将这种刑法称之为“冷静考虑,热情帮助”。张锁柱后来放回家时已没有人样,老婆孩子都认不出来。

乌盟党校教育长如意的生殖器头上拴住绳子,牵着满屋子跑,有时还变玩法,

将绳头拴到墙上，用鞭子抽打，凶手们取乐狂笑不已，造成阴茎萎缩回去，撒尿时如同女人一样蹲下去排尿。

集宁焊条厂党委书记韩淑英，是个女人，将其衣裤剥光，几个男子挖肃战士将她压倒之后，用钳子拔掉阴毛，以恣取乐。

乌盟计委主任毕力格图的牙齿用老虎钳子一个一个拔掉，后来把舌头和鼻子也割掉感染败血症死去。

西苏赛汉塔拉干部桑布，被挖肃专案人员活活将他埋掉，然后放风说他叛国外逃。家属按叛属对待。一九七七年，在赛汉塔拉举行那达幕大会，建造主席台时土方工程挖出了桑布的尸体，肉体用铁丝捆了三道，外用炕席卷上又用铁丝捆了三道。

西乌旗高力罕牧场一个干部的头上钉了七个钉子，然后扔进井里。

呼和浩特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云文义，于1969年1月11日晚活活被打死。因为根本不存在内人党，云文义硬抗，王世英等挖肃人员说他不老实，死顽固，严刑逼供。他们用棍棒、火钩、钢丝绳、电线、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拷打刑讯，攻不下来。于是王世英向廉天祥、蔡生等人布置任务，对云文义采取车轮战两班倒，连续武斗。各种刑法都用过，然后烤火炉，逐步加温，由流汗到流油，再用三件皮军大衣盖捂全身“闷豆牙”直到昏死过去，然后用凉水浇醒，接着继续拷打施刑，致使云文义全身严重外伤死亡，两肺叶出血，人死后专案人员诬说他是“服毒自杀”。经152医院、北京市公安局、中央卫生部解剖化验证明是外伤引起急性肺出血、水肿、心浊出血、两肾灶性出血、脑外伤和各脏器出血死亡，并非药物中毒死亡。

郭尔罗斯人阿民布和，共产党员，跟高万宝扎布等人参军参战，转业后任西苏旗供销社主任。“挖肃”中赛汉铁路机务段的凶手们抢功，将属地方的干部揪走，用铁条捆上，一夜之中就把他打死了。

挖“内人党”凶手入党提拔和重用

巴盟中后旗九六八年旗委机关四十名干部中挖“内人党”的积极分子二十一人，几年中入党、提职的占一半，由一般干部提升为局长一级的七人。巴盟机关张××打人最凶，当了电形公司副经理，后又提为盟体委副主任；冯××提拔为文教局副局长。中后旗乌力河公社特派员李××挖“内人党”大打出手，他将法院院长梅金山的嘴吧用钉书机钉上。这个人被提拔为公社书记。

中后旗翁根公社石××、王××，在挖“内人党”时，俩人在东屋里打人，在西屋里轮奸妇女。俩人后来都入了党，石××提拔为呼鲁斯太站长，王××调到乌兰公社重用。

中后旗财办主任张××，打“内人党”组成了十六人的武斗队，指挥、策划严重违法乱纪，被提拔为旗革委会副主任，后又调到中央石油普查队。

西苏旗白音朱日和公社有一打人凶手，原来是个社员，在挖“新内人党”中，他打死了四人，不但未法办，还调到赛汉塔拉当了国家正式工人。都仁乌力吉公社

有一工人，打死公社书记，调到二连市当了公安局干部。

察右后旗一个打人凶手，因挖“内人党”有“功”，入了党，并由普通工人提为公社党委书记。农林局一名干部，因打人有“成绩”，提为农林局的局长。

东苏旗白音乌拉公社一个副主任打“内人党”用老虎钳子拔牙，这个人被培养提拔为接班人。

北京下乡青年曲×是西乌旗知识青年挖“内人党”的总指挥，他将白音保力格公社书记娜布琪、“白马连”民兵队长德力格尔朝克图打伤致残。当时他还没有入党，但主持整党工作，然后入了党。军管领导人尤太忠发现，做了他的秘书，又提拔为内蒙革委会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

土左旗巴什公社沙尔沁大队老保管敖其尔的老伴巴什公社妇联主任党员云全全，放刑讯逼供，叫她交出乌兰夫发动政变时杀汉人用的七十把刀，追不出来将其活活打死，挂在树上，说她自己“吊死”了。七天后又将云敖其尔抓到西梁小队，仍是追这七十把刀。凶手们认为有可能把刀子同死人一起埋了，于是埋葬了的云全全的棺材刨出来寻找杀人刀。掘墓落空之后，将云敖其尔又押回来，凶手孙毛旦等人把他打死，尸体运到铁路，诬为自杀。老俩口都被挖死了，儿子云志坚接着又被打“内人党”残废了。云志坚的妻兄云德胜、云毛杏二人也在这“挖肃”中被打死。云德胜是北什轴公社社长，在一九六八年“挖肃”初期打死，将尸体运到离公社五里地一棵高大树上挂起来，定为自杀，并在同年冬挖“新内人党”时，又给他追加了一顶“新内人党”帽子。其弟云杏毛是后红岱大队支书，在挖“内人党”中被翟××等人打死后运到铁轨上，被火车轧烂，然后诬为自杀。云志坚夫妇双方亲属两户被打死四口人，而凶手却受到保护、重用。

一九七八年全区草原建设会上乌盟反映，军管中打人的、挖人的、行凶的、犯罪的入党了，提拔了，重用了，高升了，青云直上，而落实政策，解决受害者问题，却阻力层层。牧区是重灾区，先是拉肉，接着是打死人，还有“内迁”搬家，来一个扫地出门，现在活着的放牧劳动，负担着打人凶手造成的各种遗留问题。有些人趁挖“内人党”大发横财，逍遥法外。社员致死致残的费用社队负担不了。察右后旗乌兰生产队每年补贴致残社员用两千多个工。

达茂旗召河公社五六十户牧民被打死逼死四十八人，几乎一家死一人。有的女知青穿着裤叉骑在被挖人脖子上打人，还强迫他们喝洗了月经裤叉的污水。造成这个重灾的挖肃指挥人公社书记王××，军管后升迁为兴和县委副书记。

达茂旗有个名声最大的“左派”郭××，对任边境满都拉公社工委书记，对其工委秘书切日迈格其用种种刑法逼供无效后，用假枪毙相威胁，把他架出荒野，郭××亲自站在其身后向其头顶开枪，致使切日迈格其惊吓神经失常，妻离子散，郭××在这个公社打残九个人挖死十五个人，他们是丹达尔、尼玛、哈拉金术、那顺吉拉格尔、斯布杰(女)、温都尔、巴拉哈、巴达嘎、苏幼拉吐、那尔布、阿贡、根敦、少力盖札木苏、章峰、巴布。军管中这个公社商 63 户 218 人内迁，移入汉民接管房屋牛羊畜群。“挖肃”掌权的人“5. 22”后都跑了，生产队的五万元都没有了，这些人军管后又都回来了。郭××民愤太大，军管将他调到召河公社，去召河也很坏，又调转到武川县当水利局长。

乌盟委宣传部干事李×挖死了盟妇联主任田景惠和苏鲁巴特尔二人，将这样凶手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

优秀的达斡尔族干部安自治，是内蒙古文化局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中苏友好和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挖肃分子冯慧、吕殿臣、姚景坤、李承基、徐欣等人，在工宣队领导下，组成三班倒车轮战，领夜餐费，日以继夜，残无人道地折磨，一刻也不准坐息，到第七天已经走不动了，尿血、呕吐、全身伤痕，腰被打断，头被打震。由于安自治刚强硬顶，并向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申明自己是共产党，不是内人党，招致更惨的刑讯，到了第十天。终于在 1969 年 2 月 4 日凌晨三时死去。死后凶手们给定为乌兰夫反党集团骨干分子，苏蒙修情报员，民族分裂分子。从一九七三年开始，家属要求查清死因，但因在军管时期，保护挖肃积极分子，非但查不清，还重用这些挖肃凶手，给他们加官进级。

编者按：以上这些仅是受害者告发上来的少数几例。这种靠“挖肃”起家，提职、晋级、重用的数以千万计。各盟市、自治区机关普遍存在，到处都有。他们受到了掌权者们的保护。

牧区经济遭受摧残掠夺

一九六八年以来，察右后旗开荒二十 万亩。全旗七大牧场全部开光。其中农区社队进去垦荒十六万亩，均成为不计产，不征购的黑地。有个部队以办军马场为名，在乌兰哈达公社大办付食品基地，侵占社队草场经营畜牧业，开垦草场两万亩搞农业，打下的粮食又酿酒高价出售搞付业，并经常倒卖牲畜，以五百元购进，过了一年以后转手以二千元出售。

伊金霍洛旗垦荒一百万亩，沙化三百万亩。牲畜从一九六四年的五十七万头下降为四十三万；牛从二万八千头下降为九千头。 建设兵团进入杭锦旗三个团，垦荒七万亩，沿河地区的牲畜从二十五万头下降为十五万头。札尔格郎图公社过去有牛一万多头。一九七七年仅剩一千多。

达茂旗召河公社面积一千四百五十平方公里，被农区蚕食开垦。只剩下七百平方公里。

农区逐渐挤压牧区，乌拉特中后旗胡鲁斯太公社已被农区吃掉。就连公社的厕所、水井都是农区的，说不给用就不给用，牧业被挤上了山。

四子王旗，牧区和农区各占一半，农区里的小片草场已经开完，牲畜靠牧区草场，军队、工矿都去开荒，干旱、风沙、草场退化越发严重。军队占草场的是 233 军马场和 553 部队。

军管头目、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叫喊“牧民吃了亏心粮”于是大面积垦荒，滩地、好草场都开垦，种麦。牧民说“小麦下滩，林业上山，牧业登天”。他们煽动拔草烧柴、砍树、杀种畜、杀母畜、拆草库伦，破坏牧业经济基础。兴建草库伦被指责为“高筑墙、不积粮、还称霸”、“反汉排外”、“搞民族分裂”。挖防畜沟、防开荒沟被污蔑为搞“民族分裂沟”。一九七零年，锡盟军管领导强令拆除铁丝网，填平壕沟，报纸上还发表了“填平民族分裂沟，加强了民族团结”为题的文章。这股歪风刮过之处，上百万亩草原被垦掉，随即几百万亩草原沙化。你要坚持

以牧为主的方针，他就骂你不种地吃你妈的屁；你固定草场使用权，他就说“这是过去王爷的界限”。

开荒者扬言“草场是国有的，谁开谁的”，在“反汉排外”帽子的压力下，没有人敢于制止开荒，吵咀吵不过，打架打不过，告状没人管。

乌拉特中后旗原来农村、牧区以阴山为界，现已深入牧区几十里，胡鲁斯太公社几条河只能农区用，不准牧区用。

鄂托克旗一九六九年突然开进兵团，不和旗里研究自己划了地盘，将骆驼草场全部侵占，原有的工程建设无贷价的据为己有。掌权的挖肃派不经上级批准，擅自非法把一部分地盘划给陕西省，几个盐池、碱湖给了宁夏。

杭锦旗吸取历史教训，于一九六六年对农牧区进行了调正，将梁外不宜农耕的四个公社两万农民调正到沿河六个公社，剩下一半转为牧业。文化革命中两万人“造反”回去一万人，说是旗领导人搞了“反汉排外”。当时参加调正的有畜牧、农业、林业、水利等各部门，唯独给蒙族畜牧局长戴上“反汉排外”、“民族分裂”的帽子，进行残酷斗争。

鄂托克旗几拉公社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在挖“内人党”的挖肃积极分子掌权时期从榆林、定边来的，宰杀牛羊吃肉，拿走皮毛。召煌公社牧民平均每人只有五至七斤肉，吃不饱就用盐水泡玉米、高粮炒米充饥。

太仆寺旗五星公社对部分盲流人员进行了遣返，结果落了“反汉排外”罪名，在挖“内人党”时有关人员遭到了残酷斗争。

牧区没有户口的盲流人员很多，他们欺诈行骗，用各种手段谋取物质利益，清理这些人，怎么动员也不走。一九七五年达茂旗清理了六户，这几户上告旗里在搞民族分裂，上边军管领导人叫旗委书记检查错误，以后再也不敢清理了。

在牧区打“内人党”是农区贫宣队以及知识青年、盲流人员、外来户干的，打死打伤之后，把生产队的财产也都抄走了。死亡伤残人员的生活费由牧民集体负担。察右后旗乌兰哈达公社赛汉大队，一九六九年给伤亡人员补助六千五百五十个工，折款四千四百八十九元。七四年补六九年到七四年五年的工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二个，合款一万零七百六十元，赔偿损失的生活用品折款二千六百二十八元。几年中这个大队从集体共出款二万三千五百七十七元，户均负担一百八十八元，人均负担三十九元。由于生产队负担死、伤、残人员的开支，加之农区来开垦，牧场沙化，牲畜直线下降，由过去人均七头，下降为四人一头，牧民缺吃少穿，生活严重困难。

达茂旗白音敖包公社第二生产队曾有二十多万元的积累，在挖“内人党”的一年中全光了，并欠了债。潮格旗在挖“内人党”时，生产队的经济损失二十万元。

伊盟因挖“内人党”造成生活困难的三千七百多户，一万八千多人，负担过重的生产队五百多个。

在牧区挖“内人党”的同时也挖空了集体经济。贫宣队、盲流、知识青年进驻牧区生产队夺权之后，财务制度搞得一片混乱，在乱中混水摸鱼，挖肃积极分子乘机贪污盗窃。乌拉特中后旗川井公社一个生产队，查出有经济问题的多达十八人，许多是“千字号”。

不少地方在“挖肃”和军管期间将牧民的财产、物资、牲畜均当作叛国的财富、叛国的牲畜进行查抄、没收、平调。一九六九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间，

××××部队从两乌旗吉林牧场赶走集体牲畜：马一千五百四十三匹，折款六十一万二千元；牛四百五十头，折款三万七千四百元；羊一万五千五百只折款二十三万二千四百元；改良羊十五只，折款一千二百元；役牛三十头，折款五千一百元；车二十辆，折款三千六百元；大毡三十块，折款一千五百几十元。共计一百一十六万八千元。拿走个人牲畜财物：自留马一百八十匹，牛五百三十三头，羊一千八百三十七只，手表两块，收音机三个，生产用品一百二十件，生活用品八十件。蒙古包三顶，其他物品三十件。共折款一百一十六万五千元。

一九七一年，××××部队从兰旗黑城子牧场无偿赶走一百五十匹母马，拿到河北高价出售。宰杀近万只改良羊，其中基础母羊二千五百余只。

东乌旗阿拉坦黑力公社，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间，边防站站长郝××，拿走一百二十头牛，一麻袋银子，一个二斤重的犀牛角，八个戒指，现金六万余元。该郝在同期将沙麦公社半麻袋银子，十个戒指拿走。他又把九十五头牛宣布为反党叛国牛赶走。

六九年东苏旗红格尔公社九十五匹马被边防二团的甘××赶走。

建设兵团×师于一九六八年将东苏旗反修牧场的一千三百零七匹马赶走，后来经多次交涉退回五百匹。××军从六九年底对锡盟军管以后，仅从白音乌拉公私合营牧场一地就无偿拿走八千零八十八头牲畜。其中马一千三百二十四匹，牛三百三十六头，羊六千四百二十八只。此外还拿走地毯、毡子、皮毛、药材、毛毯、缝纫机、银饰鞍具、望远镜等价值八万三千元的东西。一九七零年该单位的王××指导员，在该场第三分场时，为了给其首长们做羔皮大衣，竟然在羊群里挑选优质毛色的绵羊跑羔，杀掉一百二十多只。这个部队还将集体的几百匹纯白色优良马群偷赶到关里卖掉，每匹马卖到一千二百元高价。从此这群优良白马品种断绝。

东苏旗达赖公社挖五十六人，误工补贴和物资损失退赔三万九千元，全由社队负担。红格尔公社打“内人党”六十八人，死亡十六人，“群专”管制九十三人。对他们误工补贴三万元，物资损失折款六万元，两项九万元全由牧民大家分担。牧民说“他们把人打死打伤，把东西抢走，损失还要由我们出，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锡盟西乌旗汉乌拉公社于一九七零年划归兵团四师四十四团。几年来，兵团给他们带来了严重危害。七十华里长的草场，往中间切断，将四十华里长的水草丰美的扎格斯太河两岸强行开荒十多万亩，八十八户牧民被赶到草场两端，相隔五十多华里，队部周围被开荒封闭，饲草基地围墙、牧民房屋放拆除。牧民提出反对。兵团杨指导员说“你们的乌兰夫已经完蛋了，他掌权的时候不让我们开荒。告诉你们，这里的土地不是你们蒙古人的，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哪儿随便”。

由于开垦草场的结果，牧场只剩下百分之二十的地方了，牲畜放不下了。兵团还规定“一只牛蹄子进地罚款五角……”等等。其实比罚款更凶。兵团以牲畜进地为由，经常开抢打死或用刀砍死、刨死牲畜。曾有一头牛从其背七拔下来四把二齿勾于。砍死的牛羊用车拉到连队里吃肉。牧民找兵团，×团长说“你们赔庄稼，我们就赔牛……”还有的将马尾巴从根上砍下来卖钱。兵团战士养活狼狗。抓走羔羊给驯狗吃活羊，六连的狗已经咬死了四个马驹，八个牛犊。三连赶大车的战士领着三条狗咬死了四只羊，牧民去找，用大鞭子赶走。兵团战士为了骚扰牧民方便。已经打死了牧民的五十多条牧羊犬。农业队七十三户人家，已被抢劫的有五十七户。

只剩六户尚未受祸。吃的用的什么都要。连干牛粪都剩不下。沙木老人体弱多病，拣，一冬的牛粪也被抢走了。宝音敖家准备给卧床不起的老父熬汤喝的仅有的一条羊腿也抢走了。牧民骑马从兵团附近经过，叫兵团战士看见就拦路拉下马来。他们骑上马跑个半死才扔给牧民，或者将马放跑，叫牧民几十里路步行回去。牧民到粮站买粮，去供销社买东西都要遭到兵团战士的侮辱、毒打，戏弄。牧民说“兵团战士比国民党土匪还坏”。蒙文学校都撤销了，原来的教师被赶走了，代之以汉文学校。牧民说“旧社会遗留的文盲帽子还没有全部被摘掉，新社会的文盲又增多了，看来过不了多少年，蒙古人就变成汉人了”。还有的牧民说“公社林场被砍光了。草场都沙化了。牧业不行了，种地也不长了，我们能干个啥呢，咋活呢！”兵团强购牲畜，压低价钱，剥削牧民。一等马压到二，三等。社员吃一只羊十二元，兵团才算八元。调用大队车辆、劳动力一万三千元才给了五千元。自从公社划归兵团后，旗里，盟里不管了，说兵团的事他们管不了。一九七二年大队书记阿尔斯郎来内蒙党委反映情况回去后，兵团给他扣上“民族分裂活动”的罪名，把他公社党委委员撤掉了。兵团战士骚扰百姓的问题告到兵团后，兵团领导说“你们把那个战士给我拿来，我就处理”，那么大兵团谁知道是哪个战士干的！牧民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诉，生活无法过下去了，生存成了问题了，实在没有办法了，牧民拆掉房屋，拉上蒙古包逃到离兵团很远的地方去过太平安定生活去了。

伊盟杭锦旗阿尔斯楞图公社第三大队共一百二十户，六百多口人，大小畜一万多头，面积东西宽三十里，南北长二十五里。周围和三个农业公社的五个大队Ⅰ腐界。周围的农业社、队擅自突破划界，侵占牧场，随意破坏草场开荒种地，随意损害草原植被，拔走沙蒿，挖掉草根，造成草场严重抄化。草场已被侵占了三分之一。由于草场缩小，草原被破坏，严重地危害了。牧业的发展，牲畜逐年下降，七二年大小畜二万余头(只)到七四年只有一万头(只)了，牧民收入减少，生活水平降低。

兵团×师×x团是原阿巴哈纳尔旗朝格乌拉合营牧场并入兵团后改编组成的。并入兵团以前，共有八万多头牲畜，二百多户牧民，七百多口人。三年来牲畜没有增，牧民肉食减少，奶食收费，包毡提价，儿童失学，牲畜外流：

1. 开荒种地，破坏牧场。自一九七一一年以来，累计开荒二十万亩，好草场基本开完。农业年年欠收，牧业停留在三年前的水平。

2. 搞平调，走后门。一九七零年××团调转海勃湾时，无代价地带走一百匹骗马；一九七二年九月通过团部某领导的个人关系，用一百匹生产母马从山西高价换回一匹过口种马，两头毛驴，两匹当年马驹；今年春节后，××团团团长回河北某部队探访老战友。走时带走三汽车牛、羊肉和三十匹生产母马送礼。回时带来一些大米分给团部领导享用。

3. 肉食减少。奶食收费，包毡提价，过去一年按人口安排三只半到四只羊肉。并入兵团以后一律改为七十二斤。并且一次付线。因此夏季产妇和病人喝不上羊肉汤。并入兵团以前，每年按户免费安排五头左右奶牛，解决牧民奶食问题，现在每户仅安排三头，并且每头奶牛收费三元五角。过去一块蒙古包毡子收费廿四元，现在收费三十二元羔皮、剪茬皮全部由兵团干部使用，牧民一张也不能动。

4. 适令儿童失学。××团管辖的牧民有一百二十多小学适令儿童。原有蒙文小学改为汉文小学以后，牧民儿童毒全部失学回家

5, 民族语言行不通。××团团部领导全部是汉族。领导说活群众听不懂、群众反映问题领导听不明白。有的领导对不会说汉话的牧民说:“吾噜吾噜说什么, 回去叫个会说话的来”

6. 挖肃遗留问题没有处理。挖肃期间, 没收很多误伤牧民的财物。这些东西全部廉价处理给连、团干部。现在在政治上虽给误伤牧民平反了, 但是没收的财物没给退赔。

呼盟西新巴旗一九六八年底有牲畜七十六万多头只, 深挖内人党几个月时间里就损失四万八千头赛汉塔拉公社五千多头牛死了两千头, 八万多只羊死掉三万多只, 两千多匹马死二百多匹, 东新巴旗科局长以上干部一百七十四名, 除三人外全被打成内人党。乌胡宝力公社干部除一名车夫外都被打成内人党, 百分之八十的牧民都被挖内人党。牲畜损失令人痛心。敖拉诺尔大队一千八百三十九头牛, 死了八百四十五头, 一万五千一百九十二只羊, 死一千四百九十二只。

××××军宣队在西苏旗支左领导挖肃造成惨重后果。这个军宣队人员还严重违反纪律拿走牧民查抄的物品, 这些军人从各社队拿走的财物列单如下:

汉塔拉公社——王××羔皮 51 张; 尹××手表一块; 李干事绸子一块; 高其通皮袍子一件; 翟排长皮袍子两件; 邱××手表一块; 诺干敖如公社李××等人羔皮 136 张;

布吐术吉公社——排长手表一块, 柳条包一个; 李××半导体收音机一个, 手表一块, 滩羊皮袄一件。跑羔皮大衣一件, 自行车一辆, 缝纫机一台。

汉乌力吉公社——×干事自布 105 尺, 兰布 98 尺, 花布 43 尺, 羔皮大衣三件, 羔皮 105 张, 床单一个, 耗绒袍子三件, 羔皮袄两件, 布 51 尺, 棉大衣一件。

自音珠日和公社——×××兰布 30 尺, 羔皮筒一件; 刘××羔皮 30 张, 羔皮筒两件。

自音商勒大队——几个人分驼毛 40 斤。

自音红格尔大队——×班长马靴一双, 羔皮 70 张, 大羊皮若干张。

以上所列单子是西苏旗工人、牧民、干部联合上访团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报告。

全区牧区草原建设工作会议反映“挖肃”后果

按: 粉碎“四人帮”之后, 华国锋彻底否定“内人党”的存在, 内蒙古人民再次获得解放, 由衷感谢党中央华主席再造之恩。大难之后, 受害的广大牧区工作干部第一次出来参加敢说话的会议他们对于滕海清挖“内人党”所造成的深重灾难, 以及继滕海清而来的郑维山、尤太忠的军管加深内蒙古人民苦难的严重情况都说出来了。

在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中央还没有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还在肯定军管是正确的。搞军管的尤太忠还在主持内蒙古党

委的工作,因此,与会者只能笼统地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滕海清“挖肃”时间仅为一年,而军管是从一九六九年底开始到一九七三年冬开始撤,不是一下子撤,是陆续撤,直到一九七八年底尤太忠走了才算彻底结束军管。在这《全区牧区草原建设工作会议》简报中反映的严重问题都是对军管提出的。进入九十年代天空中出现的弥漫北中国的沙尘暴,谁之罪?还不是郑维山的军管干的!历史必然要彻底否定军管的正确性。

全区牧区草原建设工作会议简报
第六期 一九七八年六月六日
当前落实政策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会议一致认为华主席彻底推翻了挖“新内人党”的历史错案搬掉了压在我们心上的块大石头,砸烂了套在我们身上十年之久的精神枷锁,使我们得到了又一次解放。干部牧民无不万分激动,更加心向华主席、心向共产党。

归纳各组讨论提出的意见:

一、要进一步清除障碍、冲破阻力。各地反映,当地落实政策的阻力很大。有的旗传达贯彻中央文件时还保密。中后旗有一打人凶手,正在传达报告时调走了。乌盟同志说,过去打人的、行凶的、犯罪的,入党了、提拔了、高升了,他们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现在落实政策,解决受害者的问题,却阻力层层,行动迟缓,有的至今未见行动,有的还在捂、还在保。

二、要尽快解决领导不力的问题。大家认为:政策中央已经定了,能不能落实好,关键仍在领导。不少同志指出,当前,全区行动迟缓,声势很小,打人行凶的不臭,一些民愤极大的没有抓,主要原因是领导不力。有的同志提出在解决挖“新内人党”遗留的问题上,自治区党委历来被动,现在还是被动,希望迅速改变这一状况。

三、兑现政策中社队经济负担大。按自治区(48)号文件规定,社员至死,至残的生活费,由社队公益金中解决,负担过重。察右后旗乌兰格日乐生产队,每年补贴致残社员的用工达二千多个。有的同志说:牧区是四害横行的重灾区。先是拉肉、接着是打死人。还有什么“内迁”搬家,来一个扫地出门。现在是活着的放牧劳动,负担着打人凶手造成的各种遗留问题。这是当前一个大量的、普遍的问题,不仅政治上影响很不好,经济上压力也很大,希望尽快合理解决。

四、各地反映,大部分打人凶手都已调离原单位。解决他们的问题材料来往,手续繁多。中后旗到盟里要人,盟组织部不给,增加矛盾。对少数民愤大的能否交原单位处理,需要有一个具体政策。

五、有的人,趁“挖内人党”之机,大发横财,逍遥法外。大家提出:亦应在此次落实政策中严肃处理。

简报 第九期 六月八日

“四人邦”对牧区和畜牧业的破坏(一)

会议讨论中,大家集中火力,愤怒声讨“四人邦”在牧区犯下的滔天罪行,越批路线是非越清。对“四人邦”越恨,对华主席、党中央越亲。

“四人邦”对牧区经济政策的干扰和破坏如下:

一、破坏“以牧为主”的方针，郑维山在牧区大肆鼓吹“牧民吃了亏心粮”的反动谬论，诬蔑牧民是“长脖子老等”。在伊盟，他们说伊盟只有牧业公社，没有牧业旗。将大部分畜牧、兽医、草原机构撤消。群众讽刺说，伊盟的牲畜不吃草、不生病。他们一面煽动拔草、砍树、杀种畜、拆草库伦，破坏牧区的经济基础；一面强迫干部牧民种地打粮搞农业，破坏草原、破坏畜牧业。这股黑风刮过之处，上百万亩草原被开掉。几百万亩草原造成沙化。杭锦旗图克力公社在滥垦草原中，六个大队有五个变成了穷队，草原沙化退化牧民缺吃少烧。全公社牲畜从五万头下降为二万头。现在草场上尽长些苦豆子，连羊肉都是苦的。

二、破坏保护母畜的政策。

在“四人邦”的干扰下，正确和错误、真理和谬误颠倒。保护母畜的正确政策被破坏。多年来，母畜被随意屠宰、出售和外流在“四人邦”歧视、排斥、打击少数民族的高压政策下，不少畜群的权也被夺了，又造成大批母畜死亡，许多地区母畜比重减少百分之七至八。

三、破坏经营管理制度

军管时期把一切社会主义的管理制度都诬蔑为管、卡、压。把“按劳分配”诬蔑为“工分挂帅”，牧区长时期“老八分”。劳动好坏一锅粥，严重挫伤了牧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特别是对“六固定”、“三包一奖”和“两定一奖”的否定，破坏性很大，杭锦旗原来推行超产奖励制度，每年六月开牧工大会兑现，繁殖成活率一般百分之八十五，最低百分之八十。现在下降到百分之六十以下。仅一个旗每年即多损失仔畜六、七万头(只)。

四、破坏财务管理制度

在“四人邦”煽动的无政府主义干扰下，牧区人民公社财务管理搞得一片混乱，混乱中造成极大破坏。一些贫宣队进驻牧区夺权后，大搞分光吃光，挥霍浪费，极大地削弱了集体经济；社员普遍大量借款、欠款的歪风，又进一步挖空了集体经济；一些坏人趁机贪污盗窃。中后旗川井公社一个生产队，查出有经济问题的多达十八人，许多是“千字号”，因为面大，大部分只好按“欠款”对待。

简报 第十期 六月八日

“四人邦”对牧区和畜牧业的破坏《二》

在小组讨论和座谈中，与会代表愤怒声讨林彪“四人邦”破坏民族团结的罪行，大家说，林彪、“四人邦”破坏党的民族政策，散布“区域自治是民族分裂”、“少数人专了多数人的政”等谬论，污蔑少数民族是“异族”、少数民族语言是“外国话”，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少数民族人民难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反汉排外”的帽子满天飞，极大地破坏了民族团结。

一、各地普遍反映，牧区的畜牧业战线很多正常的工作，都被戴上了“反汉排外”的帽子。兴建草库伦，被指责为“高筑墙、不积粮、还称霸”，搞“民族分裂”。挖防畜沟被污蔑为搞“民族分裂沟”，一九七〇年锡盟军管领导指示叫拆除、填平，有的地方报纸还发表了《填平民族分裂沟，加强了民族团结》为题的文章。杭锦旗吸取历史教训，一九六六年对农牧区划进行了调整，把梁外不适宜发展农业的四个公社共两万农民。调整到沿河六个公社，剩下一半转自牧业，文化大革

命一开始,两万人“造反”回来一万八,说是旗委领导搞“反汉排外”。有的旗反映,你坚持以牧为主,有人说,不种地吃你妈的×;你固定草牧场使用权,有的人说,这是过去王爷的界限,应该批判。

二、在牧区,畜牧业是一种民族经济,所以大批搞畜牧业的同志,受打击、遭批判,杭锦旗一九六六年参加农牧区划调整工作的,有畜牧、农业、林业、水利等各个部门,唯独给畜牧局长戴上了“反汉排外”、“民族分裂”的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文化大革命前,锡盟提出了“咬牙拚命发展牲畜一千万”的口号,后来遭到批判,罪行是“与蒙修和平竞赛”。有一个旗的旗委书记(汉族)组织固定草牧场使用权的工作,受到农民的围攻,骂他是汉族的“叛徒”。

三、由于“反汉排外”帽子的压力大,很多牧区干部对残酷斗争心有余悸,不敢大胆工作。例如,清理牧区外流人口的问题。就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鄂托克旗几拉公社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乘挖“内人党”的混乱时期从榆林、定边来的,与牧民分吃肉、用毛,关系紧张,召煌公社平均每个人冬季肉食只有五至七斤。太仆寺旗红星公社,按上级指示,对部分盲流人员进行了遣返,结果成了“反汉排外”,有关人员在挖“内人党”时遭到了,残酷斗争。各地要求党委发个文件,给这项工作撑腰。对“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政策不敢坚持,达茂旗乌兰图嘎公社一千四百五十平方公里,被农区开的只剩下七百平方公里。中后旗原来农村牧区是以阴山为界,现在农村到牧区开荒,制止不了。胡鲁斯太公社几条河槽都有水,只能农区利用,不准牧区利用,同时,农区还深入到牧区三、四十里搞水库,牧民说。河套是商品粮基地,我们拥护,不要再往北挤了。伊盟农区的牲畜,大量侵占牧区草场,长期得不到解决。

四“反汉排外”的帽子,加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造成牧民的利益无人重视,存在的问题无人敢管。鄂托克旗反映,一九六九年,“五.二二”批示刚下来,突然来了兵团,不和地方研究,自己划了地盘,把整个骆驼草场全部侵占,旗、社的工程也无代价地据为已有。同年,掌权的造反派头头,不经批准,把旗的一部分地盘划给陕西,几个盐池、碱湖给了宁夏,使全旗财政收入减少一百多万元。中后旗反映,农区说“草场是国有的”,固定草牧场使用权,他们不同意,任意侵占、开荒,吵咀吵不过,打架打不过,告状没人理。

简报 第十一期

十年错案要彻底昭雪

按:伊盟组讨论、整理了一份“挖新内人党”的材料,摘录如下:

全盟有十五万人被打成“新内人党”,占当时七十四万人的百分之二十一。全盟因挖“新内人党”致死、致伤、致残的八千五百九十八人,其中:致死一千二百六十人,致残的二千三百二十二人,致伤五千零十六人,因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工作能力的七百三十九人,半丧失工作人员、共青团员、贫下中农牧和积极分子。在致死中:有旗县委书记十一人,多数是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如乌审旗旗委付书记杨生祥是一九三五年的党员。杭锦旗旗委书记奇治民是民族学院的学生,十二、三岁就参加了革命。鄂托克旗付书记宋峰山同志是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的,活活打死。还有东胜县委付书记郭致祥同志和伊旗付旗长赵建国同志也是被活活打死

的。全盟致死的科级干部一百五十多人，大小队干部五百多人。杭锦旗全旗受害者四千多人，致死一百一十八人，其中三名旗委书记死亡。乌审旗全旗致死一百四十九人。图克公社全社三千多

人，百分之七十被打成内人党，致死四十三人。

挖“新内入党”的所谓变种组织十分罕见，无奇不有，多达三十四种。挖“新内入党”的刑法古今中外，骇人听闻，什么“烈火烧身”，“斗私批修”，“刺刀见红”，“清醒头脑”，“冻冰棍”等等几十种。东胜县武装部付部长陈福廷同志（现盟劳动局付局长）前后经受了四十七种刑法，刺刀挑身即达十六次（刺刀见红）。伊旗苏泊汉公社苏泊汉大队支书弓巴岱同志被割了舌头，成了哑巴。有的人，把人家打死，又强占人家的老婆。杭锦旗原革委主任李文杰亲手打死奇治民同志。李文杰至今逍遥法外。不少阶级敌人、阶级报复分子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至今没有得到严惩。对致死者不追认烈士，不开追悼会，仅给受害者生活补助，而许多打人凶手升官，入党、发了财。

因挖“新内入党”造成生活困难的三千七百多户，一万八千多人。负担过重的生产队五百多个。全盟干部扣发工资没有补发的达四十万元，农牧民生活困难补助费约三百万元。重划阶级，全盟错划成份的有一千八百六十八户。其中牧民一千零六十户，农民八百零八户，没收财务一百五十万元，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全盟落实上述政策需款约五百万元。需要上级给予解决。

简报 第十二期

要认真落实政策

六月八日上午，巴盟小组集中讨论了“挖新内入党”错案遗留问题，简报如下：

一、挖“新内入党”的指挥人、策划人、打人凶手。很多人入了党、提了职、受到重用。中后旗一九六八年旗委机关四十名干部中，参加挖新内入党的二十一人，以后入党、提级的占一半，由一般干部提升为局一级干部的七人，其中包××原是旗委办公室翻译、此人牵涉到潮克玛西被挖内入党致死一案，但被提拔为旗团委书记，最近又做为优秀分子选入民族学院。盟里张××打人最严重，当了电影公司付经理，后又提拔为盟体委付主任；冯××，打人严重，现提拔为文教局付局长。

二、在讨论中提出，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人，提了职，调动了工作，如何解决？并例举了以下事实。

中后旗乌力河公社特派员李××，在挖内入党中大打出手，梅××不承认是内入党，他拿钉书机把人家咀钉上。后来提拔为公社书记，现又调到旗砖瓦厂当厂长。

中后旗翁根公社石××、王××，在挖内入党时，两人东屋里打人，西屋里轮奸妇女。两人后来都入了党，石××提拔为呼勒斯太站长，王××调到乌兰公社。

中后期财办主任张×，在挖内入党时，组织了十六个人的打手，严重违法乱纪，人事科长金宝林之死，张×有直接关系，但他被提拔为旗革委会付主任，后又调到中央石油普查队。

三、同志们提出,落实政策应有几条规定,具体意见是:

1、什么是严重违法乱纪应明确,对这些人应如何处理,调走的如何办?对挖内人党的支持者、领导者如何处理?

2、对致死、致残的家属、子女应如何照顾。中后旗反映体委主任白××过去是“挖肃”组长,现在他对受害者子女的安排,百般阻挠。

3、挖内人党时生产队的经济损失,应由国家负担。(潮格旗的损失就有二十万元)。

简报 第十三期

挖“新内人党”存在大量的经济遗留问题

在讨论中,各级反映挖“新内人党”存在大量的经济遗留问题,需要解决。

伊盟挖“新内人党”致死、伤、残造成生活困难未妥善解决的四千零十二人,困难户三千七百户,一万八千人,负担过重的生产队五百个,个别还有外出讨吃要饭的。农村牧区解决生活困难,医疗等共需款三百万元。

察右后旗代表反映,乌兰哈达公社赛汉大队挖“新内人党”时共打死十三人,打伤三十三人。当时打人的都是外地来的贫宣队、知识青年以及盲流人员。但现在对死者遗属、残伤补助,却要由大队负担。一九六九年,生产队给误伤人员补助误工补助六千五百五十五个工,折款四千四百八十九元。七四年给被误伤致死致残人员补工一万三千四百五十个工,合款一万零七百六十元(从六九年补助到七四年),赔偿在扩大化期间损失社员的一部分生活用品折款二千六百二十八元,均由集体负担。七四年共拿,一万三千三百八十八元。七五年到现在,平均每年还得拿出二千个工补给致死致残者,每年合款一千九百元。落实政策以来这个大队共出款二万三千五百七十七元,户均负担一百八十八元,人均负担三十九元。严重地减少了社员的收入,造成了生产队当年收益不能兑现。三角债务严重,这个大队共欠债五万二千零六十五元,其中欠国家三万六千三百四十四元,欠社员一万五千七百二十元。在定程度上影响了集体生产和社员生活,不利于调动社员的积极性。社员对内蒙(74)48号文件有强烈的反映。队干部和社员说:这些补助工不应由我们负担,当时我们没整人,我们也是被整的,致死致残了让我们负担,真不合理。旗的意见,在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基础上,国家应予适当的补助。特别是近些年,由于农区来开垦,牧场沙化,牲畜下降。过去人均七头,现下降为四人一头(包括由外地调拨的),群众缺吃少穿,生活严重困难,牧民喊冤叫屈,旗里怕出乱子,至今未将落实政策的文件下达。

察右中旗反映,该旗有七十五户内迁户,都是一九六八年挖“新人内党”期间,从边境迁入的蒙族牧民。经落实政策,旗里动员回去一些户,有二十户不回去,他们要求:(1)平反恢复名誉,宣布不是叛国分子;(2)要给自留畜繁殖部分牲畜;(3)迁出时丢下的蒙古包、家俱,当时合款三十六万元;(4)把农区迁去的人要调走,否则他们回去了也没有牲畜。

简报 第十四期

对处理挖“新内人党”错案遗留问题

综合各组讨论,对处理挖“新内人党”遗留问题,有如下意见:

一、对内蒙党委的意见

1、在新内人党问题上,内蒙党委历来就被动,领导不得力,政策落实不迅速,各省(市)都在电台、报纸上发表自己的阴暗面,我们怎么就不行?不大破,怎能大立?(东乌旗)

2、现在担心的是政策能不能落实?尤书记五月十九日的讲话,还保群众有意见的××、××、×××等三个人。成立了落办投人管,还把×××拿到落办,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落实政策?

3、对滕、吴、高,权要彻底批判,“只抓台前旦,不摸幕后魔”群众是不答应的。滕海清要回来作检查。

4、八月搞不完政策落实工作,时间应该延长。具体问题不解决,一年也结束不了。

5、我们对尤太忠同志的秘书曲折信不过,他在西乌旗白音保力格公社和一伙人,大搞逼供信,全公社被关押七十多人,致伤致残多人,书记那布其、武装部长德力格尔被他亲手打伤致残,这样的人在上面乱出点子,我们不放心。这样的人能调动起内蒙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吗?

二、领导工作方面的意见

1、现在有的领导班子中,有幕后策划、指挥、专持挖“新内人党”的人和打人凶手,这是落实政策的阻力,应整顿领导班子,把这些人清理出去,这样才能落实政策。

2、《内蒙古日报》在“挖肃”中很括跃,现存为什么无声无息《辽宁日报》现在发表文章,批判的很好。《内蒙古日报》也应该对挖“新内人党”落实政策问题发表文章。

三、政策性的意见

1、对搞阶级报复的严重违法乱纪的刑事犯罪分子,应清查法办。否则就不足以平民愤。(普遍意见)

2、对死者除政治上给予平反外,要安置好实际生活,对经济损失国家应给予补助。

3、对不明真象的大多数人,应团结,不能每个人头上摸一把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4、原来是打人凶手,后来又被挖的,不能视为误伤者。

5、对致死、致残、致伤的子女,应增加一部分指标予以安排。

6、牧区受害者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少,他们的生活如何解决,生产队没有公益金,自己又承担不起,应由国家拿些钱,给予生活上的照顾。

7、要求废除“不抓凶手、不开追悼会、不追认烈士的“三不”政策和“保护挖肃积极分子”的政策。

简报 第十六期

乌盟挖“新内人党”情况和意见

乌盟全盟挖“新内人党”致死二千余人,致残七万余人。

察右后旗是当时挖“新内入党”所谓的“先进”单位。

全旗打死、逼死二百余人。这个旗的乌兰哈达公社赛汗塔拉大队，在进驻的军宣队、贫宣队的指挥下，十八天内致死十八人，致残三十三人。

四子王旗白音敖包公社党委秘书夫妇双双被打死。先用刀将背部割开，撒上盐，又用烧红的火钩子烫。女人破强奸后再用火钩子烫。死后五岁的孩子还扒在妈妈的身上找奶吃，孩子活活饿死。惨无人道，使人发指。朝克图公社治保主任被打死，凶手将尸体埋在雪里。反咬一口，造谣“死者”叛国外逃，又牵连家属，后来，狗从雪地里把“死者”的头叼回来，才知道被打死了。

西苏旗白音朱日和公社巴音塔拉大队贫牧女社员哈日拉老人被打成“新内入党”。凶手将她衣服剥光，强迫她的儿子同她交配。儿子被逼成疯。《5.22》批示下达后，哈日拉多次上访要求惩办凶手。但至今不做处理。

乌盟反映：绝大部分打人凶手、违法乱纪分子都入了党、当了官或发了财。西苏旗白音朱日和公社有一打人凶手。原来是个社员，在挖“新内入党”中，一人打死四人，不但未法办，还调到赛汗塔拉当了国家正式工人。都仁乌力吉公社有一工人，打死公社党委书记，调到二连市当了公安局的干部，让犯罪分子管社会主义的公安、法治工作。察右后旗一打人凶手，因挖“新内入党”有“功”，入了党，从一普通工人提为公社党委书记。旗农林局一名一般干部，因打人有“成绩”，提为农林局局长。乌盟同志揭发：现乌盟盟委书记×××因挖“新内入党”指挥有“功”，在当时的大会上总结、介绍过挖“新内入党”的经验，被评选为出席全区学代会的“先进”分子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被挖挨打，找他申诉。这位书记一面叫警卫员等候，一面打电话给军宣队说：“内入党”到我家捣乱，赶快来人带走”警卫员带走后被打得更凶，此人十年来对自己所犯罪恶未做任何自我检查，更有甚者，最近得知中央批准尤、池、侯报告后无病呻吟，要到外地治疗。大家建议自治区党委对这样的人首先应从领导班子中撤掉，并采取必要措施。否则，不足以平民愤。受害者也不会轻易放过他。

乌盟盟委付书记苏荣扎布同志反映：四子王旗结合本旗情况拟定了一个具体落实的“十条”，经乌盟报自治区审批，被当做条条框框而否定。旗落办两位负责同志，一气之下，不搞落办工作，影响很大。乌盟同志要求自治区党委尽快拿出一个具体的落实方案，对两种人、对至今还在捂和保的人、对打人凶手和违法乱纪分子入党、提职提级、发横财的问题、对受害者的昭雪、子女的安冒经济生活上的妥善安排等，拟定几条具体政策或规定，进一步加强领导，认真落实政策，昭雪死者、残者、受害者，惩办凶手，伸张正义。调动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团结起来，为建设边疆、巩固边防而共同奋斗。

滕海清挖吴涛是“内入党第三套暗班子”

编者按：滕海清遵循江青“敌人是很狡猾的，有一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了一套，他又上来一套”的讲话，认为吴涛是钻进红色政权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第

三套暗班子。在他看来,乌兰夫明里是共产党的区党委书记,暗里是“内人党”的书记,是第一套班子;政法书记王再天是混进革筹小组的“内人党”第二套班子已在“挖肃”初期“砸烂公检法”时揪出来打倒了。他准备最后挖出吴涛这个第三套班子来结束“挖肃”运动。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滕海清向中央文革汇报“吴涛已经不可靠了,他是乌兰夫集团的”。“九大”期间,周恩来批评滕海清“有人还在整吴涛同志材料,说他是乌兰夫分子、内人党,要求中央取消吴涛的九大代表资格,这是错误的”。然而,滕海清无视中央的批评,仍在暗中指示他在军区的亲信说“吴涛可能选为中央委员,马上不揪,这是个策略问题,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内蒙古军区的挖肃派,宣传部长周某,付部长王某,支左办付主任马某,专案办公室付主任周某,“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钟某等人按照滕海清的意图,对已经承认“内人党”的一些人,运用引供、诱供、逼供手段,硬是叫他们把吴涛供成“内人党中央委员、书记、乌兰夫军事政变领导核心成员、军事组组长”,只是尚未触动本人“五·二二”指示下来了,如再迟一步吴涛这个“内人党第三套暗班子头头”也就落马陷坑了。

内蒙古军区赛希揭露挖吴涛的内人党对他进行的逼供信是较为“文明”施工的一桩案例。赛希是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长。他是革命先烈多松年的孤儿。内蒙古军区挖肃指挥者认为他必定受到内人党重用,因而选定他做为挖吴涛内人党的突破口的人员之一,从而对其进行了有策略有步骤长时间的逼供信。以下赛希讲述的他所遭受的逼供信经过。

我是去年(六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入“内人党”学习班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就隔离了。负责搞我专案的有四人,组长是宣传部钟长虹。他说“我们是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的后台是滕司令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的后台是吴涛,是内人党”。

对我采取行动是从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开始,到十二月十日止,是专门压我承认是“内人党”徒。此间有两次高峰。一次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学习班,有马殿无参加,轮番搞了一整个白天,到晚上十二点钟,无结果。于是二十八日就实行隔离。隔离后,经常是搞到夜里一两点钟,有时搞个通宵。十二月八日,把我拿到宣传部,有周×部长、王×部长、马殿元等十五六个人。从八日晚八点搞到九日早八点。整整搞了十二个小时。他们是五班倒。武斗方式是揪头发、扯衣领、地上来回拖、拳打脚踢、喷气式。主要追我两个问题,一是谁介绍我参加“内人党”,二是我介绍谁参加“内人党”。他们硬逼我承认我是由骑五师政委席达一九五六年秋介绍加入内人党,又逼我承认我们科的干事道××是我介绍的。

逼我承认是“内人党”后,从十二月十一日开始,逼我交代“内人党”内职务,并揭发吴涛政委,十一日下午王×付部长问我你在宣传部担任什么职务?我说什么职务也没有担任。王×部长说,别人为什么对你了解得那么具体,揭的那么细?如果你要想走出路,现在是个机会,你必须彻底交代。王××也说,你知道王部长来的用意吗?最近要开政策兑现大会,你要争取当好典型,不要当坏典型。钟××也说,你交代的好王部长跟滕司令员一讲,可以从宽处理。在这种压力下,我交代了我是内人党宣传部支部组织委员,石×是宣传委员,海是支部书记。王付部长进一步追问在政治部、军区担任什么职务。我说没有,这就惹恼了这位王×付部长。他说,看来是给脸不要,好话听不进,是不可挽救了,那好吧,你就等着瞧吧!狠

狠地一甩提包走了。

十二日上午,钟令我揭发吴涛政委。他说,你自己的问题交代不了,你先谈谈你对吴(政委)的看法。我当即交代吴(涛)是为乌兰夫翻案的总根子。我这么一交代,钟××急匆匆做记录。我认为这个揭发可以成功。因为十一月二十三日叫我回宣传部交代问题时,周×部长冰给我指出“你赛希是个不简单人物,你是知情者,你对军区的内幕了解是比较多的,你有立功的条件”。所以,我这时想通过揭吴立功。可是第二天钟××一来,态度就变了,他说你揭的都是现象,你要想立功就得揭发实质问题,并说你知道我谈吴的问题是为了什么?我说“揭发”。钟说那你揭发为什么不写材料!于是我从十二月十三日就写揭发材料。

十二月十六日,钟××又找我谈,他说“树倒狐孙散”,你说军区内人党的树倒了吗?我说倒了,军区内人党魁是鲍荫札布,他在六七年十二月就被揪出来了。钟说“鲍是树吗?鲍有那么大的能量吗?为什么鲍倒了一年,狐孙还不散?你说树究竟是谁?你最清楚,别装糊涂”。这实际上给我点得很清楚了。我说不敢轻易讲,我讲了怕给我戴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钟××说,你讲吧,一不给你戴帽子,二保护你的人身安全。我说“军区内人党的树就是吴涛”。钟××进一步追问,你说军区内人党有没有党委?”我说“不清楚”,钟说“你态度还是放老实一点,别人已经有交代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你是最清楚的”我说“我实在不清楚”。钟马上翻脸,叫我写拒不交代的拒结书,我不写,于是又把我收拾了一顿。没有办法清况下,我估计地写了一个军区内人党党委名单。当时没有写书记。钟说“你这是是个什么党委?得有个头吧,你把头子交代出来”,这样我又填写了吴涛是党委书记。

十二月十九日,钟××又对我说“内人党军区是几套班子,文化大革命前是一套,四·一三后是一套,你把四·一三后的那一套交出来”我说“四·一三后没有明确的组织常委”钟说“四·一三后你是什么?”我说我是整训办公室付主任。钟说那是明的,暗的还有什么?我说没有人告诉。钟说担自从宽,现在你讲了算你自己交代,不然没有你的好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交代了,军区内人党核心小组名单。有吴涛、李×、鲍荫札布和我。接着钏××问“吴涛是什么时候参加内人党?是谁介绍的?”我说这我确实不清楚。钟说“你清楚怎么办?有人说你清楚,还是彻底交代吧!”在一再追逼下,我胡说是五八年由王再天介绍入党的。

十二月十三日,钟××又突然提出“内人党有无中央?”,我说“没有听说过”,钟说“已经有人交代,军区也有中央委员”,我说“鲍荫札布是中央委员”,钟说“还有”,我说“孔飞、廷懋也是中央委员”,钟说“还有”,我说“吴涛也是中央委员”,钟说“那你写材料”。我就写了哈丰阿等二十多人。钟接着让我写了政治部内人党党徒名单、后勤部内人党党徒名单。我说司令部、后勤部我接触很少,不太清楚。钟说“你是军区常委,你只管政治部吗?你不交代,就写我拒不交代”。这样,我又写了司令部、后勤部内人党党徒名单。

十二月十四日,钟又让我写吴涛的历史和调军区前的情况,我说我是六三年调到军区,我和吴接触主要是四·一三以后,以前的我不了解。钟说“你对吴最了解,就看你能不能和他划清界线,和他决裂。显然,以前你和他干了不少坏事,但你无罪,把罪恶都归于他一个人头上”。在这种压力下,我又写了“吴在总参工作期间,如何受到杨成武、肖华的重用,来内蒙古后如何紧跟乌兰夫,华北局会议反

乌兰夫是假，保乌兰夫是真，文化革命初本来已被群众揪出，硬是肖华、杨成武派总政林谦来保吴”等等四揭吴涛。

十二月二十八日，钟说“你写了一大堆名单有什么用？你交代军区内人党的内幕和吴涛是军区党委书记的依据”，我说“内幕、依据，我都交代不了”，钟说“你别抱有幻想了，滕司令员最近到北京，把吴的材料带走了，经过中央批准就要搞吴了，你要放聪明一点，要彻底交代、揭发才有你的出路”。我仍是交代不出实质性的问题来。这样又惹恼了钟××。他说没有你赛希地球还不转了？没有你，内人党同样可以彻底挖干净，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给你个好看”。说完，他就从警卫班叫来了两个战士，加上×××三个人断断续续地按在地上打了四个多小时，我还是没有交代出来。钟说“这是第一次，你要再不交代，今后还要压杠子，坐老虎凳，看你受了受不了，搞你个差不多，再抓你典型，判你二十年徒刑，你看哪个合算！”。因为我忍受不了疼痛，又考虑到无法交代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注：吴涛，蒙古族，1912年生，参加过“1.29”学生运动，1935年入党。祖籍沈阳，父名德隆阿，达尔汉王府官吏，任学田局长。1967年“文化革命”中，中央安排他帮衬自治区领导人。“文革”结束，尤太忠把他拉出来以“帮派挂帅人物”声讨批斗，1983年死去。1980年吴涛重病在身，自治区党委书记宝音图派车送到北京军区。1981年发生蒙族学生反对周惠的“28号”文件的游行事件。周惠认为宝音图支持了闹事学生，遂撤掉他的秘书长职务，所借的理由第一条就是他派车送吴涛去北京看病，其实：那时军委总政一直保留他北京军区付政委职务，生活待遇未变，还给他安排了与职务相当的住房。

内蒙古军区政治部的挖肃状况

按：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是滕海清亲自抓的点，二百人。打出内人党一百八十人，死了十个人。指挥挖肃的是这个部的副秘书长王继壮。

王继壮一九六八年十月至一九六九年五月，担任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挖新内人党学习班”临时党支部书记和主任。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旬，他曾说：“内人党”这个组织很庞大，不仅地方有，在我们内蒙军区从上到下也有一套组织”，“政治部的领导大权被内人党掌握了”，“实际上政治部是借共产党之名搞内人党活动”。“对待内人党，我们必须狠字当头，才能突破”，等等，他还亲自布置对原干部部副部长莫德勒图同志进行隔离审查，开始，专案组提出没有证据，王说：“别人揭发就是证据，你们搞吧，没错，、”经过几天审讯，不见成效，王批评专案组人员右倾，给他们介绍了经验。之后，又对莫连续两个晚上搞“车轮战”，王见仍无结果，又批评专案组右倾，致使对莫的刑讯逼供越来越严重。莫因不堪忍受折磨，遂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晚，在军区幼儿园用鞋带勒颈自尽。对此，王继壮非但不接受教训，反而说：“反革命死个算啥，吓不住我们”。继续鼓动和亲自组织挖所谓“新内人党”，致使伤害面不断扩大。

对于学习班大搞刑讯逼供,王继壮不仅不制止,反而说,打几个没关系,牛头不烂多加几把火,等等。在他的怂恿和支持下,专案组人员对受害者搞刑讯逼供愈加严重,从拳打脚踢、低头弯腰、跪凳子、压杠子、搞车轮战,用酒瓶、棍棒毒打。一九六九年春节前,王继壮指令将原干部部干事齐木德同志抓进学习班,交给打人厉害的吴文奎负责的专案组审讯,当天吴即组织专案人员把齐打得鼻青脸肿,接着吴文奎等人又对齐连续多次刑讯逼供,用木棒等将齐打得腿拐脸肿,口吐鲜血,行动困难。齐木德同志因不堪受刑,于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学习班”住地内蒙财贸学校跳楼而死。齐木德同志被逼死后,王继壮还指令吴文奎组织对齐进行批判:并多次主持召开“学习班政策攻心经验交流会”,表扬吴文奎等人,还让其介绍所谓“经验”。从而导致政治部“学习班”的十几个刑讯室的刑讯逼供更加厉害。

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和其古同志胃切除手术二十七天后(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就被抓进“学习班”。随即对其连续搞了三天的“车轮战”,采用揪耳朵、打嘴巴、拳打脚踢,打刀口处等手段,致使和几次昏迷。第四天,和乘去厕所之机,找王继壮反映了挨打情况。王对和说:“可以不打你的刀口,但你是内人党,这是板上钉钉的,非交待不可。我们采用的手段是特殊点,可你是反革命,反革命不斗不行”。当天下午,学习班“骨干”又开始对和进行了三天三夜的连续批斗。虽然没打刀口处,但采用了,拧胳膊、铁夹子夹耳朵、烟头火烧后脑勺、皮带抽脖子、揪头发撞墙、抬起来往地下敦,打着跪地爬行、用厕所手纸堵嘴、脚踩脖子下棋等手段,对和进行残酷折磨,一根肋骨被打断,还曾逼其跳楼自杀。在此期间,和曾三次向王反映挨打受刑情况,但王继壮却视其顽固不化,不仅对刑讯逼供不予制止,反而怂恿支持。

工区政治部秘书科长白云蛟同志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被抓进“学习班”后,王唆使专案人员对白进行拷打折磨,致使白云蛟同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心脏病复发,经253医院医治无效,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含冤去逝。

文化部副科长浩斯布林同志于一九六九年二月六日晚至八日凌晨,连续两夜一天遭到毒打,致其吐血、便血不止,生命垂危,医务人员多次请示送浩入院治疗,王却不批准住院治疗。二月二十四日,浩的病情恶化后,王才同意住院,但仍布置对其隔离治疗。浩因酷刑折磨,长时间吐血、便血,高度脱水,血色素、血小板明显小降,医治无效,于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死亡。浩死后王继壮还在学习班讲:“浩斯布林不配合治疗,顽固到底”。

一九六九年四月,王继壮又决定:从阿迪雅(内蒙古军区治部编译处副处长)身上打开缺口,搞清编译处“内人党”问题。并擅自派人于四月十五日,将阿的眼睛蒙住,从呼市郊区乌素图(当时关押所谓“黑帮”的监狱)押回政治部“学习班”。指示专案组负责人赵学全主持,对其连续两次刑讯逼供。当阿拒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时,王批评赵“火力不够集中”,随之赵学全等人对阿拳打脚踢让其低头弯腰、用膝盖狠撞大腿,折磨了长达八个多小时,阿不堪受刑,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学习班”住地财贸学校用刮脸刀片自刎而死。一九六九年初,王继壮几次到组织部专案组动员,追查原组织部科长陈文章“内人党”问题的物证,并指示“下决心想尽办法让他交出来”,同时介绍了30师某人交待物证的“经验”。当通过刑讯逼供陈文章交出假证向王汇报后,王仍让继续搞,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八

日陈被逼跳楼，王还满不在乎地说：“死就死了，死了轻于鸿毛，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王继壮还把对他有意见的原青年部干事常途和原秘书处杜风德等同志打成“新内人党”党徒抓进“学习班”进行迫害。

王继壮领导政治部“学习班”半年多的时间内，使一百二十八名干部被伤害，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了严重摧残。其中原秘书处副科长牧人和莫德勒图、齐木德、浩斯布林、阿迪雅、陈文章、白云蛟等七名同志被迫害致死，七十三名同志被迫害致伤致残。王继壮还到政治部幼儿园听取汇报，到军区印刷厂研究“敌情”，派吴文奎等人去厂进行所谓“帮助”，大搞刑讯逼供，将印刷厂协理员何鸣春等同志致伤致残。幼儿园保育员高春华同志(怀孕五个月)被迫害，在幼儿园用腰带自缢而死。对上述严重后果，王继壮应负主要责任。内蒙古军区党委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研究认为，王继壮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按照中共中央(1978)17号文件精神，建议定为严重错误，如本人检查认识不好，可定为“三种人”。

内蒙古军区整党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哲里木盟清算赵玉温的“挖肃”罪行

赵玉温，原哲盟军分区司令员、盟革委会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追随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滕海清等几个人，在哲盟无中生有地制造了所谓“乌(兰夫)”、石(光华)、云(署碧)反党叛国集团”和“新内人党”两大冤案。哲盟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使三千四百多人死亡，万余人致伤致残，后果极为严重。现将赵玉温在哲盟所犯的严重罪行整理如下：

一、极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残酷迫害各级领导骨干。

赵玉温自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就紧跟林彪、“四人帮”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哲盟的各级领导骨干。他无视哲盟文化大革命前十九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硬说什么“哲盟敌情严重，社情异常复杂，乌兰夫的三股黑势力在哲盟是很有基础的”，“哲盟成了大叛徒、大特务的大本营，是内蒙最大的走资派——乌兰夫最放心的地方，是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前哨阵地”。在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支配下，他把哲盟看成“洪洞县里没好人”，把各级干部的绝大多数都要打倒。对哲盟委第一书记石光华、书记色音巴雅尔、副书记云署碧等同志进行了长期关押，专案审查，百般摧残。十四名盟委委员中有十一名被长期关押，其中两人被迫害致死。盟直处局长以上干部被长期关押审查的达八十三人，占这级干部的百分之七十。旗县市主要负责干部被关押审查的四十九人，占百分之六十七点六。连农村劳模也不放过，全国、全区、全盟三级英模人物受触的达四百六十多人，致死三十六人。他对这些蒙受冤屈的同志不但经常

施以严拷打，而且采用各种办法进行侮辱丑化一剃鬼头、照鬼相、穿号坎、绘制百丑图，以至穿上水淹金山寺的戏剧服装游街示众，等等。他批准出版的长达二百八十六页的“打倒石光华、云曙碧！”的画册涉及一百三十六人，散发一万多册。在这个画册中，把石光华、云曙碧等各级领导同志歪曲丑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象赵玉温这样搞法，就一个地区来说，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二、大挖所谓“新内入党”，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假案，血案。

在清队中，赵玉温紧跟滕海清，大肆鼓吹“哲盟乌兰夫黑线又粗又长”，新内入党及其变种组织，数也数不过来，不仅旗县以上有，公社以下基层单位也有“新内入党”组织。他捏造了哲盟地下“新内入党”十五人委员会及地下“新内入党”旗县市委委员会的名单把旗县市委常委以上，盟直处长以上八十一名蒙古族干部全部打成“新内入党”党魁。他还鼓吹什么“在哲盟，共产党党委就是内入党党委，共产党支部就是内入党支部”，盟委机关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内入党，这样，就把全盟各级党组织的成员，广大共产党员或与党组织有工作联系，与领导人亲属关系的人都推到了被审判的地位，成了挖肃对象。为了逼使这些人承认是所谓“新内入党”、他大搞逼供、引供、诱供，强迫自首、登记，召开宽严大会，进行威胁利诱，说什么“只要有三个人证，本人不承认也可以定案”。他还把盟党校收藏的一面原内蒙古自治军旗拿到大会上，说是内入党党旗，作为哲盟有新内入党的物证，蛊惑人心。他公然对抗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大肆鼓吹“钢鞭底下出干货”。在各种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讲“这么大的运动，死几个人没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还把军分区大搞刑讯逼供的所谓经验，拿到盟直机关干部群众大会上介绍，说什么“我们分区有内入党分子其实是贱种，我怎么和他们讲道理，他们也不承认，可是小战士上去一动手，他就承人了”。在赵玉温这样大肆煽动下，全盟武斗风越刮越烈。据初步掌握，在挖“新内入党”中，施用的刑法，就达一百多种。有些酷刑古今中外所未有。如烤炉子，过电，上大挂，活剥皮，冻冰棍(三九天脱光衣服浇水在外面冻)、脸上烙字、头顶打钉子、烙女人阴部、往阴道里打气，等等。通辽化肥厂技术员王梦堂，是个身体非常棒的二十九岁小伙子，被揪为“新内入党”仅三个多小时就被活活打死。科右中旗公社书记根所，被打死后，还被剖腹，将五脏抛到茅坑里，把头颅砸开，往脑壳里撒尿。科左中旗花胡硕公社一心屯大队党支部书记包孝兴阿，是土改老干部、老党员，在一次抗洪抢险中，为了抢救一船遇难群众，自己光荣牺牲。群众为了纪念他，给他立了碑。在挖“新内入党”中，把这位已故的老支书也打成“新内入党”分子，挖了他的坟，砸了他的碑。把他的尸骨砸得粉碎，扬到野外。有的女同志被打死后，婴儿还爬在母亲身上吃奶，令人惨不忍睹。至于对被挖的女同志进行人身侮辱、逼奸、强奸、轮奸的事，各地都有发生，有些十几岁的小女孩也被所谓的“挖肃”积极分子给糟塌了。有的兽性发作把人强奸后还用刺刀捅阴部，至今伤痕犹在。从一九六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九年五月的一段时间里，全盟被挖“新内入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成员达四万八千五百多人，其中农牧民一万二千多人，普通工人一千一百多人，许多人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样还没有实现赵玉温的挖肃计划，他在北京参加内蒙革委会召开的盟市负责人会上说：“哲盟要把坏人揪的差不多，五万人以下不行，得五万人以上”。在大挖“新内入党”中，赵玉温除了全面部署，亲自指挥外，还赤膊上阵，亲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假案，血案。仅举几例：扎旗前进公社是

赵玉温直接插手的地方。他听信一个地主出身的坏女人的话,把这个公社硬说成是“乌、石、云反党叛国的黑据点”群众修建的水渠, he说是挖的“战备壕”群众打的浇地井, he说是“乌、石、云叛国投修的饮马井”群众按牲畜色泽实行分群放牧, he说是“反党叛国的黑马队, 自马队”。赵玉温和那个地主女人形影不离, 在揪斗公社当权派大会上, 也一同坐生主席台上。返回通辽时还同车把她带到家里, 待如上宾。在赵玉温的直接指挥下, 全公社关押三百一十六人, 致死九人, 致残三十人。

左中巨流河牧场是赵玉温直接抓的“挖肃”点。赵直接指挥, 把场党委书记抓到盟军管关押起来, 并亲自派军分区王福庆等人去该场, 大打出手, 在全场一千七百名职工中, 抓了一百七十名“新内人党”, 施用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残酷刑法。致死三十一人。

所谓《哲里木报》社反标案件, 也是赵玉温直接插手制造的冤案, 赵派其亲信潘恒山在报社坐镇, 大搞逼、供、信, 毫无根据的把哈拉依很, 达木林, 德力格尔, 扎布, 郭景德, 乌力塔等人逮捕入狱。把阿拉坦仓等六人装在站不能站, 坐不能坐的木笼里囚禁, 把几十名无辜群众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严刑拷打, 致死三人, 致残多人, 有的至今卧床不起, 生命垂危。

原哲盟军分区政委阿古达木、副司令员胡和哈达, 参谋长巴达荣贵等同志也是在赵玉温直接迫害下致死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 军内进行正面教育时, 赵就把这几个同志打成“三反分子”, 夺了权。后来, 内蒙军区下令给阿古达木等同志复了职, 群众批评了赵的错误, 赵就怀恨在心, 借挖“新内人党”之机, 指使一些人把阿古达木同志活活打死。巴达荣贵同志被打挺刑不过, 含冤而死, 胡和哈达同志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不久也死去了。仅军分区在“挖肃”期间就死亡二十九人(包括家属), 这是在赵玉温直接指挥下制造的一大血案。

三、践踏党的民族政策, 破坏蒙汉民族的团结, 造成了严重恶果。哲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蒙汉杂居地区。解放以来, 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 各族人民和睦相处, 民族团结日益加强, 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不断发展。赵玉温根本不懂民族政策, 把广大蒙族人民视为敌人, 大讲民族对立、侮辱蒙族人民的言论。“挖肃”期间, 他逢会必讲“哲盟敌情严重。光蒙族就有七十万”。把蒙族多说成是敌情严重的表现, 真是荒唐可笑! 他在扎旗前进公社(蒙族聚居公社)对蒙族干部、群众讲:

“你们这里汉族别想呆。为什么历史上有岳飞杀鞑子的事呢? 就是因为蒙族侵略了汉族。岳飞是民族英雄, 成吉思汗是个狗熊!” 他的打手们还公然给被挖的蒙族干部、群众下令: “不许说你们那个驴话!” 有的偶尔说一句, 就要遭到毒打。他还独出心裁地从汉族聚居的旗县抽调大批贫宣队到蒙族地区去挖“新内人党”, 使蒙族干部群众产生了汉人整蒙古人的错觉, 造成了蒙、汉人民的严重对立情绪, 长时间不能消除隔阂。赵玉温还多次讲: “新内人党”三里(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都有, 但主要发展对象, 第一是蒙族干部, 第二是有民族情绪的蒙古人。在赵玉温的错误思想支配下, 挖“新内人党”中, 蒙族干部、群众受害最深。全盟被揪四万八千多人, 百分之七、八十是蒙族, 死、伤、残一万四千多人, 有七千多是蒙族。科左中旗蒙古人较多, 赵玉温把它作为重点, 亲自抓, 全旗三十五万人口被挖一万多人, 致死八百三十二人, 是全盟的重灾区。这个旗的安乐公社欧里大队是个蒙族聚居屯, 被挖四十四

人，致死十二人。科左后旗白音忙哈公社一个蒙族屯，全屯三十二户人家，有三十一户被挖成“新内人党”，致死三人，重残十一人，伤病十一人。扎旗自音包力皋公社(蒙族聚居公社)共二千七百人，在挖“新内人党”中，致死二十八人，平均每百人死亡一人。这些地方，革命和生产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至今没有恢复元气。从全盟来说，挖“新内人党”给革命和生产造成的破坏也极为严重，牲畜总头数由三百五十多万下降到二百七十多万，粮食总产量由十九亿八千万斤，下降到十五、六亿斤，十年没有恢复到当时的水平。更严重的是在本来亲密无间的民族关系上造成了深深的裂痕。这个恶果是无法计算的。

四、顽固坚持错误立场，态度恶劣，拒不认罪。

赵玉温对哲盟人民是欠了大量血债的，但他一直不觉悟，不认罪，不做检查。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央已经打招呼叫内蒙注意。赵玉温反而继续批判右倾，加紧“挖肃”步伐。他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盟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当前右倾翻案风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要为“挖肃”积极的同志撑腰”。在向下布置工作对，提出四个“狠抓”狠抓清理阶级队伍，狠抓“挖肃”斗争，狠抓“新内人党”专案工作，狠抓人证、物证落实。四月一日，赵给“一专”(即所谓的乌、石、云反党叛国集团专案)工作人员下指示说：“你们不要听外边的风言风语。对参加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十月六次会议直至一九六七年十子落实下来。有些关键问题，要迅速内查外调，要坚决干，要下决心”。四月六日，在盟革委会召开的农村斗批改会议上，赵还说：“有些人已经有了确凿证据，就是不承认，那也没关系，照样可以定案”。还说：“你们要摸一摸，大头头是不是都挖出来了，要把大头头都挖出来”。四月中旬，赵下乡在左中旗直干部大会上亲自宣布保康电厂党支部书记肖传和是“新内人党”党魁，下令当场逮捕，当晚就被活活打死。到扎旗前进公社又下令逮捕了小学教员杨海峰(蒙族，罪名是内人党势力)，交群众批斗，致成终生残废。

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五二二批示》下达后，赵玉温继续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对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批示只简单开个电话会议，向下传达一下。相反，到处讲：“证据确凿的不能放，骨干不能放，不能搞一风吹，要警惕阶级敌人乘机搞翻案”。还向他的亲信说：“要把乌、石、云反党叛国集团和“新内人党”专案材料都保存起来，将来有用处”。后来，受害群众去内蒙上访，内蒙通知赵和吕顺、杜成去呼市听取上访群众的意见，他到呼市就躲起来，偷着跑回通辽。他调离哲盟时，也没做片言检查。这次清理“三案”、落实政策，他仍然佯佯不采，稳坐钓鱼台。邓副主席对他的问题做了重要批示，沈阳军区、省委、省军区着手解决他的问题，他的态度仍然极不老实，上推下卸，躲躲闪闪。哲盟人民对他这种坚持错误的顽固态度，极为愤慨，忍无可忍，一致强烈要求对赵玉温予以严惩。

呼盟关于尚民在文化大革命中

所犯罪行的调查报告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九七八年十月经中央军委同意，中共黑龙江省委决定对尚民的问题立案审查。(以下摘要)

尚民大造反动与论“呼盟党政军干部都是乌兰夫宫廷政变的老班底；呼盟的二十年是阴谋反党叛国、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的二十年；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是乌兰夫的黑线人物。

制造假案：奇、杰、王反党叛国集团；布、官、李反革命三人同盟；全蒙古民族统一党。打出来的假案：新内人党、米吉斯共和国、成吉思汗党、共和党、自由党、内外蒙合并小组、政变小组等二百零二个。当时全盟人口 131 万，干部 4 万，共产党员三万一，县团以上干部一千人，被挖人数达 40 万人，惨遭迫害的 47,590 人。在一千名付局处、付旗县以上干部中有 806 人受到伤害：三万一千名党员中有 14,891 人受触，占百分之五十。被关押的 14,329 人，被判刑的 57 人。死亡总数 2,307 人(不包括划出去的几个旗，其中仅前旗就死亡 500 人)伤残 16,000 人。盟委八名书记，七名被打倒。十七名常委被打倒十五名。副书记官布被打死，副书记布特格奇屁股打烂溃成瘰管，终身不治。粮食从每年上交一亿斤，变为缺口两亿斤；牲畜三百多万头(只)减少到一百九十万头(只)。

呼盟“统一党”比挖“内人党”要早，这是尚民的独创。尚民在“统一党”前边还加了“蒙古民族”四个字，这就变成了“蒙古民族统一党”较为完正了，并于 1968 年 9 月 13 日直接向林彪、江青报告邀功。当挖肃出现死人之后，尚民说“死的人是胆小鬼，真的敌人是不轻易死的”他提出“大字报、小字报就是证据，两票可以敦促，三票可以定案”，随之出现武斗刑法不下百余种。车轮战、不让睡觉、弯腰罚站、不给水喝、灌人粪、喝人尿、坐火炉、闻妇女月经、冻冰棍、插竹签、扎大头针、香火头烧、浇开水、脱光打乳房、抠阴户、闷土豆、套炉圈、炉钩烫、刮排骨、抓锁骨、抠眼睛、坐飞机、打秋千、压木杠、吊悬梁。

第四编 广大干部群众反“挖肃”反迫害，要求平反昭雪的斗争

内蒙古广大干部、群众，从“文化革命”开始，乌兰夫被打倒，就展开了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挖肃”以后，更为有力地进行了抗争。然而处于无权地位的少数民族，怎能抵挡住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的大民族主义暴行呢！滕海清在 1968 年 1 月 17 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委会结束讲话中，以攻为守不打自招地承认说“他们打起反动的民族主义破旗，煽动和利用民族情绪恶毒地叫喊什么文化革命尽打蒙古人，先打西部，后打东部；先打乌兰夫，后打哈丰阿。企图把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引向反动的民族主义歧途。不是已经出现什么成吉思汗战斗队，嘎达梅仁野战军吗！”滕海清他们这些大汉族主义者本来就是这么干的，却还要倒打一耙。“力胜理为变”，强者打压弱者都是这种逻辑。蒙古人也不全是绵羊，也

有些山羊，临被宰杀时使劲儿喊叫，以示抗议文化革命运动中，谁都可以用大字报、小字报表达意见贴到大街上去，胆大的白天去贴，胆小的黑夜去贴。这里仅选用了军管以后在当时文化革命继续推进的政治形势下出现的几份传单和大字报。这些群众刊物均上了当时领导机关的简报。

内蒙古文化大革命中在民族问题上进行的两条路线斗争

(请注意，这个文章是文化革命尚在进行中写出来的。所以有文革语言。)

内蒙古的各族革命人民共同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回顾内蒙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始终伴随着一条大汉族主义阴影，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矛盾，蛊惑人心，公开采取对一个民族不信任的作法，挑动民族沙文主义(大汉族主义)，破坏和分裂各民族间的团结，践踏党的民族政策，镇压少数民族和各族革命人民，剥夺了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实现的民族平等和自治权利，否定了内蒙的历史和革命斗争史，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在内蒙古各族人民心目中的统治地位，破坏了工农业生产。今天，各族革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高举十大的旗帜，彻底批判大汉族沙文主义这条黑线！

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运动初期，指导运动的内蒙古党委“左派”书记们划框框定调调，只准给“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贴大字报，不准给其他走资派贴大字报，贴了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就是“矛头对准了革命领导干部”，不择手段的把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都打成“反革命”。

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肆无忌惮地制造出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乌兰夫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宫廷政变”、“内外蒙合并”、建立蒙古大帝国”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开始从内蒙党委、人委到盟帝，从旗县到公社、生产队；从军区到各师团营，把地方和部队中的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负责干部和在内蒙古工作多年，忠实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汉族干部和一些其他民族的干部也打成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把各民族中的先进工作者和工农牧业战线上的劳动模范也打成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特别是土默特的蒙族群众、各机关的土旗蒙族干部几乎全部被打成了“土家村”、“云家店”，一个乌兰夫出了问题，整个蒙古民族跟着倒了霉，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二、运动反复乌云翻滚

高锦明、滕海清等人提出“乌兰夫黑线又粗又长”的反动口号并为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以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乌兰夫民族分裂主义集团”要翻案等等莫须有的罪名，把许多反对“挖肃”的革命群众组织打成了“反革命组织”。从此开始了大挖“新内人党”的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乌云又开始笼罩了内蒙古大地。

三、所谓“伟大的挖肃运动”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九日滕海清为了挖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乌兰夫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大谈所谓“乌兰夫的明班子，乌兰夫的暗班子，乌兰夫的老班底，乌兰夫的新伙计，乌哈特势力”等等，不顾党的阶级政策和民族政策，把清队运动引向了邪路，又一次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少数民族。于是，滕海清又根据打垮许多革命群众组织的经验，提出了支持以坏分子乌兰巴干等人为首的“小人物起来革命”的口号，分裂了革命队伍，打击了革命，对一部分反对“挖肃”的革命派实行了专政。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的内蒙古日报发表了“打倒假洋鬼子”的文章，接着又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反毛泽东思想的论“以狠字为基础”的杀气腾腾的文章，搞乱了革命人民的思想，欺骗了不少革命同志，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滕海清又欺骗中央，从北京调来了几百名部队人员向所谓“新内人党”夺权，夺了内蒙军区的军权，滕海清私设滕办，代替切，指挥一切，做好了挖“新内人党”的切准备。然后滕海清就与乌兰巴干这个政治娼妓勾搭在一起，封他为“左派”、“挖肃积极”分子，于是乌兰巴干就到处登台作反革命讲演，以文学词藻大肆渲染和伪造所谓内蒙古的“三个演变”即“内蒙的共产党是内人党演变而来”，“内蒙的军队是自治军演变而来”，“内蒙的共青团是内人团演变而来”等等，并挑动民族仇恨，捏造所谓内蒙的自治军屠杀辽河两岸汉族同胞血流成河，大喊为汉族同胞报仇等反动口号，内蒙古公安厅还有个叫丁振声的坏蛋向滕办提供所谓“新内人党”的敌情和所谓“206”号案件等竟达三天三夜。滕海清就凭这些反革命的根据，大喊大叫“内蒙的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上有中央，下有支部，是里通外国的反党叛国组织”，他还叫嚷：“内蒙的党是内人党；内蒙的政府是内人党政府；内蒙的军队是内人党的军队；内人党三里五界都有。蒙古包里，羊群里都有”。“乌兰夫就是新内人党的总头目”等等，乌兰巴干这个野心家，剃了胡子的小人物紧跟在滕海清后面大肆叫喊：“内人党吸收党徒，只吸收贫下中农(牧)、工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师生。”等等反动谰言，颠倒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滕海清听信这些反动谰言不管他是国民党、三青团、地、富、反、坏、右只要响应滕海清的号召。挖“新内人党”卖劲，挖出血来就是“左派”，就是“积极分子”，就是“伟大的挖肃战士”即使是阶级复仇分子挖死了共产党员，地富反坏右打死了土改时的支部书记，也是“积极分子”，挖“新内人党”的鬼火越烧越烈，这里突破，那里也喊“内人党”全线放下了武器等等，到处是介绍逼供信、车轮战、烤炉子、烙铁烧、压杠子、轮奸、拉大锯等等“先进”经验，于是乎全区上下展开了超法西斯式的武斗。掀起了挖“新内人党”竞赛。哲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叫：“哲盟敌情严重光蒙古人就有七十万”，锡盟军分区司令员赵××咬牙切齿叫嚣：“把蒙古人全挖了，在全国也是一小撮”等等。把蒙古民族全部打入了敌人之列，真是反动透顶。滕海清之流把几十万人关进黑屋，把几十万人赶进“新内人党徒”学习班。几十万人被怀疑为“新内人党徒”上了另册准备镇压，还有各种“新内人党”变种组织，什么“牛粪党”、“沙窝子党”等等上百种，连同他们的亲属在内足足打了百万以上的人，看起来真象给了这个“新内人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打死1『数以万计，打伤、打残几十万。滕海清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对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贫下中农(牧)、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师生，采取了宁可错杀一千，不能跑掉一个的反动政策。

四、“五·二二”批示

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了内蒙各族革命人民的灾难，发出了“五·二二”批示，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再次照亮了内蒙古草原，内蒙古各族革命人民再次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中央首长非常关心被误伤的内蒙各族基本群众，指出“内蒙的群众是好的，挖得那样狠，死得那么多，造成那样严重的后果，并没有往北跑而是往北京跑，他们是心向北京的”。然而滕海清不按中央指示办事，不落实政策，不平反，不放人，暗中挑动一部分受他蒙骗的群众，保他的错误，不但不给被他伤害的各族革命人民落实政策、平反，反而处心积虑想为自己的罪行寻找根据。企图表明他没有挖错，于是他就与原骑五师副师长吉尔搞起了政治交易，只要你吉尔不推自己是“新内入党徒”我就保证你的共产党员。滕海清还向他的上司林彪的大将黄永胜引见了，黄永胜许诺他“你是内入党，照样可以干你的副师长”，于是他就一直给林彪、黄永胜、滕海清做“新内入党”的活的人证，滕海清还把挖“新内入党”伪造的档案材料都进行转移，秘密保存起来，以备伺机再次拿它作为镇压内蒙各族革命人民的依据。同时，滕海清又到北京，阴谋策划并摇控指挥内蒙的“挖肃积极分子”，组织队伍另拉山头，用资产阶级派性的手段，掩盖路线错误的实质，并且同黄永胜借群众起来批滕、平反的机会，向中央捏造所谓“以扩大化反扩大化”和“平反一风吹”欺骗中央，又借机在内蒙煽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破坏了工农牧业生产，破坏了“5. 22”批示的落实，搞乱了内蒙的局势。然而黄永胜、郑维山、滕海清等人把搞乱内蒙局势的全部罪责，转嫁到批滕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头上。

五、如此“征服者”

郑维山以征服者的身分，带着林彪授予的上方宝剑来到了内蒙，他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就看了电影《杨门女将》。大家知道，《杨门女将》是对长城外少数民族的“征服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一伙大民族沙文主义的本质。毛主席批准的“12·19”决定明确指出，军管是为了稳定局势，落实政策，可是郑维山来内蒙之后，拒绝给误伤的群众平反，不落实各项政策，“5·22”批示也不提了，内蒙发的165号落实政策、平反的文件也宣布作废了。对于死者抚恤、伤残人员的治疗、死者遗属的生活补助等都以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停了下来，不管他们的死活。在郑维山执政期间，不准再提扩大化，不准扩大化的字样出现，在公文纸上不准谈论扩大化的死伤惨景，好像历史上未曾发生过这个问题，企图让人们忘却这段历史。郑维山不仅不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解放和使用内蒙各族干部，相反的还继续给所谓“一风吹”的罪行寻找证据，继承了滕海清未竟的事业重新开始挖起了“新内入党”，妄图哪怕再能抓到个把他们想象中的“新内入党”来否定内蒙的共产党，于是乎，挖“新内入党”的悲剧又重演开了。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在狱中打死了滕和，已经封门的“新内入党”专案组，又重新开了张。那么我们要问：连续挖了几十年究竟这个“新内入党”有没有？有多少？滕海清挖了一年多，郑维山来了又挖，前后历时几年，人力物力耗费殆尽真是“临邛道士洪都客，上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当初所抓的庞大的“新内入党”都钻到哪里去了。滕海清、郑维山等人连个影子也没抓到。那么请问“一风吹”又从何谈起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为压根就没有这个“新内入党”。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个特大假案，特大冤案，特大惨案。挖内入党所造成的恶果是那么严重遗留的问题到现在不按党的政策给予彻底解决。对那些以阶级复仇为目的反革命杀人犯不予严加惩办，怎么能谈得上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怎么能谈得上巩固祖国的边防，使之成为

铜墙铁壁呢?严格说,这才是真正自毁长城,所有这些对一个忠于自己社会主义祖国而为之准备献身的同志来说,是多么沉痛而又为之担忧的事啊!

六、破坏牧场掠夺牧民财富

解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的各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积极投入了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荣劳动,在畜牧业战线上创造出了很好的成绩,各族人民过上了和睦幸福的新生活。然而,郑维山污蔑牧民是“长脖子老等”、“牧民吃亏心粮”等等强行大量垦荒,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畜牧业。他们还通过“挖肃”、“划阶级”等严重地打击牧民践踏党的民族政策,他们在牧区横行霸道,强占集体和牧民私人的牲畜和财产,强占民房,停办蒙族学校改为汉校,用皮鞭殴打,用枪支威逼牧民。对这些严重破坏党纪国法的事,人民群众不断上告,但是从滕海清到郑维山,从郑维山到尤太忠根本不予理采,更谈不上彻底解决。在此仅举几例:

西乌旗汉乌拉公社乌桂图区和萨如拉宝力格两个生产队原有宽二十华里,长七十华里的草场。七零年并入兵团以后,在两个生产队的草场中心地带,占去长四十华里,宽十华里的地盘,仅在生产队原有饲料基地的基础上扩建两个农业队,新建四个农业连已经开垦十万亩草场,占去了两个生产队的冬春营地和打草场,严重破坏了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兵团五师三十二团在阿巴哈纳尔旗,朝格乌拉合营牧场的牧民反映,从1971年以来,累计开荒二十万亩。好草场基本开完,今年仍然播种八万亩。牲畜无处放牧了乌盟达茂旗,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仅外地到该旗开荒就达五万亩该旗乌兰图克一个公社就开荒一万五千多亩。锡盟太仆寺旗五星公社,是该旗的唯一一个牧业社,近几年外单位在该公社开荒达四万五千多亩,牲畜无处放牧,牧民无法生活。无可奈何,牧民要求外迁。某单位,从69年底到71年11月,无偿赶走锡盟巴音乌拉公社公私合营牧场的牲畜八千零八十八头(只)。其中马一千三百二十四匹,牛三百三十六头,羊六千四百二十六只。以上牲畜按当时的市场价进行核算,其价值相当于五十四万四千六百二十九元。从该场拿走的财产还有标准电柱蒙古包、地毯、毡子、皮毛、药材、电话用铁丝,广播器材等其他各种备品设备,折价数相当于三万二千四百八十六元。

在运动中没收民间的物资财物有:各种绸缎子面、羔皮大衣、羔皮蒙古袍子、水獭皮帽子、狐狸皮蒙古袍子、各类型地毯、毛毯、缝纫机、银制马鞍具、望远镜、水晶眼镜、料子裤、汗达海皮大衣、蒙古包、毡子、羔皮等等其他日用品全部被该部队拿走了。这些物资折价相当于五万零八百五十五元。对这些物资牧民要求按政策退还,但是至今无人给予负责解决。七0年秋初该单位的一位王××指导员,在该场的第三分场时,为了给其上司做羔皮大衣,从羊群中挑选优质毛色绵羊幼羔杀了一百二十多只,这对牧民来说剜心一样疼痛。如此等等不胜举。

七、陈李郑破坏唐山学习班

唐山学习班是毛主席批准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内蒙问题而办的。然而,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叶群、郑维山之流在唐山学习班插了黑手。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党中央这一正确部署,妄图颠倒内蒙古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专搞单一的少数民族问题。进一步制造分裂,打击少数民族干部,破坏了学习班。陈伯达明目张胆地破坏宪法,规定了所谓的“五不”:1.不准通信2.不准舍客3.不准请假4.不准抢购5.不准串连。学习班根据陈贼的规定,对广大干部采取了对待

犯人的办法,对干部家里寄来的衣物,进行极严格的搜查,拆看并扣留私人信件和照片等,企图从中得到什么东西。学习班把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之流到处发表的反革命游说,当成圣旨,逐字逐句的向广大干部宣读外,还连夜组织全体干部进行讨论、表态、写决心书等等。学习班口头上大讲“一碗水端平”,而实际上支一派,压一派,保一派,批一派,就是保护“挖肃派”压制“批滕派”。学习班不干别的,专批所谓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乌兰夫民族分裂主义集团”,“乌兰夫宫廷政变”,“乌兰夫要建立大蒙古帝国”,“乌兰夫要内外蒙合并”等等。还大批所谓“内蒙党、团、军三个演变”什么“一风吹”呀,“和乌兰夫沾上的都要批”呀等等。民族干部斗私必须斗到“吃了乌兰夫民族分裂的饭”,“举了乌兰夫民族分裂的旗”,“走了乌兰夫民族分裂的路”才算深刻,把批判的矛头引到专一的民族问题上去。还大造声势要揪“钻进心脏里的敌人”,还大搞所谓“促、帮、拉”,进行了变相的逼供信,很多干部斗私批修检查过不关,组织积极分子“促、帮、拉”。尤其是受害的民族干部因有情绪过不了关。学习班执行了黄永胜“内蒙干部不行,就统统换掉”的黑指示,林、陈、黄、郑维山为了在内蒙建立反党叛国的基地,在组织路线上制定出三套三个“三分之一”(军队干部三分之一,外来干部三分之一,基层选拔三分之一),对自治区进行了换班夺权。对批滕观点的大批干部,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干部实行了所谓的“分散安排,控制使用”等方针,把他们下放到农村牧区插队落户。

八、值得深思的问题

1. 郑维山要把内蒙的历史颠倒到那里去?是颠倒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呢?还是颠倒成“内人党”的历史?内蒙的某些领导,特别是徐信、王弼臣等人是怎样参加这个颠倒活动呢?

2. 黄永胜、郑维山等人为了反党叛国的目的,诬蔑“内蒙没有一个好干部,要统统换掉”,那么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干部?内蒙的某些领导,特别是徐、王为林彪、黄永胜、郑维山选拔了哪些他们认为的“好”干部?又把哪些他们认为“不好”的各族干部换了下去!

3. 群众讲:原内蒙的干部,不管是军队的还是地方的只有两个姓,一个姓“副”一个姓“帮”。内蒙有位主要领导人,他就是尤太忠,他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讲,“我们要落实民族政策,蒙族干部可以安排副职嘛”,于是乎“副书记”、“副政委”、“副部长”、“副局长”、“副处长”、“副科长”、“副组长”和“帮办”遍布内蒙的各个角落。所以人们说“内蒙的干部是副官学校和帮办训练班”毕业的。同志们看了不要笑,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难道不值得思考吗?

4 郑维山来内蒙之后,否定了“五·二二”批示和“165”号文件,到目前不给被误伤的各族革命群众平反,不落实党的政策,相反又继续大挖“新内人党”,我们现在提出要求,希望内蒙党委的某些领导,特别是徐信之流,为了挖出真的内人党打死公安厅腾和,又在内蒙古军区同吉尔在所谓“新内人党”问题上所作政治交易,大搞阴谋的内幕交代出来。

5. 斯大林曾指出:“只要充满民族主义偏见的农民,跟着资产阶级走,沙文主义和民族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必然的”。请问内蒙党委领导,你们不但不严惩那些在挖“新内人党”时,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杀人犯和那些作恶多端的打人凶手,相反,徐信竟然命令黄旗的旗委书记那木拉,把劳改释放犯,在挖“新内人

党”时杀死公社书记的反革命犯张凤田放走，请问这是徐信一个人的决定吗？他们保护杀人犯，又要把杀人犯放走的目的何在？这是哪个阶级专哪个阶级的政？无产阶级专政能这样吗？

6. 内蒙党委的某些领导，不宣传贯彻落实中央 45 号文件；不宣传贯彻落实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只是开会走了个形式就算了事，就是内蒙党委自己发的那个 108 号文件直到现在广大牧民还不知道，难道你们就这样上欺中央，下骗群众吗？ 7 内蒙古党委以培养提拔民族干部为由，把一位七十四岁的“查布根赤”（尼姑）巴莫老人提为乌盟中级法院副院长，还把尚在上学的小姑娘提为乌盟文教局长，从白发老人到十几岁的小姑娘都提拔当了领导干部，这是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的愚弄，是对老中青三结合这一新生事物的讽刺。

8. 内蒙古党委为什么不彻底销毁挖“新内人党”时伪造的全部材料，而转移他地，全部完存，这实在是居心叵测。

9. 挖“新内人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大事件，那么为什么在给那些被误伤的群众和干部平反时，在结论中不给写明挖对啦，还是挖错啦？以及他们的死亡原因呢？不写的目的是想在文字上也不留挖“新内人党”的痕迹呢，还是准备继续办案呢？对这一问题，内蒙党委必须向广大群众和干部讲明。

10. 毛主席说：“要逐步地拿少数民族干部来代替汉族干部，民族自治就要民族干部。我们包办也包办不了那么好，各级党委逐步增加本民族干部，委员要少数民族占多数，书记由少数民族当；少数民族为主，汉族为副，当然还有个过渡阶段，要有这样一个心，这样一个计划，事情就好办了……要准备以少数民族干部来代替自己。”而郑维山却嚎叫：“少数民族就是少数吗，怎么能领导多数。”前者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后者是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路线，请问内蒙党委的某些领导，你们要走那条路线？你们现在走的又是那一条路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内蒙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民族问题上始终进行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全党同志要有敢于革命的精神，彻底揭批大民族沙文主义的罪行，维护各民族的团结，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发扬无产者的革命韧性战斗精神，不怕撸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内蒙革委会直属机关部分工作人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

关于新内人党的所谓证据问题查证结论

滕海清等人从一九六八年初开始在内蒙古全区开展挖“内人党”运动，在一年的时间里凭空挖出了几十万“新内人党”，打死逼死一两万，造成内蒙古人民的空前的灾难，完全颠倒自治区革命历史，破坏了各族人民的团结，残酷地镇压了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剥夺了少数民族人民已经取得的平等和自治权利。

为了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不受破坏,我们一些干部和学生自行组织起来,对所谓的“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究竟存在与否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 所得出的结论是,子虚乌有根本不存在。 人们都知道,在内蒙古的历史上有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一九二五年出现的“内人党”是由白云梯,郭道甫等人组织的,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它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一九四五年八一八至一九四七年五大会这个时期哈丰阿等人组织的“内人党”也是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不应视为反动组织。一九四六年正顿后的“内人党”纲领与四五年的党纲基本一致,它所存在的历史事实也是早已清楚了。内蒙古现在的当权者所挖的“新内人党”指的既不是一九二五年的“内人党”,也不是一九四五年的“内人党”,滕海清、高锦明等人主观推测出来的所谓一九四七年“五一”大会后有计划地转入地下,潜伏十三年后进入组织大发展时期的,以乌兰夫为总头目,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内人党,党政军三里五界都有的庞大的,系统的,全区性的,上有中央,下有支部的,反动的民族分裂组织。

这样反动的“新内人党”是关系到蒙古民族的政治生命和生存权利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结论,才能使广大被误伤的同志真正从“反革命”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才能恢复少数民族的平等和自治的权利。为此目的,我们对滕海清印制的《新内人党罪证》进行了核查,共六个部分:

一、关于“新内人党”组织活动

党纲党章—《罪证》中选用了两个党纲,一个是一九四六年末正顿的“内人党”党纲党章(蒙汉文),是哈丰阿起草,公开发表过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中央明令不组织内人党之后,做为历史资料存于内蒙档案馆和公安厅档案室里,挖“新内人党”以来,把它从档案库里搬出来当做“新内人党”党纲,这是拿鹿当马。另一个是昭盟翁牛特旗自音汗公社旗杆大队民办教员麻连根在被挖中交出的用蒙文写的一九六六年的党纲,十二条,十六开纸不满两页。经查他是在逼供信中要他交出证据,然后故意把他放回家. 赶制出的假证。经有关部门鉴定化验结果,所用的纸是用污水浸过,然后存灯下烤干后伪造的。

党旗印章—《罪证》中选用了两个旗子作为“新内人党”旗。面是带有锄头和套马杆子图案的旗帜。这是东蒙自治政府的政旗,其施政纲领中即有文字规定。另一面旗是锡盟正蓝旗武装部的孟和于一九五八年大办民兵师时为造声势,向红光公社民兵团鼓劲制作的旗子,旗中间是套马杆子一支枪,下端是“民兵团”三个字。图案设计人是兰旗文化队画家阿巴干,裁缝是姓王的。挖内人党期间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从兰旗武装部仓库里发现后当做内人党军旗,送到内蒙军区展览,展出时故意模糊了上边的文字。展出的旗子还有内蒙古军区骑五师一个干部在严重武斗下叫其妻子用孩子的红领巾在上面钉上锄头套马杆子充作内人党证据交上去的。关于印章,《罪证》中选用了—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鄂托克旗委员会”的印模。据查阅原始资料证明,一九二五年十月老“内人党”在张家口成立以后,伊盟鄂托克旗建立过旗党部。此章是历史遗物。在展出时未敢说出它的出生时间和地点。还有一枚准格尔旗伪造的印章其蒙文是随便画的弯七流八东西。

“新内人党”的组织和发展—《罪证》中选用了内蒙古大学教师特布信自传中的一段,内蒙设计院付院长张鉴笔记本中的一段,内蒙党委宣传部付部长特古斯的供词作为新内人党组织过程的依据。从这几件所谓证据看,特布信自传中记载的是

四六年春额尔敦陶克陶向他传达的“四三会议”情况，而到四七年五一大会后内人党就解解散了。张鉴笔记本记载的是四八年内蒙党校学员在讨论内蒙古为什么不组织内人党，没有涉及内人党转入地下问题。特古斯的供词是在滕海清讲话“新内入党司令部已经找到了，特古斯就是司令官”之后，挖肃凶手们逼供出来的供词，过了几天就推翻了。《罪证》中选用了原乌盟付盟长达瓦的“琐事小记”作为“新内入党”大发展的证据。达瓦于六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至月底的几天里，在逼供要证情况下伪造了四件证据。对此证据经多方研究拿到北京公安局、北京墨水厂、卫生部药检所化验鉴定，所用的纸与乌盟革委会成立后用纸一样，墨水是天津六五年十二月一日生产的驼鸟 103，黄颜色是烟丝水浸泡而成。于是在六月十五日再次提审达瓦，他交代是刑讯逼供伪造的。

二、关于新内人党的总头目

乌兰夫是不是“新内入党”的总头目，这是关键问题。《罪证》中选用了十三个物证和供词。其中一是乌兰夫在一九四七年《五一》大会时填写的登记表。这张登记表有蒙汉两种，填的是“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内人党员，联合会员”，还有一份乌兰夫略历，说他于一九二五年在张家口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另外奎璧在“挖肃”中的供词也证明乌兰夫于一九二五年由苏联回国，路经蒙古受内党中央派遣，同奎璧、佛鼎组成内人党三人小组，回绥远地区活动，这几件《罪证》只能说明乌兰夫是老内人党，而证明不了“新内入党”总头目。《罪证》之二，乌兰夫于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在自治区运动联合会执委会讲话，提出“自治政府不是最后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的是内蒙古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策略是不公开的，将来我们争取国际上的承认”；一九四七年二月在林东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提到“内蒙古自治运动分三个阶段，即自治运动、自治政府、自治联邦”；再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内蒙古军区干部会上讲到“内外蒙合并，有利就合，否则就不合”。将这些言论作为乌兰夫是“新内入党”总头目的证据是驴唇不对马嘴。《罪证》三中引用了内蒙军区付参谋长××、自治区付主席×××、区党委付书记×××、卫生厅付厅长×××四人的口供。这里塔拉把在延安由乌兰夫介绍加入共产党一事交待为“内人党”，一九六零年按乌兰夫指示在军区发展内人党是逼供信中造的假交待。朋斯克的交待与“新内入党”问题无关。义达嘎的口供是武斗出来的。王再天在长时间车轮战逼供下交待“六二年夏秋，在内人党代表会议性质的会上，选举产生内人党中央机构，通过内人党中央名单，选举乌兰夫为总书记(或叫主席)，在这次会上我被选为中委、执委、书记处书记或叫付主席”。把这样一个含糊两可的口供作为乌兰夫是“新内入党”总头目是极不严肃的。《罪证》四中有两件物证，一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方志达、张策、胡昭衡给李富春、张平化、黄克诚的电报。电文中提到哈丰阿讲“内人党成立后，中央如不承认与领导，我便无资格参加中共，云泽为中共中委，也无参加人民革命党可能”。这件事只能反映哈丰阿等人保存内人党的活动，证明不，乌兰夫是“新内入党”总头目。并且应当指出，我党中央及东北局在四七年四月二十日前亦曾考虑过同意组织内人党并派中共党员参加的问题？另一个所谓物证是呼盟陈旗完工公社书记官布札布的“记录”。其中记载陈旗统一党书记吴国勋布置工作时讲一九六二年乌兰夫去陈旗批准组织“统一党”。此件经公社、旗、盟、自治区四级专案核实甄别，是在严刑逼供下的伪造，所用的纸是六八年革委会成立后买来的，六二年没有那样纸，伪造的装订眼

与笔记本不吻合,伪造的两页纸是将十六开纸用手裁的,锯齿形相吻合,专案人员也承认了这个事实,总之,说乌兰夫是“新内人党”总头目的任何一个证据都不能成立。

三、关于“实现内外蒙合并”

《罪证》中选用的十七条证据都是乌兰夫在内蒙古工作活动二十年的记录。如乌兰夫组织迎灵团,从青海塔尔寺接回成吉思汗灵寝,在内蒙古日报上宣扬成吉思汗;乌兰夫《三基论》;“大汉族主义九种表现”;推行斯拉夫新字母;重新印发《三五宣言》;还有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的诗《乌兰巴托颂》、《蒙语字典》、《阿母训子》年画以及解放前的传单刊物等等。《内蒙古受苦之局面》一书是在四七年土改时从翁牛特旗一个老喇嘛那里发现的,当时旗长乌日更看到此书后当做文物叫下边干部复制几份藏为图书馆的文史资料。把这本书说成是“内人党”一九六二年出版,当做了罪证。还有一件《圣旨》传单是从四子王旗旺其格家抄出的,宣传“蒙古可汗已经出世,蒙古国家”即将诞生了……”。这个传单是四十年代旺其格的奶奶收藏品。它的背景是外蒙古人民革命推翻博格德格根哲布尊丹巴政权后,反动贵族为了复辟而制造的反动宣传,与滕海清挖的“内人党”毫无关联。滕海清将军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将内蒙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进行的战备计划、战备图、战备粮、民兵装备都当成叛国政变的证据。

四、关于“里通蒙修,大搞特务活动”

展出的《罪证》中说“新内人党”是里通外国大搞特务活动的庞大的苏蒙修情报间谍组织,选用了十六件物证和口供。《罪证》选用乌兰夫接受蒙古一部电台问题。这是一九四六年奉中央指示反美蒋背靠苏蒙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所需,那是蒙古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怎能当成内人党的情报电台呢。“挖肃”中从王再天保险柜中查出“情报处十月分张市工作计划”,这是共产党的公安机关特情工作安排,只能说明我党公安机关使用特情人员的问题,是泄露了我党的机密。《罪证》二列举了陈立夫给国民党中央的电报和玛尼巴达拉与美国战略情报处的谈话记录。这两件只能证明一九四六年乌兰夫与乔巴山的联系和玛尼巴达拉与美国情报人员的接触,与“新内人党”联系不上。《罪证》三选用了一张地图、一封信、一篇记录。一张《中蒙边防站分布图》是一九六六年锡盟军分区绘制发给部门以上干部和通讯情报机要等科。因为盟委书记高万宝札布兼军分区政委也发了一份,副盟长孟和特木尔借阅放在办公桌里,“挖肃”中查出,当做给蒙修提供军事情报展出。一封信是内蒙军区文化部副部长葛日勒朝克图替外蒙高陶布收到蒙古情报员瓦其尔呼雅克图的情报后给瓦的回信。一篇记录是内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额尔敦陶克陶一九五七年参加蒙古语文工作代表团赴蒙与蒙方人员闲谈中,蒙方人员谈到“内外蒙合并”的话。额尔敦陶克陶追记下来,回国后向领导上做了汇报。“挖肃”中从额的笔记本里发现后当做了里通外国的罪证。《罪证》四中选用的军区情报部侦察科长敖其尔向蒙修提供内蒙军区部队团以上人员名单和从东苏旗武装部抄出的电台和密电码问题。经查团以上名单是敖其尔因隔离关押五个月之久,遭到残酷刑罚把保存在他办公室文件柜中工作上使用的名单假充为送走的“情报”以缓解对自己的刑讯从东苏旗武装部查获的电台是查干敖包牧场经邮电局报请自治区邮电管理局审批设置的。密电码是一九六三年旗武装部制订战备计划向军分区作过两次报告。《罪证》五中选用了边防站同蒙修边防人员会晤合影的两张照片和一九五九年内蒙军区与蒙

古交换的报纸。经查证交换报纸是经总政批准同意的。会晤照片是一九六五年八月二连边防总站与蒙修东戈壁省边防站拉布嘎上校、札门乌德边防站丹必尼玛中校等前来二连浩特江改旅行社会谈时由我方报请上级批准,为建立蒙修新任边防站长卡片而合影。在展出中对这张照片做了手脚,从照片中把我方汉族负责人郑大进剪掉,把被打成“内人党”的包垦卿补进去重新排照作为“证据”展出。另一新照片是一九六六年东乌旗边防总站副站长巴特尔、嘎拉布其,边防站教导员苏达那木斯楞,绥和查干边防站干事包文贵等人根据总参车口内蒙古军区批示维修 444 号界桩,完工后为建立卡片与蒙方代表留影。这也成了大搞情报活动的罪证。《罪证》六中选用了不少口供。原内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札布、组织部副部长图门昌、副秘书长乌尔吉郎、情报部长张巴图等人的口供都是残酷的逼供信的产物。尤其鲍荫札布的口供不单是逼供信,而且是专案组出具详细提纲,并且由专案人员修改加工出来的产品。《罪证》七,滕海清在准备向中央上报的文件中还把一九六五年自治区与蒙古建立“内外蒙名词术语统一委员会”(亦称四十三人委员会)当成“内外蒙合并”的办事机构。

五、关于“新内人党”变种组织

展出《罪证》中列举的变种组织不下百余种,除了一个“蒙古民族统一党”外全是棍棒之下的产物,不必一一赘述。所谓“变种组织”的发明人是原内蒙古公安厅政保处的一名科长叫丁振声,他是与乌兰巴干齐名的人物,他把公安厅档案中记载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组织给起了“内人党”变种组织的名称,于是在“挖肃”中打出来的什么“沙窝子党”、“牛粪党”之类东西一律称之为“变种组织”。

六、关于“新内人党”中央委员

提起“新内人党”中央委员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还要从丁振声这个人谈起,因为他挖“内人党”献“图”有功,被滕海清提任专打“内人党”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副主任,一九六九年二月,滕海清要向中央写挖“新内人党”成果报告并向“九大”献礼。在这个报告中有一项是“新内人党”中央委员名单。这些都是逼供信,共有一百零八人,每个人票数不等,有的一两个人,有的三四个人,有的十来个人。不可能有这么多中央委员,怎么办?要从这些人中遴选,怎么选呢,四条原则:一是东西合流,东部西部人都要有;二是新老内人党都要有;三是人数不宜太多;四是既要照顾票数多少;又要照顾一些人的特殊地位。本着这个原则,从一百零八名中挑选了六十八名。东部区的有哈丰阿、特古斯、鲍荫札布、木伦、巴图、德力格尔、额尔敦陶克陶、杜固尔札布等;西部区有吉雅泰、浩帆、布赫等。西部人的票本来就少,但为了照顾东西部和在“宫廷政变”中的地位也安排上了,后来又觉得西部人少,于是又加上了墨志清等俩人凑成三十五人。于是滕海清认为可以就报送中央了。《罪证》二是认为“二〇六案件是上层人物作案论”。“二〇六”案件尚未破案何人所为,可是丁振声认定这是“新内人党”的铁证,是上层人物作的案。因而从这一论点出发对特古斯、鲍荫札布、玛尼札布、义达嘎、额尔敦陶克陶、巴图等十六人进行突审车轮战,武斗刑讯,逼着这些人承认“二〇六”案件是他们所为。干这个活儿的指挥者策划者就是贼人丁振声。他这个“二办”副主任一带头,全区武斗逼供信邪风就蔓延开了。通过上述调查,我们已查清了这场灾难是怎样发作起来的。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滕海清将军挖出来的几十万“内

入党”竟没有一个是真的，全都是在车轮战、武斗、逼供信折磨下打出来的假货。

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革命干部、学生、群众

1969年11月12日调查完结

内蒙古在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

滕海清在内蒙古挖“内人党”犯严重错误，不好好平反、落实政策，群众批他的错误觉得伤了面子，忿忿离开内蒙。接着郑维山来内蒙。对于滕海清挖肃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但不收拾，反而继续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又犯了很多罪行。

一、时至今日，挖“内人党”已经5年了，死的死了，残的残了，有些人因伤了元气，逐渐在死去，他们在政治上得不到彻底平反，造成的后果得不到妥善处理。

1. 滕海清挖“内人党”几十万，死了成千上万，伤残了好几万，这个数字恐怕只有少算没有多算。收拾这么大乱子的后果：在1969年内蒙革委会仅仅发了一个(165)号文件，而仅有的这一政策文件早被一些，“积极分子”打成毒草不予执行，后来又被郑维山下令宣布作废停止执行。这样，5年来挖“内人党”的受害者没有政策可言，那还落实什么政策呢？

2 滕海清挖的“上有中央，下有支部，遍布全区，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的庞大的叛国组织”究竟存在不存在？这个“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分子抓到一个半个没有？如果一个也没抓到，那么何为“扩大化”岂不是冤案错案？中央指的是“清队扩大化”是从全国来说的。而内蒙讲的挖“内人党”扩大化是有些人仍在坚持着“新内人党”的存在。这个问题不解决，被打“内人党”误伤受害的群众在政治上不能得到彻底平反。再过些年，挖肃人员把他手里私藏的材料拿将出来，说你某某人就是“内人党”分子，别人是扩大化了，而你是一风吹了，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3. 挖“内人党”的那些逼供信材料为什么不销毁？是什么人在指使存档？内蒙革委政治部保存那么多“内人党”材料是想干什么用呢？在兰旗封存那么多“内人党”材料又是为什么？据说徐信临走时有指示不准销毁这些材料，这又是为何？被挖误伤的共产党员应否为此担忧！

4. 人死了多年，为什么不给做政治结论？明明是武斗致死，为什么在结论中非要写个“非正常死亡”？死者遗属能接受吗？时过境迁，不知道内蒙这段历史的人，在死者档案里见了“非正常死亡”他会怎样理解呢，一定认为是有问题自杀的。这样对其子女升学、就业、当兵的考察不受影响吗？为什么不可以写为“运动中误伤武斗致死”或“运动中不幸因公死亡”。

5. 死了的是“因公死亡”待遇，而活着的伤残的为什么却按私事病伤对待？内蒙财政局根据什么政策定为私病私伤而不按公伤开支？你们知道一个伤残人员一年的挂号费一项就需要多少钱吗？他们为了治好病伤私配药，吃营养品而多花很多

钱。这对低工资职工来说是很大的负担。财政局说有困难就申请福利补助。应该应份的公伤开支为什么要求补助, 要求“照顾”呢?

6. 伤残人员不能坚持上班或到外地治疗过 6 个月就扣发工资。生活造成困难无法解决。

7. 中央(45)号文件指出“凡是死者家属提出申诉要求查明死因的, 都应认真查明死亡原因, 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做好善后工作”, 内蒙为什么不给查明死因?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指示?内蒙物资厅为了查清金雪云同志被打死一案, 组成一个小组, 为何王××训斥解散?运动中打死人就不论罪吗?以后搞不搞运动?有人说坏人干了坏事才能处理, 那么坏人生来就是坏人吗?不是因为干了坏事犯了罪才变坏人的吗?徐信根据什么法律强令黄旗那木拉同志释放打死共产党员的劳改犯?!徐信保护的是那个阶级的“积极分子”?

8. 农村牧区社员, 主要劳动力被挖死, 留下的遗属生活怎么办。伤了残了的, 他们治病·次性给钱就能解决了吗?若要认真负责伤残人员生活以及死者遗属生活, 那就应该做好统计, 死了多少, 死者遗属有多少人, 伤残人员有多少, 有了这个数字再年年列入财政于算, 不要想起来以后才这里凑一笔钱, 那里挤一笔款临时性处理。死者遗属及伤残人员还应发证, 不然调迁到外省市谁能承认这个事, 发补助费呢?

9. 牧民被挖, 又划阶级错定成份, 生活资料及现款、存折被查抄没收了, 都被挖肃人员拿走了, 现在没人管没人退怎么办?挖肃积极分子把生产队干部挖进去, 夺了权, 将队里的几万几十万元的公积金、公益金都挖没有了, 还欠了债, 集体经济挖空了, 现在牧民生活困难怎办?

二、对民族干部的使用怎样?

1. 区域自治的核心是干部问题。现在还能不能讲“自治的民族当家做主?对自治区蒙族领导人为什么迟迟不能解放使用, 他们全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吗?如果老的都不行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什么不提青壮年干部上去呢?为什么蒙族领导干部都降格使用?为什么蒙族干部净安排付职, 内蒙古几十个厅局有几个正职?

2. 被打伤残, 身体不好的干部不给安排工作还强迫退职。在隔离武斗逼供信中, 谁坚持党的原则顶的最硬, 谁就吃苦头最大, 身体弄坏, 放出来后批滕劲大, 这样的干部就成了不好的干部, 说他们“有民族情绪”、“有怨气”不给他们安排工作, 提拔使用没有他们。整党中这样的干部就过不了关, 长期不给恢复组织生活。什么样的最吃香呢?一隔离就胡说乱咬乱供, 要啥说啥, 平安无事, 出来后内心有亏, 不敢批滕, 精神不振, 在家一呆, 这样的干部却落个“高姿态”“没怨气”的好干部而备受重用, 优先安排, 给好工作, 提拔也有他的分。而那一两个扛锹挖“内入党”当“积极分子”的“左”派蒙族干部, 那就成了“共产主义化”的一等干部了。这样的对待民族干部, 能调动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吗?

三、锡、乌、巴、伊牧区各盟大片开荒, 哪里水草好就到哪里开, 把浩特、乌苏包围起来开垦, 然后将牧民挤走, 牲畜进地就宰杀吃肉。剥夺、平调集体经济, 赶走牛羊。牧民告状, 谁也不管, 旗推盟, 盟推自治区, 自治区各机关互相推, 推来推去仍是没人管。沙化年复一年的严重起来, 草场在退化着, 牲畜质量在下降着, 而我们一些领导同志无视这种严重情况, 不去认真当做一回事提到领导日程上

去研究。

四、内蒙做为一个民族自治地方，蒙语言文字不使用，开会不讲蒙语，讲汉语不设翻译，下文件不译成蒙文。翻译人员死伤的多，又改行处理掉一批，蒙语文不受重视，语文工作队伍越来越少，蒙文学校改成了汉文学校。

我们提了以上这么几条意见，希望内蒙党政领导同志认真研究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群众等待落实政策够耐心了，请不要责怪群众，天天讲落实政策，而领导上却拿不出政策，即便有了政策也不认真执行。比如去年发了一个(108)号文件，下边连传达也不传达。很多人不知道，更谈不到贯彻执行了。领导上发了文件还应检查一下，执行情况如何。

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部分工作人员
1973年11月初

滕海清的幽灵还在内蒙游荡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署名“内蒙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两张大标语——“新老内入党的复活就是最大的复辟”、“否定挖肃就是复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的标语。笔者按捺不住别了几年的仇恨，口里念着老滕的咒符，手里挥舞着挖肃的黑棒，杀气腾腾跳出来了。革命的同志们，它告诫我们：乌兰巴干之流在蠢蠢欲动，滕海清的幽灵在内蒙古游荡。它向人们揭示，内入党的问题没得到彻底解决，受害者没有得到真正平反。一旦时机成熟，气候适当，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牛鬼蛇神、民族败类、老滕的宠儿，就会摇旗呐喊地跳出来，把我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广大贫下中农牧。重新打成内入党。几十万人，甚至百万人重新遭受精神折磨、肉体摧残。他们就会继续“抓到羊群里去，抓到蒙古包里去”。到那时会有更多的人挣扎在魔鬼的皮鞭之下，惨死在魔鬼的棍棒之下。老实告诉你们这些坏蛋，这是一千个办不到。

关于内入党问题，是毛主席给我们平了反。我们千万个受害者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但是，时至今日为什么还会有人恶狠狠地跳出来为滕海清翻案呢？联系内蒙在落实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我们忍受着被摧残的伤痛，战斗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线，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力量。然而，昨日打内入党的镣铐皮鞭声还在耳边回响，死者的哀音还在耳边呻吟，战友的血还未干、伤口还没有好。今天竟然会有人跳出来向我们广大受害者挑衅。当时党的民族政策遭到空前的破坏，内蒙革命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铁路瘫痪、工厂停产、干部不上班的景象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而现在竟会有人对那种腥风血雨使亲痛、仇快的情景还念念不忘，又重新挥起反革命的大棒！这是林贼破坏民族政策的流毒没有肃清，这是迎合了林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千万不可麻痹大意，

掉以轻心。

正告你们一伙儿打着“内蒙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一小撮坏蛋，我们曾被打过内人党的各族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广大贫下中农牧，面对着你们这种反革命的叫嚣，我们已经严阵以待。我们不会再像“挖肃”中那样，乖乖地逆来顺受，被你们关进黑房子里，任意折磨摧残。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就有打虎上山的胆量，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我们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对敌人的容忍，就是对革命犯罪。不把你们的脑袋砸个稀巴烂，就是对人民有罪。一些手中有权别有用心的人，也动辄给我们扣上“民族情绪”、“民族分裂”大大小小的帽子。这些我们听够了。只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什么都不怕。

在这里，我们向内蒙党委呼吁：一小撮践踏民族政策的败类分子，如此嚣张，正说明内蒙古党委没有很好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没有给在挖肃中错打成内人党的广大群众真正平反。

我们强烈要求内蒙党委对这个反革命标语，进行严肃处理。

内蒙广大受害者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送：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新内入党结案问题的严正声明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区 and 全国一样，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开展。在大好形势下，我们怀着久等而急切地心情强烈要求内蒙古党委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内蒙古各族人民深受其害并日夜关注的“新内入党”案件尽快结案，以达到更大的团结和胜利，特此严正声明如下：

一、挖“新内入党”妖风的兴起

当时的内蒙革委会滕海清、高锦明等人心怀巨测，为打击自治的主体民族剥夺他们的自治权利，提出“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行动口号，旋即大挖所谓“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四七年五·一大会以后潜入地下，六十年代进入组织大发展的’“上有中央。下有支部”的“三里五界都有的”“遍及全区农村牧区街道的，阴险反党叛国的，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新内入党’”。

滕海清等人把矛头对准内蒙古各族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把内蒙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打成“新内入党”组织。象乌兰巴干这样的坏蛋兜售反动透顶的“三个演变”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象丁振声这样的政治扒手，分封了所谓的“新内入党”中央委员会名单，并罗织了几十种所谓的“变种组织”，提供了假造的证据；象张风田这样的阶级敌人乘机行凶杀害共产党员，依仗滕海清的权势，有恃无恐地进行阶级报复；还有不少别有所图的坏旦接过“挖肃”口号，狠下毒手，兴风作浪。

二、深重的灾难

滕海清等人一笔抹杀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内蒙古的主导地位,竟然胡扯什么:内蒙古的二十年是“反党叛国的二十年”,“大搞民族分裂的二十年”,“建立大蒙古帝国的二十年;断言“乌兰夫黑线又粗又长”,“内人党是没有证据,口供就是证据”等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派胡言。滕海清等人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教导,煽动武斗,大打出手,致伤、致残几十万,致死几万各族革命人民,打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破坏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破坏了边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了邪路,客观上配合了苏修对我国的颠覆和攻击。同志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乌云翻滚的日子里那黑暗阴森的隔离房和堆积刑具的刑讯室,以及手铐脚镣、棍棒皮鞭和各种法西斯刑法的罪恶的声响;我们在漆黑的深夜,何止一次地听到遭难弟兄在受刑时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不是新内人党,我是贫农一贫牧一工人阶级的儿子”“我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高呼声!我们也曾见过革命战友被打得半死不活倒在床上,口中默念着“毛主席呀!我不是内人党,我是共产党员啊!”就这样含冤死去;我们也曾见过年青寡妇和年迈的父母控诉凶手的眼泪;我们也曾听到过失去双亲的孤儿揪心袭肺的啼哭声和那些人类文明所不容许的种种民族侮辱和人身侮辱。同志们,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滕海清等人利用中世纪的野蛮手段干出来的罪恶。对此,我们各族革命人民怎能不怒不可遏热血沸腾,无所畏惧地投入到批林孔的战斗?怎能不彻底揭批林、陈、黄、李、郑的大汉族主义反动路线?怎能不彻底清算打人有理,杀人有功的反革命路线?怎能不彻底清算滕海清等人对各族革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三、谁来承担罪责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这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对于滕海清的历史性罪责我们要以革命的名义继续清算,他是怎样挖起来的?对这一问题,当时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滕海清、副组长吴涛、高锦明,成员权星恒、李质、李树德,必须把挖“新内人党”的来龙去脉、前前后后,向各族人民交代清楚。从而揭露出那些拿几十万人的生命进行政治赌注的阴险的捣鬼分子。当初不是有个叫郭以青的恶鬼蒋介石的门徒捶胸顿足的发誓说:“抓十个,哪怕抓对一个,我也宁愿给那九个跪下磕头,叫爸爸也行!”吗?同志们想一想,这种歇斯底里嗥叫是什么人的观点!中央首长在今年四月二十九日的指示中说:“是谁打的内人党?现在的区党委是搞平反的,还是平反不彻底,还是继续打内人党?要把是非搞清楚。”我们认为内蒙党委仍坚持“扩大化”观点,不想彻底平反,至今还在转移黑材料,还把这些黑材料作为永久保存,存入内蒙档案馆,尤其必须提出的是军管领导人,尤太忠等人在批林批孔斗争中,不揭郑维山来内蒙后继续打“新内人党”的盖子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谁都清楚军管之后,公安厅长毕里格巴特尔同志因“新内人党”问题再次被武斗还打掉了牙齿。为了从新在内蒙大挖“新内人党”把原内蒙公安厅搞。206”专案的一处处长腾和再次打成“新内人党”并进行武斗逼、供、信,令其交待“新内人党”的线索在狱中给他加重刑致死。尤、吴等同志对上述问题你们一点也不知道?既然你们也表示批林批孔,那么我们就要求你们狠揭猛批陈伯达、黄永胜、李雪峰、郑维山的罪行,用揭干货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你们誓言的真实性。希望你们言行一致,对内蒙各族人民、对党中央要光明正大。

四、几点强烈要求

1. 我们强烈要求内蒙党委立即行动起来和内蒙各族革命人民站在一起, 尽快对“新内人党”作出结案。

2. 我们强烈要求内蒙党委, 根据“十大”提出的“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的精神, 吸收一定数量的、能够坚持原则的、有代表性的各族工农兵群众所信任的代表参加“新内人党”结案调查组, 落实中央指示, 从根本上解决误伤者在政治上彻底平反、信任及在经济上、生活上妥善安排, 伤残者给予治疗等一切遗留问题, 彻底废除内蒙革委会在挖“新内人党”时的“公告”、“通令”和各种错误的“决定”和“文件”, 作出彻底结案, 不这样作, 对各族人民的团结、对祖国的统一, 对边防的巩固都是极为不利的。因而, 把这个内蒙历史上空前的假案、冤案、惨案作为惨痛的教训载入内蒙古的史册。

3 我们强烈要求内蒙党委, 围绕打“新内人党”的问题, 在全区范围内彻底揭发、清算罪魁祸首和捣鬼分子的罪行; 惩办杀人凶手、强奸犯、轮奸犯、大搞民族侮辱的反革命分子和作恶多端的坏人,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4 我们强烈要求内蒙古党委召开全区民族工作会议, 检查几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问题, 听取少数民族工农牧兵和革命群众代表的意见, 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5. 我们强烈要求内蒙古党委, 结合对“新内人党”问题的结案工作, 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 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 不突出了, 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 需要再教育”的指示。通过这场批林孔的斗争。开展全区性的民族政策再教育, 对大汉族主义思潮进行一次深刻的批判。

6. 军管领导人认为有“新内人党”, 那么有多少? 人证、物证、旁证何在? 必须把这些敌人交给全区各族人民公审. 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我们向全区各族革命人民紧急呼吁! 行动起来动员起来团结起来, 在彻底揭批林彪、陈伯达、黄永胜、李雪峰、郑维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即在民族问题上的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罪行的基础上, 开展对“新内人党”的结案工作, 这时还要特别警惕一小撮敌人的破坏和捣乱。

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各族革命群众

一九七四年五月廿二日

军管保护的是哪一路的积极分子?

滕海清在内蒙制造的“挖肃”悲剧, 使得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死于非命, 有多少优秀共产党员残死在阶级敌人手中。可是这些杀人的“积极分子”至今逍遥法外。林彪死党郑维山来内蒙执行军管保护滕海清的罪行不准批判, 保护杀人犯不准触动, 拒绝执行中央“5·22”批示, 不给误伤群众平反, 对死者不予昭雪抚恤, 对打死人的“挖肃”积极分子不但不予惩处, 反而可以入党。提拔、信任、重用。

广大革命群众对此能够容忍吗?

锡盟黄旗张凤田在“挖肃”中, 杀死该旗巴音塔拉公社第一书记拉喜道尔吉同志就是一起令人发指的阶级报复案件。张凤田是个从外地跑到黄旗潜居的历史革命分子子弟, 其亲父被我镇压, 继父是国民党恶霸保长。一九六八年, 杀人犯张凤田乘挖“新内人党”的机会, 认为时机已到, 遂明目张胆的跳出来充当了“挖肃积极分子”, 对他本人进行过监督和对历史反革命狗父进行过监督劳动的巴音塔拉公社第一书记拉喜道尔吉同志, 公开进行阶级报复。白天在他私设的所谓“密封室”任意行凶毒打, 晚间押回自己家, 给他历史反革命分子狗父和狗母随意烤打和污辱。甚至把拉喜道尔吉书记打得昏死过去以后, 让其小脚狗母骑在拉脖子上, 咬牙切齿地说: “看你敢不敢再监督我们!”。最后将拉喜道尔吉书记绑在马鞍架上, 在左肩下胸部从上斜下, 用长刀捅至心脏, 共产党员拉喜道尔吉同志终于惨死在张犯一家之手。黄旗军管会和新党委根据群众的揭发和强烈要求, 对张犯所作案情及其狗父的历史问题一并进行了详细地内查外调, 并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以后, 于一九七一年做出对杀人犯张凤田依法逮捕, 对其父母戴帽遣返原籍监督劳动的决定。对此, 黄旗各族革命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热烈欢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但不能令人容忍的是, 军管领导人之一在自治区党委分管政法的常务书记军管第二负责人徐信听到张犯被捕的消息之后, 暴跳如雷, 竟然在一九七二年八月召开的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上, 把黄旗第一书记那木拉同志叫去斥责“张凤田是积极分子嘛! 你们为什么抓他?” 并下令立即放出来, 那木拉同志据理驳斥说: “张凤田是搞阶级报复的杀人犯, 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如不专政他, 专政谁?” 顶得徐信无可奈何, 未能达到立即释放的目的。但是, 这招不行又来一招, 徐信竟把盟委负责同志找来, 亲自进行谈话, 向黄旗委施加压力, 继续提出一定要把杀人犯张凤田放出来。内蒙公安军管会通过锡盟公安军管会传达徐信的指令“内蒙杀人凶手有五百名, 该杀谁?” 据此指令, 锡盟公安机关至今对张犯不予签发逮捕证。

徐信竭力把搞阶级报复的杀人犯张凤田放出来。请问徐信: 你保护的是哪一路的“积极分子”?

广大受害革命群众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八日

尤太忠一伙是林彪、“四人帮”路线的维护者和推行者

本文不准备赘述李雪峰等人从六十年代开始, 在内蒙古所策划的阴谋; 也不准备谈六九年对内蒙古实行“一二·一九”分区全面军管前滕海清等人制造“新内人党”假案, 破坏民族区域自治, 残害少数民族及其共产党人的罪行。

这里主要揭露尤太忠一伙, 七一年从郑维山手里接过军管大权后的八年来, 他们不仅不准许揭批林彪、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滕海清等在内蒙古所犯下的罪行, 反而变本加厉的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路线, 他们来内蒙

古竟干了些什么？

有人在山西为林贼修建纪念馆。一九七一年四月，内蒙前指成员徐信指示有关部门给该纪念馆调拨了大量物资。并说这是政治任务。尤太忠还擅自拿走了内蒙地方外汇三万六千美元干什么了？下落不明，还把为庆祝内蒙二十周年准备的沙发、地毯从物资局仓库装上火车运走，什么手续也没有给留。同时，文化大革命中收存的一部分干部的猎枪、照像机等物，也被尤太忠、徐信、孟琦等人，给军管时的一些领导人送了礼，落实政策时国家财政拿钱退赔。尤太忠在呼和浩特宾馆开设地下工厂。调毛织厂的国拨原料、技术工人并配备战士，做成地毯上火车拉走分赃。军管人员还拿走内蒙古的汽车二、三百辆。六十五军军长靳甲夫军管锡盟时，吉普车带个行李卷，走时满满两卡车东西，真是升官发财。各地、各单位，特别是在牧区挖“新内人党”、“划阶级”、“内迁边境牧民”运动中，没收查抄的集体和私人物资、牛马羊群和金银头饰成麻袋的银元等都被拿走了，更可恶的是锡盟有的地方把牛群也打成了“反党叛国牛”，以一只羊的价钱处理给了他们自己。他们对待内蒙古就象对待战败国一样，随意刮分掠夺抢劫。

尤太忠到内蒙后，召开了内蒙古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他在这次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彻底的否定并恶毒攻击和污蔑了内蒙古的革命斗争史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十九年，把共产党领导内蒙古这十九年中所制定的路线和政策完全颠倒成民族分裂的十九年，反党叛国的十九年，搞蒙古大帝国的十九年。他们从政治路线到组织路线上完全继承了林彪“四人帮”的干将滕海清、郑维山安排好的那一套反马列主义、反民族区域自治的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班底。这个班底彻底篡夺了蒙古民族的自治权。

毛主席早已指示“要反对国内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但是尤太忠一伙拒不执行，对人民群众要求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的意见不予理睬。当牙含章同志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起来揭发批判了一下郑维山等人大汉族主义时候，尤太忠却大骂牙含章是民族分裂分子。他的支持者报社总编××，用卑鄙手段以请牙含章作报告为名借来他的讲稿，连夜抄下来，送到北京“拔牙队”批判。

一九七三年黄旗逮捕了两个挖“新内人党”时搞阶级报复的系人犯，尤太忠、徐信一伙听到后痛在他们的心上，马上下令黄旗释放这两个杀人犯，并且大力宣传这些人是“挖肃积极分子”，黄旗旗委抵制了这种错误的命令，坚持没放。专为此事，尤太忠还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作了一次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要十分注意挖新内人党时的积极分子的工作，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还说：“比如呼市有两张大字报就是破坏性的，破坏民族团结的。（注：这两张大字报是，要求落实老干部政策的）。更可笑的是，尤太忠、池必卿、侯永三人，竟然在“四·二〇”文件里借黄旗逮捕杀人犯的问题，往自己的老脸上抹粉，厚颜无耻地说“对乘机进行阶级报复的阶级敌人，有的已依法惩处”，“广大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对这些是满意的”等等。

尤太忠口口声声说，他不是挖的，他是落实政策的，然而落实政策的阻力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他自己。他到内蒙后，在落实政策问题上所干的第一件事是，在内蒙古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那么热烈的肯定了“挖肃”运动的“伟大成绩”，又那么凶狠的大骂了所谓的“一风吹”，到一九七二年尤太忠一伙就以(42)号文件向中央作了假报告说挖“新内人党”的有关平反、落实政策等问题已全部作完了，误伤的群众都非常满意等等。

一九七三年军管撤销后开始,广大受害者群众强烈要求内蒙党委,给“新内人党”结案,惩办杀人犯,恢复原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落实干部政策。在此情况下,尤太忠一伙在一九七四年搞出了一个既欺骗中央,又欺骗内蒙各族人民的74(48)号文件,标题为“……挖“新内人党”扩大化……”,在此之前,那些挖“新内人党”的候案制造者们都没有胆量说挖“新内人党”是扩大化。可是尤太忠一伙竟敢肯定挖“新内人党”是扩大化。

正当七四年落实政策的时候,尤太忠一伙派出政研室付主任×××到处流窜之后,搞出了一个所谓“落实政策扩大化”的报告。这个报告恶毒污蔑受害者说,在关押期间,说烂掉了白菜要求赔偿很多钱,老母猪下崽子因没人管理,死了崽子要求赔偿驴打滚的钱,说被关期间小孩做饭浪费了小米多少斤,要求赔偿钱,还说被关期间小鸡因没人饲养冻死了,要求赔偿钱等等等等,把受害者骂的狗血喷头,就差说受害者卖死去亲人的骨肉挣钱了。拿这样的一个恶劣的调查报告,尤太忠一伙视为“落实政策扩大化”的根据,上报『中央。一九七五年尤太忠在落实政策会七宣布,挖“新内人党”死亡人员只限“挖肃”当时死的列为“因公死亡待遇”。这就是说,重伤致残人员“五·二二”后死的。尤太忠不给“因公死亡”待遇,让那些孤儿寡妇们讨吃要饭去。中央拨下来给落实挖“新内人党”受害者的专款,不少地方挪用补助了打人凶手,也有的打人凶手以受害者之名,钻农牧民群众小识字的空子,他们代写收条,多写少付,从中渔利;更有甚者,干脆写白条子冒受害者之名,贪污盗窃死难者家属子女应得到的一点补助钱。如呼郊保合少公社雕窝沟大队书记那苏图的遗孀云春娥老大娘就是被这些家伙克扣了补助钱。尤太忠一伙从来不想追查这类问题。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尤太忠在暗里支持“二〇二”挖肃派山头在呼市街头贴出了三条反动标语:“重用新内人党魁就是最大的复辟”,“新内人党的复活就是最大的复辟”,“否定挖肃就是最大的复辟”。对这个现行反革命标语,尤太忠、孟琦不准追查。他又在暗中派于天竟、王德山同“二〇二”联系并勾结内蒙工会安排李××驻工会。内蒙工会还写出欢迎进驻的大字报。“四人帮”分子王德山在尤太忠的支持下在内蒙党委到处讲话放毒,同时尤太忠又刘要求给“新内人党”结案平反的广大受害者扣帽子,说“他们同‘苏蒙修’唱一个调子”,“否定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还在背后放风,恶毒攻击受害者要求落实政策的行动是“民族主义”山头等等。在这些老爷们眼里,屠杀少数民族,屠杀共产党人的才是反苏蒙修的英雄,那些挖而优则仕的人才被认为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积极分子,存他们眼里那些为各族受害者和共产党人的利益,为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奋起同林彪、“四人帮”路线进行斗争的人都是“阶级敌人”。

尤太忠等人,为使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按着“四人帮”的意图开展,他们把王洪文放回来的“归山虎”王德山拿到内蒙党委来指导运动,王德山按尤太忠的旨意,去同进驻工会的李××私下开会秘密部署,让他们保尤太忠,清查以来尤太忠不准揭批王德山的罪行。内蒙古人民在尤太忠一伙的手下完全被剥夺了人权,生存权。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问题,是实行自治的民族当家作主的问题,也就是自治机关民族化问题。

林彪、“四人帮”认为“民族自治就是民族分裂”。因此。他们就从当地或外

地选拔那些他们认为能够治理少数民族的“挖肃派”和能够紧跟他们路线的人来剥夺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区域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及其干将们又步满清政府和国民党对蒙古实行分而治之的老路，把完整的内蒙古自治区一分为六，因而，“自治”也就成了一句骗人的空话。正如王弼臣破口大骂的那样：“什么他妈的民族特点！”、“什么他妈的三十周年不三十周年的”。这就是尤太忠、王弼臣为了进一步彻底实现上述两条，他们对内蒙干部提出“三个不用”：“有派性的不用；有民族情绪的不用；受过我们批评不听话的不用和五个去向：(1)赶到农村、牧区插队落户；(2)到基层当付官、帮办；(3)把成千上万的干部列入审查范围；(4)勒令退职、退休；(5)以种种莫须有罪名开除(仅这一项当时锡盟就开除了二百多名)。为了彻底完成这一工作，还组织了一个“双退办公室”，强令近千名老干部和中年干部退休，实际上是清洗了这些同志，这些人在内蒙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忠实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各族人民同他们是有感情的。还有些同志虽然当时没被强令退休，但至今不给安排工作，这些同志地方有、军队也不少，尤其内蒙军区对蒙族干部实行了清洗政策。真正有马列主义水平的少数民族干部，尤太忠一伙不用，就是用，也只能当当“副官”或“帮办”，要害部门都得掌握在“挖肃派”或紧跟他们的外来干部手里。

他们一伙使用民族干部的原则有两条：一是象乌盟中级法院付院长，近八十岁的察布根赤××老人、和××那样还不懂事的小姑娘；二是为了保自己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机会主义分子、风派干部。以上两种人的特点是：第一种人是聋子的耳朵；第二种人是奴才。

尤太忠一伙的干部路线，一是否定内蒙十九年的“挖肃路线”，一是林彪、“四人帮”的帮派路线，尤太忠一伙培植亲信，建立嫡系干部队伍，当地干部要“挖肃派”，外来干部要忠于他的路线的，这两种人他是越格提拔，大家还没有忘记一个叫什么王××的小女孩子吧！十五岁后门参军，十七岁入党，十八岁复员，又通过尤太忠的后门从江西把她接到内蒙来，以十几万人之众隆重欢迎，送到武川县。据说：原计划第一年当公社书记，第二年当县委书记，第三年当盟委书记，第四年可能要拿到内蒙来。然而计划刚执行一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这种美梦也只好到此告终了。又如南京下乡知识青年×××，也是尤太忠安排为内蒙党委组织部付部长。对这种怪事，中组部点了名后，尤太忠实在没法，只好挂职下放到二毛当书记去了。尤太忠嫡系干部队伍中这样上来的何止这几个呢，他们占据了内蒙古的每一个要害部门。这样的一帮人如果继续掌握领导权，他们又不认错改错，那么受害者的政策如何落实？

1978(79)号文件是尤太忠一伙公开袒护挖“新内人党”的组织策划者，制造假案者，现场指挥打人造成严重恶果者，杀人犯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明证。保护他们，也是妄图保护他们自己过关。

内蒙各族人民要提高警惕，行动起来彻底揭批林彪“四人帮”在内蒙古所犯的一切罪行。坚决打退那一伙同“四人帮”沾得很紧的“大小鲨鱼”，他们妄图把揭批林彪“四人帮”和清查工作同落实政策打击“两种坏人”对立起来，他们所谓的“清查”就是依靠他们那一伙“挖肃派”和紧跟他们路线的某些人，他们只查远不查近，只查外不查内，只查下不查上，只查别人不查自己，他们用明暗两种方式进行串连，统一口径，保他们自己和他们那一伙罪犯，死捂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盖

子，妄图蒙混过关。斗争是艰巨的，胜利一定属于在党中央华主席领导下的，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蒙古各族人民。

挖“新内人党”受害者和死难者子女：

阿古达木、塔拉、努特格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

乌盟地区受害者群众的愤怒行动

一、一九七五年春节，大年三十，万家灯火。集宁市当年父母受害致死的一些孤儿，看到家家户户热热闹闹喜气盈门，尤其是那些挖肃凶手们的欢乐情景，再看看自己没有父母的悲凉处境，产生了巨大反差，因而遏制不住心头怒火、愤懑之情，他们联合起来除夕之夜冲入凶手家中，砸烂了他们的家具摆设、锅碗瓢盆和年货，打的凶手们东奔西跑，不敢回家，没有过上好年。挖肃起家的盟革委会主任郝力生保护他的“挖肃积极分子”责令公安机关逮捕了七个孩子，并且亲自出马审讯他们。问：你们这样干后台是谁，交待出来就放你们。孩子们回答：我们的后台就是被你们打死的我们的父母亲。又问：你们为什么打人呢？答：我们根据党中央、内蒙古党蚕下达的文件精神再三要求落实政策给我们父母平反昭雪，处理凶手，可是你们不办，所以我们自己动手。郝力生说：你们知道吗？打人是犯法的。答：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还要问杀人的都不犯法，打人就犯法吗？郝力生等人无言可对，只好停止审讯，关押起来。对此事件，社会舆论哗然，引起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孩子们的正义行动，谴责那些凶手和挖肃领导人。在此情况下，郝力生等人慑于众怒把这些孩子放了。

二、乌盟计委主任毕力格图的牙齿全被拔掉，舌头、鼻子被割掉惨死。他的老母亲年已七旬高龄，她是三十二岁守寡，给人家当保母，辛苦劳动，艰难地把儿子抚养成人，当了国家干部，有望能够晚年幸福。不料竟然被人活活整死，痛不欲生要求惩办凶手。可是凶手受到保护，怨仇难报。这样，老人家月月去到凶手家门前给她儿子烧“图利食”阴间吃喝用之物，并祷告上苍给恶人报应。老天真也有眼，一个凶手玩水淹死，另一个车祸摔死。这个凶手因挖肃有功受到重用，提拔为集宁钢厂的厂长。他坐吉普车去锡盟返回途中，在大六号前边平坦的公路上翻车，而且车上五个人中只有这位凶手摔死，别人安全无恙，你说怪也不怪。这个凶手厂长死后，在钢厂召开隆重丧礼，盟委书记郝力生亲临参加追悼。正在举行过程中，毕力格图的老妈妈和父母被打死的孩子们百余人冲进会场，将凶手厂长的棺槨连同里边的死人砸了个稀巴烂，郝力生上汽车狼狈逃走。此后又连续发生几次一二百人组成的寡妇上访团，请愿落实政策，要求给其丈夫平反昭雪，并惩办凶手。郝力生等人坚持说他们都是自杀的，没有人打死，要说是打死的没有第三者证明。因为打死人都是在深更半夜在黑房子里，只有打人的和被打的两方，上哪去找第三者！寡妇们只好提出验尸，后经法医检验图布信及苏鲁巴特尔等人尸体，结果都是外伤致死，

证明是被打死的。

三、集宁事发之后达茂旗也发生了受害者子女要求给他们父母落实政策事件。旗委书记挖肃分子高五黑也同郝力生一样同受害者作对，引起孩子们的忿怒，在这汹涌的怒涛中，自音敖包公社受害者的几个孩子把打死他们父母的凶手给打死了。盟委书记郝力生下令逮捕了那几个孩子，被激怒的全旗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上访，发表声明，如不把这几个孩子放出来，他们就自己动手处理所有的杀人凶手，以命抵命，得到全盟各旗人民的声援，有力地打击了挖肃凶手们和他们的支持者的嚣张气焰。

四、和林县委书记范×x 是在盟里造反挖肃的头头，不给受害者落实政策，对死者不予平反昭雪，对伤者不予治疗。愤怒的群众贴满了全城大字报，同时袭击了他的家，把他家里的坛坛罐罐全给砸烂。

五、丰镇县的挖肃凶手刘 x x 提到盟里当官。受害者四五十个人到盟里要人，郝力生等人强调保护“挖肃积极分子”政策。不交给他们，后来不得不同意将这个打人凶手带回，但条件是不能打他，叫县委做保证。可是气愤的群众还是把他打了。郝力生紧急派两名盟委副书记去劝说，仍然制止不住，于是到夜间偷偷放跑了。

关于达瓦所供“内人党”材料处理的一场争论

因为“206”案件发生在集宁地区，所以乌盟也就成了挖内人党的重点地区。盟委副书记旺丹和副盟长达瓦就成了重点突破对相。在滕海清的《内人党罪证展览》中就有一件是达瓦所供。后来到了平反落实政策时，按规定个人交待材料退给本人。可是盟委挖肃书记郝力生、副书记闰健等人坚持唯独达瓦的交待材料不能退不能烧，要长期保存。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据达瓦本人讲，这些材料是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至月底的几天里，忍受不了法西斯刑法下，无可奈何流着血泪编造出来的。逼他要的东西就是内人党的组织情况和党员名单。于是他悄悄施工，将《光芒》牌烟丝泡进水里，然后把白纸放进烟水汤里，拿出来晾干，变成陈旧，而后把编造的所谓内人党徒名单写上去，共写了四百二十六人的名字，旺丹是第一名。达瓦把这个泡制名单交到专案组手里。当时的革委主任周发言见到名单，真是喜出望外认为挖内人党的伟大胜利，立即做为战功向上报捷，受到滕海清嘉奖。但是盟革委会委员赵军等人怀疑材料的真实性，提出化验。于是拿到呼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进行化验，结果均认定是假造。为了查清伪造过程，又拿到沈阳化验，结果与达瓦所谈工序完全一致，所用的墨水是“文革”牌。虽然化验鉴定是假造的，可是郝力生等人坚持保留不处理，于是发生激烈争论，争执不下，在此情况下请示了内蒙古党委。吴涛同意烧毁达瓦伪造的材料，这一场争论才停了下来。

周恩来总理亲自阅批的一封信

编者按：一九七二年，内蒙古正是军管时期。下边这封信里所反映的嘎日玛被打死，几个孩子的生活惨状。这在当时来说，是全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滕海清挖完走了，黄永胜胡说内蒙古批滕作乱，“内人党平反一风吹了”，派郑维山来实行军管，把平反落实政策工作都停下来了，受害者的困苦没有人管。拉希德吉德弟兄几人还算是幸运的，遇上好人反映上去，引起周恩来总理的关心，陈锡联亲自来落实。尤太忠的军管本应从这一封信的处理去举一反三，全面检查处理受害者的生产生活存在的问题。可是他们只知道压制群众，哪管你受害者的死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我从辽宁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白音查干公社(现巴彦查干苏木)任工业助理。身为丁一业助理，还得经常陪同公安特派员去搞询问笔录之类的汉文材料。

1972 年隆冬，辖区内的光明大队(现珠日河嘎查)发生了一起盗窃案。我同公安特派员胡图同志前往侦察。我俩途经白音乌拉大队时，天色已晚，再加上大雪弥漫，只好留住。晚上闲谈得知，大队部附近有一个平均年龄只有十周岁的五口之家。“家长”名叫拉希德吉德，年仅十六岁，最小的成员不满一周岁。他们的父亲嘎日玛生前曾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某团二连政治指导员，多年的自治区级劳动模范，还光荣地出席过全国第一次科学代表大会，并同当时的中央首长合影。合影时，他恰好站在周总理身后。就是这样一位模范人物，在“文革挖肃”那场浩劫中却被活活打死，并将其尸骨混在死畜中，扔进一口枯井内。几个月后，他那悲愤交加的妻子也含冤忍辱而死，丢下了五个还不懂事的孩子。

为了伸张正义，讨得公道，更重要的是为了兄妹五人的生活出路，作为“一家之长”的拉希德吉德，多次到数百里外的事发地上访，但得到的不是白眼、羞辱，就是怒骂……

听了这个“冬天里的童话”，我这个“初生牛犊”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油然而生，竟不顾“为反革命翻案”将给自己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拍案而起，大声说：“告他们！”

“告？到哪儿去告？”在场的人惊呆了。

“给周总理写信告！”我信心十足地说。

“周总理那么大的官，又那么忙，能管咱民间这点小事吗？”有人问我。

“……”我哑然了，是啊，周恩来同志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昼夜操劳，一封极其普通的民间上访信，他老人家能亲自过问吗？尽管我自己没有任何把握，但强烈的同情心和责任感驱使我马上去见这五个孤儿。

我在大队革委会主任达理同志的带领下，来到这个特殊的家。这哪能算作个“家”啊！八面透风的蒙古包，在刺骨的寒风中不停地摇晃。包内杂乱无章，几乎找不到一床像样的被褥。五个孩子见到我们，目光呆滞，毫无表情，仿佛是一群泥塑的雕像。目睹这凄惨的情景，我眼含泪水。

天上，寒星闪闪；身边，朔风怒号；脚下，没膝的积雪。我暗暗下决心，就是粉身碎骨，也要用手中的笔为他们讨个公道。

回到大队部，我向有关人员继续询问、核实了一些情况后，连夜伏在昏暗的油

灯下。挥笔疾书•••••

我含着眼泪写到凌晨两点多，总算写完了这封“致敬爱的周总理以及尤太忠司令员、吴涛政委的信”（尤太忠时任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时任内蒙古党委副书记、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内蒙古军区政委）。为了打动领导们的心，我在开头就点明了主题：

敬爱的周总理以及尤太忠司令员、吴涛政委：

首先，我代表蒙冤受辱、平均年龄只有十岁的五个孤儿，含泪向您问安！

结尾处，为了证明事件的真实性，又写上了“上述所言，如有半句谎话，我甘受国法严惩”。

天刚放亮儿，我就派大队炊事员找来了受害者和他们还信得过的亲属，急不可待地将信读给他们听。可是，出人意料，他们全都摇头反对，怕担政治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哪来的一股“邪劲”，一字一板地告诉他们：

万一出了事，你们就说不太懂汉语，不知我都写了些啥，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这还不行吗？”就这样，这封在昭乌达草原深处油灯下“出笼”的上访信，通过白音查干公社所在地的邮电所，越过白雪皑皑的塞北草原和巍巍高耸的燕山山脉，飞向了首都北京•••••

两个多月后，大概是春节过后的正月十七八，一辆当时很少见的北京 212 型吉普车，顶风冒雪驶进公社大院。不一会儿，有人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是公社领导让我快去。我刚进屋，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朝格吉拉同志赶忙站起来，一边说“我代表受害者家属向你表示衷心感谢”，一边恭恭敬敬地给我鞠了三个躬。

原来，来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和所属的五师政治部有关领导以及五师某团的一位副政委。我的那封上访信，周总理不仅亲自阅批，而且还委托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交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亲自督办。陈锡联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亲临呼和浩特等待听取调查汇报。同时，来人还带了内蒙古党委为此而专发的一份正式文件，文中有“挖肃遗留问题，照此处理”等字样，我所代写的那封上访信，以附件形式，全文附在文件之后。

当天下午，我受公社领导的委托，陪同调查组直驱五个孤儿的所在地白音乌拉大队。

五个可怜的孤儿听到周总理派人前来调查和慰问的喜讯后，互相拥抱着哭作一团。

带路的大队革委会委员昭日格图和我也泣不成声。

调查组的几位成员和闻讯赶来的牧民见此情景，也泪如泉涌

这是一个震撼北疆草原的夜晚•••••

这是一个呼唤良知和正义的夜晚•••••

这是一个永远铭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系百姓崇高精神的夜晚•••••

不久，这五位蒙古族孤儿的父母蒙受的冤屈，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在有关首长亲自督办下，终于得到了昭雪。

五位蒙古族孤儿，在敬爱的周总理和有关领导及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和培育下，早已长大成人。他们至今仍在锡林郭勒大草原过着幸福的生活。

乌庶民

第五编彻底平反“新内人党”冤假错案

华国锋彻底否定“内人党”的存在

按：彻底否定“新内人党”存在的这份白头文件，从其程序来看是尤太忠等三人向中央写报告，然后由中央作批示。而其实际情况的过程是，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被打“新内人党”惨死，并定为“现行反革命”，军管中又做出“不准翻案”的决定。“文化革命”结束了，可是掌权的尤太忠和自治区公安局长挖肃分子孟琦等人仍然不准翻案。嘎如布僧格子女在内蒙中诉无望，告到中央，由当时组织部长胡耀邦两次派员调查，得到实情，然后向中央报告。华国锋批示“什么内人党，不存在，彻底平反”于是中央办公厅将尤太忠等人叫到北京，授意起草报告。这三个人都没有彻底否定“内人党”的意识，写不出来，因而“究竟有没有一个新内人党？”的要害段落都是华国锋、胡耀邦修改定稿。尤太忠他们只会编写假话，在这个报告中说什么“军管以后，被打肉人党的政治上平反了”、“致死的抚恤了”、“伤残的治疗了”、“查抄物资补偿了”、“凶手惩处了”、“广大干部群众是满意的”等等瞒上欺下的骗人谎言。

这个没有文号的无头文件，在当时传达使用时叫做“党中央华主席 4. 20 指示”。由于文件没有头衔关防，尤太忠回去传达，广大干部哗然，出现一场风波人们提出这个传达报告，一不是中央文件，：不是内蒙古党委文件，执行起来没有权威，而且根据以往教训，担心日后有人出来否定、推翻，发生反复。这是敢提问题的有识之士的呼声，反映到了中央、于是尤太忠在六月二十日全区平反落实政策会上说明了这个问题。解释说，是华国锋主席把他们找去主持制定了这个文件。文件形式是技术性问题，不要发生顾虑，这是中央有案可查的。

文件中还提到，委托胡耀邦同志负责向辽吉黑甘宁省区传达。这是因为，一九六九年东三盟划给东三省，额济纳旗划给甘肃，阿拉善旗划给宁夏，尚未归回内蒙建制。所以，须要向他们传达中央这个惊天动地的大好消息。

华主席、党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尤太忠、池必卿、侯永同志《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并望认真贯彻执行。

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五省、区也有同类问题。为了统一思想，统一政策，共同解决好挖“新内人党”的遗留问题，中央委托胡耀邦同志通知这五省、区党委各派一位负责同志来京，向这些同志传达这一文件。

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

华主席、党中央：

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于四月十日到京后，向李先念、汪东兴副主

席和纪登奎、胡耀邦同志汇报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中，干部、群众的一些思想情况和迁到的一些重要问题。在几位领导同志的亲自指导和具体帮助下，我们研究了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的问题。四月十六日前来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工作会议的池必卿同志也参加了讨论。现将有关情况和意见报告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在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中，由于当时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大挖“新内人党”，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这些严重错误，混淆了阶级阵线，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损害了各族人民的团结，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给内蒙古自治区的革命和生产造成了，很大损失。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对内蒙工作的指示，停止了挖“新内人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后，特别是自治区新党委成立以来，根据党中央的一系列有关指示，全区各级党委在纠正清队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解决挖“新内人党”问题，落实党的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于被打成“新内人党”的干部和群众政治上给以平反，有关材料销毁；对致死致残的干部、群众及其家属，分别给以抚恤、治疗和生活上的适当照顾；对查抄的财物，给以清还或一定的补偿；对乘机进行阶级报复的阶级敌人，有的已依法惩处，广大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对这些是满意的。但是，按照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的精神，在解决挖“新内人党”问题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恰当地处理有关干部和群众提出的某些合理要求，以利于加强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加速自治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究竟有没有一个“新内人党”？是全区广大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一直关心，并希望给以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家认为，在揭批“四人帮”斗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是应该而且完全有条件对这个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根据在落实政策中了解到的大量事实，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主观臆断，盲目蛮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因此，应该完全予以否定。这一错案的祸根是林彪、“四人帮”，责任在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当时，广大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是极其忿恨的；对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的严重错误也是不满的，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的。参与挖“新内人党”活动的人，绝大多数是不明真象的，有些是被迫的，这些同志是没有责任的。真正乘机进行阶级报复的阶级敌人、严重违法乱纪的刑事犯罪分子是极少数。全面、正确地估计和分析这一情况，是解决好这一问题的基础。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反修前线，保持安定团结，发展大好形势，加强对敌斗争，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内蒙建设好，是革命的需要，是全区蒙汉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大局。我们一定要从这一大局出发，坚决遵照华主席、党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大局的方针，积极而又慎重地按照党的政策，把工作做深做细，把这个历史错案的遗留问题解决好。

一、对致死的干部和群众从政治上给以平反后，还应由有关党组织对他们的历

史和工作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写出书面材料,通知其家属和生前所在单位的群众。二、有关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亲切关怀死者家属和伤残人员,尽可能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过去对死者家属的生活补贴,和伤残人员的治疗、困难补助问题的有关规定,要继续认真贯彻执行。

三、有些生产队因死伤人员过多,集体负担过重的,国家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扶持他们发展生产。

四、对于极少数证据确凿、借机搞阶级报复的阶级敌人。和严重违法乱纪、民忿极大的刑事犯罪分子,应经盟市以上党委审查批准,由政法部门依法惩处。

五、对有关干部、群众提出的其它要求,凡合理的,要抓紧研究,及时解决;办不到的,要认真解释,说明情况;不合理的,要耐心说服,做好思想工作。

以上意见,如经中央批准,全区各级党组织都要认真学习讨论,统一思想认识,制定执行办法,联系当地实际情况,结合当前中心工作,深入进行传达,做好思想教育和团结工作。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都要从大局出发,要向前看,消除隔阂,加强团结,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把对死者的怀念、对伤残者的关心化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实际行动。人人上阵,投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深入揭批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破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反革命罪行。过去被伤害的干部、群众及其家属是顾大局、识大体的,是通情达理的。大家懂得,绝不能用错误的办法去纠正错误,甚至“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党组织对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有的已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教育。有的结合其他问题,正在令其接受干部、群众的揭发批判。对少数跟着他们犯了错误的人,要加强教育帮助,只要这些同志自觉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主动做好团结工作,是会得到群众谅解的。

内蒙古的广大党员、干部、驻军指战员和蒙汉各族人民是好的,是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热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忠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过去在建设内蒙,保卫边疆.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家的思想路线觉悟更有了很大提高:我们相信。只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工作.讲清道理,讲明政策,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蒙汉各族群众一定会正确认识、正确对待过去挖“新内人党”的严重错误,共同处理好这方面的遗留问题。一定会提高警惕,排除干扰,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乘机挑拨离间、破坏捣乱。一定会坚决响应华主席“团结、团结、再团结”的伟大号召,受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建设和保卫好祖国北部边疆,奋发努力,做出新的贡献。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审阅批示。

尤太忠 池必卿 侯永
一九七八年四月一十}{

内蒙古党委对挖“新内人党”所做的结论

按：原件是自治区党委于 1978 年 12 月，向全区党员干部传达稿，没有头尾，没有落款，传达完之后收回销毁，不让讨论，不收反应，不存档案。

为什么说“新内人党”是错案、假案？

从查证核实的大量档案材料和滕、吴、高、权、李他们搞出来的“罪证”材料看，更加证明了“新内人党”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错案、大假案。

滕海清一个人，于 1969 年 2 月 4 日向中央文革汇报的“关于‘新内人党’问题的汇报提纲”，共二十二页铅印的材料，这就是他们把以乌兰夫为总头的“新内人党”六十八名“中央执行委员”（又称骨干核心）名单中，除了原来的统战对象二人都是我们党多年培养的蒙古族优秀的领导骨干，其中包括在中央民委、外交部工作的好干部，这些干部除了去世的九人以外，现在还在自治区党政军机关和中央有关部门继续担负着重要领导职务。

二是于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内蒙古自治区革委，内蒙古军区名义编造的所谓“反革命叛国集团”‘新内人党’部分罪证的影印册，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是所谓“新内人党”组织活动的主要罪证。

滕海清他们把 1946 年 3 月 23 日草拟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纲领》共四章十二条蒙汉文原稿，当作“新内人党”的党纲党章的罪证（见 3—16 页）这份材料在 1947 年 4 月 20 日中央明确指示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后，作为历史资料早已存入内蒙古档案馆保存。稍微清醒的人都看出。哪有一个反党叛国的反革命组织把自己的党纲党章保存在我们的档案馆呢？明明自己的政策规定写着 1947 年 5 月 1 日大会以后转入地下的是反革命组织，而偏偏又把 1946 年 3 月 23 日的文稿作为“新内人党”的罪证呢？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所谓党旗是把 1947 年 5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做为自治旗公开悬挂过的旗子和锡盟兰旗机关“红光人民公社民兵团”的团旗当做了“新内人党”党旗的罪证。

所谓党印也找到了一个，他们把 1925 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鄂托克旗委员会”的印章早已存在我们的国家档案中（见 17 页），蒙文字明明写着“里蒙古”（现在叫内蒙古）也看不出来，可见当时搞专案的人中还没有一个懂蒙古文字的同志。

所谓“新内人党”的组织活动中把 1948—1949 年内蒙古党校学员讨论的在内蒙古“为什么不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讨论记录也当做了罪证（见 18—23 页），还把 1963 年 2 月集宁地区发现的反革命信，署名以中国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集宁市民族中学赵金海寄，邮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市建筑处交蒙古大人民呼拉尔和部长会议的黑信，其内容是用新旧蒙文写在梅兰芳戏剧条屏上的，所谓在集宁召开了“新内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等等，（见 34—41 页）立案为“206”号案件，做为“人民革命党”的现行活动，实际上这一案件由于乌兰巴干等人的扩散，至今还没有破案，究竟是外部敌人还是内部敌人搞的反间计还没有查清。

所谓组织机构中，把严重逼供信情况下搞出来的乌盟原副盟长编造出来的名单，当作“新内人党”的花名册和盟一级地方组织机构的证据（见 42—46 页），此件当时就送北京专业部门化验鉴定是伪造的，盟军管方面自己都否定了的东西也当作了罪证影印出来。

第二部分是所谓乌兰夫同志是“新内人党”的总头目。

他们的根据：(1)是把乌兰夫同志于 1947 年 4 月为出席内蒙古人代会代表登记表肯定为“新内人党”登记表(见 48—51 页)；(2)把乌兰夫同志于 1947 年 4 月 70 日在人代会上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关于施政纲领的说明(原件在内蒙古档案馆)；(3)把乌兰夫同志 1947 年林东干部会议上的报告；(4)把乌兰夫同志于 1949 年 8 月在军区干部会议上的总结，都当作“新内人党”活动的罪证(52—56 页)，又把几个人的供词也当作乌兰夫同志发展“新内人党”的罪证。

第三部分是所谓“新内人党”舆论的罪证。

1、把 1954 年迎成灵、建成陵和 1962 年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的公开活动，报刊上的照片当作了“新内人党”舆论的罪证(见 70—73 页)。

2、把 1949 年的公开刊物《新生的内蒙古》重印的 1926 年“内人党”刊物《内蒙受苦之局面》也当作了“新内人党”舆论的罪证(见 75 页)。

3、把 1965 年 11 月 13 日，乌兰夫同志在内蒙古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所谓“三基论”当作了“新内人党”的公开纲领，此件是张鲁加工的，1966 年元旦广播讲话稿也是这个精神，是高锦明定稿的(见 76—81 页)。

4、把我们建国初期，翻印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语词典上的“乌兰巴托是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是人民的首都”等词也当成了罪证(见 88—89 页)。

第四部分所谓“新内人党”里通蒙修的罪证。

滕海清、吴涛他们公然把斯大林、乔巴山领导时期的苏联、蒙古都当作“修了”，所以把 1946 年蒙古赠给乌兰夫同志工作用的苏式电台，把 1949 年我们建国以前曾经有些人为斯大林、乔巴山领导的苏、蒙做情报工作的革命活动都当作了“里通蒙修”，甚至他们把中蒙边防人员定期会晤时的合影照片通通都当作了里通蒙修的罪证(见 98—127 页)。

第五部分是所谓“新内人党”的变种组织。

这方面政治扒手乌兰巴干编造得离奇了，他们所列的变种组织上百种，但是罪证汇编的影印册没敢完全用，例如有些组织，就在 1947 年当时两条道路斗争中蒙古族进步青年起来进行了批判，其头头因搞了其他反动活动而被法办以外，其一般成员也没有定反革命，象“兴蒙党”是日伪时期进步的青年学生组织的以反满抗日为宗旨的群众组织，它和“内人党”毫无联系，还有些是 1945 年 8 月 15 日以后共产党地方领导机关帮助建立的一些进步组织，和“内人党”更没有关系，影印册上列的“统一党”，黑龙江省委发(78)46 号正式文件已给呼伦贝尔盟的“统一党”彻底平反了，还有额济纳旗的“土尔扈特党”，兰旗的“独立党”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见 128—135 页)，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的存在，证明它就是“新内人党”的变种组织。

这个长达 135 页的罪证影印册，它所罗织的罪证没有一个是能够站得住脚的，根本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说来也实在叫人奇怪滕海清、吴涛挂帅，李树德直接指挥内蒙古革委会、内蒙古军区专办搞的“部分罪证”影印册，今天已经变成了他们一伙制造“新内人党”错案、假案，诬陷迫害大批干部群众的罪证。

我们从上述的大量事实看出，为什么说“新内人党”是错案呢？因为历史上有过 199_5 年的“内人党”，1946 年的“内人党”，人家自己简称革命党(蒙语)，绝不能毫无根据推论 1947 年“5·1”大会已转入了地下，又说它是从潜伏、个别

吸收、到大发展成为乌兰夫同志为总头目，上有中央下有支部的“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的“新内人党”。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我们不否认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一小撮内奸、亡命徒搞名目繁多的纲领相似的，但组织上单一的民族分裂反动党派，甚至它可能故意叫“新内人党”，对此我们不打保票，但是这绝不是滕海清他们挖的“党政军三里五界都有的，‘内人党’”。其所以是错案：(1)历史上有“内人党”，现实没有“内人党”；(2)社会上有个别的反党叛国小党派，但没有普遍性的“新内人党”；(3)“新内人党”的名称也是滕海清他们编造出来的，人家是自称“革命党”，“新内人党”用蒙语不好简称。为什么又说“新内人党”是假案呢？从他们罗织的罪证材料看都是假的；从他们挖出来的“新内人党”总头目、“中央执行委员”到“一般党徒”没有一个是真的，是滕、吴他们采用林彪、“四人帮”的“棍棒底下出反革命”的法西斯手段挖出来的。因此，他们挖出来的“新内人党”是彻头彻尾的大假案。我们从严重的恶果也就可以看出它是个冤案、惨案了。

内蒙古党委关于追究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政治责任的请示报告

华主席、党中央：

最近，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为了弄清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挖“新内人党”中所起的作用和应承担的责任，组织专门工作班子，翻阅大量档案资料，进行反复查证核实，又在常委会上作了认真研究。事实证明，所谓“新内人党”是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等人追随林彪、“四人帮”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是他们策划和制造的大错案、大假案。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吴、高、权、李紧跟林彪、李雪峰，捏造事实，罗织罪名，诬陷乌兰夫同志搞“宫廷政变”、“大蒙古帝国”，推行“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路线”，把大批干部、群众打成“黑帮分子”、“反党叛国分子”、“民族分裂分子”。

一九六七年六月，自治区革筹小组成立以后，滕海清伙同吴、高、权、极力贩卖“黑线专政论”，攻击乌兰夫同志的“黑线又粗义长”、“渗透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十一月一日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他们积极鼓吹叛徒江青“一、一二”黑讲话，煽动“文艺界必须大乱”、“公检法必须大乱”。一九六八年的一月自治区革委会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区打一场“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大“挖”所谓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三股势力”，一股是“包括××、×××，这些坏家伙”的老班底，“××、×××之流”的“少壮派”和“×××、××、×××在内的老搭档”；二股是“哈丰阿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三股是“例如×××、××”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他们诬蔑乌兰夫同志“在内蒙古自治区干了二十多年反革命勾当”，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内蒙古的主导地位，否定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

利，否定自治区二十年来的伟大成就。否定毛主席关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英明论断。这个“挖肃”运动，是他们制造“新内人党”错案、假案的前奏。

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搞的“挖肃”运动很不满，决心要审查既有历史问题，十七年又有路线错误的高锦明、权星垣一伙。高、权等人为了转移矛头，保护自己，经过阴谋策划把他们曾经认为“底子都清楚”的“内人党”问题端了出来。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滕海清、李树德向中央汇报“内人党”的问题，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肯定，“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四月十四日，高锦明主持核心小组会，研究“内人党”问题，他们根据政治骗子乌兰巴干(原内蒙文联付主席、自首变节分子)捏造的所谓内人党材料和××××同志(原内蒙古军区政治部付主任)被迫交代的口供，决定对十六名蒙古族负责干部，进行秘密隔离、拘留，组织专案突审。四月二十六日，他们利用刑讯逼供的假口供，凭空捏造的伪证据和至今还没有破获的“206”案件(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在集宁邮检中发现寄往乌兰巴托蒙古大呼拉主席团的一封反革命信件，信的落款是“内蒙人民革命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安部门立案为 206 号”)作依据，由高锦明签发，向中央作了《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谎报 206”案件已“初步突破”，证明“内人党”是存在的，而且长期与我为敌，大搞民族分裂主义”。从五月二十日到七月一日，核心小组多次研究“内人党”问题，七月滕、吴主持召开自治区革委会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了“新内人党”问题，由李树德作了有关“内人党”的“性质及如何对待的说明”，七月二十日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一小撮民族反动派的包庇者和黑后台》，毫无根据地断定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内人党转入了地下，决定对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还用登记反动会道门的办法，强令“一般党徒”进行登记，对“抗拒者加重惩处”。这是一次大挖“新内人党”的决策性会议。从此，大挖“新内人党”运动在全区铺开了。与此同时，他们在牧区划阶级中，执行极“左”政策，把大批贫下中农牧划为牧主、富牧、宗教上层=据统计，全区平均打击面高达百分之十以上，最高的中后旗达百分之五十。同时强迫错划为剥削阶级的边境牧民内迁，在部分地区还把农民迁进牧区，搞所谓“掺沙子”等等。严重混淆了阶级阵线，伤害了许多劳动牧民，有些遗留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滕、吴主持召开的自治区革委会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是大反右倾，狠挖“新内人党”的大会。他们为了迷惑群众，大肆煽动说“党政军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新内人党”上有中央，下有支部，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是苏蒙修情报机关”，是“最大的特务组织”，攻击乌兰夫同志是“内人党的总头目”，诬蔑共产党的支部“就是内人党的支部”，共产党的边防站是“内人党的情报站”。十二月十六日，滕海清签发的《内蒙革委会深挖“内人党”领导小组第一次碰头会议纪要》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里通外国的，专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反革命组织，实际上已成为帝修反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情报组织、特务组织。”他们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狠字为基础的社论，鼓吹“左比右好”、“武斗有理”的谬论，胡说“左要革命，右不革命”，“打人是革命群众对敌的仇恨”，“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

起”、“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嘛！”他们煽动刑讯逼供，怂恿违法乱纪。到处给所谓的“新内人党”党徒办学习班，设隔离室，给阶级敌人和刑事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这些坏人猖狂进行罪恶活动，其言词之毒，手段之卑鄙、刑法之残暴都是骇人听闻的，是罕见的，使大批干部、群众精神受折磨，肉体受摧残，造成近万人致死。三万多人致残，几十万人受迫害，给内蒙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遗留的内伤，外伤都是极其严重的。他们对此毫不痛心，反而继续欺骗中央，蒙蔽群众匆匆忙忙的拟“汇报提纲”，编“罪证”汇集。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滕海清还向中央汇报“新内人党”问题。在汇报“提纲”中，把我们党在斗争中长期培养的优秀少数民族领导骨干，诬蔑为“新内人党”的“中央委员”。就是这篇无中生有的汇报，却得到了中央文革中某些人的肯定。×××说：“乌兰夫包庇了不少坏人，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样的部队要改造，那有内人党的部队，你们能掌握吗？”“要把内人党组织搞垮，搞臭……。”叛徒江青还煽动说：“内人党是专门搞破坏活动的。”“你们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滕海清等人把这些谬论，当做“上方宝剑”，以此压人。

一九六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敬爱的周总理多次指示滕海清等人，要注意政策，防止扩大化错误。他们根本不听，继续蛮干，直到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还以内蒙革委会、内蒙古军区名义印制所谓“反党叛国集团‘内人党’部分罪证”的影印册。这个长达一百三十五页的影印册所编造的“罪征”，完全是骗人的。今天，这个影印册已经变成了他们陷害广大干部、群众的罪证。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滕、吴、高、权、李等人在大挖“新内人党”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有罪于内蒙各族人民的。在制造“新内人党”错案、假案中，滕海清是主要决策人和主要指挥者；吴涛是重要的决策人和重要指挥者；高锦明是主要的阴谋策划者和重要的决策人；权星垣是重要的阴谋策划者、决策人和直属机关的直接指挥者；李树德既参与了阴谋策划和决策，又充当了前线总指挥。

1978 年 12 月

评内蒙古党委对“挖肃”所做的结论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彻底否定“内人党”的存在之后，自治区党委经过半年的时间组织人力调查研究翻阅档案，对于历经十年的“挖肃”斗争做了结论，并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向全区党员干部进行传达。按说，自治区党委的文件应该是有权威的准确的可信的。可是由于这个在“文化革命”的军管时期在“内人党平反一风吹”的鼓噪中建立起来的新党委是个“挖肃”党委，而且军管领导人尤太忠任区委书记还没有走，同时因为对吴涛、高锦明、权星垣怀有派性敌意的王铎来主持编写这个结论，所以其偏斜不公正成分很大，况且仍然持有“左”的“挖肃扩大化”观点，因而也就失去了它的权威性。

这个“挖肃”结论失实、偏斜、不公正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一九六九年郑维山的军管以及一九七一年尤太忠组建的内蒙古新党委一直坚持“新内人党”的存在,只是“扩大化了”。所以尽管华国锋已经否定了这个“新内人党”的存在,可是王铎及其“挖肃”笔杆子居心叵测,埋下了伏笔。他们在结论中说“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我们不否认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一小撮内奸、亡命徒搞名目繁多的纲领相似的,组织上单一的民族分裂反动党派,甚至它可能故意叫新内人党,对此我们不打保票”。接着他们用倒置的手法表明了他们的心迹,“社会上有个别的反党叛国的小党派,但没有普遍性的新内人党”。请注意:这里他们说有“反党叛国的小党派”。如果把他们上边所做结论再倒置过来的话,那就是“社会上没有普遍性的新内人党,但有反党叛国的小党派”,这不是和“挖内人党扩大化”同意语吗!大家都知道,滕海清挖的不只是“上有中央下有支部遍布全区的以乌兰夫为首的内人党”,同时也挖了形形色色的几十上百个变种组织。这个“变种组织”可以说是王铎笔下的“反党叛国的小党派”吧,那么哪个是真的呢?谁不知道滕海清的“挖肃”是“竭泽而渔”掏干水抓鱼,可是一个“小党派”也没有抓到啊。“挖肃”已过三十年了,他们所肯定的这个“反党叛国的小党派”至今没有个影子。尤太忠他们既然认定“反党叛国的小党派”还是存在的,那为什么不在四月二十日向华国锋打的报告中写进去呢?为什么只是向下讲呢!“我们不打保票”,谁叫他们“打保票”哩!群众叫他们“打保票”还是中央叫他们“打保票”。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对华国锋的全面彻底否定“内人党”怀有疑意。他们的意思是应该把“挖内人党扩大化”的说法永远保留下去,而不应该“一风吹”。达摩克利斯剑应该永远悬在蒙古人头上,而不该把它卸下来。

二、我们认为挖“内人党”死伤残责任主要由滕海清负责。而区党委的结论非要把“核心小组那几个人”捆绑在一起集体承担责任。这样的结论是责任不明,是非不清。区党委编写的《为什么说新内人党是错案、假案?》这个材料一开头就说“从查证核实的大量档案材料和滕、吴、高、权、李他们搞出来的‘罪证’材料看,更加证明了新内人党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错案、大假案”。众所周知,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内蒙古自治区革委、内蒙古军区名义编造的所谓《反革命叛国集团新内人党罪证》是滕海清一手蛮干的伪劣假造产品,怎能由“滕、吴、高、权、李”共同承担呢!三、边民内迁,牧区“掺砂子”是在军管中郑维山、尤太忠他们干的。与滕、吴、高、权、李毫无干连。这个罪责怎能叫他们承担呢!郑维山、尤太忠的军管是在“五、二二”后,不到半年时间进来的。他们不管“内人党”受害者的死活,平反落实政策一概停止。经过“挖肃”的内蒙古如同一个受了重伤的人倒在路旁,刚刚有人扶到车上急送医院抢救治疗的时候,来了一位“左派”把伤者从车上拉下来,反复验看是不是“反革命”,警告救护者“不要放跑了敌人”。这个简单的比喻,不一定合适、恰当,但是,就是这么一回事。“挖肃”后果之所以那么严重,是与军管有关,他们非但不收拾滕海清的“挖肃”善后,且继续“挖肃”,以致受害者极为痛苦地熬了八年时间才得见天日。

四、自治区党委上报党中央、华主席的报告中讲,滕、吴、高、权、李挖“内人党”是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他们所说的“假左真右”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他们仍然坚持认为内蒙古有“内人党”,滕海清在形式上很“左”蛮干,可是有“真”的“内人党”没有挖出来,挖出来的是假的。这也是

郑维山观点,军管的观点,也是王铎的观点。他们准备有朝一日再行组织队伍来挖出这个“真”的“内人党”来。所以,尤太忠、王铎他们反复多次讲“要十分爱护挖肃积极分子,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以保存他们的“挖肃”力量,重开挖戒。

“假左真右”也叫“形左实右”。在一九六九年“五、二二”指示中,周恩来已经批评过这种论点,“不能说成是形左实右”,“滕的这一段错误,看来是‘左’的错误,不是形‘左’实右的错误”。自从“挖肃”以来,内蒙古历任领导人的思想总是和中央的正确指导思想相悖,这是他们紧跟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明证。

五、区党委在《关于追究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的政治责任的请示报告》中开列的清单是:滕海清是主要决策人和主要指挥者;吴涛是重要的决策人和重要指挥者;高锦明是主要的阴谋策划者和重要的决策人;权星垣是重要的阴谋策划者、决策人和直属机关的直接指挥者;李树德既参与了阴谋策划和决策,又充当了前线总指挥。

在人们的常识里,一个组织、一个团体只能有一个人是“主要”或者叫“主犯”,哪能有“几个主要”、“几个主犯”。在区党委上报中央的请示报告的文件题目上就写着“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的政治责任”。对于挖“内人党”的领导、策划、指挥的责任不分主次,笼统地讲“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这无疑是在让其他几个人平摊滕海清的罪过。在挖“内人党”问题上,吴、高、权、李诚然都有错误,然而备有各的帐,要实事求是,是谁的就是谁的,不能代人受过,也不应分摊。大家知道,文件档案确切证实挖“内人党”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是在上层蒙族干部中进行的,关“老母鸡”叫他们“下蛋”,人数很少,没有死人。第二阶段是制定政策界限,并设防线,在全区铺开,限制在旗县级以上范围内,这一阶段开始出现死人、伤人。死人大概几百上千。时间是七月下旬布署下去,经过一个月的进展情况,高锦明、权星垣骇怕了,九月初旬就提到自治区决策领导层议事日程上,九月二十五日召开自治区机关干部大会,由权星垣主持会议,高锦明讲话,停止“挖肃”转入斗批改。讲话中说“不能再挖了,再挖就挖塌,”。第三阶段是滕海清“批高反右”,突破第三次全委会制定的政策防线,深挖以“乌兰夫为首的上有中央下有支部遍布全区的内人党”。最后结算,死了一万六千多人,跑除第二阶段死的一千人,这一万五的整数由滕海清一个人承当,大概不会错的吧。

我们不妨把“挖肃”这一年的大事日程表排列一下,以分清责任,不能煮一锅糊涂粥。

1、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召开第二次革委会,开展“挖肃”运动。这一阶段开挖“内人党”先河,高锦明是始作俑者,承担重要责任。

2、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到二十一日召开内蒙革委会第三次会议,拿出《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提出“内人党”的三个历史阶段,只有第三个阶段“五、一”大会以后加入“内人党”的旗县级以上干部才做为“挖”的对象。在那个极“左”的年月里,有这么一道防线。还算是可以的。同时在这次会上提出学习包钢、二冶、宁城县的斗批改经验,已经有了“挖肃”要转向斗批改的过渡趋势。自治区机关除了进入革命委员会工作之外的几千名干部组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下到农村牧区开荒种田,人们的思想里已没有了“挖肃”念头了。

3、内蒙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于七月二十一日闭幕,仅过一个月,高

锦明发表“9、25”讲话，停止“挖肃”，停挖“内人党”。

4、这年十月国庆节前，周恩来总理通过北京军区郑维山转告滕海清要注意防止“挖肃”扩大化。

5、十一月三日滕海清召开内蒙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批高反右”，挖“内人党”运动掀起新的高潮。

6、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是滕海清深挖以后亲自抓的试点。从十一月十三日开始挖，二百人的政治部，挖了一百八十人，死了十个人，伤残几十人。这是全区的缩影，可足以证明，死伤残主要是在这第三阶段滕海清一个人蛮干时发生的。滕海清他本人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在内蒙革委会常委扩大会上洋洋得意地讲过“如果挖肃斗争按高锦明那样做，那时就刹车，这几十万坏人就抓不出来”。他还在二月二十日召开的挖“内人党”学习班经验交流会上讲“支部书记骨干至少也有上千以上”。“内人党”是支部建在旗上。这支部书记都在“千名以上”，那党徒自然就几十万了。这个严重扩大化的指标，是滕海清一个人定的。

7、十一月二十日，《内蒙古日报》发表“狼为基础”的“挖肃”社论，这是滕办小秘书陈晓庄干的，也只能由滕海清一个人承担责任。

8、十月十八、十一月二十三日，呼和浩特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关于“新内人党”限期登记的一、二号通告。这是军管会主任马伯岩奉命滕办指令干的。是在高锦明“9、25”讲话停止“挖肃”后干的。

9、一九六九年一月初，北京军区警告滕海清，指出“围剿内人党”的口号和“限期登记”的做法是错误的。滕海清漠然视之。

10、“内人党”中央委员名单是滕海清一个人钦定的，《内人党罪证》展览是滕海清准备向党的“九大”献礼邀功的作品，是不能诿过他人的。

对上述铁打的历史证据滕海清是赖不掉的，逃不脱的。

所谓“平反一风吹”、“第二个扩大化”是康生黄永胜制造的诬陷屁话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经历。有的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而在那个问题上又正确；有的在这个阶段有错误，而在另一个阶段又显得正确。吴涛、高锦明、权星垣在内蒙古文化大革命中都有严重错误。但是清算他们的错误，要实事求是，是非要分清，不能说锱全错，更不能把没有的东西也给他们扣上。

高锦明、权星垣是“文化革命”初期的“左”派，中、后期的右派。他们的错误发生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之前，一是在华北局前门饭店会上追随李雪峰对乌兰夫的所谓“民族分裂”无限上纲；二是在“挖肃”初期为保自己转移群众斗争方向开挖“新内人党”。一九六八年十月，高锦明、权星垣被滕海清打成“九月暗流”之后，他俩就从内蒙古政治舞台上摔下来了。高锦明以“右倾机会主义”被打倒了，权星垣的革委会政治部主任职务撤下来挨批判。如果按照高、权意见“挖肃”在那时就停下来，内蒙古的局面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不会造成死伤残的

严重后果。只要不死人不伤人就好办，人要活着宣布平反就没有事了。问题还不止这一点，更大的冤屈接踵而来。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央领导接见滕、吴、高、权、李等人，责令挖“内人党”立即停下来，平反、放人，并批评滕海清擅自停止高、权工作的错误。他们在回返内蒙古的火车上，因五月的热天，喝了几瓶啤酒。对此，滕办的秘书们密谋策划，叫区党委机关的一个叫黄×的“挖肃派”干部向中央诬告吴涛、高锦明、权星垣等“喝庆功酒幸灾乐祸”。内蒙实施军管以后，中央把滕、吴、高、权、李叫到北京，康生、黄永胜借此大做文章，批评高锦明不顾大局，喝庆功酒，把内蒙局势搞乱，内人党一风吹了，敌人都放跑了，不得不实行军管。斥责高锦明制造了“第二个扩大化”，比第一个“扩大化”严重。

“左”是为了，革命，“右”不要革命。从那以后，高锦明、权星垣的政治生命完结了。就在这次接见会上，有一场精彩的对话。康生问呼和浩特革命委员会主任高增贵“呼和浩特平反了多少人？”，高增贵起立回答“三千多人”。康生追问“平反有何根据？”高增贵答“平反的都是内人党，打的时候也没有根据。国民党、特务、叛徒一个也没平反。”把老康生顶了回去。呼和浩特市蒙族干部闻听此对话，无不感愤。感激高增贵敢替蒙古人仗义执言，愤恨康生老贼实在可恶。无根无据的“内人党”为什么不能“一风吹”。

历史是无情的，人民是公正的。谁对谁错，谁做了什么，群众眼睛是雪亮的，铁打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经过三十年的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一风吹”，“吹”的对，就应该吹，华国锋彻底否定“内人党”的存在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大内人党”、“小内人党”都不存在。当年康生、黄永胜鼓噪“内人党一风吹”叫高锦明承担“第二个扩大化”罪责是个大冤案，高锦明承担不了“一风吹”责任，同时也没有“一风吹”，那些“下内人党新蛋”的“老母鸡”还都在“笼子里”，仍在隔离关押，并未放出来，何谈“一风吹”。军管后把他们都转移到黄河南岸伊盟沙漠里去了。我们说高锦明承担不了“内人党平反一风吹”制造“第二个扩大化”搞乱局势的责任，其根据是什么呢。他是在“5、22”后刚刚解放出来工作的人，他没有控制局势的权威。谁都知道，“文化革命”中掌权的主要是军队体系，各级革委会主任都是军人，各级“挖肃战士”都是听命于他们。谁听你地方干部高锦明的话。滕海清及其“挖肃派”对中央“5、22”指示消极抵抗，不执行中央平反、放人指示。所以，受害者自己解放自己，“批滕派”从“挖肃派”手中往外抢人。当时隔离关押在黑房子里的“内人党”每天都在大量死人，所以受害者亲属一天一时也难以等待。受害者说“毛主席解放了我们，再也开、怕你们挖肃战士了”。对这种局面高锦明控制得了吗。一边是“挖肃派”抵制，一边是受害者上访团。这两边人，害人的不服，受害者的更不服，于是就乱起来了。。叫高锦明承担搞乱局势“第二个扩大化”责任岂不是冤案吗。广大受害者憎恨滕海清及其“挖肃派”。而康生、黄永胜、郑维山、尤太忠、王铎都非常爱护和保护“挖肃战士”，爱憎是如此分明。再说吴涛有什么罪，他哪里有过一天实权，他是中央指定辅佐滕海清的，内蒙古这个地方不找那么一个蒙古人帮衬也不行。所以，吴涛的使命就是跟着滕海清亦步亦趋。以那时的共产党员的党性，安排谁去当这个角色也都一样，必须随声附和跟着一把手。在战斗逼供信最严重阶段，吴涛也曾出来讲过按政策办事的话，所谓“第二个扩大化”是康生、黄永胜等人为他们挖“内人党”过错不服输而制造出来的一大冤案。内蒙古广大受害者认为吴涛、高锦明、权

星垣等人是无辜的。不能让他们承担这个“喝庆功酒、一风吹、扩大化、搞乱局势”的责任。“内人党应该一风吹”，何来“第二个扩大化”。搞乱局势的责任应该由制造“挖肃”灾难的滕海清及其帮派承担才是公正的。历史的裁判应该做这样的结论。

第六编对滕海清“挖肃”罪行的声讨

内蒙古党委对于滕海清“挖肃”罪行所做的结论

编者按：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于 1978 年 12 月的传达稿，没有题头，没有落款，口头传达到旗县级党员干部。不叫讨论，不征求意见，不回收反映。传达完之后，不准存留。这是有心之人偷着复印留下的。

一、违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大搞“挖肃”运动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滕海清就极力鼓吹大叛徒江青“一一、一二”黑讲话，煽动“文艺界必须大乱”、“公检法必须大乱”。他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自治区革委会二次全委扩大会上说：“去年十一月江青××讲话下达后，……下决心打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是势在必行，完全必要的”。他颠倒敌我，说：“乌兰夫集团是一个由多种反革命势力组成的反党叛国集团。一股是乌兰夫的老班底，包括奎璧，吉雅太这些坏家伙，还包括潮洛蒙、布赫之流一些‘少壮派’，王逸伦、王铎、刘景平实际上是乌兰夫的老搭档。第二股是以哈丰阿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第三股基本上是蒙绥合并以后形成的，主要成员是一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例如：张如岗、李贵、何跃、郝文广等，这三股势力同流合污，形成了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一大股反革命势力”。他大肆贩卖“黑线专政论”，说“乌兰夫的黑线又粗又长，流毒全区”。“不但文艺、教育、新闻、出版界以及其它党政机关有，公检法也有，内蒙古军区也有”。“文教卫生、公检法、党群机关是重点。特别是文艺界、公检法是重点的重点”。“公检法是公开包庇坏人的合法机关，是一个黑窝子”。“党委、人委很复杂，坏人不少，不这样看不对，但是总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好人”。“内蒙干部三分之一要调换”。他的结论是，“反革命势力遍及全内蒙”，因此，他说，“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彻底摧毁乌兰夫司令部”。

这个“挖肃”运动开始不到半年，就出了武斗、逼、供、仗，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致死一千多人，可是他却说“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果”，“进入了全线总攻击的新阶段，斗争正处在近战、恶战、歼灭战，拼刺刀的时候”，他还说，“这场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一九六八年六月，滕海清听到有人提出内蒙搞的挖肃与中央的提法不一致时，他训斥“这是糊涂人，是替阶级敌人说话，是替乌兰夫

说话”胡说什么：“我们的挖肃斗争，是根据内蒙阶级斗争特点提出来的”，“抓住了内蒙古的主要矛盾”，“是内蒙地区习惯的形象化的提法，是广大群众斗争中创造出来的。这个提法我们已经用了一年，广大群众对它已经有了感情，不要丢掉”，“挖肃与反挖肃的斗争，是关系到内蒙革委会举什么旗，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内蒙向何处去的问题”，“要突出挖肃斗争”，“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

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制造“新内人党”错案、假案。

一九六七年十月，政治骗子乌兰巴干开始不断向滕海清办公室提供所谓“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材料。六八年二月，滕海清同李树德向中央汇报了“内人党”问题。当场中央文革中有人肯定了“内人党”有地下活动。四月二十六日，高锦明签发给中央的电报称：“证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存在的，而且长期与我们为敌，大搞民族分裂主义”。此电报抄给了滕海清。六月份，滕海清召开核心小组会议，李树德、李德臣(滕海清办公室主任)汇报，突破“新内人党”的问题，会上决定准备材料，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进行研究。根据武斗和逼供信拿到的假口供、伪证据，滕海清主观断定内蒙一九六八年七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有一个“新内人党”，并以革委会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重点打击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一般党徒进行登记。会后，全区上下组织力量，办学习班，搞登记站，大挖“新内人党”。

滕海清认定“新内人党”是“乌兰夫的一个暗党”。他说：“很长时间，乌兰夫那套暗班底搞不清楚。群众起来后，把他们挖出来了”。为了迷惑广大干部、群众，他胡说：“内人党的总头目是乌兰夫”。“他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内人党，这个暗班子很大，有的已经混到革委会，掌了实权。‘新内人党’很危险，他比叛徒，特务还危险。……‘内人党’有党委、有支部、有领导小组。上育中央，下有支部。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是搞颠覆活动的反革命组织”。“是最大的特务组织”。“党政军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是全区性的东西，是六一年后，把各地的地方组织恢复起来。进行大发展”。“严重的是他主要的抓干部，不仅蒙族，也发展了汉族”，“共产党的支部就是内人党的支部”。共产党的“边防站就是‘内人党’的情报站”。“必须把这个反革命组织，从组织上摧垮，政治上搞臭，这个决心不可动摇”，

在滕海清的大肆煽动和直接指挥下，从一九六八的十二月二十三日限期登记终止后，武斗和逼供信越发严重，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滕海清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有人当面提出面宽了，他声色俱厉的说：“什么叫面宽？谁知道内人党占百分之几”，“谁能肯定我那个单位有五百个挖出一千个”，“乌盟挖了七万，占三百万(全盟人口总数)比例不算多”。有人提出“新内人党”没有证据时，他说：“它是地下反革命组织，那有多少证据！”“没有证据，不要紧”。“只要有三个人交代一致的就可以作为证据。”他洋洋自得的说：“把‘内人党’挖出来我特别高兴”。

他把对挖“新内人党”的不同意见一概斥之为“右倾”，说成是“立场问题”，和“内人党同病相怜”。他通过大小会议、报纸、广播，鼓吹“左”比“右”好的谬论。胡说什么“‘左’要革命，‘右’不革命”，“左好克服，右最顽固”，“右倾是普遍的，左倾是局部的”等等。他还抓点带面，亲自督战，向下

边要“成绩”，催“战果”。十二月六日，他主持召开了专案工作汇报会议，交流了所谓大挖“新内人党”的经验和骨干分子名单。从此越挖越深，越挖越多，武斗逼供信更为严重，死人事件不断发生，搞得人人自危。

十二月下旬，滕海清授意向中央起草一个汇报提纲。这个提纲把“新内人党”的组织机构、指导思想、地 F 活动等完整系统化了。提纲所附的中央委员名单，原来都注明有“据揭发，据口供”字样，滕海清为了说明“新内人党”的“真实”情况，汇报时，把那些字样都抹掉了，继续欺骗中央，蒙蔽群众。

三、煽动刑讯逼供，怂恿违法乱纪

在挖“新内人党”中，滕海清对严重武斗、逼供信和死人问题，既不追查，又不制止，反而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狠”字为基础的社论，他还胡说“打人是革命群众对敌人的仇恨”，“死几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吓昏了，头脑，…不要背包袱”，“不要手软，不要怕”。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滕海清主持召开的自治区革委会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是大反“右倾”狠挖“新内人党”的会议。会后，严重刑讯逼供的恶劣作法由点到面，逐步扩大，不断升级。滕海清竟然说：“十二中全会以后有些单位搞得凶一点，搞了点武斗，逼供信都有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大惊小怪。”“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一点代价不付是不可能的。有右倾的人，他对敌人没抓出来并不怕，死了几个人就特别痛心。”“死几个坏人就哇哇叫，敌人在那破坏，你看不见，这是立场问题”。“搞一些武斗，出发点是好的，想快出成效”。“打几下不要紧，这是革命义愤嘛！”“对‘内人党’不能手软，必须给一定压力，要有连续作战的作风”。他还贩卖江青的毒汁说：“叫他们多写材料，一次、二次、多次，我们从中找出矛盾，作为突破口”。一九六八年底，在武斗、逼供信的高潮阶段，滕海清支持推广了。内蒙医学院挖“新内人党”车轮战的经验，一九六九年初。推广了军区政治部武斗、逼供信的经验，促使大小单位都举办“内人党”学习班，进行“内人党”登记，武斗、逼、供、信逐步升级，各种残暴的刑法都用上了，造成了一片恐怖气氛。许多干部和群众愤怒地说：“简直是法西斯，集中营”。

四、紧跟林彪、“四人帮”，封锁、抵制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

滕海清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和批评教育，当面拥护，背后捣鬼，不是封锁抵制，就是加以篡改。一九六八年二月。他向中央汇报说，内蒙干部有历史问题，年岁大，要求中央派一批干部去内蒙时，周总理就讲，调的太多了，内蒙干部不错嘛，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向外蒙跑。滕海清回来又未传达。五月间陈先瑞同志传达了总理关于“内蒙打人现象严重，要注意”的指示，他满不在乎，说“没记上，忘掉了”，没传达。国庆节前，总理根据锡盟一名下乡知识青年反映的情况，告诉北京军区转告滕海清“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扩大化”，他不作传达。六九年二月四日周总理当着滕海清的面指示说：“你们那儿我们怕步子太快了。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学习政策，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吸取江西苏区打 AB 团，鄂豫皖打改组派的教训。”滕海清根本不听，并在背后讲“快点有什么不好”，继续蛮干。他还在二月十六日用自治区革委会名义发了《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若干规定》的文件。不久还召开了军区机关挖“新内人党”经验交流会。会后，军区司令部又把五十多名干部送进了“内人党”学习班。在党的“九大”期间，滕海清听了毛主席关于“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的指示以

后，内心不满，说什么“抓阶级斗争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和不抓阶级斗争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对“四人帮”的一套却是言听计从，只字不漏地传达贯彻，什么江青说“内蒙动起来了，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张春桥说“内蒙形势很好，清队成绩很大”，姚文元说“内蒙清队搞得比较早，也有不少经验”等等，并沾沾自喜地说他们“对内蒙很满意，对我们评价很高，我们不要翘尾巴”。由此可见，滕海清根本不听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而是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滕海清是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新内人党”错案、假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有罪于内蒙人民的。

滕海清对其“挖肃”罪行的三次检查

编者按：滕海清对他挖内人党的错误检查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中央指示挖“内人党”停下来之后，在受害者控诉的怒潮中，做了个很不情愿的检查；第二次是在唐山学习班在他部下二十四军政委朱松令主持下做了个“过关”检查，然后学习班给他做“结论”，对其光荣革命历史摆功称颂之后说“……在内蒙工作期间，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犯了扩大化错误，对党对人民对民族团结造成了严重损失，今后希望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对所犯错误认真改正，保持晚节。”在这个结论中一句未提“内人党”三个字。学习班结束，滕海清就回北京军区官复原职主持工作了。粉碎“四人帮”后，一九八〇年内蒙古党委在广大受害者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惩办滕海清的声浪中准备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这时已经转任济南军区常务副司令员的滕海清，见到内蒙古党委对他所做“挖肃”罪行的结论之后，感触到个人名利将要受损，他伤感落泪了，然后急匆匆向中央写了“检查”，把责任都推给他人，给自己留个空头责任。他对自己要害避而不谈，他向康生、江青咋汇报的，更是讳莫如深，不敢沾边，他那个“滕办”都干了什么，一点也不讲。其实他这个检查不是个检查，而是开脱自己罪行的辩解。说他挖“内人党”是对高锦明、郭以青这些人“轻信”、“盲从”当了傀儡。全篇“检查”都是“据说”、“听说”、“他们干的”、“集体决定”的，最后来个“不了解情况”。对他“情况不明决心大”，却没有一点痛心诚恳的检讨，对死伤残那么多的人没有一点沉痛的表示，诚然，开挖内人党先河是高锦明干的。可是挖一段之后高锦明不干了，而他滕海清却把人家打下去，继续深挖蛮干下去，他滕海清又有何说呢！你是听了谁的话呢？不管谁的动机如何，唯物主义者主要看事实看后果打“内人党”死伤的大数、整数都是在这后一阶段，滕海清一人蛮干时发生的。以内蒙古军区政治部为例，死的十个人都是在滕海清反掉高锦明“右倾”以后，从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后到他准备向“九大”献礼的四月二十二日这一段发生的。全区“内人党”死一万六千多人，至少有一万四千人是在这深挖阶段死去的。滕海清他能逃脱罪责吗？

下边是滕海清的三次检查，一次不如一次。前两次检查，为了

过关，还接触了点思想实际，最后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时，没有叫他检查，他却以“检查”的方式把错误和罪行都推到四面八方去了。

滕海清在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的
(第一次)检查(摘要)

1969年6月23日

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检查我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从1967年4月18日来内蒙古，已经两年多了，工作没有做好，错误犯的很严重，特别是1968年11月第四次内蒙革委会全体会议后，在挖“新内入党”进程中，犯了严重逼供信扩大化错误，伤害了很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我以沉痛的心情向内蒙古各族人民低头认罪。我对内蒙古的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夸大了乌兰夫在内蒙古的影响。我是把几股敌人合起来做为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势力。一是伪满留下来的一股，伪蒙疆留下来的一股，傅作义留下来的一股，乌兰夫反党叛国一股。认为这几股敌人的力量很大。从“挖肃”开始，一直是反对右倾，反到今年三月间，越反，“左”倾越升长，“左”倾思想就一步一步升高加码。上面轰轰烈烈，下面搞逼供信扩大化，很凄惨。我的“左”倾错发展到第四次全委会，已经到恶性阶段，可是我又错误地批判高锦明的“右”倾。这样“左”倾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挖“内入党”是按照我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指导下搞起来的，只看到口供材料就信以为真。出现武斗打人现象时，我说这些同志革命热情是很高的，应当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当时想通过办学习班解决群众中的“内入党”问题，结果严重的逼供信，残酷的各种惨无人道的刑法都在我们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产生了。刑法之多是罕见的，有的被打死打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向这些受打击迫害的同志请罪，向这些政治上受打击，精神上受摧残，身体遭到损害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表示慰问，而且向他们请罪。有些单位，少数民族干部百分之百打成“内入党”，还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你们蒙古人的领袖，蒙族领袖是乌兰夫。这是污蔑广大蒙古族革命群众。那样多的群众打死打伤，家破人亡，没有一个跑到外蒙古去的，不都是朝北京跑吗！说明内蒙古人民是热爱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中央对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防止扩大化有好几次指示，一个在六八年二月四日晚上，中央指示开始的时候，面不要搞宽了；第二次是六八年十月，呼盟挖“统一党”报到中央，江清、姚文元同志批示防止扩大化；还有一次，总理电话给陈先瑞同志，说有个青年学生反映你们那里搞挖肃斗争有扩大化；第四次，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在我汇报时中央领导讲，你们内蒙清坪阶级队伍步子太快了，同时讲你要接受鄂豫皖打改组派和江西苏区打AB团的教训。以上这些批评指示我都没有传达，“左”倾思想一直发展下去，以致犯了这样严重扩大化错误。大家对“滕办”意见很大，这也是我的一个严重错误。“滕办”驾于革命委员会之上，驾于军区党委之上。还有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很多错误文章。我的那些信口开河讲话，“左”倾思想言论，也做为干部学习材料，都是严重错误。我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独断专行，不受群众监督。我这是军伐主义作风，我在内蒙古工作这一段所犯错误这么严重，我要向毛主席请罪，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请罪。

滕海清在唐山学习班的(第二次)检查(要点)

1970 年 12 月 16 日

按：滕海清承认他的“挖肃”运动，以乌兰夫划线，以蒙族划线。

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夸大了，敌情，把大批群众打成反革命。揪出特古斯，把文艺界当成黑窝子，揪出王再天，把公检法当成黑窝子。把党委机关当成“内人党”中央机关，把内蒙干部看得坏的多，认为民族干部都是跟乌兰夫大搞反党叛国的，把执行乌兰夫路线的干部都当成反革命势力，以乌兰夫划线，以蒙族划线，破坏了民族政策。我把乌兰夫势力看过了头，在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提出了“挖肃”口号，听信了用逼供信搞出来的老内人党骨干的口供，以为内人党很大，人很多，用挖肃改代替了毛主席的斗批改，以挖内人党代替了清理阶级队伍。我把高锦明反“左”的正确意见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区批判，并造谣说康老点过头，迷惑了思想不通的常委。68 年 7 月三次全委会时已经出现扩大化，高锦明提出防“左”，我联想到挖肃初期高不太积极，认为他的“925”讲话是攻击我的，于是在四次全委会上擅自决定批高。1969 年 5 月 10 日，我向中央发电报说“高锦明同志 4 月 17 日恢复工作，70 日开始乱”，把乱的责任归咎于高锦明。我对中央恢复高锦明工作思想上没有接受。68 年 12 月，军区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军区有人整吴涛同志材料，我是批评了，没有追查。不久我在 69 年 2 月 4 日向中央汇报时，反映了吴涛有右倾，说他与乌兰夫关系不清，处理鲍荫札布问题上右倾，怀疑了吴涛同志。毛主席批发“5. 22”指示，我没有坚决贯彻，亲一派疏一派，我对错误认识很差，搞了平反一风吹，让厚和当了典型。

一九八〇年滕海清向中央作的(第三次)检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并中央组织部、总政：

一、内蒙古挖“新内人党”是根据一九六八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搞起来的。一九六八年一月召开内蒙革委会第二次全委扩大会，展开了清理阶段队伍(在内蒙叫“挖肃”运动)。同年四月十三日向全区发出了《向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及其残党余孽发动总攻击》的通告，从此内蒙形成了一个阶级斗争、派性斗争混淆在一起的混乱动荡局面。(按：元旦社论精神是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而滕海清却号召“小人物”起来造“假洋鬼子”反，掀起“挖肃”运动，破坏了大联合，三结合，造成新的混乱和动荡局面。)

实际上这个清队运动是文艺界根据叛徒江青的一九六七年“11. 12”讲话在首都先开始的。而后逐渐波及到整个文教口和公检法。并先后揪出了特古斯、王再天。当时据高锦明的分析，乌兰夫三股势力中，王再天的势力在公检法，哈、特势力以文教口为多这两界过去未被破获的反动党团、叛国案件被提出来了。从此，这个挖“新内人党”问题作为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一个问题，由暗到明，由隐到显逐步展开，直到铸成这个错案。(按：中央部署的是清理阶级队伍，而滕海清他按江青的“黑线专政”讲话搞“挖黑线肃流毒”，听江青的，不听中央的，另搞一套。)

二、“新内人党”问题早在文革前就审查过。它不是个新问题，是个老问题，这一点了解内蒙古历史的人都知道。(按：“文革”前内人党的底子都很清楚，是别有用心的搅浑水，无中生有，制造假案。)

据反映, 内蒙古地区历史上曾两次组织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是一九二五年, 时间不长就解体了; 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 哈丰阿、博彦满都等人打着“高度自治、内外蒙合并”的旗号重新组织起来的,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 被我党中央正式命令取消。据说取消后仍有些活动。我到内蒙后还听说过几件事: 一是李树德说内蒙档案馆查出胡昭衡等三人向西满分局报告, 哈丰阿在一九四七年有组织内入党打共产党活动。(按: 中央当时有四次电示, 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说, 组织内入党, 我们应以赞助; 四月二十日说, 不组织内入党而保留自治联合会, 此意甚好; 四月二十三日说, 这些主张恢复, 则不如采取积极态度以我党为中心来建人民革命党; 四月二十六日, 同意组织人民革命党。)还有一件是一九四七年高万宝扎布入党前曾请示过哈丰阿, 哈批示说: “高万宝扎布加入共产党是毫无异意的, 但入党之后, 必须永远保持我党(内入党)的立场”。(按: 高万宝扎布是一九四六年六月入党, 介绍人是老革命干部郭峰和黎晓初。此种说法, 子虚乌有。)二是“206 号案件”(编者略)。三是一九六八年~月二十四日, 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会上, 高锦明说奎璧告诉他“四十三人委员会就是新内入党”。另据张鲁说“高锦明讲, 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 奎璧在火车上给我讲四十三人委员会就是新内入党。是不是这个情况, 我不清楚。四是一九六四年文艺界整风时。发现过“蒙古民族统一党”, 说这是内入党的变种。

以上几件事在文革前都查过, 文化革命初期, 一些群众组织和高锦明等人都把它当作“新内入党”存在的根据提出来的。当时我不了解情况, 对这些意见轻信、盲从, 是我在内蒙犯错误的重要原因。

三、“新内入党”是高锦明等人首先搞起来的。据揭发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内蒙革委会成立前, “揪叛联络站”的头头乌兰巴干向高锦明汇报了哈特势力与内入党的问题, 高锦明让郭以青支持他。接着, 高锦明、郭以青插手鲍荫扎布和巴图专案, 用诱供和刑讯逼供的办法迫使他们交待了所谓“新内入党”的中央组织和参与“206”案件, 四月, 高锦明组织会议, 听取郭以青、汇报两个专案情况, 明确提出“新内入党”是乌兰夫的暗班子。他说“清队以来搞了乌兰夫的明班子, 这次又搞出了他的暗班子, 是个重大发现。一大收获”, 同时决定从鲍荫扎布、巴图供出的名单中确定十六人, 实行军管和隔离审查, 选择六人为突破口进行突审。四月二十四(应为四月二十六—编者)日由高锦明签发了报中央突破新内入党的电报。(按: 滕海清想把开挖内入党的责任推给高锦明。可是早在五十天前的二月四日, 他带上李树德向康生、江青汇报准备挖内入党。康生指示“内入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 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滕海清能推掉干系吗?)

上述情况是我在犯错误后知道的。他们开始搞的时候我在北京参加会议。内蒙给中央的电报是由中央转给我看的。正因为我不了解“新内入党”情况, 所以也没有引起重视, 这是我在内蒙挖新内入党犯错误的起点。

四、在内蒙普遍展开挖“新内入党”是集体决定的, 我要负主要责任。

五、挖“新内入党”军队首先严重恶化。

六、我和吴涛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后, 召开内蒙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 大搞批高反右, 使新内党这个错案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恶果。这个问题我要负主要人责任。

滕海清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六日

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廷懋致信黄克诚追究滕海清法律责任

——他迫害少数民族，实际上把蒙古人都当成敌人了

黄老(黄克诚):

我主张对滕海清追究法律责任。

周惠同志由北京回来，说你似乎不主张这样办；还讲到当年抓 AB 团”的事。我听后，没有想通，因此给你写这封信。

(一)内蒙在“文革”中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挖“新内人党”，死两万多人，伤残十七万，被株连的上百万人。第一案，没有滕海清的事。第二案，挖“新内人党”，他起了主要作用。诚然，这是在“文革”中发生的事，不能讲杀人偿命了。但死伤这么多人，按过失犯罪论，他也不应逍遥法外。

现在，滕海清上推江青、康生，下推高锦明、吴涛。江、康、高、是各有罪责，而毕竟滕海清当时是内蒙的一把手。谁下命令要他非挖“新内人党”不行呢？谁要他非挖几十万人不行呢？高锦明是“新内人党”的发明人之一，挖到半道，高不干了，滕还坚持挖。吴涛跟着挖，滕海清还怀疑他。无论如何，不能说挖“新内人党”一案滕海清只是个执行者。

(二)挖“新内人党”，不是两派斗争，不是失去控制”的混战，是滕司令员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有组织、有领导进行的。当然，在挖“新内人党”期间发生的那些惨绝人寰的事，他不可能都知道。但是，当时刑讯逼供，路人皆知，滕怎么会不知道呢？不，他是搞逼供信的专家、大师；他全心全意地搞逼供信，别的话他听不进去。

滕海清说，他当时不了解内蒙古的情况。情况不明，为什么决心那样大？草菅人命到如此程度，怎么可以不追究责任？

造成大错之后，毛主席有“五·二二”批示，滕海清也调回北京军区。据我所知，他除在被迫的情况下，不得不认错之外，他没有为内蒙人民(包括军队)说过什么公道话，办过什么好事。今年，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塔拉(当年的受害者)在上海遇见滕海清。滕也没说一句有自我批评意味的话，毫无悔过表现。

(三)滕海清挖“新内人党”不是个人恩怨问题；我主张法办他也不是个人恩怨问题。他迫害少数民族，实际上把蒙古人都当成敌人了。内蒙古只有二百万蒙古人，他挖了几十万还不停手，普通的工、农、牧民，几乎家家有“反革命”；还挖许多长期在内蒙工作的汉族干部、职工。这在我党历史上是空前的，创纪录的。如果这样的人不法办，怎么能平息民愤？怎么能安定团结？我们怎么能说服人民群众？连那些执行他的命令而犯错误的人也不会服的。

眼前的安定团结，还不是我想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各族人民群众，特别是现在的青少年，怎么理解和相信我党的民族政策？怎么能相信我们党？滕海清办

的事，不是一般的草菅人命，是草菅民族团结之命！

我讲个故事，前几年我送孩子去牧区，中途到一个沾亲带故的老大娘家，她有个十来岁的孙女看见我们一下车就发抖；为什么？因为我们穿着军装坐着吉普，她父母当年就是被这样的车这样的人抓走的。这类事，何止一家，外人去他们是不讲的。下一代，和我这样的蒙古人不同；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人也不同；他们刚懂事就遇上了挖“新内人党”。他们不认识滕海清，然而滕海清的大名妇孺皆知，甚至有人称他为“滕格里阿爸”，意为天老爷，意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可不可以抗拒呢？可不可以处理一两个罪魁祸首呢？挖“新内人党”对内蒙各族人民是空前的灾害，可不可以绝后呢！就是小许以后再发生这种事呢？这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特别是蒙古族和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千家万户难忘的问题。

黄老！恕我直率，这和抓“AB团”的历史条件和今后影响均不相同！

此信是否可转呈中央书记处，请黄老酌定。

此致

敬礼

廷懋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

按：廷懋同志这件信，言简意赅，几句话概括了滕海清的“挖肃”所造成的人道主义民族灾难。他干的这个“挖肃”不是“一般的草菅人命”，而是“草菅民族团结之命！”，其后果是少数民族千家万户难忘的问题”。廷懋同志这封信是针对滕海清向中央所写的“检查”而发的。

滕海清将军没有记取江西苏区打“AB团”的教训

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滕海清时周恩来警告他要接受江西苏区打“AB团”和鄂豫皖打“改组派”的教训。

“AB团”是什么？是英语“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是一个反共秘密组织。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国民党右派在南昌成立。“AB团”在南昌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引起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愤慨，决定对“AB团”采取行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朱德所属军官教导团捣毁了江西国民党省党部，抓住了“AB团”骨干三十多人，“AB团”做为一个组织早已不复存在。可是零散的团员散布到各地还有些活动，这时红军总前委派出的巡视员张怀万来赣西南巡查，认为“AB团”已混入赣西南我党各级组织和红军内部，他们在给总前委和中央的报告中夸大了“AB团”活动的严重性。赣西南特委把破获“AB团”活动案件做为一种政治上

巩固根据地成绩,想造成一种声势以扩大自己的政绩,便以此为契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肃“AB团”运动。他们发布《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提出改组派“AB团”是“红旗下的奸细”,必须对他们实行“红色恐怖”。红一方面军解放吉安城,发现了三年前原“AB团”储存在机关的“AB团”的旗帜、印章。由此总前委断定苏区里有大批潜伏的“AB团”。赣西南特委把形势估计的更为严重,从一个工作消极,表现不好的叫朱家浩的干部下手,怀疑他是“AB团”,实施逼供信,逼出了“AB团”活动的大量口供。于是将这些所谓证据向总前委作了报告,总前委不做调查就又向中央作报告。于是就开始了长达一年的肃“AB团”运动。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凡怀疑就抓,抓了就逼,逼出来就信,然后再抓,再逼再供,再信再抓,造成滚雪球式的滥抓滥杀,短短几个月中就肃了四千四百人。由于怀疑发狂结果逼出了红二十军攻打省苏维埃和江西特委的痛心的“富田事变”。红二十军排以上一直到军长七百名干部全部枪决。然后全面整肃,从而三千多人的红二十军被自己消灭了。

“左”的灾祸连续不断,接着是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王明的再“左”倾路线,不间断地开展肃反运动。打过“AB团”之后又打“社会民主党”,全苏区党政军机关和一切团体全部投入运动,不调查研究,不立案审查,以捕人最多处决最快为最坚决。在这种滥加杀戮的恐怖下出现了,各种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组织”,如年青姑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抓去定为“姐妹姑娘团”杀之。男女之间说了些什么就定为“反动恋爱团”杀之。在一起议论吃喝就定为“膳食委员会”杀之。在一起吸烟对火就认为是接头暗号的反动组织,杀之。有的红军组织,连以上干部半数被处决,有的刚任两天连长也被枪决。

中央苏区打“AB团”和闽西苏区“肃社会民主党”造成的损失,周恩来去了之后才得以制止,总结了沉痛的教训,从而结束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肃社党”运动。但是在当时正处于王明“左”倾路线时期,虽然认识到“肃社党”是个严重错误,却都强调一点,即肃反是必要的,只是方法上的错误,谁都没有认识到应该从根本上加以推翻,错杀和受到伤害的人一直没有平反,直到一九八五年福建省委做了结论,认为闽西苏区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应予彻底平反。错杀的予以昭雪,政治上恢复名誉。平反昭雪人数为6,352人,其中6,000多人被错杀。

一九三一年底闽西肃“社会民主党”运动刚停下来,王明又把夏曦派到湘鄂西根据地打“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开头是将一名被俘的国民党连长叫张锡侯的人抓起来严刑拷打,逼他承认是打进苏区来破坏红军的,张在受尽皮肉之苦后,挺刑不过,胡乱承认,并将在红军中认识的同乡、同学咬出来,编造供词说准备在苏区举行暴动。从这儿就开始滚雪球,很快在湘鄂西根据地蔓延开来。敌人从外面包围,夏曦从内部开刀,在严刑拷打逼供、诱供之下,这些人按照他们的指供交代自己熟悉的人,于是再按屈打成招供出的名单抓捕一批人。如此连锁抓人、打人拉名单,反复拉网,进行了四次肃反,基本上把湘鄂西根据地肃垮,贺龙后来沉痛地回忆这场惨痛教训说“解散党、团组织和第三、四次肃反后,红三军中党员只剩下夏曦、关向应、卢冬生和我四个人。根据地垮了,党也解散了,干部杀了一批又一批,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干部损失最大”。红三军由一万人锐减到三千人。

中国古代酷吏周兴、来俊臣的逼供信与滕海清的逼供信何其相似乃尔

滕海清等人仅从“内蒙古人民都要反党叛国”的猜疑心理出发，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主观臆断，盲目蛮干，用棍棒逼供信，凭空打出了几十万“反党叛国的内人党”。一九六九年“五、二二”后，愤怒的受害者群众在控诉残酷的逼供信时说“如果把滕海清交给我，不过一夜我就能叫他也承认是内人党！”这是令人寻味的。

在古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曾讲述了唐代酷吏周兴、来俊臣用逼供信罗织冤案残害无辜的历史教训。说的是则天女皇当政以后，忧虑李唐朝臣谋逆。时有叫索元礼的人，领悟太后心意，因告密被召见，提任游击将军，令其查办被告密监禁的“谋逆”人犯。索元礼生性残忍，每审讯一个人犯，必叫他牵连数十人乃至上百人，备受则天赏识，权威日盛。于是长安人周兴、万年人来俊臣之流争相仿效。周兴连续升官至秋官侍郎，来俊臣连续升官至御史中丞。他们私下豢养无赖数百人，专门从事暗算告密，想要诬陷哪个人，便叫他们几处同时告发，所告内容相同，受害者有口难辩。他们撰写数千言《罗织经》，传授他们的门徒如何搜罗无辜人的言行，编成谋反罪状，捏造排布得都像真有其事。他们还争相制定审讯无辜者的残酷刑法，制做各种刑具，如“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刑法。他们拿人犯随意开心取乐，或用椽子串连人的手脚旋转，口q做凤凰斥翅；或用绳子拴住人的腰部，再将其颈上的枷向前拉动，叫做“驴驹拔橛”；或叫人捧枷跑步，枷上垒砖，叫做“仙人献果”；或叫人立在高木桩上，将其颈上的枷向后拉，叫做“玉女登梯”；或将人倒吊挂石块；或用醋灌鼻孔；或用铁圈儿锢脑壳，再加楔子。每抓人犯，先叫他们观看陈列的刑具，令其恐惧颤抖，魂飞魄散，无罪也认有罪，叫招什么罪就供认什么罪。《请君入瓮》的典故就发生在周兴、来俊臣之间。有人告发周兴则是奸佞贼臣，则天皇帝令来俊臣审讯，于是酷吏对酷吏办案。来俊臣请来周兴，一起进餐，来请教周说“有个重要囚犯硬是不认罪，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叫他招供呢？”，周兴不假思索地脱口说出“那不容易！取一个大瓮，用火烧热，叫人犯进入瓮中，不怕他不招供”。于是来俊臣令下人抬来大瓮，按周兴所说四面加火，而后站起身来恭请周兴“入瓮”。周兴立时叩头认罪。

周兴、索元礼残害忠良数千人，则天女皇为抚慰人们的怨恨情绪，给以应得的惩处，杀了索元礼。周兴流放岭南，途中被受害仇人所杀。

除掉周兴、索元礼之后，来俊臣益发忘形，为了窃取更高权利，罗织罪名诬陷武氏诸王以及太平公主、李氏诸王一同谋反。逼使原先对立的两派两个家族联手揭发举报“来俊臣凶残暴虐，诬陷忠良，贪赃受贿，财物堆积如山，被他冤死的鬼魂满道路”。酷吏来俊臣恶贯满盈，武则天准奏处死并暴尸街头。世人拍手称快，挖其眼剥其皮、刨其腹，争吃其肉，片刻吃光。

内蒙古运动办公室关于落实政策工作情况报告

一九八一年五月五日

一、当前对落实政策工作，群众意见最大要求最强烈的是对滕海清、高锦明、权星垣、吴涛等人的处理。特别是对滕海清、高锦明、郭以青的处理，强烈要求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对军队的问题，在“挖肃”期间，各盟市的第一把手几乎都是军人，他们都是迫害各族人民群众的主要指挥者及决策人。对他们群众意见很大，各盟市都打来报告，要求追究其责任。但至今没有处理一个，甚至对有的继续提拔重用。犯错误(实际上是犯罪)严重，群众意见大，强烈要求追究责任的有以下几个人：哲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锡盟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呼盟军分区司令员尚民、乌盟军分区周发言、骑兵五师的武尚志、昭盟军分区的王锡荣、滕办主任李德臣、秘书陈晓庄。

二、在十年浩劫中，在内蒙提拔、重用的是那些挖肃积极分子。直到一九七六年末纪登奎等人公开指示内蒙的尤太忠等人，要保护“挖肃积极分子”。粉碎“四人帮”后，虽整顿了些领导班子，“挖肃积极分子”在台上继续掌握着部门领导权的还大有人在，他们是落实政策工作的主要阻力。

(下略)

按：运动办这个情况报告中，重点提到“挖肃”运动中起了主要作用的是军人。在这个名单中漏掉两住重点人物，一位是呼和浩特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马伯岩，另一位是滕海清深挖“内人党”时期的内蒙革委会政治部主任刘树春。马伯岩是“滕办”实施“挖肃”工程的操作工具，勒令“内人党”徒自首，像反动会道门那样去鬼门关进行登记，都是由他来干的。乌兰巴干、孙玲玲等牛鬼蛇神，都在他那里窝藏作祟。刘树春是取代权星垣，组织“挖肃”力量，调整人马，使得革委会机关职能成了“挖肃”工具。他在唐山学习班为证实康生、黄永胜制造的所谓“第：个扩大化”写了一张大字报。他说内蒙革委会机关中开始军人很少。1968年11月，滕海清从北京军区要来200名营团以上军人。这些人积极投入“挖肃”工作。“5.22”后，1969年11月，“都被赶走了”、“逼走了”。刘树春这是讹人的话，谁“赶了”，谁“逼了”。因为他们已先知内蒙要军管了，自动溜走了。没有过一个月就军管了。不过刘树春在这里透露了滕海清私自调来一批人马的准确数字。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落实政策工作的情况汇报

我区落实政策工作始于一九七八年五月，至今已十一年零六个多月，到目前为止，基本完成了平反落实政策的各项任务。从而恢复了党的信誉和威望，增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巩固和发展了全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我区各项建

设事业的发展，并在港澳台和海外也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为阴谋篡党夺权，丧心病狂地在我区制造“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新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及其它四千八百多个名目繁多的所谓别动组织而造成冤、假、错案，使全区几十万人遭受迫害。“内人党”冤案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内蒙古的追随者为把乌兰夫同志打成反党叛国集团的总头目，采取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的手段，从自治区一直挖到农村社队和牧区的蒙古包，用尽骇人听闻的极其野蛮、残酷的各种各样的刑法，大搞逼、供、信，造成我区历史上特大的冤案，其恶果尤为严重。共打成四十八万多人为“新内人党”分子，极其严重的破坏了各民族的团结，在汉族同蒙古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之间造成严重的隔阂，社会秩序混乱，各项建设事业尤其是畜牧业遭到极大的破坏。

自治区党委按照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向党中央写《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入党”的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及时得到党中央的批准。自治区党委接到中央的批示后，立即向全区各级党组织进行传达，组织干部、群众学习，统一思想认识，并全面着手解决挖“新内入党”的问题。

首先组织领导班子，从自治区党委到各盟市、旗县委，都由一名主要领导同志分管此项落实政策工作，全区旗县以上普遍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共抽调了四千五百余名干部狠抓落实政策工作。及时提出了有关解决此问题的具体政策、措施、意见，对于做好这项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认真传达了中央的批示，利用各种会议形式，为“新内入党”问题受害者彻底平反，并把政治平反决定，发给本人和其亲友及所在单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二）在大搞逼、供、信中形成的有关材料进行了清理：对存档的材料，均已注销；本人所谓交待材料，退还本人处理；对所谓的检举揭发材料，已当众销毁。

（三）对在挖“新内入党”冤案中致死的，做了因公死亡的结论，按因公死亡对待；属于国家干部、职工的其遗属享受国家规定的因公死亡者遗属待遇；对于“三民”（农民、牧民、城市居民）的遗属，采取定期定量生活补助办法解决其生活困难。

（四）对严重致残的干部、职工和“三民”进行了评残发证工作。对完全丧失工作和劳动能力的，评为完全伤残的一万二千零三十三人，其中干部、职工为四千一百一十人，“三民”为七千九百二十三人；对基本丧失工作和劳动能力的评为基本伤残的八万零一百二十九人，其中：干部、职工为四万四千七百五十九人；“三民”为三万五千三百七十人。对干部、职工致残者，按照国家的因公负伤待遇，在看病和休养期间工资照发；在住院期间享受公出待遇的住勤补助；退休时，评为全残的，在正常退休的标准工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十，评为基残的增加百分之五，但不得超过原工资。保证了伤残人员的正常生活和医疗问题。对“三民”中受害致死者的遗属、完全伤残者供养人口及基本伤残者本人给予定期定量生活补助，全区共评出八万六千四百零二人，牧民、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为一十九元，农民每人每月为一十三元。给评为“三民”全残和基残的本人，每人每年发给医疗费三十三元。从一九七九年三月到现在每年支付“三民”定期定量补助费和医疗费为一千九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九十七元。

(五)对被错误开除公职的国家和集体企业的干部、职工,(全区有四千四百零四人)在政治上彻底平反的同时,均给予复工复职,连续计算工龄;对他们被扣发减发的工资,如数补发;在生活上造成严重困难的,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对于能够工作的安排适当的工作,对于年老多病的按国家离休、退休的规定,由受害者原单位负责安置。

(六)对受害致死者或严重致残者(指评残发证的)干部、职工,在国家和集体在招工或补充自然减员中,按照招工条件,优先安排一名子女就业;对农、牧民中致死或严重致残的,在社队企业招工,优先安排一名子女就业。全区共安排就业六万一千二百九十四名。这样做,既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又减轻受害致死或致残者经济负担和家生活实际困难。

(七)对受害的干部、职工、“三民”被抄抄的财物,积极地进行了退赔。具体清退原则和方法是:对有证有据的,原物在的追回原物退还原主,原物丢失或损坏的折价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给予补偿;对有证无据的,同本人协商,给予酌情补偿;对无证无据的,又无线索可查的,向本人说明情况,不作清退;对金、银及其制品,已上交国库的,不再清退原物,一律按退还时国家牌价折合人民币发给价款。清退查抄财物,均由被抄抄人的原单位负责调查落实,让占有者退赔,即:个人拿的,由个人退;集体占用的,由集体单位负责退赔;上交国库的,由原接收单位负责归还。根据上述清退的原则与方法处理后,不足部分由国家给予适当补助,全区已用经费一亿零五百多万元。对“新内人党”冤案中被迫内迁和“掺砂子”面扫地出门的农、牧民的财产退赔,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承包时,用牲畜、财物作过部分抵销。

(八)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加强对受害者的政治思想教育,做好来信来访工作。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成立以来,接待和处理了大量的来信来访和一大批“老大难”的疑难案件。仅自治区接待的来访人员就有六万七千多人次,处理的来信信件有五万九千余件。有些复杂的地区性案件或中央、自治区党委批办案件,均采取派人下去或请上来的办法,进行认真调查研究,予以妥善处理仅自治区党委落办直接插手处理的近七百余件。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区的平反冤、错、假案,落实政策工作是取得很大成绩的;各级党委及落实政策工作机构是做 j. 大量艰巨工作的。尤其是广大受害者都很通情达理,密切配合,绝大部分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落实政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但是,按照中央的要求来衡量差距不小。遗留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退赔和安排子女就业。被抄抄财物的还有一万七千一百零三人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需经费二千三百八十九万多元;被没收和挤占的房屋,还有三百零八户(人)尚未解决,需经费一百万元;被扣发减发工资的有二千二百零三人,大部分是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需经费二百六十二万七千多元;对生活确实造成严重困难的,给予一次性补助,需经费二千五百八十四万一千九百五十九元;以上四项共需经费五千三百三十五万八千九百五十九元。对“文革”中致死和严重致残的干部、职工安排一名子女就业,尚需劳动指标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名。

以上是我区落实政策的基本情况和做法及存在问题。为更好地落实党的政策,我们要继续努力,处理好遗留问题,既要注意政策的连续性,又要做到善始善终。鉴于我区的财政困难,望中央给予支持。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落实政策办公室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内蒙古有没有出卖领土的卖国贼

内蒙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出现了耸人听闻的传言，说是乌兰夫黑帮要从伟大祖国分裂出去与蒙修合并建立大蒙古帝国。为此目的，乌兰夫印发《三五宣言》，向邻省争地盘，寸土必争。同时又向蒙修划出大片领土。这些蛊惑人心的传说，还真的把很多怀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人煽动起来了。他们认为“蒙古人真要反党叛国了”。这个风起初是从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刮出来的，很快传到呼和浩特。于是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队伍发生政治分野，一些机会主义政治投机分子出现了。首先是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王逸伦自封“左派”，说他受乌兰夫打击排挤，在第一线指挥打黑帮黑线。他的帮派，自治区政府代秘书长鲁志浩。由于自己历史有自首变节问题，怕打叛徒心底空虚。为了引导本单位群众斗争方向，转移目标，拉上他的帮派弟兄闫兆麟等人，写出一丈高的大字报挂到政府机关太轴，上写“嘎如布僧格向蒙修出卖了大片领土”。这张大字报如同一颗巨型炸弹，震动了自治区机关，一下子把广大群众的斗争锋芒引过来，同仇敌忾声讨“出卖领土的卖国贼”嘎如布僧格及“反党叛国”的乌兰夫黑帮。随后不久，民族叛徒乌兰巴干到处叫喊“乌兰夫、嘎如布僧格出卖领土，将贝尔湖拱手送给蒙修了！”在这种疯狂形势下，谁跟着骂“卖国贼”谁就是爱国的“左”派，蒙古人跟着喊也可当“左”派。嘎如布僧格时任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出身”、“成分”不好。他在伪满洲国上学时学习成绩优秀，受到过皇帝溥仪的金壳怀表奖历，到日本留学时受到日卒天皇裕仁的军刀奖历。所以他是“伪满成分”、“挎洋刀出身”，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运动的对相。因为他兼任外事办公室主任，1963年参加中蒙划界埋桩工作，他的“卖国”问题由此引发获罪。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乌兰夫、嘎如布僧格反党叛国“出卖领土”，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了，而是成了蒙古人都要叛国投修的重大问题。于是有那么几个对政治抱有严肃认真态度的人士去北京找外交部查证核实。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姬鹏飞回答了“卖不卖国”的问题。他是当时负责中蒙划界的领导人。他说中蒙划界协订是两国总理签订的，由外交部实施的。乌兰夫、嘎如布僧格做为地方官是出卖不了领土的。内外蒙古自古以来因为同一民族没有疆界，只有大概的边界走向。误差争议往往发生几十上百公里的出入。划界埋桩是有争有让。对于地下埋藏资源，中国方面已经勘探清楚。蒙修方面未经勘察，底子不清。中方争的是有宝的地方，而让的是没有资源的地块。蒙古是个内陆国家，又缺少湖泊。北海贝加尔湖在十八世纪被沙俄夺去。蒙方要求把贝尔湖划给他们。中方考虑附近有呼伦湖，因而将贝尔湖切出一大块让给蒙修。这就是划界历史的实际情况。嘎如布僧格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被打成“出卖领导土的卖国贼”、“苏蒙日三料特务”、“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内入党的联络部长”、“乌兰夫死党”、“现

行反革命”残酷武斗致死。

内蒙古军区政委吴涛的一次辉煌的政策演讲

吴涛是结合到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第一付主任，党的核心小组付组长，是中央安排辅佐滕海清的唯一蒙古族领导干部。一九六九年初，正当滕海清的“挖肃”左祸登峰造极，武斗逼供信已经到了极为严重，乌云压城最为黑暗时期，吴涛挺身而出做了一次政策宣讲。这是吴涛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最为光辉的一页。以当时的挖肃形势，吴涛自己也已岌岌可危，身边的人都被“挖肃”了，只剩他“孤家寡人”了。对他来说时间不多了，再不说话就没有机会了，他也豁出去了，发出了最后的吼声。虽然他的讲话对于滕海清的“挖肃派”来说屁也不顶，然而对于历史来说也起到了“立此存照”的作用。他的政策宣讲，从正面点到了滕海清的要害。指出内蒙古的天地是共产党的天地；内蒙古的干部群众百分之九十五是可以信赖的；要从阶级界限分析问题，不能从民族界限观察问题：用武斗逼供信的办法是不行的。

吴涛的政策宣讲

摘自 1969 年 1 月 22 日《内蒙古日报》第一版

1969 年 1 月 21 日，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万人政策宣讲大会，吴涛在宣讲中说：二十多年来，毛泽东思想在内蒙古占统治地位，内蒙古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内蒙古的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内蒙古的广大革命干部和各族革命人民是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可以信赖的。这是我们分析形势，决定政策的基本点。决不能动摇。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一定不要从民族界限来分析解决问题，应该从阶级界限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对敌斗争中，还应该防止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其次，在对敌斗争中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敌斗争的实践证明：哪里注意调查研究，掌握了确凿证据，哪里的对敌斗争就迅速的向纵深发展。用武斗逼、供、信的办法是不行的。（下略）

第七编 对滕海清发动的这场“挖肃”运动的思考

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历史

谁想要了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那他就必须首先要知道内蒙古的历史。只有知道了这个贫弱落后的民族在满清、北洋军伐、蒋介石、日本帝

国主义统治压迫下怎么挣扎过来的，才能正确、客观的认识这个“内人党”。

十三世纪蒙古人崛起朔方，在欧亚大陆上建立风暴帝国，在东方建立元王朝。十四世纪朱元璋赶走蒙古统治者出长城，建立明王朝。十七世纪满洲人从东北兴起。1636 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个领主归附满洲。满清政府对蒙统治，从地理上以大漠南北划分内蒙古与外蒙古，又从行政隶属上划分为内属蒙古与外藩蒙古。实行众建分而治之政策，使之蒙古各部互不相属。清政府严格控制蒙古疆界，不准汉民流入。到了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华北农村遭到破坏，清朝国力逐渐衰弱，关内贫困流民动乱频仍。清廷为了转移汉民的反抗情绪，准许他们进入蒙地垦荒种田。流民日趋增多造成农牧矛盾，于是引发了民族矛盾。

一八九一年东部区发生“金丹道”作乱，屠杀蒙古人，蔓延卓索图、昭乌达十几个旗地。其首领杨悦春打着“扫北武圣人”旗号，提出“扫胡灭清杀鞑子”口号，以“杀人夺地”为宗旨，震撼了整个蒙古。民族仇杀造成了蒙古人的世代恐惧。从那以后蒙汉矛盾日趋严重。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以“驱逐达虏，恢复中华”纲领在武昌起义，号召各地“脱离满清统治”。蒙古王公听到之后，认为汉人脱离满清统治，我们亦应脱离满洲人的统治。同年，外蒙古博格都格根哲布尊丹巴宣告脱离满清独立。同时，活佛政府宣诏内蒙古王公：“现值南方大乱，各省独立，我蒙古亦宜联合各盟，自立为国，免受汉人政权压迫之苦。本着北南蒙古皆属一家的精神，劝谕各旗一体归顺”。

一九一二年，内蒙古王公相继响应博格都格根的号召，展开独立运动。但有的动，有的不动，有的观望，行动不一。窃国大盗袁世凯大总统命令东三省出动防军镇压独立运动的“动乱者”。平定动乱的吴俊升“吴大舌头”晋升陆军中将，受到大总统袁世凯接见嘉奖。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还将独立运动的首倡者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拉到北京去，出任蒙藏事务局长，拆散了王公们的联合行动。然后宣布蒙古王公喇嘛制度一切照旧，稳住了动荡不安的蒙古上层统治者。然而，满清大皇帝推翻了，可是蒙古土皇帝却都保留下来了。这是什么“共和政体”。从此以后蒙古地区出现了王公政治与平民政治的斗争。

一九二一年外蒙古在苏俄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了人民革命。这对于内蒙古的为平民政治奋斗的民主志士震动很大。这时孙中山在其《建国大纲》中也调整了他的政策，提出“对于国内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治自决”的主张。一九二四年，国共第一次合作，革命形势高涨，孙中山、李大钊支持蒙古自决，赞助蒙古青年开展革命活动。喀喇沁出身的蒙藏学校学生白云梯牵头筹备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外蒙古当局派来札东巴为代表到北京联络，与共产国际挂勾。以北京蒙藏学校学生为中坚联络东西部民主青年，于一九二五年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会议。党的名称，以蒙语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以汉语为“内蒙古国民党”。选举出白云梯、阿拉坦敖其尔、恩和布仁、伊德钦、白彦泰、满德勒图、莫尔色、赛音巴雅尔、乐景涛为委员。其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王公制度、反对大汉族主义压迫。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反共，国共分裂：内人党在乌兰巴托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中间发生争论，左派占据优势，赶走右派白云梯，继续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白云梯逃出会议之后投奔冯玉祥，派代表去武汉声明解散“内蒙古国民党”并加入蒋介石的国民党。总部设在乌兰巴托

的内人党，自从 1928 年外蒙古民族主义领袖丹巴道尔济被打下台之后，不再有人关注内蒙古问题，到三十年代蒙古当局跟着斯大林搞肃反，杀了很多政要人物，政局动荡。受其影响，内人党总部关闭。

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派回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乌力吉敖喜尔等去东部区开辟工作。一九三二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蒙形势下，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发展了哈丰阿、阿思根等二三十名新党员，并派出朋斯克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日本侵略者加强统治的局面，计划举行武装暴动。共产国际东部负责人指示：搞武装暴动条件不成熟，目前要抓广泛统一战线，深入群众开展宣传，组织群众做好准备。

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一年特木尔巴根被日本人怀疑，两次被捕，哈丰阿从日本赶回来营救。此间第三国际派出报务员携带电台，被日本人察觉，由于哈丰阿机智转移，未被发现。

在西部地区，德王的蒙疆军队第九师里作地下工作的老内人党阿拉坦嘎达、毕勒格巴图尔、乌力吉敖喜尔，于 1944 年在德国战败形势下，准备起义，派出超鲁去东部找哈丰阿、阿思根，未能联系上。那时，包悦卿赛音巴雅尔（德力格尔、王克夫是共产国际联络员，阿拉坦嘎达在包头。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内蒙古之后，将东部区划入“满洲国”，西部区划为“蒙疆”。日本人从其征服中国的战略意图考虑，实施“扶蒙抑汉”政策，旗县并存地方，撤销县治，统归旗治。在“满洲国”内进行社会改革，叫蒙古王公贵族们向“满洲国”皇帝溥仪“特权奉上”，废除封建王公世袭札萨克制和解放奴隶为平民。民主主义者博彦满都利用他在伪政权中的职权，将蒙古人的土地所有权向伪满洲国皇帝“土地奉上”，每年从国家财政预算中列支三百万元，做为土地报酬。博彦满都从中拿出一半用来兴办学校、做为教育基金，提高蒙古人的文化教育，从而广开民智，造就了一代知识分子。在西部蒙疆地区，德王也重视开化民智，兴办学校。这样，东西部地区蒙古民族有了自己一批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这一代知识分子因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所以都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知道自己民族是怎么衰落下来的。也正是这一批知识分子后来成了内蒙古开展自治运动的中坚骨干力量。

一九四五年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必败形势已成定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人士积极做好准备，在百万苏蒙红军开进满蒙地区形势下，充分运用自己有利条件，与苏蒙军方进行联络。特木尔巴根在莫斯科进过东方大学，俄语通。朋斯克也上过东方大学，这时也随同蒙古红军回到家乡。哈丰阿由于多年来联络各阶层仁人志士，在蒙族青年中威望很高，但他还是把博彦满都推在前边。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哈丰阿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本部名义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

- 一、内蒙古从此加入在苏联和蒙古指导之下，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 二、内蒙古解放军协助红军驱逐日寇；
- 三、铲除封建，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使将来社会向非资本主义发展；
- 四、领土内民众，不分种族领域一律平等，援助汉民族的解放运动和友邦中国的革命政党紧密提协。

致乔巴山、策登巴拉书

内蒙古人民多年来,接受蒙古与苏联的领导,一直奋斗到今天,内蒙古二百万同胞坚决要求合并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全蒙古的合并,除了现在就不会再有这样好的机会。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本部

秘书长哈丰阿

执行委员: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莎嘎拉札布、乌云达赖、乌

云必力格、阿思根、额尔登台、乃日拉图、宗哈布、拉

木札布、桑杰札布、旺丹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

在西部“蒙疆”地区,蒙古红军进来之后,在他们的支持下,伪蒙疆的官吏与知识界人士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组建了以“内外蒙合并”为宗旨的“内蒙古临时共和国政府”。美国情报局得悉之后,向斯大林质询,马林诺夫元帅证实了这个政府的存在。于是斯大林向乔巴山照会,初次透露《雅尔塔协定》密约内容。外蒙古当局得悉这个协定之后,向“临时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明确表示“我们现有的疆域也刚刚得到承认,内外蒙合并是不可能的,你们回去向中国共产党联络,中共会注意内蒙古问题的”。这时东蒙代表团也去见乔巴山,也同样的回答,并提示: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员复杂,难于领导内蒙古人民革命;二、内蒙古的解放运动,不宜搞阶级斗争,要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

根据乔巴山的意见,“内蒙古临时共和国”解散,派人去张家口与中共晋察冀分局联络。东蒙代表团回到王爷庙之后也主动接受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西满分局的领导。

一九四六年四月。东西部人士在承德协商内蒙古的统一自治。

一九四七年四月,哈丰阿以一个团的部队迎送乌兰夫从林东到王爷庙,并以民族领袖之尊鸣放礼炮迎接入城。

关于建立什么样的自治政府问题,一九四七年二月,乌兰夫在林东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讲,要分三个阶段:即自治运动时期,自治政府时期,自由联邦时期。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内蒙古自准政府施政纲领》中讲的是“内蒙古自治政府是蒙古民族各阶层联合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自治的区域性的民主政府”。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各中央局的指示中说“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即将开幕,其目的在应内蒙古人民要求实行自决与高度地方自治。在自治区成立大会上,东北局派出的代表张平化讲话说“实行自治,争取自决”。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于乌兰浩特。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内蒙古的胜利。然而在“文化革命”以后,这个自治区的诞生地乌兰浩特却成了“民族分裂的策源地了。”什么“蒙奸、伪官吏、王公贵族、挎洋刀的、日本人培养的、反动的、分裂的、叛国的、独立的、合并的”,不断地大量地连篇累牍出现在书报杂志、纪念文章、党史、区史、回忆录以及电影电视宣传刊物之上。他们以“老左”的观点完全无视历史事实,肆意歪曲内蒙古人民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的自治运动。想要否定内蒙古热血青年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历史功绩。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太低,完全不了解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的革命志士从民族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过渡,他们只会从简单的浅薄的阶级斗争意识出发,从出身成分上去看问题。他们不知道党的历史上因单纯的唯成分论的“左”

的错误曾对革命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危害。孙中山、鲁迅是在日本“培养”出来的，我党的好多领导人是西方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我们党好多将帅是蒋委员长的黄浦军校培养出来的。从延安出来的也不能说都是那么神圣的，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不也都是从延安出来的“左派”吗！

由于内蒙古人民所进行的是摆脱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革命，所以不分家庭出身成分，全民族汇成革命洪流，为争取自治、自决而斗争。别看王爷在民族内部欺压民众做威做福，可是对外他们同样受到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和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欺凌，争取民族自立、平等是王爷、平民共同的原望。在解放战争、自治运动那个时期，只有少数王公反动分子怕共产党的阶级革命投到蒋介石那方去了。

因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其诞生以来一直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苏、蒙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时由于苏蒙红军闪电般进入满蒙地区，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进入蒙地，所以哈丰阿、博彦满都发表了“八·一八”宣言，提出“内外蒙古合并”的主张。解放前在蒙古人的思想意识中只有一个民族观念，而没有国家观念，认为同一个民族，合到一起天经地义。顾及不到内蒙古是属于中国领土这种国家法权的概念。再说马列主义讲“民族自决权”原则，还有“工人阶级无祖国”、“无产阶级没有国界”的世界大同观念，谁也意识不到内外蒙合并是“民族分裂”的错误。严格准确地来说，内蒙古人民以中国为祖国的观念是在解放后新中国成立才明确了。在那以前，人们都把东北叫做“满蒙地区”。三十年代我党的地下组织叫“满洲省委”。一九四七年内蒙古党的组织叫“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历史上长城以内才算中国本土。中国的抗战八年是从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算起的，而满蒙地区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丢给日本了，叫做“满洲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之前的提法是，中国对满蒙地区有宗主权。所以蒙古人提出“分立”、“自立”、“自决”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共两党争天下。内蒙古的民族主义者毫不犹豫地投靠共产党一边。因为共产党的民族纲领响亮地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原则。我党为了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从延安和各地派出上万名干部奔赴东北，牺牲了很多干部，付出重大代价才站住了脚。而内蒙古东部区有哈丰阿的势力早已控制，国民党进不去。所以，西满分局只派一名张策就把这个地区抓住了。那时东蒙青年和几个师的骑兵部队都喊哈丰阿万岁。西满分局支持这个口号，认为哈丰阿的威望越高越好，是形势的需要。如同“群众跟着贺龙走，贺龙跟着共产党”一样，只要抓住一个哈丰阿，就抓住了东蒙古。共产党的干部在内蒙古东部区可以说没有牺牲的。八路军的大干部胡秉权在突泉县落入国民党光复军手里，是哈丰阿、阿思根的部队，“伪满出身”的“民族分裂分子”、“反动军官”双宝团长带兵去打，抢出来的。

对于内蒙古东部区革命史应该有个公正的评论。

对于历史上的“内人党”及“民族分裂”问题怎么看

一、滕海清及其“挖肃派”，将内蒙古历史上发生的“自立”、“自决”、

“分立”、“联邦”、“独立”、“合并”等等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口号、行动,不顾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我党的宣言、纲领、政策、指示,一概拿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国家法权观念以“民族分裂”批判、定罪。有些顽固的挖肃左派们,在“文化革命”结束,拨乱反正之后,仍在批为“反动的”、“分裂的”,甚至在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大庆的纪念文章里还在继续重复着错误论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问题要提到一定的历史阶段,要历史地看待问题,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评定昨天的是非,打“民族分裂”要有时间界定。民族问题的纲领、任务在各个历史阶段是不同的。解放前在军伐、日伪、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族压迫制度下进行民族主义革命,实行自治还是分立那是内蒙古人民的民族自决权。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以来在历次宣言、纲领中所明确提出来的无可非议的问题。民族纲领的进步与反动,团结与分裂,其界定线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如果不承认这点,那就否认旧中国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同时也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策略的正确性。

二、“挖肃派”们为了把哈丰阿在二战结束后公开恢复“内人党”组织的活动进行否定,妄言老“内人党”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已经解散:想以此否认特木日巴根、朋斯克等人在日伪时期潜伏历史,并来印证哈丰阿等人“八一八”宣言恢复的是假牌、冒牌“内人党”。“内人党”总部解散之说是怎么出来的呢?三十年代中期,日本侵略者强敌压境,蒙古当局在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影响下也处决了不少政要人物。设在乌兰巴托的内人党总部长期无人,于是加以封闭。一九三六年特木日巴根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一九三九年德力格尔、朋斯克去乌兰巴托向共产国际代表汇报工作,以“反革命”嫌疑被捕。其间有苏联指导员潘靠夫坐北京联络。怎可说“内人党”解散呢。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宣布的呢?时至今日谁也没有见到有关文案。对于一个兄弟党,蒙古革命党能宣布解散吗,就是宣布了能有效吗。革命是各自的事情,不准别人革命行吗。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这是大家都听到了看到了有案可查。可是“内人党”怎么解散的,什么根据也没有。

三、对于一九四七年“五、一”大会期间争论“内人党”存留与否问题,滕海清及其“挖肃”者们断章取义地只提一个“四、二〇”指示,不提其它。滕海清在其《关于对待新内人党的若干规定》中讲“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一九六〇年后进入组织大发展时期”。这是滕海清挖“新内人党”的重要根据。“内人党”是个革命政党,内蒙古人民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后,对它的存留与取消有不同的意见,当时对这个问题是在讨论之中,东北局将讨论情况随时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对此,中央有四次文电指示,“四、二〇”是其中第二个,还有“三、二三”、“四、二三”、“四、二六”三个文电。这三个文电讲的都是可以保留内人党的,而且极为明确地指示“中央同意内蒙组织人民革命党的意见和办法”。哈丰阿所以坚持保留内人党是他已得悉中央有这个指示精神。然而,当时他刚刚加入中共,党内机要文电他是看不到的,乌兰夫也没有向他透露过这个底。在“五、一”大会那时做为东西部两位民族领袖,对于“内人党”的去留意见不一。哈丰阿主张保留“内人党”,做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而乌兰夫则力主以“自治运动联合会”取代“内人党”。最后东北局支持了乌兰夫的意见,取消了“内人党”。

为使人们对新中国成立前的内蒙古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能够客观地历史地看待

问题,将我党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历次宣言,纲领、指示抄录于后。

中国共产党(1921—1949)关于民族问题的宣言、信电、指示

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

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922年7月)

蒙古、西藏、新疆等处不独在历史上为异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因为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而蒙、藏、新疆等处则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以这些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异种民族,而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伐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没有丝毫利益。

二、《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1922年6月30日)

4、联络各革新党派,作承认蒙古独立及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运动。

三、《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1923年6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8、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民族自决。

四、《中共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

(1923年)

蒙古问题: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伐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主之客观的可能。

五、《中共中央给蒙委的信》

(1929年2月30日)

关于内蒙民族的政纲应是:建立内蒙民族共和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十四)、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

七、《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大会决定:(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上面,必须明白规定对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自决权,直到离开中国而独立的自决权,它无条件地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八、《关于内蒙民族问题》

(1934年7月7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内蒙党委员会的信)

(2)反对由国地主资产阶级军伐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行止以暴力手段来实行殖民化,反对国民党移民的掠夺与民族同化.实行民族自决,直至分裂与建立独立国家为止。

九、《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

(1935年12月20日)

亲爱的内蒙古全体民众们：现在我们是处在全世界大变动的关头。你们还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宰割，作他们的炮灰而趋灭亡；还是乘机奋起，努力图强，以争得至尊的蒙古民族在全世界民族中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二者必居其一，望速择之。

野心勃勃，凶焰逼人的日本帝国主义，欲占领全中国，必先占领满蒙，欲称霸于全世界必先占领中国，这个野蛮计划，现在已逐步实现，首受其害者，为东三省，华北五省的民众和内蒙古的整个民族。狡猾卑鄙、口蜜腹剑的日本强盗，正在用各种欺骗手段假借“大蒙古主义”，来达到占领蒙古的整个土地财富，奴役整个内蒙古人民的目的。它准备把你们的土地作战场，人民当炮灰，以达到它进攻中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进攻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并最后消灭蒙古民族的目的。不信，请看朝鲜、台湾、东三省人民，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不能有居住、行动、耕种牧畜的种种自由，一切政治经济权限，完全操在日本倭奴之手，再看日本帝国主义者察哈尔的军事布防与军事设备，及兴安总署与其他的一切阴谋，更可以了然内蒙古民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机，何况还有恬不知耻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不独自命为宗主国，更进而把内蒙古整个的区域划为行省，驱逐蒙古民族于黄河以北，阴山以北？更时常指使井岳秀、高石秀等小军阀，不断地占蒙古民族的牧地、盐池。企图逐渐消灭蒙古民族，作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加速内蒙古民族之灭亡。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所有的英勇红军，在数年来的英勇战斗，无数次的给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军阀以严重的打击。中国红军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特别是英勇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突破了全世界的行军纪录，胜利的达到了北上抗日预定的计划。中国红军战斗的目的，不仅是把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它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的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而获得如土耳其、波兰、乌克兰、高加索等民族一样的独立与自由。因此，本政府向你们宣言：

(一)认为原来内蒙六盟，二十四个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无论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三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其它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

(二)我们认为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力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力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一切权力，同时，内蒙古民族可以随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它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三)凡在内蒙古区域的汉、回、藏、满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发展民主主义，使这些民族与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并有虚用自己的言语文字及信仰与

居住等的自由。

(四)首先将井岳秀所占领的巴秃湾与高石秀所占领的区域及两个盐池交还蒙古人民,并将长城附近,如宁条梁、安边、定边等地划为商业区域,以发展你我双方问的贸易。

(五)我们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或其它的武装队伍,绝对没有向草地进攻的企图,但你们亦不要允许中国军阀或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经过草地来向我们进攻,来加速你们的灭亡。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总之,只要你们真认识到蒙古民族解放的必要,不应做亡国奴,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中国军阀的决心,那不管你们领导者是王公贵族或平民,我们都可以给你们以善意的实力的援助。蒙古民族素以骁勇善战见称于世。我们相信你们若一但自觉的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之子孙为可欺也。请为熟思,并望互派代表以建伟业,则不胜幸甚!谨此宣言。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十、《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

(1936年8月24日)

中国苏维埃红军与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对国内弱小民族的压迫,主张民族自决,一直到弱小民族组织独立国家与政府,中国苏维埃共产党,关于内蒙人民民族自决的立场,不仅要在口头宣传上,并且要从每一个具体行动上,向蒙古人民表示出来,使他们相信,我们所指出的道路是正确的,同时应利用外蒙解放独立的历史与事实,来证明这种正确性和斗争前途。

十一、《中共中央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

(1937年7月10日)

(1)、德王对大汉族主义的压迫有过较强的民族意识,曾经代表着蒙古民族独立解放的意向,他之转到日本傀儡方面,是由于日寇利诱与国民党政府适之使然。

(2)、他在内蒙民族中有比较广泛的信印。

十二、《中共七大党纲》

(1945年6月11日)

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

十三、《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蒙工作方针的意见》

(1946年4月17日)

(一)、东北蒙民共约一百二三十万,散布于兴安四省及省外十三旗,多以农业为主,及半农半牧的农牧民,纯牧民为数最多。

(二)、过去东北军笼络王公屠杀蒙民侵占牧场、设县、经商,汉人势力已深入蒙区。

(三)、伪满时代,日寇采取抑汉扶蒙政策,名义上兴安四省及十三旗为蒙人统治区。一九三八年在“特权奉上”、“土地奉上”口号下,取消王公封建特权。以日寇扶养的新官僚,曾培养中等以上学生为千人,军官八百余,军士二百余,共万余人,蒙人文化大为提高,但由于粮谷、牲畜“出荷”占半出品,蒙古人民生活极

苦。(四)、苏联进兵东蒙时,蒙古青年分子在王爷庙杀死日本人举行起义欢迎苏军。日寇投降后,东蒙青年及官僚曾派代表到外蒙,要求合并,外蒙未允。归来后于一月中旬在葛根庙召开东蒙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东蒙人民政府。

十四、《中共中央关于考虑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指示》

(1946年11月26日)

内蒙自治现在不仅东蒙无论老年青年进步的落后的一致有此要求,而且国民大会的内蒙代表亦一致有此要求。荣祥表示如国大不解决内蒙自治则全体内蒙代表退出国大。国内舆论逐渐同情内蒙自治,而国方亦已逐渐侵入内蒙,故中央认为,为了团结内蒙人民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政治经济压迫,现在即可联合东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的高度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但对蒙汉杂居地区仍容纳汉人合作,并避免采取独立国形式。

十五、《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

(1947年3月23日)

(四)、内蒙人民革命党及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问题,如果内蒙人民中积极分子主张解散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而组织内蒙人民革命党,我们应予以赞助,并以中共分子加入成为领导核心,如果时机尚未成熟,亦不妨暂时保存内蒙自运,作为向西蒙活动的人民团体。

十六、《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给东北局的复示》

(1947年4月20日)

东北局并转云泽:(乌兰夫)

…不组织内蒙人民革命党而保留内蒙自治联合会。此意甚好,望多以内蒙自治联合会名义派人至绥蒙及伊盟、阿旗活动。

十七、《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人民革命党的对策给东北局的指示》

(1947年4月23日)

东北局并云泽:

如人民革命党既未宣布解散,而这些人又极力主张恢复,我们党员亦一时难以说服,则不如采取积极态度以我党为中心来建立人民革命党,领导其革命发展,而不必预存废止之意。同时,仍保持内蒙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与发展。

编者注:此电文是对《东北局关于对内蒙自治问题的意见向中央的请示》《西满分局关于内蒙人民革命党问题的请示报告》等电文的复电。

十八、《中共中央同意组织人民革命党》

(1947年4月26日)

东北局:

中央同意四月十八日来电关于内蒙组织人民革命党的意见和办法。

内蒙古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党群团体

建国初期，内蒙古的干部队伍大都是从民族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过渡。很多人参加过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干部人事部门会同公安机关进行了多年审查干部政治历史的工作，档案存在内蒙古公安厅。1968年，在“挖肃”运动中，内蒙古公安厅政保处的干部丁振声将自治区审干办公室存查的历史档案偷将出来送到滕海清办公室，做为挖“内人党”的“变种组织”。这些党群团体列表如下：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1925年于张家口建立，领导人白云梯、郭道甫。1927年在乌兰巴托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党部设在乌兰巴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国际派乌兰夫到西蒙工作。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回东部，又发展了些人民革命党员。这一时期发展的党员有哈丰阿、阿斯根等人。“9.18”后，日寇逮捕了特木尔巴根，朋斯克逃到外蒙。

兴蒙党

1943年在王爷庙(现为乌兰浩特)兴安学院出现的学生团体，同由具有反满抗日思想的青年们为复兴蒙古而组建的，是学生们自发组建的，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

内蒙古青年革命党

1943年在西部区出现的组织，只有名单而无任何宗旨。

主任委员 胡尔沁必力格；执行委员 德力格尔超克图、布林色音、罗布僧敖力布；常务委员穆克登宝；委员长宝音达赖

成吉思汗党

1942年。由胡果吉夫在洮南发起组织的。宗旨为复兴蒙古。成员额尔敦敖其尔、阿兴嘎、太平嘎、达兰台等人。

正义党

1945年8月15日，由齐齐哈尔的达斡尔人亲属系统组建的，主张赶走苏联红军，接收由札兰屯至海拉尔铁路，呼伦贝尔与纳乌木仁合并，与内蒙古分离。拥戴郭文通为主席。

蒙古青年团

1939年，蒙疆军司令部翻译德力格尔朝克图以复兴蒙古文化发起。纲领是：一、保护发展蒙古文化；二、主张军、政、学校注意蒙文蒙语的学用；三、改善民生、卫生；四、改革喇嘛教；五、创办蒙文杂志。鉴定名词术语。曾派人去东蒙会见兴安局总裁札格尔、蒙政部大臣齐木德森丕勒、第九军管区司令官巴达玛拉布坦。

蒙古青年革新团

由北京学生王士龙、王迪哲、陈芝军组织。

海日图巴特尔布勒呼木

组织者为哈达，1946年2月组织的。亦称“哈达派”。口号是呼盟人管呼盟，反对达呼尔外来蒙古之统治，反对大汉族主义。

兴蒙团

1942年日本侵略者从伪满洲国、蒙疆地区蒙古军人中选派少数青年军官去日本神奈川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伪满洲国有嘎日布僧格、拉瓦、巴音图、呼和哈达等

人。蒙疆地区有葛瓦等人。兴蒙团的主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复兴蒙古不能依靠日本。1943 年成员们感到有言无行不能成事，于是到富士山秘密开会建立组织。1944-年 2 月毕业前开会，被日本值班军官发觉，会议没有成功。从此，唯恐被日本人察觉杀头，再未活动。

安达会

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行将灭亡之时组织起来的。口号是复兴蒙古，反对汉人、苏联，带有武装性质的组织。

蒙古青年同志会

1945 年“9. 3”后，札兰屯地区知识青年，为蒙古民族好好干一场的动机，于 1945 年 12 月在札兰屯女高成立的，约有一百多人参加。

大同会

郭尔罗斯前旗的太中专学生，在日本投降后，留在旗所在地与共产党和王爷庙的哈丰阿联络而成立的组织。该会的组织领导人陶特克其、高万宝札布、孙殿忠等人，他们都参加了哈丰阿的人民革命党。

蒙古留平同乡会

“9. 18”满洲事变届，当时在北京的白云梯、吴鹤令、吴子升、昭、何兆麟等人组建。1948 年改选，常务班子：张绍健、于宝衡、陈绍武、乌宝等人。1948 年同乡会员曾达到 1. 700 人。

蒙古青年互励会

日本投降后，1945 年冬，国民党辽蒙党部特派员全作历、金养浩为笼络哲里木盟蒙古青年而设的组织。

蒙古青年万志会

1946 年，察、热、辽蒙党部的国民党员，为声援伪制宪会议的蒙古代表，开过一次记者招待会，声称“反对实行地方自治，要求统一的内蒙古的高度自治及反对蒙旗旧省辖的文件。陈绍武曾委托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党部书记海福泉、郭木布扎布成立分会。

蒙古青年革新会

1949 年春，北京和平解放后，宋国栋、胡和木仁(滕志一)、色希浩三人发起，认为北京蒙古青年组织起来回内蒙古，要比单个回去要好。

蒙古青年同盟

1946 年 11 月召开伪国民大会之际，蒙旗代表因为要求恢复蒙旗建制。以及蒙古高度自治，遭到热、察、绥国大代表大汉族主义者的反对，感到势单力薄而组建的团体。

达斡尔蒙古青年同盟

1945 年日寇投降后，达斡尔知识青年为反对国民党光复军而组织的团体。召集人讷吉祥讲话指出，现在布西地区(布达哈旗)为光复军所占领，旗政府也没有多少蒙古人，蒙古人没有权利。我们应维护旗政府，不要让汉人占领，现在大局未定。

察哈尔蒙古青年同盟

1940 年 9 月，蒙疆察盟公署阿拉坦格日勒、王公、军政人员在张北组建。其宗旨为开展识字运动。消灭文盲，改掉头饰奢侈，开展蒙旗的民族革命。

蒙民厚生会

1938 年, 蒙旗王公向满洲国皇帝“土地奉上”, 然后由满洲国政府每年从国库拨出 300 万元买断汉人耕种的三十二县的蒙旗地租权。蒙政部官员提出建议, 拿出 150 万元用来补助蒙民的文化教育、卫生以及经济产业。征得各旗王公们同意在王爷庙设立这个蒙民厚生会, 由各旗旗长组成评议委员会, 下设执行机构, 玛尼巴达拉出任财团法人理事长。根据厚生会的宗旨开办了育成学院、产业技术学院、贫困学童后援联合会、蒙民习艺所和十五处贫民开垦部落、一处牧场、十四处产所, 并资助办理蒙古青年留学国外的事宜。由于玛尼巴达拉的筹措, 在王爷庙建立了成吉思汗庙。

内蒙古军区政治部阿民在平反大会上关于民族问题的发言

(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

参加这个大会很高兴, 也很难过,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广大群众希望平反昭雪可有年月了, 终于盼来了今天这个大会。这标志着给予受害者们的第二次解放, 是值得庆幸高兴的。可是同志们, 这是什么样的幸福, 什么样的高兴啊? 我们伤了多少人, 残了多少人, 死了多少人啊? 开这个大会的时候, 不能不想起我们含冤死去的战友们哪! 这是一种悲哀的幸福, 是一种痛苦的高兴。这是苦味的甜, 是想哭的乐。我们对第二次解放我们的党中央、华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卫边疆, 团结起来共同战斗!

领导上通知我在这个会上发言的时候, 我欣然从命了, 因为我有话要说。要说的话很多。今天只谈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题目, 就是民族问题, 因很多受害者们所受的害, 主要是从这条路子上来的。打黑帮、打“内人党”就不用说了, 就是打“二月逆流”, 也是挂在“乌兰夫反党叛国”这条线上打。所以, 内蒙的三大冤案, 实际上就是一大冤案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而已。第一阶段打的是乌兰夫的“集团”, 第二阶段打的是乌兰夫这个集团的代理人, 第三阶段是挖这个“集团”的组织。“四人帮”倒台前是不让讲民族问题的, 七四年牙含章同志讲了个民族政策再教育, 又被打成反动的民族理论家。之后, 人们更不敢讲了, “四人帮”倒了, 特别是“四·二〇”批示以后, 人们才敢讲些了。

有的同志说, 制造三大冤假错案是林江集团为篡党夺权而搞的阶级斗争, 不要把它说成是民族斗争, 这话是对的, 但是又不完全对。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条件下, 阶级斗争有不同的特点。用抽象的阶级斗争概念, 掩盖阶级斗争的特点, 就不是马列主义。林江集团搞阶级斗争, 在全国特别是在中央主要是以老干部为打击对象的, 所以说“老干部是民主派, 民主派是走资派”, 这一公式是他们的政治纲领。我们假如说“林江们搞的阶级斗争, 不要把它说成是新老干部的斗争”行不行呢? 不行, 这么说就掩盖了他们政治纲领的要害, 好象是抓了阶级斗争的实质, 其实是掩盖了它的实质。林江集团在内蒙搞阶级斗争, 目的当然都是为了篡党夺权, 而手段, 则是从他们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出发, 从民族问题开刀的。不但在内蒙, 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 林彪、“四人帮”迫害了大批少数民族同志和同少数

民族长期共事有密切关系的汉族同志。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说的是民族矛盾斗争，归根结底是由统治阶级造成的，而不是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要把仇恨记在林江集团的帐上，只要不是他们一伙，不是“两种人”，即使打过人，伤过人的，也是自己的同志，通过一定形式，可以谅解，可以团结，我们很多同志，事实上也都是这样作的。

这里我并不是说自己很能原谅人，宽宏大量，不是的。对有的人，我至今还有意见。因为这种人不要团结，也谈不上我们谅解不谅解。比如有位副司令员，大会小会骂过我们多少次“乌龟王八旦”，口头骂着不过瘾。还发书面材料骂嘛，有的发到全区民兵连嘛，我们老家亲友老少都知道了我是“反革命乌龟王八旦”了。虽然他没有打我半拳，可这讲话的影响是极坏的。可是这些年见过几次，人家不理我，我怎么去团结他呢？只好算了。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我今天的理解就是把仇恨记在林彪、“四人帮”的帐上，但这并不否认林彪、“四人帮”在内蒙搞的阶级斗争的特点，就是民族压迫的特点。

林江们给内蒙人民横加的共同罪状是民族分裂。凡是他们打的少数民族成员，几乎每人都有这么一条，还有好多被打的汉族同志也有这么一条：“民族分裂”的内容很多，什么搞“独立王国”，搞“大蒙古帝国”，还有“投修叛国”等等，我想这些东西市场不多，就是当时嘴里叫喊的人也不一定真信，不值得一驳。另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倒能迷惑一些人，诸如“反汉排外”问题，“反汉排老”问题，还有什么批判“成吉思汗子孙团结起来”的口号的问题等等。一九六九年“五·二二”以后又出了个新罪状叫“民族情绪”。我今天就谈谈这些方面的想法。

(一)关于所谓“反汉排外”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问题喊得最响，说孔、廷、塔、鲍“反汉排外”了。林江集团有个“法宝”，打倒在先，查罪在后，先定敌性，后找罪证。所以，人呢？一打就倒，罪呢？一打就有。鸡毛蒜皮事，都得上纲上线。离休退休是“反汉排外”，调动工作也是“反汉排外”，给某领导提意见是“反汉排外”，给某部下作批评也是“反汉排外”。说是用阶级斗争理论这么一擦，眼睛一下就亮了。这一亮不得了，好多内部矛盾，同志间的是非问题都“亮”到敌性上去了。

许多老同志在军区工作几十年，又经过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反复，现在林江们的干扰排除了，我们可以公正地讨论这个问题了。据说现在还有人说“孔、廷都上台了，再不要搞‘反汉排外’就行了”。这就是说以前有“反汉排外”是定了案的了。只求以后不要『商』了。是这样吗？我们看事实：

我是内蒙军区政治部最早的成员。一九四六年乌兰浩特有了党的领导，也有了军区，那时叫兴安军区，政治部主任是胡昭衡同志，有组织、宣传两个科，共十几人，除胡以外都是蒙族同志，我在组织科工作。

四七年“五一”大会以后改称内蒙古军区，政治部主任是方志达同志；建国以后搬到张家口，主任是廷政委，这时的政治部可能有百十来人的样子，汉族同志可能有二、三十人吧。甄振亚同志在世时曾说过：“那时是政治部的黄金时代”，可

见同志间的关系是不错的。五二年军区搬到呼市来，蒙绥合并，汉族干部猛增，这时的主任是刘政委。六十年代以来，部队、机关逐渐扩大，外来干部也逐年增多，少数民族干部从多数变为少数。

文化大革命以前二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内蒙古军区的干部路线不是反汉排外的，而是五湖四海的。再说政治部从六〇年设立二级部。只有一个席达同志是组织部长，其他部的正职都是汉族同志，六四年席调走，杨玉春同志当部长，此后二级部的正职都是汉族同志；主任们四位中三名是汉族同志，这怎么可以说是“反汉排外”呢？

还有些具体人的例子：×××，据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痛哭流涕地控诉了“反汉排外”。六一年，刘政委带一个工作组从天津接来一个团的部队，我跟去的。×是该团新任的团长，到内蒙三年后，于六四年组建骑五师，提他为副师长；二年后的六六年又提他当师长。三年升一格。两年提一职，来内蒙共计五年之中，从新任团长提为军区唯一一个主力师的师长，这是重用呢？还是排外呢？人总该看点事实，讲点道理吧？

与会的老同志们都知道，我们这些民族干部对汉族老同志们都是很尊重的，这是我们在成长的长期历史中养成的习惯。我们这些人学会走革命的路，都是汉族老同志一步一步教出来的。我入党是胡昭衡同志介绍的在乌兰浩特兴安军区政治部。他常把我叫到家里去，给讲政工业务，组织科的工作职责等。所以我们对老同志们视为师长，总是抱有敬仰和尊重的心情。政治部二级部中没有一个蒙族正职，没有人计较，我们都认为由汉族老同志任正职是理所应当的。设二级部以前，我是宣传处长，一度调王桐三同志来任处长，我降为副处长，领导上没有给我解释过，我也没想过这有什么不正常。过去干部间关系就是这样，这都是事实。领导上也是常以这个精神教育我们的。六五年王调任步校，周平任我们部长，来以前，廷政委就专门给我谈过，说我在宣传部时间最长了，教我尊重新来的部长，搞好团结，关系出毛病，就要我负责。我也这样作了，不但工作上，就是生活上也尽量照顾他，房子碰上的是一个较小的单元，我要搬给他，他坚决不肯；那年我家咸菜都是两家分着吃的，他家的菜窖就是包安去给挖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中他六亲不认了，把宣传部挖了个“不亦乐乎”。包安挖他的菜窖，他挖包安的“内人党”，真是“有来有往”，而且他亲自动手打了包安的嘴巴子，究竟是谁对不起谁嘛？！

文化大革命中，我认识了一条真理，别人想搞臭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臭了，那就是你自己搞的，不是人家搞的。据说我们的一位副司令员在军区领导中，是“反汉排外”的最大受害者，说是在群众中破坏了他的威信，使他难于工作等等。我不信这种高论，首先在理论上就站不住。一个人的领导威信，是由自己的德才、言行树立的，群众对一个领导人的出自内心的敬仰尊重的程度是跟这领导人的德才水平成正比例的。再高明的“反汉排外”的专家，也不可能把你的德才反掉，所以也就不可能把你与这德才相应威信排掉。林彪、“四人帮”骂邓副主席多少年？骂臭了吗？他的德高尚，才智卓著。你越骂，他越香，而骂的人倒是越骂越臭，终于垮台“大吉”。文化大革命以前，你是大军区的第一副司令员，吴涛来以前又是第一副书记，这个地位还低吗？“反汉排外”，还怎么都“排”在“第一”上呢？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十多年，所谓“排斥”你的人们都“倒”了。这该是你大显身手，创建奇功的时候吧？可是你干了些什么呢？第一批打倒了那么多黑帮，可是打错了，

有你的份；第二批打倒了黄王刘张，又是打错了，也有你的份；第三批打倒了那么多的“内人党”，还是打错了，也还是有你的份，你干了哪一件好事呢？中央为三大冤案平反了，说明三大案件都是错误的，可是你还是“正确”，时至今日你沒的一句诚恳的自我批评，在群众中何以自处啊？同志间没有不可克眼的矛盾，检查不在话多，洞开肺腑之言，几句就够了，可是你没有。

(二)关于“民族情绪”问题

“五·二二”以后，“民族情绪”这个名词流行了若干时间，据说这是郑维山的“宝贝”，其实郑以后的时间里这东西也在起作用。什么叫“民族情绪”，就是对民族问题上的思想感情，心理反映，其中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不能一概而论。压迫、歧视少数民族的情绪，是大民族主义的情绪，是错误的；不承认少数民族采取民族取消主义的态度，也是错误的；反对排斥外民族的情绪是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是错误的；不要自己民族，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也是错误的。民族情绪要作具体分析。当一个民族遭到压迫摧残的时候，必然表现反抗的心理和行动，这是正当的和正确的民族情绪：中国人如果没有这种情绪，早就成亡国奴了。

林、江集团搞三大冤案，对内蒙人民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进行了残酷迫害。因此少数民族人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这也是正当的，是正确的。还有些人，他们不一定是“四人帮”的同伙，但他有严重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对少数民族说了不少侮辱、诬蔑的话，伤害了少数民族人员的自尊心，引起不满情绪。但我们不是对汉族老同志不满，我们是在他们眼皮底下长大的，是他们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们了解我们。军区开始打黑帮的时候，刘昌政委就是上不了纲，是保护我们的。恽汝和同志看着不公，就给×××贴了一张大字报，说你是“代常委”的成员，为什么不揭发交待？结果遭到了围攻。我们的情绪是对着林彪、“四人帮”的，是对着个别严重的大汉族主义言行的。浩斯布林同志是打土匪的，辽沈战役都参加过，之后转战锡林郭勒草原，追剿胡图灵嘎匪部。可是把他当做“土匪部队”，当做“内人党”给整死了。落得比土匪还要惨的下场。对此能没有情绪吗？素英同志的丈夫就是在这次剿匪中牺牲的，她二十出头就守寡，只有一个儿子，长大了又送去当兵，保卫祖国，这样的女同志有什么罪嘛！也把她当成“土匪”的“臭寡妇”，打断了人家的骨头，这能没有情绪吗？还有的把骑一师解放战争时的战斗统计表，当“罪证”公布，把消灭国民党军队，说成是“打死了我们八百名阶级兄弟！”甚至有的到七五年十月还说“内蒙部队没有结论”，电影剧本不能写等等。对这些奇谈怪论，能没有情绪吗？当年锡盟分区司令员赵德荣恶狠狠地说“蒙古人坏透了。我一见蒙古人就恶心！”还责骂嫁给蒙族干部的汉族妇女说：“你们找不到男人啦？嫁给蒙古人是民族的败类，叛徒！”同志们，看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族情绪。我们不要站在汉族的立场上，也不要站在蒙族的立场上，而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去评论这些问题，我们就不难分清什么情绪是正确的，什么情绪是错误的，不难分清是非了。

当年郑维山之流所指的民族情绪，主要就是说的这种反抗心理和不满情绪，他在内蒙继续推行了林彪、“四人帮”的民族压迫政策。这个政策，在我们军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个别领导同志的观点迟迟转不过来，对少数民族干部，特别对那些在三大冤案上意见较多，在民族问题上意见较多，在落实政策上意见较多的干部总是看不顺眼，“民族情绪”成了使用干部的不成文的标准。

有的首长说：“在配备领导班子上对蒙族同志照顾不够”。我感谢首长们的关怀!但这里必须说清楚：前些年人们在干部问题上的意见，不是要求“照顾”，不是要求民族特权，只是要求民族平等，合理使用，反对歧视，反对压制，要求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肃清“四人帮”的民族压迫政策的流毒。内蒙军区成立以来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培养了大批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并且应该承认他们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胜任愉快的。这些人们中，可以参加领导班子，德才标准都够得上的干部大有人在，只是有人信不过。为什么?因为派性、有偏见。他们深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影响。对一些严重害人的人，一提再提，而对一些受害者，不予任用，甚至对一些说真理，敢斗争的同志继续迫害。当然这个问题根子在林彪、“四人帮”。六九年二月四日“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们跟滕海清有个谈话，康生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样的部队要改造，哪有内人党的部队，你们能掌握吗?这就是说内蒙部队是“内人党”的部队了。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这就是说内蒙的共产党就是“内人党”的意思。江青说：“你们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康生说“内蒙就象拉丁美洲的智利那样长”，“边防线这么长，敌人到处可以跑”。这就是说他们眼里“骑兵”和“敌人”就是一回事，不改造还行吗?黄永胜说：“你们要什么干部，写报告，可以调。”这说明黄永胜在场，他表示从组织上保证这个“内人党”部队的改造。这次谈话的影响深远，它的苦头，我们吃了好多年还没完。“五·二二”批示说“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了”，没有说“内人党”不存在，借军管的名义，郑维山是拿上林、江集团的尚方宝剑来征服少数民族的，不是来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

郑维山不久就垮台了，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并没有垮台，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作怪。军区有的首长不是说过吗?他来的时候，黄永胜作过“意味深长”的长谈吗?谈的什么?不用他自己讲，康生、江青们上述讲话的精神，必然是黄永胜长谈的最为“意味深长”的部分。所以有的领导来内蒙的时候，就是满脑子“敌情”，可是谁是敌人，谁是好人，自己又分不清，于是就抱了个“不相信主义”。出车换车牌子，半夜换住房子，紧张到何等程度?在干部使用，落实政策上，出现很多极不正常的现象，都是从这里来的。群众中有句话：有人喜欢用奴才，不喜欢用人才，道理就是“奴才”可信，“人才”不可信。群众有多少意见不顶，“你抒你见，我行我素”。有个小例子，政治机关管干部，这是我军老传统，可是我们军区好长时间恢复不了这个传统，难道领导忘了吗?不是，他是叫你管不放心。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不是不用有“民族情绪”的干部吗?好了，我非但民族情绪不要，连民族也不要。于是“我是共产党员，不管什么民族不民族的”高论出来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谁讲民族问题就是反动的”高调也出来了。结果有的领导就赞赏了：“还是他的马列主义多些嘛!”

共产党员该不该管民族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可不可以讲民族问题?这本来是个很简单的常识，过去是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民族虚无主义从历史以来总是民族压迫下的产物，内蒙三大冤案对少数民族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对于一些意志薄弱者来讲，这是极大的恐怖、威胁、压力，他们想起来就打战，不寒而栗。另一方面，民族取消主义的宣传与鼓励，甚至诱以“官、禄、德”，对这些人又是一种

吸力、诱惑，他们听起来就向往，跃跃欲试。屈从于压力或向往于诱惑，或是二者兼备之下民族虚无主义就可以产生了。这个东西对于~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不允许的，这不简单是理论认识上的问题，而且是对党的根本观念、根本态度问题。他们对党的领导产生了动摇，不相信党的民族政策还能回来，“四人帮”的天下似乎就定了，所以采取了机会主义的行动，避其所恶投其所好。当林彪、“四人帮”们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时候，不但蒙族同志反对，汉族同志也抵制和反对的大有人在。李希圣同志就是因抵制林、江们的民族压迫政策而被打成“内人党”，遭到残酷迫害的汉族老同志。当有人鼓吹民族虚无主义的时候，不但蒙族同志不满，就是汉族同志也是严肃批判的大有人在。王桐三同志就是第一个批判民族虚无主义谬论的汉族老同志。

民族是长期存在的，毛主席早在 58 年成都会议上说过：“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这样三步，现在第一步阶级消亡远远没有实现的今天，就根本谈不上不要民族的问题。民族为什么会这样长期存在？根本道理就是民族的消亡只能通过融合来实现，而不能通过同化来实现。融合是自然自愿的，同化是强迫的。民族问题是人民的问题，是群众的问题，共产党、马列主义者只能用融合的办法，而融合的过程要等自愿实现。可见全国各民族的融合是需要老老长时间的，是急不得的。象毛主席说的“欲速则不达”，民族间反而造成不必要的矛盾，破坏民族团结。

既然民族问题是个长远的问题，那么你共产党、共产党员不管，谁管呢？有人自充高明，似乎你觉悟最高，不计较民族长短，超然于民族之外，其实这是假象，骨子里是搞投机生意，出卖灵魂，出卖祖宗，企图博得一些人的欢心，换得一官半职。话是难听些，但这是事实，无可辨驳。其实这种买卖是作不久的，有点马列的领导就不信你这“觉悟”的，不要祖宗的人，还要什么党、什么祖国吗？他心目中只有个人利益而已。

前几天传达了中央边防工作会议文件，有华主席和中央各首长的讲话，有乌兰夫同志的报告，共产党人要不要管民族问题，这些文件里讲得很清楚。

谁不要民族？国民党不要少数民族，“四人帮”不要少数民族。“都社会主义了，还有什么民族不民族”，这是“四人帮”们的话。我们这儿，有的人的话，与此何其相似乃尔，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三)关于“成吉思汗子孙团结起来”这个口号

我手头有个小册子，叫《对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反革命“内人党”的大批判提纲》，是我们政治部学习班搞的。批判了七条所谓“反动谬论”，其中的第二条是“痛斥‘成吉思汗子孙团结起来’这个民族分裂主义的反动口号”云云。这里先讲点历史：这个口号是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到四七年“五一”大会前后，在内蒙东部乌兰浩特广泛张贴的。口号的全句是：“成吉思汗子孙团结起来，粉碎美蒋反动派的进攻！”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四六年四月开始，乌兰浩特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共兴安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张策同志，并在工委领导下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分会；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向内蒙东部地区大举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方针是团结拥护党领导的内蒙各阶层人士，积极开展自治运动，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这就是口号产生的历史背景。小册子把这口号的下半句去掉，只留了上半句，作了三点“批判”。下边我们逐点讨论一下：

一点是作者想从理论上论证这个口号的“错误”，说“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是革命的口号，而“成吉思汗子孙团结起来”是民族主义的反动口号；喊这个口号是为了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云云。有点分析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一引证，不是证明了他的批判的正确，倒是反证了这个口号的正确。列宁和毛主席说的“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口号中的“被压迫民族”，指的是什么？是包括各个阶层的整个民族呢？还是不包括民族上层的人民群众呢？当然指的是包括各阶层的整个民族。那么“成吉思汗子孙团结起来”这个口号又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蒙古民族团结起来的意思，不能有别的解释。“团结起来”干什么呢？是《粉碎美蒋反动派的进攻！》这有什么不对呢！“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就是革命的口号，而“被进攻的蒙古民族团结起来，粉碎美蒋反动派的进攻”，就是反动的口号，这是谁家的理呢？你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又为什么反对这个口号呢？真是岂有此理嘛。

二点是说毛主席已经作结论了：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把这种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当成蒙古民族的祖先，是对蒙古劳动人民的“最大污辱”；还说成吉思汗是代表王公贵族的，所谓“成吉思汗子孙也就根本无法团结起来”，因为蒙古的历史证明“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是没有‘平等’、‘团结’、的”，等等。

主席诗词一句，是不是就是对成吉思汗的历史结论？我这里不说了，史学家们自有公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否不可以当做一个民族的祖先和代表性人物？我不能同意。鲁迅曾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句，以我国第一个皇帝为汉族的代表性人物；毛主席也曾多次说到汉族是“黄帝的子孙”，以黄帝轩辕为汉族的祖先。而且也正是毛主席说过蒙古民族是“成吉思汗之子孙”，原话是这样的：“蒙古民族素以英勇善战见称于世，我相信你们一旦自觉的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之子孙为可欺也”。署名是“中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日期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这就是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向内蒙人民发出的有名的“三五宣言”。这里人们要问作者：是毛主席污辱了蒙古劳动人民的呢？还是你在诬蔑毛主席呢？！

说什么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没有团结”可谈，这是笑话。我不相信这个材料是小学生写的，如果是大人的话应该知道孙中山团结全国人民推翻了清朝皇帝的吧？应该知道我们党和蒋介石还搞过统一战线的吧？写个东西一出来就去自杀的话，可以乱写，不怕脸红。否则即使不为党负责，也应为自己的脸面着想吧？！这人还假装通晓蒙古的历史，说这“没有团结”是“蒙古的历史证明”了的，真是嘴是横长的，理也横讲。嘎达梅林就是王爷的官吏，不是团结蒙古人民反对军阀吗？！也在这个“三五”宣言中，看毛主席怎么说的：“只要你们真认识到蒙古民族解放的必要，不愿做亡国奴，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中国军阀的决心，那不管你们的领导者是王公贵族或平民，我们都可以给你们以善意的实力的援助”。这不是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有团结”的意思吗？

还有一个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对比：这里看起来是多么积极保护蒙古劳动人民，热爱蒙古劳动人民的呀，真是大“恩人”。这提纲是六九年一月搞出来的，这

时的学习班干什么呢?关进了一百多名蒙古劳动人民的好党员、好干部,正在加紧逼供刑讯,逼死人、打死人的时候。我们看政治部十位烈士死去的日子:十二月一日是莫德勒图同志,一月十六日是高春华同志(女,二十五岁,怀胎六个月),一月二十三日是郎风鸣同志,一月二十八日牧人同志,二月二十一日齐木德同志,三月九日是浩斯布林同志,四月八日是陈文章同志,四月二十二日是阿迪雅同志,四月二十五日是白云皎同志;敖景奎同志是出学习班以后死去的。看吧,这不正是口里念佛,手里杀人的伪善面孔吗?不正是一只伪装外婆,来吃孩子们的“大灰狼”形象吗?

三点是在口号提出的时代问题上作文章。他说“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新时代。在消灭剥削压迫的基础上,各民族的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样一个时代,反革命“内人党”公然抛出这个反动口号,真是反动透顶云云。这里说的究竟是什么时代呢?从字里行间可以理解其意,是想说“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但他知道这口号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东西,不敢直接造谣,所以就玩了这个文字游戏,这叫居心不良,又作贼心虚。

如上所述,这个口号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到四七年“五·一”大会前后在乌兰浩特出现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已经有了中共的领导;(2)有了自治运动联合会;(3)国民党向内蒙东部地区大举进攻;(4)党的方针是团结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各阶层人士,开展自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提出“成吉思汗子孙团结起来,粉碎美蒋反动派的进攻”这么个口号有什么不对?

“反动透顶”在那里呢?不但口号这样喊,实际也是这样作的,内蒙骑兵各师正在前线打仗。我是一师的,当时我们正在通辽、中旗一带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作者故意掩盖这个历史事实,说成象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口号,加以批判,其手段之恶劣,目的之卑鄙,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而且这里说“在这样一个时代、反革命‘内人党’公然抛出这个反动口号,真是反动透顶”。这个口号究竟是谁提出的?是内人党还是共产党?大家听一听下边一段话:“摆在内蒙古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内蒙古的成吉思汗子孙——包括王公喇嘛在内——团结起来,反对内蒙古民族的首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为内蒙民族自治与自决而斗争”。这是谁说的?是中国共产党说的,而不是“反革命内人党”说的,是引自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关于热河蒙民工作的指示》,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历史也真会捉弄人,似乎当时就知道了二十二年之后会有这么个丑角出来诬蔑内蒙历史,为了给他一个应得的难堪,这段话就预先写在这个文件里了。说也不怪,歪曲历史的人必然遭到历史的嘲弄,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法则。对这段话也许有人怀疑,它登在《中共内蒙古党史资料》上册第 80 页——_7 行里。(下略)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家牙含章批判大汉族主义

关于《牙含章民族问题的讲演稿》编者按:

牙含章是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者,五十年代在西藏自治区党委任统战部长,一九六五年乌兰夫要采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文化革命”初被打“乌兰夫黑帮”受到迫害。军管撤销后,于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牙含章同志挺身而出批判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大汉族主义。尤太忠是继郑维山之后的军管领导人,军管虽已撤销,他仍任自治区党政军一把手,他极力维护军管错误,阻挠批判陈、李、郑。那时王洪文在中央主持常务,保护和支持尤太忠。于是在北京召开《批林批孔汇报会》。《内蒙古日报社》负责人江波是个挖肃派,拥护军管,他用卑鄙手段,以请牙含章到报社讲演为名,将其讲稿骗来,转送北京。尤太忠组织专业“拔牙队”开到北京进行批判。中央领导人纪登奎主持会议,李先念讲话骂牙含章是“反动民族理论家,没有你内蒙古羊儿照样跑,妇女照样生孩子”。那次,我也因批了军管的错误,被拿到这个会上挨整。我与牙含章住一个房间,会议领导人给我任务,叫我注意不要出事。牙却坦然处之,呼呼大睡。会后将牙含章放到河南一个工厂劳动改造。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给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一位汉族同志,在那个年代里,敢于挺身而出替一个少数民族说话,讲求真理,声讨邪恶,实在是令人崇敬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尤太忠的“拔牙队”按:牙含章同志是内蒙古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党的领导小组副组长。今年四月以来,他以《狠批林彪死党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在内蒙古地区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为题,在内蒙古大学发表讲演。讲演稿经过传抄翻印,在内蒙古流传很广影响极坏。现将这篇讲演的全文印发到会同志,供批判。)

牙含章关于民族问题的讲演稿

(一)

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在内蒙古自治区所犯的反革命罪行的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内蒙批林批孔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内蒙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问题在这里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所以我的发言着重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陈李郑在内蒙地区践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祖国统一的反革命罪行。

林彪的路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它的实质是极右的,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表现在国内民族问题方面,就是实行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践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祖国统一。下面我只举三件事实,说明林彪死党陈李郑在内蒙地区执行的就是大汉族主义。

第一、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陈伯达对郑维山讲:“你们到内蒙军管是拿上方宝剑去的,是征服者,不是胜利者。”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六日,郑维山在内蒙前指的会议上又讲:“我们来内蒙是征服者,不是胜利者。”重复了陈伯达的黑指示。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的地方提到“征服者”这个名词。马克思在论述印度民族问题的一篇文章中说:“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那些阿剌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尔人,总是不久就被印度人同化了。依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非常明白,“征服者”一词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是指旧社会的压迫民族而言的。我国现在是新社会,我们伟

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既不存在压迫民族，也不存在被压迫民族，当然，我国既不存在“征服者”，也不存在“被征服者”，这是很明白的道理。我们要问陈伯达和郑维山，你们既然是“征服者”，那么“被征服者”又是谁呢？

事实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内蒙地区是我国最早实现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是一个蒙族为主体，实行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内容的民族区域自治和地区，毫无疑问，林彪死党郑维山到内蒙来，就是为了要“征服”居住在内蒙古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就是为了要“征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蒙族人民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实行区域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就是要取消民族区域自治。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践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特别是破坏蒙汉团结），危害祖国统一。

林彪死党陈伯达和郑维山自己承认他们是“征服者”，而把内蒙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置于“被征服者”的境地，这就赤裸裸暴露了他们与内蒙各族革命人民为敌的狰狞面目，他们是一伙挂着共产党员牌子，披着解放军外衣的大汉族主义者，是一伙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他们嘴里讲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实际做的是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第二、林彪死党郑维山窜来内蒙以后，胡说他“走遍四盟二市，没有发现一个好干部。”这是对内蒙各族革命干部的恶毒污蔑，也是反对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反对内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郑维山胡说“四盟二市没有发现一个好干部”，这当然是指内蒙地区的整个干部说的，既包括了蒙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也包括了在内蒙地区工作的广大汉族干部。伟大领袖毛主席认为干部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对干部的一个总的看法，也就是我们观察干部问题的基本观点。而郑维山却胡说内蒙没有一个好干部，这不是和毛主席唱反调是什么？这不是在干部问题上反对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

毛主席又教导说：“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这是毛主席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指示。因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由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个政策需要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来执行。内蒙古自治区自一九四七年建立以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方面是有成绩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严格审查和考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论断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但是郑维山却胡说内蒙没有一个好干部，他讲这个黑话的目的是什么？他无非是要说明内蒙都是坏干部，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当然也都是坏干部。既是坏干部，当然不能当家作主，不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所以林彪死党郑维山虽然没有公开取消内蒙古自治区，没有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际上就是要取消内蒙古自治区，实际上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林彪死党郑维山当时是内蒙的第一把手，他不光是说说而已，他是怎么说就怎么干的。郑维山根据他的内蒙“没有一个好干部”的荒谬结论，就制定了一个内蒙干部大换班的荒谬计划，并且立即付诸实行。他把内蒙地方干部八千多人强迫迁往区外学习班。另从北京部队、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省市调来了大批新干

部，接替了原来的工作。从此以后，在内蒙古地区提任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的干部中，蒙族出身的干部只剩下了吴涛同志一人，而且也不负主要责任。在盟市旗县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中，蒙族出身的干部不要说没有一个当第一把手的，就是当第二把手的也不多。所以从实质上讲，郑维山主持内蒙工作的那一时期，内蒙古自治区实际上是被取消了，因为当家作主的都不是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那还叫什么民族区域自治？这就是林彪死党郑维山践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铁证。

第三、林彪的另一死党黄永胜在谈到内蒙问题时，恶狠狠地说：“少数人怎么能当多数人的家。”大家一听就明白，他所说的“少数人”，就是指内蒙古自治区的主体民族——蒙族人民而言的，他所说的“多数人”，显然指的是居住在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民。黄永胜的这句话不仅恶毒地攻击了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且是恶毒地挑拨蒙汉民族关系，破坏蒙汉民族团结，妄图煽动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民起来反对蒙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反对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其用心是极其恶毒的。

由于历史上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长期的压迫剥削。我国少数民族很少有完整的聚居区，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形成各民族杂居状态。这是我国客观存在的事实。全国解放以后，党和国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决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时，有意识的把许多民族杂居地区划入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之内。这就产生了有些民族自治地方的主体民族在人口方面不占多数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就是如此，还有许多自治地方也是如此。这正表现了毛主席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英明伟大。

林彪死党黄永胜恶毒攻击内蒙古自治区是“少数人”当了“多数人”的家，他不仅是攻击内蒙一个自治区，而是攻击了全国许多自治地方，因为我国还有些别的自治地方也是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汉族人口占多数，按照黄永胜的看法，这些自治地方都是“少数人”当了“多数人”的家，这样的自治地方都应该取消。所以黄永胜的这句话不仅恶毒攻击污蔑内蒙古自治区，而且恶毒攻击污蔑全国许多民族自治地方。

林彪及其死党陈李郑在内蒙古地区民族问题方面进行的反革命活动，并不是从一二·一九决定以后才开始的。在这以前，他们的黑手就已插了进来，干扰和破坏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笔帐也应和他们清算。

大家都知道，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从一九七〇年九届二中全会才开始的，但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抛出了～篇专门议论“政变问题”的讲话。林彪的这个“政变经”对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没有一点干扰和破坏。就在那个时期，内蒙也刮起一股黑风，说什么内蒙有一个“反党叛国集团”，“内蒙要发生宫廷政变”，“蒙古人要杀汉人”等等。这些黑话的罪恶目的，就是在煽动民族仇杀，妄图把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引向邪路。

内蒙地区在清队中又发生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这个严重错误的直接负责人是滕海清同志，但是林彪死党黄永胜也插了黑手，胡说：“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要挖尽。”滕海清同志正是因为背后有人撑腰，他才蛮干一气，误伤数十万蒙族干部和蒙族群众，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有的朋友给我说：你提出“反党叛国集团”问题，会不会被人误解为否定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正是为了肯定内蒙古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所以对这个问题要亮明观点，不能回避。

就在民族问题方面，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例如挖“新内人党”的问题，发生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现并纠正了，清队扩大化的错误，及时拨正了内蒙文化革命的航向。

这些就是内蒙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绝不允许否定的。至于在运动初期挖出的所谓的“反党叛国集团”，那是在林彪的“政变经”干扰下产生的一个虚构的问题，否定了这个虚构的问题，才能使内蒙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更加扎实，更加巩固。其实，经过党的十大的召开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选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际上已否定了那个虚构的“反党叛国集团”，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再产生任何误解。

(二)

现在，内蒙地区正在开展批林批孔的伟大运动。但是要把批判林彪死党陈李郑在内蒙地区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他们推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向广大群众进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再教育，作为内蒙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进行，还有很大的阻力。一部分阻力来自人们对这个问题还有不同的看法，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澄清。

第一个问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提出民族问题，批判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这是不是冲淡了批林批孔，这是不是大方向？”我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应该首先闹清楚。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表现在国内民族问题方面，就是实行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所以批判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就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林彪的大汉族主义，又是从孔老二那里继承下来的，孔老二是我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奉行的大汉族主义的祖师爷。所以，批判林彪及其死党的大汉族主义，也是批孔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认为，在内蒙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联系本地区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把批判林彪死党陈李郑在民族政策再教育作为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内容，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不仅不会冲淡内蒙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而是把运动引向更加深入。

为了进一步批判林彪死党陈李郑在内蒙地区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他们奉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林彪及其死党在民族问题方面推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不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反映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民族问题这个领域出现的一股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思潮。这种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虽然是从孔老二那里继承下来的，是历代统治阶级对待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但它也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有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特点。

林彪及其死党所推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的特点是：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有民族问题。所以他们也不愿意让别人讲民族问题。他们对“民族问题”四个字讳莫如深。他们一听见谁讲“民族问题”，就认为谁就是“民族主义者”，谁就是在搞“民族分裂”。搞“民族分裂”就是“叛国”，就是“敌我矛盾”，就应该对这种人实行“专政”。林彪及其死党就拿这种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大整我国的少数民族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

林彪及其死党的这种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谬论，特别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没有民族问题的谬论，也不是他们发明的，而是从苏修那里偷偷地贩卖过来的。苏联现在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国家，是修正主义国家；我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和苏联现在有本质的区别，这一点勿庸在此多说。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苏修《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上面说：“民族问题在苏联早就彻底解决了，它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解决的”。这就是民族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苏修不承认苏联国内还有民族问题，谁要说苏联国内还有民族问题，苏修就给谁扣上一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苏修的这种修正主义，实质上就是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它和林彪及其死党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是一丘之貉，本质上是一个东西，都是民族问题方面的修正主义，不过表现形式有些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在批判林彪及其死党所推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就是批判民族方面的修正主义。

从思想根源来说，林彪及其死党所奉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又完全是从孔孟之道那里继承了衣钵。孔老二是他们的大汉族主义的老祖宗。孔老二和孟轲生活的那个时代，我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那时的统治阶级把汉族叫作“华夏”，把少数民族叫作“夷狄”。孔孟之道对少数民族的反动谬论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日“严华夷之防”，就是对少数民族瞧不起，不信任，不以平等态度对待；二日“尊王攘夷”，就是主张对少数民族要实行武装镇压，就是要“征服”少数民族；三日“用夏变夷”就是以汉族的文明去同化少数民族。我国历代统治阶级就是根据孔孟之道的这些大汉族主义思想，制订了对待少数民族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政策。林彪在民族问题方面，完全继承孔孟之道的大汉族主义。所以在民族问题方面批判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批判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也必须批判孔孟之道，挖出它的思想根子。

由此可见，在内蒙古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在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必须联系本地区批判他们在民族问题方面践踏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祖国统一的罪行；必须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的大汉族主义；必须进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再教育；这是内蒙古地区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一部分，而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第二个问题，“民族问题方面有没有路线问题？有没有路线斗争？”，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族问题方面没有路线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主要解决九次、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民族问题主要是落实民族政策的问题，应该放在运动以后再去处理。”这种观点实质上就是在当前的内蒙地区批林批孔运动中，不让革命群众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就是不让批判大汉族主义，就是不让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

首先我们要问：民族问题方面有没有路线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党有基本路线，又有具体路线，这是全党所公认的。

那么，党的民族工作的具体路线是什么？我虽然没有看到明文规定，但这个问题也不难理解。我们常说，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具体路线的体现。这就是说：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等，就是党的民族问题方面的具体路线的主要内容。究竟用哪些文字把党的民族工作方面的具体路线正确地概括起来，恰当地

表达出来，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但这也不能说明民族问题没有路线问题。只有政策问题。

有人把党的民族工作方面的具体路线概括为四个字，就是“民族团结”。他们认为，“内蒙地区的民族问题方面的两条路线斗争，集中地表现为民族团结和分裂的斗争。”

我认为“民族团结”是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具体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毫无疑问的。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就说明了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但是用“民族团结”这四个字是不能把民族平等、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等概念包括进去的。所以，用“民族团结”四个字是否正确地概括了毛主席的民族工作的具体路线？我表示怀疑。

对于民族分裂主义，我们是坚决反对的。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都是搞民族分裂的，林彪及其死党的大汉族主义，大整少数民族革命群众，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祖国统一，这不是搞民族分裂是什么？林彪及其死党是以反对“民族分裂”来搞民族分裂的，他们认为，谁讲社会主义中国还有民族问题，谁就是搞“民族分裂”；谁反对大汉族主义，谁就是搞“民族分裂”；这些家伙就是用“民族分裂”这个封条封住了许多人的嘴巴，不让他们议论民族问题，不让他们批判大汉族主义，不让他们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所以在林彪死党郑维山统治内蒙的那个时期，人们都回避民族问题，都不敢讲民族问题，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很不正常的局面。所以，林彪及其死党讲的那种“民族分裂”，表面上好像是“革命”的，实质上是反动的；表面上好像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是大汉族主义的。这正是我们要批判的。只有批判了这种“理论”，才能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批深批透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才能广泛深入地开展民族政策再教育。

第三个问题：“大汉族主义要批判，地方民族主义也要批判”，“当前要警惕地方民族主义抬头。”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是对目前正在起来批判大汉族主义的少数民族同志施加压力，似乎他们是以地方民族主义反大汉族主义。对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才是对的？这也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有必要从理论上把它弄清楚。

从理论上讲，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我们共产党人是都反对的。而在反对一种倾向时，同时应该注意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实际斗争中，在一定时期只能反一种主要倾向，这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

我们就拿建国二十五年来实际斗争情况来看，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民族工作方面的斗争主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因为那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刚刚垮台，大汉族主义的流毒还很严重，如不狠狠地批判大汉族主义，就不能很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民族政策。所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发动了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斗争，持续了七、八年之久，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及其死党对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大整少数民族干部和革命群众。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发现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才发出了“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的指示。

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的英明指示。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明确指出了大汉族主义是当前民族问题方面应该反对的主要倾向，这就给我们指明了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在内蒙古地区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对这种状况各族革命群众是不满意的。所以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民族问题就必然要提出来，林彪及其死党陈、李、郑在内蒙古地区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必然要受到批判，这就是革命群众自发地起来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自发地在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

现在，批判林彪及其死党执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的斗争刚刚开始，矛头应该指向大汉族主义，把它批深批透。因为它是主要倾向。

有人看到目前在内蒙古地区批判大汉族主义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出身的同志，而且听到他们的发言比较激动，用词比较尖锐。就认为是“地方民族主义”抬了头，是以地方民族主义“批判大汉族主义”，所以他们提出“要警惕地方民族主义”。

“既要批判大汉族主义”，“也要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其实，对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汉族同志和少数民族同志都应该批，而且汉族出身的同志批大汉族主义更为有力。少数民族出身的同志，因为他们亲身受到林彪及其死党的大汉族主义的伤害，憋着一肚子气，所以他们批判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时，感情容易激动，用词比较尖锐，这是很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这和地方民族主义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的。有些人却把少数民族同志对大汉族主义的这种气愤，误认为是“地方民族主义”抬了头，认为也应该批。这就实际上给这一部分同志的头上泼了冷水，对发动他们起来狠批林彪及其死党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是不利的。

(三)

内蒙古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后，有些同志联系内蒙古地区的实际，联系本地区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就很自然地提出了林彪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就很自然地要批判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实际上这就是革命群众自发地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这是完全正确的，大方向是对头的，所以我坚决予以支持。但是要在内蒙全区开展这场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这就需要内蒙党委对这场斗争的重视，把它作为内蒙古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有力地领导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遗憾的是，批林批孔运动已开展了三个多月，内蒙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对民族问题还是很重视，对民族政策再教育还是很认真，对落实民族政策还是很不得力，对革命群众自发进行的批判林彪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的斗争，始终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因而这场斗争目前还处在自发状态，这是很不利的。

内蒙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对内蒙古地区的民族问题采取这种态度，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央负责同志对内蒙工作作了具体指示。特别指出：“党内党的平反工作方面还有不少遗留问题”，要内蒙党委抓紧解决。可见中央负责同志对内蒙古地区在清队中大挖“新内人党”的问题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内蒙党委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这个指示又采取了什么态度呢？挖“新内人党”以后究竟遗留的问题有多少？是些什么问题？内蒙党委组织专人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如何处理这些遗留的问题？政策界限如何掌握？内蒙党委又认真研究了没有？挖“新内人党”已经五年过去了，遗留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处理完毕，究竟还要拖到什么时候呢？能不能规定一个时间，限期完成呢？据我所知，内蒙党委也是照例召开会议，照例传达了中

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照例组织参加会议的同志讨论了一遍，也就完事大吉，具体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会后内蒙党委也不督促检查，完全放任自流。这就是内蒙党委对中央负责同志指示的态度。

由于挖“新内入党”以后遗留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特别是内蒙地区究竟有没有一个数十万人的“新内入党”这么大问题始终没有结案。内蒙党委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表态，所以许多被打成“新内入党”的同志思想上仍然背着包袱。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呼市街头出现了“新内入党”的复活是内蒙最大的复辟等三条大幅标语。这就更刺激了过去被打成“新内入党”的这些同志的感情，从而就爆发了革命群众自发的起来批判林彪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上的反革命罪行，批判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的斗争，这是必然要发生的现象。

有人认为：挖“新内入党”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牵涉面又很广，不仅涉及四盟二市，而且还涉及东三盟，这个问题只有中央表态以后，内蒙党委才好结案。我认为这个问题，应由内蒙党委负责解决。内蒙党委应该组织一个专门的班子，在区内区外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做出究竟有没有“新内入党”的结论，然后报中央批准后向全区广大群众公布，这就可以解除数十万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包袱，对于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加强党内军内的团结，是十分必要的，是非常有利的。

以尤太忠同志为首的新内蒙党委成立快三年了，做了不少工作，但对民族问题始终采取应付态度，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反复向全区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没有对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没有迅速处理挖“新内入党”遗留下来的问题，使自己在民族问题方面陷于被动，远远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目前到了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

为此我向内蒙党委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希望内蒙党委的负责同志明确表态，支持当前起来批判林彪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上的反革命罪行，批判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的这些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并且希望内蒙党委的负责同志站在这一运动的前列，带头揭，带头批，把这一斗争当作全区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当作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大的大非问题，领导全区坚决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二、建议内蒙党委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认真检查一下内蒙地区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特别是认真检查一下挖“内入党”以后遗留问题的处理情况，狠批林彪死党陈李郑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反革命罪行，狠批他们推行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根据确实存在的问题，和内蒙地区的具体情况，作出切实可行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各项决定，在全区贯彻执行。

第三、建议内蒙党委成立一个工作组(或调查组)，负责在全区调查研究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批判大汉族主义，落实民族政策的情况(特别是挖“新内入党”遗留问题的情况)，及时向内蒙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同时也监督内蒙党委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落实民族政策，认真批判大汉族主义，防止发生“走过场”的情况，以便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编者注: 为了节省篇幅作了点删节)

乌兰夫复出民族工作拨乱反正

文化革命结束, 华国锋、胡耀邦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非常重视民族工作, 安排乌兰夫出任统战部长在民族工作上拨乱反正。1979年4月25日乌兰夫在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指出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 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遭到了巨大灾难, 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和难以估量的损失。他们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 疯狂破坏党的民族政策, 任意撤销和分割民族自治地方, 取消民族工作。他们继承国民党反动派的衣钵, 实行封建的、法西斯的反动民族政策, 肆意践踏党纪国法, 采取极其野蛮的手段, 严耐逼供, 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所谓“叛国集团”、“里通外国集团”等等冤假错案。

1981年7月14日, 乌兰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的文章, 全面阐述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现将这篇文章要点摘录如下:

过去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 把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当做敌我矛盾看待, 甚至把一些正当的民族感情和正常的工作意见也当做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

有些同志以为,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只要挂那么一块牌子点缀点缀, 吸收那么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帮衬帮衬, 这就够了, 如果由这些同志去推行民族区域自治, 势必搞得名大实小, 甚至有名无实。

有些同志还带着大汉族主义的思想, 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遗产, 封建时代贵华夏贱夷狄的传统观念。存有这种陈腐观念的同志总是不大信任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 不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因此, 他们虽然口头上也讲民族区域自治, 实际上却往往虚应故事, 或者搞包办代替。

在有些民族自治地方, 少数民族干部往往是任正职的少, 当领导干部的少, 在重要部门工作的少, 在党的机关工作的少, 当了领导干部而真正有职有权的少。

当前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的要求, 主要有以下五点:

1、他们要求按照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享有自治权利, 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方事务, 一切工作都从本民族、本地方的实际出发; 他们不同意搞成“自治不自治一样”, 不赞成在工作上和其他地区“一刀切”。

2、他们要求妥善保护和合理开发本地方的自然资源, 维护本民族、本地方的经济权益, 合理解决农牧矛盾, 迅速制止人口的盲目流入, 妥善解决盲目流入人口的问题。

3、要求上级在财政经济上对民族自治地方放宽政策。

4、要求加强安定团结。

5、要求抢救和清理民族遗产, 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 繁荣民族文化。

我们讲全民落实和及时推进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基本问题有两个, 一个叫民族化, 一个叫自治权。民族化是行使自治权的必要条件。民族化有几个方面, 而中心环节是自治机关的干部民族化。自治机关的组织和 work, 应当以实行自治的民

族的人员为主，这就是说，自治机关的主要领导职务，必须由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担任；在自治机关的组成人员中，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必须占有和这个民族作为当地主体民族的地位相称的比例，并要切实保证他们真正有职有权有责。

我们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主要就是让能够忠实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当地民族群众、充分掌握当地民族特点、深刻理解当地民族心理的当地民族自己的干部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

关于汉族人口比自治民族人口多，如何自治问题。我们说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民族”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这“区域”以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为基础；这“自治”，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的自治。汉族在全国占绝对多数，用不着在民族自治地方内另搞自治，在自治机关中用不着也为主。如果自治机关不以实行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那就不成其为民族区域自治了。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说的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要认真做到少数民族为主，汉族为辅。

1980 年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特别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胡耀邦同志就西藏工作问题作出了重大决策，它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其他民族自治地方。这项重大决策体现了党的政确路线，发展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获得了真诚的拥护。

附：

中共中央 1980 年 4 月 7 日以 31 号文件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要点：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受了很大摧残，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产生了相当的隔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才能恢复各民族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发展建设，总结过去的经验。今后必须注意：

1、中央各部门的一切决定和措施必须首先确实得到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的真心同意和支持，否则就要修改或等待。

2、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舍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3、内地调往西藏的干部，要根据实际需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要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

4、要特别注意培养民族干部，逐步做到自治县以上党政群机关以藏族干部为主，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

5、重视使用藏文藏语，汉族干部要学习藏语藏文，民族干部要学习汉语汉文。藏汉各族学生都要学习藏文。

中央通知的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全国其他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县。

编者代表广大受难者致信感谢华国锋

华老国锋同志:

内蒙古在文化大革命的“挖肃”运动中,挖了几十万“反党叛国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多年来,我同广大受难者一样,对于这个“反党叛国”的“内入党”究竟有没有,是“扩大化”了,还是根本就不存在,极为关注。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它是笼罩在内蒙古上空的疑团乌云,是悬在内蒙古人民头上的一把凶剑,所以成了人们时刻在思考的头等大事。“文革”宣告结束以后,1978年,在你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彻底否定了这个“新内入党”的存在,从而搬掉了压在内蒙古人民头上的这块磐石,蒙古民族将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德。

在“文化革命”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滕海清将军在康生等人支持下,凭空挖出几十万莫须有的“反党叛国的内入党”造成了蒙古民族的重大灾难。由于当时是“文化革命”的极左时期,1969年5月,毛主席他老人家纠正这桩冤假错案时批了个“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的含糊不清的话。对此,康生、黄永胜以及执行“挖肃”路线的军管期间和内蒙古新党委的领导者们,把这个批示演变成了“挖内入党扩大化”,不给误伤受害的干部、群众做彻底平反。坚持“内入党”还是有,只是“扩大化了”的观点不放。“挖肃”案卷,如同宝物,东躲西藏,转这里转那里,最后转到一个安全地方去了。

19了6年粉碎“四人帮”,“文化革命”宣告结束,各个领域全面清“左”,拨乱反正。然而,内蒙古的领导班子争权夺利,热衷于派性清查,仍然没有对“内入党”平反的动议。在广大受害者痛苦绝望的时候,是你华国锋同志突破“凡是”,纠正毛主席他老人家“扩大化”的批示,彻底否定了这个“反党叛国”的“内入党”的存在。蒙古民族才得以重见天日,受到信任,回到党的怀抱。对内蒙古地区来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拨乱反正。内蒙古人民所以对你由衷的感激是因为你华国锋同志担着巨大风险做出这样一个勇敢的决定。如果没有忠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胆略,没有一颗关怀少数民族的仁爱之心,是不可能做出这样重大决定的。本来所谓“新内入党”是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可是上上下下,掌权的“挖肃派”领导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谁也不肯出头否定它的存在。假若不是你华国锋同志在二十年前做出过这个决定,根据后来的政治形势,恐怕“内入党”这个冤案到现在电不会有人出来彻底否定了。

在你1978年4月20日彻底否定“内入党”的存在之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于1978年12月在王铎等人主持下,做出了一个与你彻底否定的批示相悖的结论。他们认定,全区性的“内入党”是没有,但是反党叛国的小党派还是有的。他们说没有“内入党”的保票不能打,仍然坚持着“扩大化”的观点不放。

滕海清挖“新内入党”及其变种组织成百上千,历史已过去三十年了。他们所说的这个“反党叛国”的“小党派”在哪儿呢!一星半点儿也没有发现。历史已经证明。你华国锋彻底否定“新内入党”的存在是正确的,是站得住脚的,谁也休想推翻这个历史性的正确结论。

祝你健康长寿

2002年2月2日

内蒙古“文化大革命”没有全面彻底否定

中央对于“文化大革命”早有定论，并指出在这场动乱中出现的这个派那个派，都是错误的产物，哪一派也没有“正确”可言，都要彻底否定。然而在我们内蒙古却是“一派正确，一派错误”，军管也“正确”。为何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当时的军管领导人尤太忠以军管划线。尤太忠走后，王铎接管清查，以他自己划线，将他的《无产者》一派定为“正确的一派”、“保党派”。因而未能正本清源，拨乱而未反正，形成一派掌权体系，从而导致内蒙古政治失衡，权利倾斜，工作落后，腐败盛行。这个扭曲的历史为何没有得到纠正，这是因为继往开来的内蒙古领导人都是从区外来的，他们不了解内蒙古“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不知道“三大冤假错案”是怎么回事，他们也不想解决这个纷繁缠绕的历史遗留问题。内蒙古当地领导人廷懋复出任第二书记之后，于 1981 年 7 月 1 日在干部大会上宣布两派都参加了极“左”竞赛，没有哪一派是“正确”之说，都要否定。然而，他不是实权人物，说了无用，未能奏效。十年浩劫。内蒙古的灾难是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挖“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两派的极“左”竞赛，争夺“左”派桂冠，都是围绕这个主线展开的，怎能说还有“正确”一派呢！

一、内蒙古有“正确一派”吗？

内蒙古与其他省区不同，“文革”一开始就定下打“乌兰夫黑帮”的大方向。区党委高锦明、王铎、权星垣等“左派书记”们，在打“乌兰夫黑帮”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并且层层封“左派”指定“文革领导小组”。这个所谓的“正确一派”在运动初期是打“乌兰夫黑帮黑线”、“土家村云家店”、“黑五类”、“破四旧”、制造“红色恐怖”、“横扫牛鬼蛇神”的“左”派队伍。进入批判“反动路线”、“唯成份论”阶段，受压的群众和受害的“黑五类”，还有些同情不平的群众杀出来造反，成立《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呼三司》。在此以前出现的《红卫兵》一司因犯了“唯成份论”错误失势，从而改头换面招牌换记为《二司》。“文革”进入 1967 年全国夺权阶段，两大派对峙。军区黄王刘张违反军委三条指令，持枪介入，支持《无产者》、《红卫军》、《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红卫兵二司》一派，激化矛盾，发生两派冲突。中央电令两方、两派去京谈判。就在中央调查处理阶段，军区支持的《无产者》一派违反总理停止冲突、防止扩大事态指示，将对立派《呼三司》镇压下去，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由于这一派造反过头，非但不听中央号令，还以谎言假话欺骗中央，抓人打人，监狱塞满，各个单位在夺权中将对立派的人捆绑、关押、毒打、请罪，造成极度恐怖，干的错事坏事太多太严重，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做出《八条决定》将王铎的《无产者》一派定为“保守组织”，《呼三司》定为“革命群众组织”。“文革”结束以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付崇碧写的《回忆录》中 182 页写道“有一次，内蒙造反派来北京，大约有一千人，提出一些无理要求，周总理亲自做工作。造反派开了枪，总理还不走。我把总理强行拉走。后经中央批示，由卫戍区把这些造反派押送到 38 军管教。付崇碧在

这里说的造反派，就是军区、王铎支持的所谓的“保守派”。当时中央号召造反，又将造反夺权组织定为“保守组织”当然是定错了。“文革”到 1968 年，滕海清将军在康生、江青指引下，在已经打倒乌兰夫的情况下，开展“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运动，进而挖“内人党”打“叛国集团”。进入“挖肃”阶段，尤其是到深挖阶段，“造反派”掌权体系的干部群众很多人跟不上“挖肃”形势，落伍掉队，“右倾保守”了。于是滕海清号召动员被错定为“保守组织”的群众踢开“假洋鬼子”（指造反派大小头头）投入“挖肃”运动立新功。于是“保守派”的群众纷纷响应，当了“二造反”，这时原“保守派”和“造反派”的群众组织重新组台，两派分化，出现新的阶级队伍。在滕办的操持指导下，宣布这个队伍称之为“挖肃派”。那些原“保守派”的干部群众参加“挖肃”之后立功心切，干的非常凶狠，他们说“运动初期就把你们这些黑帮黑线揪出来了，你们造的是谁的反！”后来的严重伤残，大都是这些人干出来的。如打死内蒙古物资厅金雪云的杜文俊、高祥顺、秦永恒、王一平等人都曾是所谓“保守派”的干将。1969 年“5. 22”毛主席批示下来，滕海清和“挖肃派”处于不利形势。反对“挖肃”而受压和误伤受害的群众形成强大的“批滕派”队伍，于是内蒙古又出现两大派的对立。“挖肃派”虽然错了。因为有军队和黄永胜的支撑，有恃无恐。一派有理，一派有力。“天下之事，理胜力为常，力胜理为变”。当然有理的顶不过有力的。黄永胜制造“内人党平反一风吹”说批滕搞乱了内蒙局势，实行了军管。郑维山执行军管任务，认为“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颠倒了，保守的成了造反的，造反的成了保守的”，扶“挖肃派”压“批滕派”，将军管权利逐渐转交给“保守派”出身的“挖肃派”。军管将内蒙古干部分为四等：一等是“保守派”出身的“挖肃派”，二等是“造反派”出身的“挖肃派”，三等是“保守派”出身的“批滕派”，四等是“造反派”出身的“批滕派”。到 1974 年“批林批孔”中，受压的“批滕派”批陈李郑，批军管。“呼三司”郝广德批郑维山的“颠倒论”，“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时两派由“挖肃派”和“批滕派”又演变为“拥军派”和“反军派”。从上述两派的斗争史，人们不难看出“保守派”并不保守，他们的造反精神也够可以的。所谓“保守派”也者就是“保党派”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有保守的群众组织，或许有一个，那就是《土默特旗东方红联社》。这个组织的出现是因为乌兰夫倒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土默特籍的蒙族群众起来造反自求解放。就这个《土联社》在北京四方谈判时，被“正确一派”的《红卫军》司令张三林猛攻《呼三司》序列里有“为乌兰夫黑帮翻案的反动组织”。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正确一派”的正确在哪里？

二、内蒙古有“二月逆流”吗？

全国都知道，在“文革”夺权动乱阶段，在中南海发生过几位老干部向林彪、江青抗争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在内蒙古，王铎、王逸伦和他这一派有过这种性质的行动吗？没有。1967 年 4 月 13 日，中央处理内蒙两派的决定中，对王铎一派定的是“保守组织”而不是“二月逆流”。内蒙古的权力机关也从未定过什么“二月逆流”。所谓“内蒙古二月逆流冤案”是对“保守组织”的升华，然后再改换为“正确一派”载入史册。这样一变再变，王铎、王逸伦和他的“保守派”的历

史地位就拔高了, 荣光了。那么, “内蒙古二月逆流”之说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是从《人民日报》“反革命复辟逆流”一词而来, 中央《4. 13》决定之后, 赢得官司的《呼三司》造反派在批斗二王和“保守派”头头时用了。这个当时的时髦上纲的语言。在以后的《内蒙古日报》上也常见这个“二月逆流”用词。内蒙古的“保守派”是不是“二月逆流”, 这要看他们在那一段干了什么。1967 年春全国形势是打“刘邓陶”向“走资派”夺权。“内蒙古二月逆流”这一派保“刘邓陶”了吗? 没有。非但未保还打了。保自治区党委 r 吗? 没有。非但未保, 还把不支持他们的区党委书记们都抓走了。他们反对夺权动乱了吗? 没有。非但没有反对, 还全面夺权 r。这个“保守派”的口号、纲领、行动大大超出了《呼三司》造反派。这有他们传单为证。《无产者》1967 年 4 月 9 日印发的第 2 号图文并茂的铅印小报第一版头条载“本报讯: 呼和浩特革命造反派七万余人, 四月三日在新华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和游行示威, 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国修正主义总根子刘少奇的罪行。他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勾结, 狼狈为奸, 网罗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企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 彻底埋葬乌家王朝, 坚决打倒乌兰夫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高锦明, 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这张传单里还报导他们“查封了刘少奇黑修养, 在电影宫前广场焚毁了七千张刘少奇丑像”。他们在这里将对立派《呼三司》也攻击为“反革命复辟逆流”。在两派撕打对骂, 相互攻讦中, 双方都用 r 这个时尚的政治语言, 谁给谁平反哪! 两方都是造反派, 各保一方打~方。《无产者》保王铎打高锦明; 《呼三司》打王铎保高锦明。两派都打“乌兰夫黑帮”。中央将其一方定为“保守组织”当然是错了。但不能将错就错, 变换成为“内蒙古二月逆流”。内蒙古党委于 1979 年 1 月 22 日以(79)10 号文件上报中央的《关于彻底推倒“内蒙古二月逆流”冤案的请求报告》是王铎弄权编造假话, 骗取中央批示的以错纠错的产物。把造反派错定为“保守派”, 纠正之后还其本来面目, 仍是“造反派”。

三、内蒙古的军管是“正确”的吗?

内蒙古应不应该军管, 当然不应该军管, 军管是错误的, 在全国也只有内蒙一家军管。有人说内蒙乱了, 军管是必要的。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在那个动乱年代, 哪儿不乱, 全国都乱, 而且很多省市动了枪炮, 那为什么没有军管? 乱, 不是原因。对内蒙军管是林彪反党叛国集团的需要, 因为滕海清按照他们的旨意挖“内人党”捅了大漏子, 广大受害者都起来批滕, 他们所支持的“挖肃派”顶不住了。为此, 他们制造“内人党平反一风吹”、“内人党”批滕作乱, 内蒙古部队不可靠, 要兵变, 内蒙古存在着“反党叛国”的危机! 军管一来就宣布“内人党”平反落实政策文件废止; 除留少数“挖肃”骨干, 所有干部端到区外办隔离学习班; 受审查干部全都移过黄河南岸; 重新挖找“内人党”证据; 牧区“掺砂子”, 边民内迁, 引进盲流实边; 组建兵团, 牧区全面开荒; 军纪败坏, 掠夺内蒙财富; 调运内蒙资材, 给林彪修纪念馆。其结果, 在当时计划体制下, 人口、职工、粮食三突破, 内蒙古经济跌入困境。1971 年尤太忠要开党代会, 起草报告送中央。总理批评政治部主任王弼臣“你们必须检讨郑维山问题, 否则不叫你们开会”。军营对“内人党”不但停止平反落实政策, 而且于 1972 年以(42)号文件打假报告欺骗中央说“内人党”平反落实政策工作完了, 误伤群众很满意; 为了拖长军管时间, 屡向中央谎报敌情, 说内蒙敌我阵线不清, 派性没有解决, 外地学习班不能回来。内

蒙古被挖受害干部群众为何对军管持否定态度,这是因为滕海清、郑维山、尤太忠一脉相承,执行了林彪“四人帮”不信任内蒙干部的错误政策。军管对内蒙干部有几不用政策。其中一条是有民族情绪的不用。人都打坏了,不给平反,有点怨言、牢骚也不行。那么,对军管有没有说好的呢?有。“挖肃派”是满怀激情地欢迎军管。如果不叫军管,那就没有他们的光景了。拨乱反正之后“挖肃派”仍然不臭是军管留下的后遗症。东三盟的“挖肃派”可都臭了,那里划给东三省,没有军管,像赵玉温、尚民这些“挖肃”领导人都受到应有的处理,所以拨乱反正就较为彻底,“挖肃”受害者扬眉吐气。而西部区的受害者只得了个“平反证”而已,怨气未得出。

四、王铎是“正确路线代表”吗?

胡耀帮同志是个非常坦诚之人,说他在“文革”中也有错误。陈云同志从党的原则利益出发,客观地分析“文革”这场灾难,教育全党干部,也从未提及自己正确。在全国也投有听说过哪位领导人标榜自己正确。唯独内蒙古的王铎说他和他的派是“正确”的。所谓“一派正确,一派错误”以及将“保守组织”错案改装为“内蒙古二月逆流冤案”与“内人党”“叛国集团”并列为“内蒙古三大冤案”,都是由王铎策划构造出来的。王铎在他《五十春秋》中是如何装修自己和他这一派“正确”的呢,“一司、红卫军、(无产者)保各级党委、保革命领导干部;呼三司主张打倒一切旧党委,打倒一切当权派”、“大中专院校成立红卫兵司令部,破四旧,搞红色恐怖,揪斗黑帮、黑五类,一片恐怖,我无限忧虑,心焦如焚,思想搞不通,这哪里是文化大革命,简直是文化大破坏!”、“文革灾难中全家受害,二儿子王××和王逸伦二儿子王××被关进监狱几个月”。王铎这样描绘自己,可能一点儿也不感到惭愧。如果他不是健忘的话,1966年12月29日在政府礼堂“黑五类”受害者控诉大会上,不是由他王铎代表二王(王铎、王逸伦两位正确领导人)向被打伤残的“黑崽子”检查纵子行凶管教不严的错误吗!愤怒的学生声讨要人,要揪斗他们的儿子。区党委高锦明为了叫其躲风。放到公安机关保护起来。将保护措施也说成“受害”,这叫有权就有理,怎么说都行。王铎说《呼三司》主张打倒一切,是错误的造反派。然而就是这个《呼三司》刚刚出世,区委书记里面不是他王铎第一个表态支持的吗!我们从王铎《五十春秋》中再看一段他的哗众取宠的假话谎言。“74年内蒙党委报请中央,对新内人党按扩大化处理的讨论会上有过激烈的争论。我提出新内人党根本不存在,是一大假案、冤案、应完全推倒,彻底平反。有几个领导同志则坚持说扩大化是毛主席说的,不能彻底平反,某某人承认是内人党至今也不推翻”。王铎多么会编,成了剧作家了。按他自己所说以及历史记载,他是在1975年才复出,而他却在前一年就参政议政了。况且在当时来说,彻底否定内人党的存在,是一个足以震动朝野的伟大意见。但是因为这是一个虚构的谎言根本就没有这码事。所以谁也不知道,查无此事。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受军管压制不得说话的广大受害者猛批“陈李郑”及军管,要求平反的呼声强烈震撼了军管体系。为此,尤太忠发了个敷衍应付的(74)48号平反文件。王铎其人是个两面人物,他一方面对受害者表示极为关切,另一方面又极力保护“挖肃积极分子”。1978年4月20日。中央对“内人党”彻底平反,于是各单位也按他清查帮派的办法。把打死人的专案组人员集中起来,办说清楚学习班。刚刚办起来,王铎听到之后,紧急召集各单位党组成员会议,勒令解散。他说“挖肃”责任

在核心小组那几个人,广大挖肃积极分子是没有责任的,这些人提职晋级入党都仍然有效,不影响信任使用。并立即用党委办公厅文件发往各单位。这就不难看出,王铎所真正关心的是他的“挖肃”队伍,稍有触及就如此紧张。因为只要将制造冤假错案的“挖肃派”纳入清查,他这个“正确一派”的阵角就要崩塌。王铎、王逸伦是不是“乌兰夫的代理人”?当然不是。“受乌兰夫排挤”的“左派书记”怎能是“代理人”呢。中央《4.13 决定》是错误的,应当平反纠正,还其“左派”书记头衔。那时乌兰夫已经被打倒了,谁也不愿意当这个代理人。可是当乌兰夫复出之后,就有人抢戴这个帽子了。王铎说“75 年初,中央准备安排乌兰夫工作,我的问题与乌兰夫有关,连在一起,他解放工作,我的问题也解决了,75 年 2 月任内蒙革副主任”。王铎俨然以乌兰夫代理人自居,将自己紧紧地与乌兰夫连上 r。1967 年北京“四方谈判”时,王铎是以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到了后期,他对两派胜负判断有误,以为军区支持的《无产者》一派已全面夺权,既成事实,遂向王逸伦学习,离开区党委集体,跳到《无产者》方面去了。这是属于造反行动。“文革”结束后,王逸伦也以“代理人”、自我“正确”炫耀自己。他也忘记了运动初期曾以“受排挤”的“左派书记”面目出现,在第一线指挥打黑帮黑线场景,以及两派夺权的狼烟一起,他就从区党委集体班子中杀出来+召开部分厅局长黑会,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造反行动。要说“造反派”,王逸伦是内蒙第一号造反派。当然,他被康生点为“特务”的耻辱是令人同情的。就在当时而育,连反对王逸伦的人们也认为那是胡说八道。但是,二王是因祸得福的内蒙最大“受益户”。晚倒的不如早倒的,如果在“挖肃”中倒,那可就惨了。

五、吴涛是帮派挂帅人物吗?

十年“文革”结束后,在内蒙古大地上发生过的所有灾难的罪责全部泼到吴涛头上。这位道貌岸然的“不倒翁”,终于被“左派”们推倒了,而且钉到林彪、四人帮的历史耻辱柱上。嗟乎,悲乎!这是很不公正的一桩历史冤案。谁不知道吴涛在“文革”中是怎么过来的。运动初期他就被军区“正确的左派领导们”违抗叶帅指示,硬是把他打成“乌兰夫黑帮”、“三反分子”关进牛棚。中央处理两派冲突以后,才叫他出来辅佐滕海清以及后来的郑维山、尤太忠吃“民族饭”做个陪衬当个副手,何曾有过一天实权。充其量他不过是中草药处方中的一味甘草而已。在内蒙古这个地方,没有这样一个摆样子的蒙古族干部也不行。十年“文革”中,吴涛一直在台上,那是中央的安排。他个人并没有投机钻营卖身投靠于林彪、“四人帮”。也没有培植经营自己帮派。打吴涛是“帮派挂帅人物”,那是生拉硬扯。

吴涛是个很有修养,循规蹈矩,遵守纪律,明哲保身的人,他哪是个“帮派挂帅人物”。在长达十年的“文革”过程中,这位劝导别人“要说正确话”的“吴老正”,自己却说过不少错话。然而那都不过是配角对主角的帮腔而已。当滕海清的“挖肃”开始出现问题时,吴涛出来讲“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不能完善无缺,挖出这么多敌人,不可能一个错的没有,但这是支流”。当到了深挖阶段,大量死人,而且已经挖到他本人周围,身边的人一个个挖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哀叹“凡是跟我一起的都抓起来了,就只剩我自己了”。就在这种泥菩萨过河的处境下,他仍然出来违心的为滕海清保驾护航,“这么大的运动,怎么可能不发生一点偏差呢!要看主流。挖敌人,也可能好人碰着一点,刮着一点。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嘛!”。吴涛的悲剧就是这么演出来的。滕海清将军捅大漏子走了,实行军管

了。跟着滕海清犯了“挖肃”错误的吴涛本应去唐山学习班“斗私批修”，可是他无此福分，中央仍叫他留下来辅佐郑维山。这位将军比滕海清还要霸道，哪把吴涛放在眼里。可怜的富有修养的吴涛忍不住了，发起牢骚，放出怨言“连个文件也不给看，他妈的，倒也好！”不久郑维山滚蛋了，尤太忠来了。吴涛对新的一把手仍是尽心辅佐，尤太忠念错了讲稿，吴涛在旁给予点正。充当这样的配角也够难受的了。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正确”的“左派”们硬是把他撩倒了。而尤太忠紧跟林彪、“四人帮”说过那么多错话，办过那么多错事，却是“正确”的，哪里有公道可言。军管是扶“挖肃派”压“批滕派”。而“批滕派”同情、理解吴涛，并且希望他对军管中受压的这一派和受害的群众不得平反落实政策说话。吴涛也就为两派的平衡和误伤受害群众落实政策的问题表示过意见，仅此而已。就把这种关系打为“帮派挂帅人物”是没有道理的。当年在“揭批查”中报纸上对吴涛连篇累牍地批判的那些东西，大都是诬蔑不实之词，可以说是诬陷批判。“文革”以来，内蒙古风水有变。一把手可以干掉二把手。一有政治风浪，一把手就把二把手推下水去。滕海清干掉高锦明；尤太忠推倒吴涛；周惠赶走廷懋。1981年学生事件，本是周惠导演出来的。一出事他就推给第二书记廷懋走了。小蒙古闹事，你老蒙古收拾吧！等到事件平息，他回来之后就打廷懋为闹事学生“后台”这是什么共产党员！连个做人道德都没有。

六、内蒙古的清查查了什么？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部署的清查任务是：查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制造冤假错案迫害干部群众；打砸抢抄抓；制造流血事件。并且明确指出，清查工作要执行不以人划线不以派划分，不看头衔，要看事实的政策。内蒙古的清查恰恰相反，按头衔挂标签，一派查一派，有权查无权。十年浩劫，内蒙古的灾难是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挖以乌兰夫为首的内人党”。而且在康生、江青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内蒙的清查却不查这些冤假错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因为一查“挖肃”就要查到军管和“左派”体系上去。广大干部群众一提清查“挖肃”，尤太忠发怒跳起来，说那是干扰打吴涛帮派体系的大方向。王铎更是明目张胆地保护“挖肃派”。云世英管了一段清查，抓了几个民愤极大，手段残忍的“挖肃”凶手。等他一走，这些人大摇大摆走出牢房逍遥法外了。内蒙还有一个不查的是，跟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不查。因为一查又要查到尤太忠军管体系上去。大家知道，林彪“四人帮”在内蒙经营的是握有实权的军管体系。所谓“吴涛挂帅的帮派体系”跟四人帮没有组织联系，既未挂上，也未靠上，充其量是个地方帮派。真正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就是尤太忠自己和军管培植起来的工贼、“中央委员”王德山。“四人帮”篡党夺权是从1974年开始，1975年登峰造极。1974年“批林批孔”开始，王洪文从他“虎班”将王德山放回内蒙。这只“归山虎”一回内蒙，尤太忠就安置到新城宾馆，召集厅局长以上干部传达王洪文批“现代大儒”的黑讲话，并用内蒙党委文件向社会印发，引导干部群众批“周公”。可是内蒙的干部群众不批“周公”而批“陈李郑”，且劲头儿很大，连军管和尤太忠都批进去了。尤太忠向王洪文告急，王洪文感到内蒙“批林批孔”大方向不对头，遂保护尤太忠，中止“批林批孔”，并在北京召开汇报会，否定群众批错了，并调一帮“拔牙队”，将批判郑维山维护党的民族政策，替误伤受害的干部群众说话的汉族老干部牙含章“拔”下来了。总理逝世后，“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活动加紧了。尤太忠又派王德山去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给尤太忠与“四人帮”之间当联络员。主席逝世后，王德山上窜下跳。猖狂活动。“四人帮”一倒台，王德山突然死掉。对于这样一个地道“四人帮”分子，尤太忠不设专案查清问题，草草定了“四人帮的追随者”贴到吴涛的帮派上了事。尤太忠比之于吴涛，他的问题性质分量重多了。诸如，他曾多次讲与林彪、叶群的关系，大量印发歌颂林彪的小册子；大讲林彪扁担，不是朱德扁担；多次骂陈毅元帅；大讲与王洪文交往；接触江青，拍特写镜头。1975年“批邓反右”，尤太忠亲自督阵，以压倒一切的中心向全区部署，各项工作都要让路。由于尤太忠全力以赴“批邓反右”，内蒙三十周年大庆准备工作，搞的一塌糊涂，民族政策再教育也未进行。“四、五”悼念总理时，限制群众，派出很多亲信，密密侦察，勒令政府办公厅和农业厅扯下悼念长条。四月九日在尤太忠的指令下，在呼和浩特组织十五万人声讨《天安门事件》尤太忠虽然以他手中大权压住他人不准说话，但是仍然有人揭他的问题。为此，不得不吱唔几句搪塞一下“没有看清林彪、四人帮的面耳，受骗上当；屈服于帮派的压力，做出了些错误的决定，说了些错话”上推下卸，多么轻松。他真挂上了，却没有事。吴涛扯不上去，可他们硬是往上挂。哪里有真理可说。“内人党”平反落实政策工作三起三落，困难重重。原因何在？就是掌权的“挖肃派”阻挠、捣乱、破坏。74年“批林批孔”中群众呼声起来之后，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过了不久，因为尤太忠胜利了，于是侯永勒令落办关门。

七、内蒙古“文化革命”的历史结论应是什么？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全面否定的结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然错了，那“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各种派别也都是错误的产物，哪一派都无正确可言。两派都有“反”有“保”，而且“保”谁、“反”谁都是从派性利益出发的。因而以人划线，以派划线，都是错误的。内蒙古的“保守派”并不保守，并未保以乌兰夫为首的自治区党委，也未保军区吴、廷、孔、塔。王逸伦、王铎也不是乌兰夫的“代理人”中央定错性质戴错帽子，那是应该平反纠正。“保守组织”平反纠正之后，仍应以造反派定位，不能因定错性质就把“保守组织”说成是“内蒙古二月逆流”同“内人党”、“叛国集团”冤案并列，相提并论为“三大冤案”。因为“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而“造反派”、“保守派”历史相对仅存一年多时间，后在“挖肃”中重新组合为“挖肃派”与“批滕派”。关于干部问题，王铎、王逸伦不能因戴错帽子而以错就错，成为“正确路线代表”。吴涛在十年“文革”中一直在台上。那是中央的安排，不是个人所为，他辅佐滕海清、郑维山、尤太忠有错误，但不是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挂帅人物”。对他的诬陷清查所定罪名应予推倒。

反对两种民族主义

——后“文革”时期在民族问题上的争论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过，搞好民族关系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尤其要

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文化革命”中，一切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都已达到“左”的极端，在民族问题上更是无以复加。大汉族主义极度膨胀，无视少数民族的生存权，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民族斗争，将一个仅有二百万人的少数民族凭空打出几十万“反党叛国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造成蒙古民族的空前灾难，伤了这个民族的元气。

“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彻底否定，然而由于内蒙古拨乱反正不彻底，“挖肃”流毒没有肃清，以致后“文革”时期在民族问题上的“左”倾思想仍在肆扰着民族团结，大民族主义不信任少数民族的言论行动严重影响着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以及处理民族问题的措置不当。

一九九四年三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群推出秘书长韩茂华发表了《内蒙古当前民族分裂活动加剧》的讲话。他的《讲话》一出来就令人震惊，引起人们强烈反应，于是展开了讨论，有些人还动笔写了批判文章，我也参加讨论发表了自己意见，并向中央作了反映。

韩茂华讲“搞民族分裂的人，一条是歪益历史，一条是歪曲事实”。然而，胡扯乱说，歪曲历史、歪曲事实，恣意枉谈“民族分裂”谰言的正是他自己。

对于“文化革命”以后发生的民族问题怎么看，我们要用马列主义作为准则，以各民族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精神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一、内蒙古这块地方是蒙古人的还是汉人的问题

韩茂华在他《讲话》开头就说“有人讲，匈奴是他们(蒙古族)的祖先，秦汉时期就建立了独立国家，内蒙这个地方历来就是蒙古人的，汉人是外来户。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说，到这儿较早的民族，当然是匈奴，其次就是汉人。匈奴人同中原汉族发生过各种联系，后来多数融合到汉族了，还有一部分人西迁到了匈牙利。在历史上，不能说匈奴是个独立国家，何况蒙古!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固阳县有个鸡鹿塞，是秦始皇驻兵的地方。鄂托克旗有很多汉墓，可以证明是汉朝的地方。汉朝的军队曾经驻扎在居延海，居延海在什么地方，在额济纳旗。蒙古族是属东胡的一支，最早出现在唐史，叫蒙兀室韦，就是现在呼盟室韦那个地方的一个部落，和匈奴是两回事。到了十二世纪，蒙古族由小部落崛起，东征西讨，入主中原，建立元王朝。元朝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忽必烈是中国的皇帝，他并不是蒙古的大汗。”

韩茂华上述言论出现在新中国尚属第一次。而且竟然是内蒙古党委秘书长，这样的高级干部出来代表内蒙古党委做为党课教材统一思想，这就非同寻常了。他的这个讲话，是旧中国大汉族主义史学家“华夏为中央帝国，周边是夷狄之邦”的翻版。韩茂华岂知新中国审定的历史教科书上写着“中国北方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就产生在内蒙古，这就是匈奴国。”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秦段开头就讲“公元前221年，汉族统一国家开始了。”这里说的是“汉族的统一”并没有说中国各民族的统一。说到鸡鹿塞，确有这个地方，但不是在固阳县，而是在蹬口县西北沙金套海乡哈隆格乃峡谷口，是汉武帝卫青大将军打匈奴驻兵的地方。居延海那里有居延塞，也是汉武帝驻兵的地方，汉骑都尉李陵战败投降就在那里。汉武帝刘彻穷兵黩武，给中原汉族和北方民族都造成了极大灾难。韩茂华说，蒙古人不承认忽必烈是中国的皇帝。这正是相反，有大蒙古思想的人，正是以他祖先征服过世界而自豪。不承认的正是汉人的先辈。《明史》朱元璋讨元檄文是如何写的呢?“自古帝王临

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予恐中土久污膻腥，故率群雄奋力扩清，志在逐胡虏，雪中国之耻，尔民共体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在旧中国，汉史学家都认为元朝是“异族统治”，不承认是中国皇帝。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是这样观点，一九四九年，中国历史研究会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482 页“蒙古族侵入中国”，495 页“中国人民不愿受异族统治以及遭受侵略”，511 页“汉族反蒙古斗争，始终没有停止，朱元璋北伐，中国又回到了中国人手中。”有一位很有名望的文豪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蒙古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民族，侵入中国之后，对中国文化采取抗拒态度。九十年之前，他们怎样来到中国，九十年之后也怎样离开中国。对中国文化没有受到一点感染。”蒋委员长介石先生一九三五年讲亡国论：“我国一亡于元，再亡于清。蒙古和满洲都是文化落后的民族，所以我们还能复国……”过去的史学家，对元朝一百年说的都是漆黑一团。华北局领导人批乌兰夫就说过“你们蒙古人把中国搞黑了一百年。”其实不然。在元代，一个世纪四海升平，中国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都有长足发展。尤其是东西方陆上海上贸易，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中国手工业是在元代与农业分离的。南北宋两个朝代三百年间，政治腐败，奸臣当道，国力衰微，人民负担很重。元统一大江南北，结束战乱，国家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中原人口出现高速增殖。人口的升降最能说明社会现象。宋代中原人口才一千六百万，元末达到六千万，到了明末降到两千万。元朝官办学校达到两万四千余所。“搞黑了”的说法是民族感情上的鄙视。忽必烈还把大理国、吐蕃国拉入中国版图，元代疆土比任何朝代都大，对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了贡献。汉族文化传统是最讲正统的，对元朝不愿承认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历史都是汉史学家写的，民族偏见很大，就是写个民族名称也要选个有犬旁的字，匈奴“奴”用奴隶的“奴”。对于《元史》，清史学家钱大昕颇有感慨地说“明初史臣，黑白混淆，谬妄相沿，为后人所诟病”。由于朱元璋认为蒙元是入侵者“异族统治”、“中土久污膻腥”，从而“驱逐胡虏”，如同赶走日本侵略者一样，修元史不到一年，潦草成书，竟写“坏”，不写“好”，流传后世，一片漆黑。蒙古人只修过宋辽金史，各以正统列入史籍，对辽金正统汉族不予承认，在解放前一直以“番邦”定位。往下我们再探讨几个问题。其一、韩茂华说，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未曾有过独立的国家和政权。那么，别的不说，华夏帝国的皇帝常被围困和抓获做何解释。刘邦在平城(大同)被匈奴围困七昼夜，被迫与之和亲才得解围；吐蕃常常打到唐长安城下，和亲退兵；北宋徽、钦二帝，被女真人虏去；明英宗被蒙古卫拉特(瓦剌)部俘虏。皇帝都被抓走，还不算独立政权？五胡十六国、藏族吐蕃国、南诏大理国、党古忒(党项)人的夏国、契丹辽、女真金退出长城后的北元。曾经都是与中华帝国交战对抗过的独立政权和国家。再说是不是一个民族祖先足迹到过的地方，或是驻过兵，标过地图，就成了这个民族的地方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蒙古人的祖先到过中亚、东欧，秦、汉版图曾画到汉城，日本人的铁蹄到过中国。又驻过兵，咋说呢！在内蒙古，汉名称的地方可多了，什么“受降城”、“归化城”、“绥远城”等等，按名称争地盘行吗？东北辽、吉、黑三省有很多蒙古名称地方，解放后卓索图盟大体上都划给辽宁省了，吉林、黑龙江西半部原来都是内蒙古的，今天内蒙古往回要行吗。阴山、黄河以南地区历史上怎样记载的呢，秦灭六国统一华夏之后，始皇帝派出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占据黄河以南地

区置郡县,迁徙内地人口,接着又把犯人迁入新设四十四县,充实户籍。这些人到了楚汉战乱,秦王朝覆灭,都跑回去了,匈奴人回来了。到汉武帝时,穷兵黷武,派卫青、霍去病向北、向西扩展疆土,烽火台北连大漠,西到葱岭。到了东汉末期,中原战乱,边民又流亡回返,鲜卑南进。历史就是这样推过来推过去:势力强了就推过去,弱了就退回去。有文化的汉族,所到之处留下历史遗迹画上地图存人档案。而游牧民族,帐篷一拆,赶着牛羊上马就走了,什么也不留,坟墓也没有。秦皇汉武向外扩张,说是“开拓疆土”,而北方民族打进关、塞就是“犯边、入寇”。一部古代史都是这么写的。因为北方落后民族没有文字,不留史籍,汉文史籍写什么是什么。其三、匈奴是不是蒙古人的祖先?在蒙古人的传说中,一直把宏奴(蒙语发音匈奴为宏奴)认为祖先,不是今天才有此说。中国历史“华夏”,原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将其四周称之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秦统一六国,华夏各国轻蔑嬴秦氏是“西戎”加以抵抗。楚国的国君熊渠说“我蛮夷也”。秦统一六国,也可以说是统一各民族,到了西汉才形成汉族共同体,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汉族的开始。韩茂华说蒙古人唐代才冒出来的一个部落,怎成了匈奴的后裔呢。如果这么说的话,炎帝、黄帝也难以成为汉族的祖先了,因为炎、黄也未报他的民族成分是汉族。汉族以炎、黄为祖先错不了,蒙古人以匈奴后裔自居也错不了。北方民族历史上的统治者风暴帝国,一个一个匆匆消失了,然而不能说这个民族也随之灭亡了。匈奴西迁,这个民族走光了吗?辽、金入侵中原,北宋南迁,汉民仍生活在黄河流域,接受辽、金统治。蒙古人、满洲人人主中原,汉族人民仍在原地繁衍生息。国家出版的史书中说“草原上游牧民族称号的屡屡变化,主要是统治者的更迭。原先的统治者领着一批臣民走了,但总有一部分人留在故地,接受新的统治者。北方民族名称的更迭,如同华夏帝国的朝代更替一样。所不同的是“风暴帝国”在欧亚大陆上飘忽不定,不像中原农业帝国那样稳定。当匈奴西迁、入塞,留在漠北的匈奴人尚有十余万户。他们加入了鲜卑体。十三世纪,蒙古崛起,如同秦灭六国一样,将塔塔尔、蔑儿乞、翁吉拉、克烈忒、汪古、奈曼六部统一:于是历史上在这块地方活动过的民族,如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契丹等民族的后裔,均融合在蒙古共同体中。这时,蒙古一词也就成了统一后的民族共同体的名称。蒙古人继承匈奴遗产,说是他们的子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王昭君是蒙古人的老奶奶,汉族的姑奶奶,这么说是错不了的。董必武同志题写的王昭君“胡汉和亲”的“胡”字,历史学家考证是蒙古语“人”的发音声母,“胡们”的胡。王昭君的娘家,湖北省电视台直接了当的讲“王昭君远嫁蒙古王爷”,这就对了。

我们现在争谁做自己祖先,都没有什么意义。现代国家民族的疆域是在近代历史形成的,尤其是二战后各民族的生存空间都已定型。中国现在这个版图,究竟是从什么时候算起,谁也没有定论,大概是元代打的基础,清代奠定的。如果以正统华夏民族明王朝版图做基础,北到长城,西到甘肃。那么中国领土就少了三分之二面积。我们讲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不能争到两千年前的时代去。西藏阿沛也只承认他们是元朝忽必烈时纳入中国版图,再往早说他也不认帐。中国各民族大一统如从元朝算起,已经七百年了,也算历史悠久了,美利坚立国才有二百年嘛。内蒙古这块地方,从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末,七百年时空里,可以说没有汉人群体的行政建制。朱元璋在赶走蒙古统治者出长城后下令,长城外地方“得其地不足以供给,

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人不耕织，地无它产”要它何用，遂修复长城，从山海关至嘉峪关，以长城为界，设置九边，三十七堡，什么“镇夷堡、宁虏堡、杀胡堡、灭胡堡、平虏堡等等。对中国各民族大一统概念，在孙中山也是模糊的。1911年辛亥革命，以他领导的“同盟会”武昌起义，所提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与朱元璋口号只有一字“胡”、“鞑”之差，“五族共和”是他后来在蒙古王公搞独立运动之后才改的口。内蒙古的边界是从清太宗天崇九年至乾隆元年编成六盟四十九旗，外加不设王爷札萨克的内属蒙古土默特、察哈尔。山海关以东，经锦州到长春宁古塔，挖壕插柳为界，名为“挪条边”；山海关以西，以明长城为界。国人从那以后，有，“关里关外”、“边里边外”的严格界限，汉人不得进入蒙地，旅蒙商贾工匠带腰牌春入秋出，不得滞留。直到清朝后期“借地养民”，令蒙古人出荒让地，到1902年正式开禁，推行“移民实边”政策。绥远这个地方，汉民来的可能早些，满清在绥远城驻兵，招募汉民来种田供粮。所以，上默川有为数不少“庄头蒙古”，汉民入了土旗户籍。为什么叫“庄头”呢？从外地流入的客家人进不了庄里，只能在村外庄头搭窝棚居住栖身一“归化城”的汉民商贾工匠，可能早在阿拉坦汗时期就有了。汉民大量涌入内蒙古地方，是在民国以后。随着汉民增多而设县治。于是在内蒙古这个地方出现了奇特的，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人文景观。那就是一地二主，蒙汉分治，旗县并存，层床叠架，双重政权的局面。随之也就出现了民族矛盾，蒙汉之间发生纠纷，没有一个共同的法律诉讼程序，打官司要到县衙门，王爷札萨克没有司法权。蒙古人总是败诉，破产后退。垦荒种田与保护牧场的矛盾日趋尖锐。国民党政府实行大汉族主义汉化政策，一九二八年将内蒙古分割成三大块。设置热、察、绥三个行省建制。从此在《中华民国地图》上内蒙古就不存在了。一九三五年，我们党发表《三五宣言》，宣布“原来内蒙六盟四十九旗，察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两特别旗之全域，无论是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古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共产党毛主席，按照马列主义原则解决民族问题，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内蒙古在五十年代是全国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模范自治区。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后，开始向“左”，接着就是“文革”挖“民族分裂集团”、打“叛国集团”，酿成大祸。大难刚过，历历在目。伤痛未消，现在韩茂华等人又在小题大作，大喊“民族分裂加剧”又要想干什么。

韩茂华侈谈上古历史，争论内蒙古这块地方是蒙古人的还是汉人的，这是在挑动民族争端，破坏民族团结。

二、关于蒙古人反对国家开发资源问题

韩茂华在其“民族分裂加剧”的讲话中，胡说“他们(蒙古人)反对国家在内蒙古开发资源。说成是掠夺蒙古人的资源。内蒙古是殖民地经济”。他这番话是枉加在蒙古人头上的一项黑帽子。内蒙古人民，在五十年代，曾以全民族的欢腾，迎来了包钢建设和白云鄂博铁矿的开发，“白云鄂博”是什么，是神山头，是藏有金马驹的神山，谁人敢动一块石头，那就叫你脖子赏识一下套马杆的威力。共产党来了，金马驹放出来了，谁反对开矿了！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四十年教育的蒙古人，现在“反对”起国家开发资源了呢！韩茂华诬枉蒙古人反对开发资源，是为其“民族分裂加剧”的噫造文章渲染气氛，制造民族关系的紧张。说起“反对国家开发资源”，你说没有，似乎也有。不久以前，1990年，在伊克昭盟准格尔煤

矿重点项目，发生过一件轰动一时的“反对国家开发资源”的事件。《内蒙古日报》连发两篇社论，可以说是一个不大也不小的事件，发了社论还算小吗！那么，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呢？准格尔煤矿是国家“八五”期间，能源开发重点西移的主要后续基地。内蒙古各级政府，伊盟各族广大群众欢迎国家在这贫困地区开发资源，并为支援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做好了充分准备。动员搬迁，征用土地，施工队伍，建筑材料，全部落实到位。可是动工之后，施工队伍、建筑材料，全由内地各省引进，不用内蒙的施工队伍，内蒙做好计划供应的建材也不用。只有沙、石一项取之当地，没有从区外运进。而从区外各省市开进来的二十多家施工队伍，不熟地理人情，没有秩序，一片混乱。矿区附近乡间公路是当地农民集资、贷款修筑的“富民之路”，刚刚竣工交付使用。这些外来的施工队伍“喧宾夺主”，非但不出一分不出筑路补偿费用，且嫌路窄，用铲车拓宽，毁掉庄稼，路尘飞扬，粮食减产，吊车挂断电线、广播线路。对此，村民、村干多次交涉矿区建设者们。可是各路诸侯，谁也不理。在此情况下，群众怒不可遏，发生炸路、刨坑事件。肇事者是汉族农民郭和、李二曼等四人。事件发生后，矿区建设者们，向上级、向与论界告急，大声疾呼发生“反对开发资源事件”，于是乎，《内蒙古日报》听风就是雨，连发两篇社论，惊呼“在我们民族地区，国家开发资源，要支持，不能反对”向全区蒙古族人民进行了“正面教育”。这又是一个以想当然的逻辑推理，蒙古人在反对国家开发资源。事件发生后，伊盟、自治区派人调查。自治区政府是派建材局长、现任内蒙付主席的沈淑济去的。查的结果就是前边说的情况。《内蒙古日报》没有弄清什么情况就乱发议论。事生文耶，文生事耶！

下边我们回来再讨论韩茂华的“殖民地”呀“掠夺”呀的问题。不错，在内蒙古广袤的土地上，也确有这些说道。“我们内蒙是殖民地吗？”、“这不是资源掠夺吗？”说这种话的大有人在。群众有，干部有；蒙人有，汉人有；下边有，上边有；会上有，会下有；上层干部争吵有，资料书刊上也有。将这些人的言论，如何归类，区分其性质，哪些人应该打入“民族分裂”的敌情里去，哪些人属于牢骚、怨言、怪话。做为人民内部矛盾去批评教育，将是一个很难分清的问题。而这些话大都是在近几年才出现的，是主要针对一些高级领导人以其手中特权，将内蒙初级产品钢材、木材、铝锭、稀土、煤炭以低价拿走发财而发出的愤恨之言论。骂这些人“掠夺”是否打成“民族分裂分子”呢？

大家知道，内蒙古是资源省区。而在资源政策上是存在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人们的议论当中，难免有人发表意见走火，冒出“殖民地、掠夺”的话来。如果生拉硬扯上纲，当然可以打成“民族分裂分子”。内蒙古人民是忠于祖国顾全大局的。建国以来，所走过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在政府的资料上有如下一些数字。在国家指令性计划体制下，从 1950 年至 1986 年 36 年间，国家向内蒙投资 120 亿，财政补贴 240 亿，加起来 360 亿。然而，国家从内蒙调出的钢、铝、木材、黄金、煤、电累计达 460 亿，进出顺差 100 亿。这也可以说是内蒙古对国家做出的奉献。再说国家从内蒙古调出的原料及初级产品的计价都是很低的。而从内地经过加工返运回来的商品作价却是很高的。省际差价一年逆差 25 亿，低出高进，内蒙古是两头吃亏。内蒙由于资源开发的延伸加工链条短缺，在输出基础产品而输入加工制成品的转换过程中，导致结构效益外流。

此外，依靠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外延扩张手段，导致投入多、产出少，经济效

益很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能源开发上的问题还在加重。如向华北送电, 1994 年实行电价为 0.22 元 / 度, 而产出成本为 0.35 元, 度, 仅此一项每年就损失 4 个亿。同时税款也随同产品流出区外, 大约也有一个亿。元宝山、通辽两个发电厂每年也有几个亿的税收流入他省。

内蒙古草原从东到西, 埋藏着千里油田, 由华北油田管理局开采, 国家拨出一部分叫内蒙加工。内蒙古极为兴奋的把炼油厂放到首府呼和浩特, 然而从 1992 年投入生产之后每年亏损 1~2 亿。什么原因, 因为原油价格定的高, 每吨高出全国最高价 160 元, 不亏哪去。在内蒙古产的原油, 由内蒙古加工, 利益却都转到华北油田, 轮到内蒙古加工产品的时候却转换为“高进低出”了。

过去内蒙古西部铁路运输线是内蒙、宁夏两家平分。进入八十年代以来, 被华能集团、军矿以及众多“倒煤”公司挤进运输线, 大量减少内蒙古的运输量, 大批物资积压运不出, 很多企业被迫以运定产。内蒙古原有的包头、乌达、海渤湾三个煤矿七万人, 每年运出 800 万吨方能维持生活, 然而仅能运出 500 万吨。由于三分之一以上生产能力闲置, 每年减少产值 40 亿元。

再者内蒙为国家资源开发, 承担着沉重负担, 开发的资源越多, 负担越重, 每增加一个工人, 内蒙古财政就要增加 100 元负担。东部区五大煤矿由东三省开发, 采煤发电空中拿走。可是为煤、电资源开发而进来的职工及其家属几十万人的油、粮、肉、菜补贴。社会服务设施, 全由内蒙承担, 税收只抵财政开支的一小部分, 准格尔煤矿的开发也是如此。东胜华能精煤公司是集团企业。可是取代地方政府职权, 掌握了矿区开发的审批权。其体制是地方办矿挖煤, 华能收购运销。这种分工, 利在华能, 亏在地方。华能控制路运, 压价收购。吨煤上路 30 元, 上了车就增值到 80 元, 到了内地、沿海就几百元: 关于资源开发, 有一位学者在一个刊物 E 发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 中央经济与地方经济反差现象》的文章。其中讲“中央企业在民族地方, 当地受益甚少, 确的不但得不到实惠。还做出了许多牺牲, 承担了种种后患。现行开发模式带有一定的掠夺性质。地方虽得些税收, 但粮差一项补贴就超过税收部分”。再其次, 关于开荒, 这也是资源开发问题。“文革”前。乌兰夫时期。没有开荒, 并抵制王震开荒, 每年粮食自给有余, 上交国家 10—20 亿斤粮。“文革”以后内蒙出现了几次开荒浪潮。内蒙古人民反对开荒是有历史性的, 远非今天才有。韩茂华如果要扣“反对开发资源”的帽子, 在开荒问题上扣那就扣准了。说起开荒, 就扯到盲流。盲流对于资源、生态、植被、森林、药草、山产的破坏, 那是很可怕的。莫力达瓦旗是达斡尔、鄂伦春森林民族, 聚居山区, 山产是他们世代的一项重要收入。自从盲流大批进来之后。每到秋季一哄而上, 他们没有采集山产知识, 盲目采摘, 人多互相争夺, 有些高贵土特产品未等成熟就一抢而光, 够不着的枝杈劈下来, 等到采集季节, 土著居民上山时早已荡然无存。西部荒漠草原盛产发菜。每到秋冬之交, 收完庄稼之后, 上冬之前。成千上万的大批农民涌入牧区搂发菜, 抢夺牧民, 成为牧区的一大灾难。对于干旱草场钢丝耙子纵横耙搂之后, 草根也拔出, 所过之处黄沙一片。这些年, 大兴安岭林区火灾毁林频繁, 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烧荒开地引起的, 盲流人员自行组建村、屯, 俨然是山沟的主人。然而盲流的冲击虽属可怕, 也能管住一些。但是领导上决策要开荒, 那是谁也阻挡不住的。“文革”中西部区实行军管。郑维山骂“牧民吃了亏心粮”组建兵团, 以师团建制开进各盟牧区, 波浪式推进垦荒。等到后来兵团

撤出时，西部区已无荒可开了，能开的都开了。到了八十年代垦荒高潮再度出现。周惠时期于开始少量开垦，王群来了之后，急功近利，短期行为，制订“近期奋斗目标”、“超常规发展”，在呼盟岭北地区大面积垦荒。国家民委付主任赵延年考察呼盟后，劝谏王群千万不要搞开荒农业，用免征农业税来鼓励开荒，会引起大面积掠夺性游农开荒。王群不听，坚决开下去。1989年《文摘》645期报导“内蒙古生态严重恶化”，赤峰地区草原退化面积达83.84%，鄂尔多斯草原73.85%。东部流沙已到沈阳城北，西部区早已危及华北。现已出现历史上没有过的黑沙暴。牧民哀叹“草场沙化了，牧业不行了，种地不长了，我们咋活呢！”赫鲁晓夫在哈萨克垦荒是地球上的教训，可是我们有些领导不顾这些。开荒问题，既是生态政策，也是民族政策，草原就是牧业民族的生命线。

内蒙古地下是个巨大的矿物宝库，全区有各类矿床、矿点达六千多处，矿藏种类达七十一一种。内蒙古的矿藏不但多，而且贵重，在现代冶金、航天、电子工业上有重要用途的宝贵金属铌、锆、钽储量占全国之首，稀土储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九十，而且相当集中，便于开采。内蒙古的铬、铅储量占全国第二位，锌占全国第三位，硫铁也居全国首位。白云鄂博以富有稀土、铌、铁等多种金属共生矿，成为当今世界罕见宝山。内蒙古的煤田更是遍布全区，煤层深岸，地质构造简单，品质优良、品种齐全。内蒙古的碱储量也占全国首位，盐湖储量在两亿吨以上。内蒙古还有三十多种储量丰富的非金属矿产，其中至石矿是全国唯一产地。麦饭石、铸型硅砂、沸石、石膏、冰洲石、玛瑙、萤石储量都居全国之冠。石油、天然气的储藏难以计量。

内蒙古据有这样丰富的地下资源，在现代科学技术发达的时代，应该是最富有的。然而现在仍然还是贫穷落后。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应该调整现行政策。在内蒙古来说，蒙古民族就是“土著”，国家应有“土著政策”，把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起来，赶上先进民族行列，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古人的地位是主体民族。他这个韩茂华居然对区域自治的主体民族发出“民族分裂加剧”的警号。这不是和滕海清的秘书陈晓庄发号施令，把“内人党”挖到羊群里去一样拔扈吗。主体民族“分裂加剧”，这样一个关乎大局牵动正体蒙古民族的重大问题，岂能不负责的信口乱讲。这样于是严重违反党的准则。如今国家有法了，资源法、土地法、森林法草原法都有了。我们争论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按法说话，乱扣帽子不行，不是那个“挖肃”时代，随意把蒙古人推到“民族分裂”的黑坑里去。

三、所谓“反汉排外”、“驱赶汉人”问题

“文化革命”结束以来，内蒙古曾发生过遣返盲流和蒙族学生反对盲流继续流入的事件。然而，却从未发生过“反汉排外”、“驱赶汉人”事件。那么，这个“反汉排外”、“驱赶汉人”之说是从哪几出来的呢？韩茂华在“民族分裂加剧”讲话同时还发了一个党委办公厅文件。其中说“1981年发生蒙族学生驱赶汉人事件”。他把1980年锡盟遣返盲流而发生的所谓“反汉排外”、“驱赶汉人”事件搬到学生事件上去，扣错了帽子，安错了位。但也不一定，他们可能就是把学生事件认定为“驱赶汉人”事件。不管是指哪件事，“驱赶汉人”是民族关系七的重大问题。因此，有必要把这两件事再翻出来摆清情况，以期明辩是非。提起这两件

事；当年的区党委书记周惠最为清楚，因为都是他一手导演出来的。事件的起因是人口问题。如周惠所说“僧多粥少”穷日子不好安排。说到盲流，人们只知道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却很少知道他们在“文化革命”的“挖肃”运动中，造反夺权于出来的那些难以令人置信的种种坏事。“文革”结束，拨乱反正，盲流问题提到日程上，成了内蒙古的大事。这里有自然流人的盲流，也有军管中“掺沙子”进去的盲流。其数量之多，问题的严重，在民族关系史上是罕见的一幕。就在这个时候周惠来内蒙古工作。当他看到内蒙古广大干部、群众被打“叛国集团”、“内人党”死伤残局面，深表同情，平反落实政策工作比他前任要好，这点大家对他是好评的，是感激的。不久他又到牧区巡视。看到盲流摧残牧民和社队经济状况，非常气愤，把它称之为牧区“三大灾难”之一。这时中央也发(80)31号文件，其中讲到“十年浩劫，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受了很大摧残，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产生了相当的隔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才能恢复各民族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于是，周惠决定将清理盲流工作和严格禁止区外人口盲目流入区内的的工作同时进行，登报发文件，多次开会研究部署。在周惠制订的清理盲流政策中有一条讲“对那些在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民愤大、有罪行的，坚决遣返”。锡盟是畜牧业地区，粮食和商品都从千里内地运入，财政负担和运输力量已难以承受，而且新的盲流继续流入之势。为了有效地阻止再进，盟委根据周惠上述规定，将最坏的盲流遣返几个，以期造成盲流不能再进来的声势。为了遣返顺利回籍妥善安置，给钱粮、给耕马、发路费、汽车送，可谓负责到家了。然而不料，和盟里的预期相反，砸了，坏事了。有个叫冯玉根的盲流，早就扬言上告，说北京有他宗亲大干部，没过几天，冯文彬批评周惠内蒙古“反汉排外”、“驱赶汉人”。周惠顶不住，谗过他人，将盟委书记赵真北撤免，召回呼和浩特。这时的周惠已经把他讲过的“清理盲流如有问题，区党委承担责任”的话坐了回去。于是自治区机关干部中流传“赵真北赶盲流，反被盲流赶出来了”的苦涩笑料。周惠其人，做为党的高级干部、封疆大吏，却是这样逃脱责任，谗过他人。

正兰旗桑根达赖苏木有一户盲流，是河北省枣强县。公社用汽车送回原籍，走时牧民群众拿五、六千元，叫送去的人回返时从北京捎买些衣物用品回来。然而一到村里，人车扣下，所带款项细软之物全部查抄，送去两个人空身逃了出来。仅在五天时间里，生产队报公社，公社报县，县报地区，地区报省，省报中央，时间、速度、效率之快是惊人的。送去的人逃跑出来还没有到家，河北省告内蒙古“驱赶汉人”的报告早转到内蒙古来了。逃跑回来的人狼狈不堪，马不停蹄报到公社，旗里，盟里。到自治区，告枣强县扣车、抄钱。两头都告状，是非曲直，谁也不敢处理。过了一年之后，时任全国人大付委员长乌兰夫出面，跟河北省有关领导说好话，把已经用烂了的破车要回来送到废品收购站，也就算完结了。内蒙古做为一个自治区，遣返区区几个恶棍盲流，竟然引起“反汉排外”的轩然大波。一个堂堂正正的盟委书记，居然被几个盲流告倒了。这是令人难以理解，而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问题。内蒙古驱赶的是盲流，而并不是因为他是汉人，怎可拉到民族关系上去！赶盲流被诬为赶汉人，这叫讹人、赖人。同一个问题，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国度里，同在共产党领导下，黑龙江省强行驱赶二十多万盲流，平安无事，1980年10月号大《内参》上，记者报导叫好。他们富省往出赶成不了问题，我们穷内蒙养活不了，却成了问题。两个省区，显明对比，截然不同。这公平吗，平等吗？

而且,黑龙江赶出来的盲流,大都转进我区呼盟、兴安岭地区安营扎寨,毁林垦荒,重建了家园,内蒙是无可奈何,在军管时期一夜之间将边境牧民内迁,代之以汉族盲流实边。这么严重的问题,谁也没有吵吵嚷嚷,似乎没有发生过这回事,悄悄地过去。而韩茂华等人,逮着一个盲流问题,讹赖内蒙古“反汉排外”,大作文章,铸成“铁案”,列入“民族分裂”的帐册上,写到党委机关的文件上,记到学生的户头上。在历时已过十四年的今天,再把它拿出来,做为当前“民族分裂加剧”的一项罪名,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多灾多难的内蒙古,继 1980 年赶盲流事件,1981 年又发生了学生堵盲流事件。“文革”拨乱反正告一段落,大乱之后大治,各省区依次向中央汇报建设大计。区党委会上,周惠提出并决定一、二书记加政府主席三人去汇报。可到了时候,是他周惠一人去汇报,遂产生 28 号文件。文中讲对盲流“不要采取堵的方针”,还要“妥善安置”。对此,内蒙古干部上上下下都表示反对。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应该有步骤按需要进来,不应盲目自流进来、蒙族学生听说盲流又要进来,一哄而起,罢课、游行、请愿。学生闹起来之后,周惠在区党委书记办公会上说,乌兰夫派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付主任云北峰来发动起来的。事件的发生确实是土默特旗老干部中先吵起来的。开始是政协主席奎璧发话“不堵盲流就不是自治区”。统战部长克力更召开座谈会研讨盲流问题。接着是李森老人派出自治区民委干部王见喜去各大院校发动学生出来抵制,他又找社会科学院茂敖海起草《评因周惠汇报产生的(28)号文件八条》,作为学生游行示威的行动传单。传单开头就说“周惠同志在汇报一开始就说要汇报政治、经济两方面的问题,这实质上就是他个人要决定二百多万蒙古民族的命运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民族问题。但是,他在汇报内容里千方百计掩盖在内蒙古存在的民族问题。”周惠见闹事学生是冲他来的,于是推给第二书记廷懋走了。学生乱哄哄闹了一阵子就过去了。事件平息之后,周惠回来了。这时一些善于抓“民族分裂”的老“左”们和“文革”的“挖肃积极分子”活跃起来,围上周惠,帮助出谋划策。上纲上线。有一位汉族老干部一言九鼎,他说“土旗人好闹事,然而充其量是个地方民族主义。而民族分裂的危险主要是东部区干部”。这就把打击的方向路线定下来了,于是将这次学生事件挂到他们爷爷年代的 1947 年的两条路线斗争上去,把它说成是跟博彦满都分裂路线斗争的继续,是第三次民族分裂主义路线斗争等等。周惠在大会小会上,语无伦次地今天说学生后边有“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明天又说“有为数不少的老民族分裂分子、有相当大的地下组织、宣传机关和情报机关。”于是乎设立明、暗两套专案班子,查“后台”、挖“民族分裂集团”。周惠下定决心像唐·吉诃德一样向风车宣战。蒙族干部都预感到那个令人诅咒的罪恶的“挖肃”灾难又要再次降临。李森老人看情况不对头,又要搞扩大化瞎闹了。于是拄着拐棍叩周惠大门“自首”学生后台。可是周惠一心要挖出他那设想的“庞大集团”。这时的周惠已经失去了理智,到了疯狂程度,竟然将在前台做学生工作的第二书记廷懋、分管文教的付书记杰尔格勒疑为“后台”,不择手段,违反法制,动用专政工具逮捕王见喜,立即突审追查第二书记廷懋。廷懋不同于吴涛,他很明智,在这种情况下,他说老了,该退休了,于是不再上班理事了。一个月后,杰尔格勒气死。王见喜判了三年徒刑,出狱后死去。周惠为什么抓廷懋为“后台”?恨他袒护学生。学生刚开始闹,来党委门前,书记办公会研究,周惠的秘书×××从旁站起来,疾言厉色叫喊“闹的甚!把带头的几个抓起来……”。看

其气势与滕海清的秘书陈晓庄相比，毫无逊色。廷懋回过头对他说“不能抓，抓了反而把事闹大。你没听他们汇报，领头的学生把牙具袋都背着哪，他们叫你抓，好当英雄哪！只能疏导……”。周惠刚来蒙古，曾在干部大会上说过“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学生骂他“不是马，也不是骡子，是一头驴，提请中央牵回去！对此周惠熬火伤感，掉眼泪。他恨学生感情冲动，又抓不了。于是把气出在做学生工作的所有蒙族干部身上，廷懋、杰尔格勒、秘书长、文教办公室、高教局都被疑为“后台”，就连大门口第一线工作的，被闹事学生骂为“周惠的顶门棍、看门狗”的小小信访处长，也被周惠三次点名强令赶出党委机关。中央领导曾有指示“出了民族问题，叫他们出去工作，比汉族干部有效”。像周惠这样干，以后谁还给出去工作，内蒙干部是有了这个教训。周惠的挖“后台”挖“民族分裂集团”的战役经过一年多时间终于悄悄收场了，打了一场“空战”。所谓“后台”依然是那位登门“自首”的李森老人。周惠在一次领导层会上，有气无力，哼哼哈哈，以听不清的混浊声调做了结论：“延安来的老同志，老糊涂了，算了……”。可是在这一年中，已经用各种名义、形式、手段、搬开、拿掉一大批涉嫌的厅局、院校、盟市级干部。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巴图是第一个拿下的。有些重点部门和院校是拆庙搬神、改组换班子。这些人大都是不明不白地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不是回家休息就是坐冷板凳。只有一个人明白地离开，她就是牧业劳动模范、阿盟付书记宝日勒岱。周惠当面斥责她“你不在盟委表态书上签名，就凭这点，我就要把你撤下来，你就到政协呆着吧！”被周惠拿下来的这一大批蒙族干部都是刚刚恢复工作，“挖肃”伤痕尚未平复而又遭一次雪上降霜。这是内蒙古干部继“文革”之后的第二次灾难。学生闹事，没有“后台”却有其历史背景。什么背景，是“挖肃”后遗症。因为内蒙广大牧区打“叛国集团”、挖“内人党”是由部队、知识青年、盲流进行的。其中，盲流干的最为凶狠。这些人文化知识浅薄，不懂政策，谋生而来，具有流氓无产者特质。1981年那时上大学的，大都平反落实政策后上来的受害者子女，“挖肃”时他们都十来岁，心灵受过创伤，一听盲流就害怕，反盲流劲头是他们从小就有了。当然，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系统提上来，不应罢课上街。任何形式的游行、示威都是错误的，是破坏安定团结的行为，是应该反对的。蒙古民族已经落后了几百年，现在虽然已经有了平等发展机会，但是还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有志青年想要争气就要少喝酒多学习，提高文化科技水平，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勤奋努力，在自己事业上取得成就，在政治上也要成熟起来，不要胡闹乱来犯错误。

内蒙古遣返盲流和学生闹事，都是因人口问题引发的。

内蒙古人口，六十年代以后猛增一千万，翻了一番，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内蒙古虽然幅员辽阔，然戈壁、沙漠、不毛之地以及荒漠草原占去一大半。电影里好看的草场不多了，好的农田更少了。不管谁来当这个家，两千万人的吃饭是头疼大事，不限制人口的机械增长行吗？吃什么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总结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提出今后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内发生的，就在什么范围内处理赶盲流怎可扯到“反汉”、一时一事的学生事件，怎可提到路线斗争上去。有些人中林彪四人帮流毒太深，“文革”遗风依然还在，这些人应该认真清“左”，遇到问题不要动辄拉到“民族分裂”上去。

四、怎么看内蒙古的“民族分裂”问题。

在我们内蒙古这个地方，打蒙古人的“民族分裂”可以毫无顾忌。只要瞄准这个大方向，怎么说都行，怎么干都可以。不必承担什么责任。多年来，打“民族分裂”成了一些“左派”们的职业专利。他们一见到民族问题，就往大里讲，往严重里说，往“民族分裂”上拉扯。发现那么一个半个，或者扑风捉影，没事说成有事，小事说成大事。点上出事，面上怀疑，以点推面，以偏概全。于是就可以制造出“民族分裂严重”的紧张局势来。韩茂华在其讲话中说，当前“主要影响内蒙古稳定的是民族分裂问题”、“民族分裂活动加剧，严重影响我区的稳定”。在他看来，内蒙古的“民族分裂”形势已到了“主要”、“加剧”、“严重”的危局。为此，他要求全体党员“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最大限度的缩小民族分裂势力的活动市场”。然而，他的讲话，说来讲去却露出了一句实话“要看到，搞民族分裂的是极少数人，甚致可以说是极个别人”。这里前后的话都是他讲出来的。既然，他“看到”的是“极个别人”，那怎么就成了“主要”、“加剧”、“严重”的形势了呢，这不是蓄意制造紧张吗！极个别人，什么时候没有？过去有，现在有，今后还会有。哪个民族都有个别分子，汉族里没有吗？有民族分裂分子就抓嘛，处理嘛，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拿事实教育党员，其效果岂不更好吗！可他又不拿出来，只是虚张声势，制造紧张，达摩克利斯剑悬在蒙古人头上，叫你战战兢兢不敢说话。说他没拿事实，他也曾拿过。韩茂华于1994年2月，以办公厅红头文件罗列了一串“民族分裂”的豆腐帐。他这个帐单与“挖肃”中臭名昭彰的那两位“左”派向滕海清将军献图所列“敌情”差不哪去。可举出一例，其中有这么一项“蒙专学生向人大提乐二十条意见”。这叫什么性质的敌情？人民群众向民意机关表达意见，怎么就成了敌情动态。多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抓“民族分裂”的闹剧可谓多矣、“文革”前抓什么“师院特木尔巴根案”、“医学院蒙医系案”、“蒙语办四十三人委员会案”以及形形色色案件。然后折腾一个时期之后，抓多少还要平多少。“文革”中滕海清挖“内人党”打“叛国集团”几十万，死伤残那么多，打了个“歼灭战”。“文革”刚过，周惠又抓“学生党”的后台“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这才几年，韩茂华又大喊大叫“民族分裂加剧”惶惶不可终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经过拨乱反正，大家以为不会再胡闹乱来了。然而这是一个天真想法。内蒙古在民族问题上并没有认真批“左”、清“左”，党的民族政策没有真正回来。“挖肃”积极分子不服输不认错，以至“左”倾主义继续肆虐。在这些“左”派们看来，内蒙古博物馆门顶上的石雕白马也有叛国外逃的危险。于是将其砸烂，重新打作，掉过头来往南跑。这是“左”派们为内蒙古的“稳定”于的一件实事，认真彻底解决了这个畜牲往哪儿跑的方向问题。他们是如此荒唐可笑。这种心态错位就是“左”派们的特征。马走逆风，牛跑顺风，这本是自然现象。成语“风马牛不相及”是说风雨天马是顶风跑，牛是顺风跑。古代诗人将这个自然现象感情化，“越鸟巢南枝。胡马依北风”。南方北飞的候鸟蓄窝在向阳背风位置。夏季热天，马群在高地上向北吸朔风凉。胡马恋北风，汉马也是同样的。“左”倾怀疑主义者，总以为内蒙人怀有二心，向着外蒙古，内外蒙古，同一个民族，地理上连片，内蒙的那边就是外蒙，搞内外蒙合并是想当然的事情。滕海清的“挖肃派”打“反党叛国的内人党”时就是这么推理出来的。你是蒙古人必然有民族情绪，有民族情绪必然搞民族分裂活动，搞民族分裂必然参加反党叛国搞内

外蒙合并的内人党。“左”派们就是这样用逻辑推理来抓、打“民族分裂”的。他们有的是无知的民族偏见，而缺的是马列主义民族观。林付统帅是汉人，按照他们逻辑，应该往南跑，然而他却葬身蒙古高原。这些人也不好好查看一下公安、边防部门，自从中苏反目以来，往北出逃的蒙古人多少，汉人多少。蒙古人在那“挖肃”的严峻年代都没有往北跑，想逃骑上马一溜烟就跑过去了。然而却向南千里往北京去找毛主席，这本来已经过历史考验的了，难道今天还需要再次把红心掏出来给他们看吗！二战以后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内蒙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自治，是中国领土统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蒙早已划定边界。内蒙古人民早已明确无误的有了这个国家观念。世界上一个民族分属几个国家，多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例子很多。内外蒙古不同于东西德国、南北朝鲜。稍有历史、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所以分为内外蒙古是因为中间天然隔着千里无水戈壁高原。内外蒙古之间相距可谓“近在眼前，远在天边”。在古代就分南北匈奴。与当今内外蒙是一样的。蒙古人在世界舞台上称雄一世，却把自己人散落在欧亚大陆广大地面上，这是蒙古祖先的错误没有什么可自豪的，还闹什么大蒙古的统一，那是胡闹。跑到国外去闹“分化”的不过是区区几个民族狂热分子的“英雄主义”表演而已，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二十年代也曾西伯利亚达乌里车站出现过昙花一现的“泛蒙古运动”。能把世界蒙古人统一起来，恢复祖业，建立大蒙古帝国的大可汗尚未出世。以内蒙古的现状来说，分东部、西部，长期以来就连自己内部都不能团结，矛盾斗争不断，还哪有可能搞什么内外蒙的合并统一，那是“天方夜谭”。在民族关系上，存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人，接过历代统治者“分而治之”的反动思想，总想挑动蒙古民族内部矛盾，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落后的少数民族也都有这个弱点，惯于窝里斗。你想超过我站在前边，没有门儿，我非把你拉下来不可。我是老大，你是老二。周惠在其 28 号《汇报提纲》中讲过内蒙古有“三方两派”。这里的“三方”是指东部西部蒙族与汉族之间三方关系。蒙族学生闹 28 号文件之后，有些人乘机挑唆周惠上纲上线，推出西部区蒙族干部，将“民族分裂”祸水拨向东部区。然后又做出结论说，土旗老干部是这次闹事学生的“后台”。这样一来，东西部矛盾又加深了一层。对此，过去在内蒙古工作过的老干部张策、胡昭衡等人曾做过批评、指责。民族团结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如若蒙汉干部之间互相猜疑不信任，那问题就来了，疑心生暗鬼。以前，在解放战争时期到内蒙古工作、战斗过的汉族老干部，了解内蒙古的历史，同蒙族干部感情相通，充分信任蒙族干部。蒙族干部堆到一起说什么也不生疑心，蒙汉关系融洽，因而出现了五十年代辉煌的黄金时期。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以及“文革”以后，有些人对内蒙古的历史越来越恣意歪曲，比萨斜塔越来越斜，对民族干部越来越不信任，动辄“民族分裂”，“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到了不承认历史、篡改历史、瞎编历史的地步。据以往打“民族分裂”的历史，每次“左”的形势一来，防范措施紧跟其后。那就是削弱蒙族干部力量，蒙族干部纷纷落马。从重要岗位、关键部位、要害单位、重点地区、核心地带，都要调开一批人。经过调整之后，虽然民族干部的数量未减，但“质”量却下降了，闲职增多了，实职减少了。札萨克王爷少了，闲散王爷多了。民族问题上“左”倾政策，还表现在“加速”民族融合进程。今天，内蒙古的人口，在汉族人数占绝对多数，蒙汉比例一比十的形势下，还要写两种文字，发两种文件，出两种书刊，挂两种牌子，操两种语言，设翻译机构，太麻烦、累赘。应该赶快使用一种文字，说一

样话,那多省事啊!蒙古人到一起在说什么也不知道,很不放心。这就是“左”派们的急躁情绪、猜疑心理。为此,着手削弱蒙古语文工作,急于蒙汉合校向全面汉语授课过渡。在韩茂华的讲话里,将蒙古人要求和抢救民族文化遗产,保持发展“固有文化”也打成“民族分裂”的重要表现。在他看来,蒙古民族的文化,现在不是发展,而是到了消灭的时期了。“文革”以来,蒙译人员大量快速减员、改行、转业,蒙专学生越来越难就业。报考蒙文授课学生越来越少。这已经表明同化速度也够快了,可是有的人还是嫌慢。承认不承认民族问题的存在,实质上是承认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的问题。按照《自治法》49 条规定“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文字”。这一条规定看来对内蒙古是不适用了。对于“左”的政策措施,民族干部、文化教育、知识界是敏感的阶层。这些人跟不上加速融合的形势,民族感情就要油然而生。于是就要极力表达意见,就会发出牢骚、怨言,就会影响到青年一代。青年人不知天高地厚,容易冲动,就要闹出事来。出了事就找老的算帐。马列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族感情充分表达时期,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时期。民族融合只能随着社会的前进,顺其自然,是遥远的事情。任何以行政手段加速这个进程,那无异是强制同化。我们坚决反对反动的强迫同化政策和否认民族问题存在的谬论。语言文字这个东西,若要强行同化,也能很快奏效。然而感情上的同化,那可就逆反了。土默特人在过去付作义大汉主义同化政策压迫下,语言文字丢掉了,可是民族意识反而更强烈了。列宁说“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我们应吸取和研究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失误和教训。他们过早的宣布民族问题解决了,到六十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进一步宣布“完全彻底解决”,大家都是“苏联民族”了,从而导致民族工作上的严重失误。理论上否认民族问题的存在,而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发生民族纠纷。对此,往往以“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捣乱破坏”而采取压制与镇压的错误方针。前苏的失误造成了后苏悲剧。在苏联,以前被打为右倾的人,正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当时演“左”而飞黄腾达的人,后来却是埋葬苏联的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过;搞好民族关系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尤其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并且要经常注意检查。可是在我们内蒙古,历来是只反一面,而另一顾永远是正方。受到打击、处理的总是蒙古族干部,而从来听说过哪个人因犯大汉族主义错误而受到批评、指责。八十年代,周惠主政要把昭乌达盟改为赤峰市。在研究改建会上,民政厅一位付厅长提出,要改也应改为“乌兰哈达”市。因为“赤峰”是根据“乌兰哈达”译过来的。“乌兰哈达”是古老名称,民族地区保留原有地名为好。对此,周惠的反应是“挺好的干部,有民族情绪”。这又是想当然的逻辑推理闹出来的笑话。这位付厅长是汉族干部,并不是蒙族干部。

“文化革命”以后,无可讳言,蒙古人的民族情绪是有了上升趋势。何故?是国外敌对势力的“分化”煽动吗?不是。而是我们内蒙古这里自己内部的“左”倾大汉族主义压出来的离心倾向。八十年代以来,做为主体民族的自治权利一削再削,蒙族干部现在对于自治权利,越来越模糊不清了。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说的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要认真做到少数民族为主,汉族为辅。可是在我们内蒙古,早已掉过个来,汉族为主,蒙族为辅了。胡锦涛同志于 1993 年 6 月 8 日讲过,中央多次讨论民族工作,强调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从最根本的意义来

说。就是要由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的干部和人民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事务当家作主”。民族团结的基础是信任和尊重少数民族干部。如果将正当的民族感情所表达的正确意见都视为“民族分裂情绪”那才是真正制造内蒙古不稳定的因素。

一九八一年内蒙古学生事件

一九八一年内蒙古发生了因阻止移民流入问题而引发的大专院校学生请愿、游行、罢课事件。风暴席卷全区，惊动朝野上下，历时七十多天。对这次学生运动，社会各界，蒙汉各族人民不管做何评论，它已铸就了内蒙古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文化大革命”中，滕海清来内蒙古挖了几十一万“反党叛国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文化革命”后，周惠来内蒙古又从学生事件中挖了“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因而人们称它为“内人党”之后的“学生党”事件。

内容提要：

○内蒙古天灾人祸，生存危机。昔日“农进牧退”，今日“涉进人退”，“胡儿眼泪双双落”

○冯文彬诬枉内蒙古开展“驱赶汉人”运动，周惠顶不住压力。诱过他人

○周惠带着江波去中央汇报内蒙古工作，决定二百万蒙古人命运

○胡耀邦右手发了个西藏 31 号文件，左手又发了个内蒙 28 号文件。两个文件碰撞发出火花

○乌兰夫派云北峰来内蒙古抵制 28 号文件，阻止移民流入。土默特籍干部愤起响应，发起运动

○自治区党委一、二书记对闹事学生头头抓不抓，意见分歧

○政治骗子周惠耍弄权术，翻云覆雨

○群众运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民族极端分子喊出吓人的民族自立口号

○周惠挑动干部队伍的“三方两派”为他所用

○胡耀邦交底“要保乌兰走这面旗帜”

○“以夷制夷”，周惠点化学生事件，祸水引向东部区干部

○布赫、云世英批学生事件是四七年“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周惠追查学生后台，逼死杰尔格勒，气死宝音图

○内蒙古自治区成了周惠的“专治区”

一、事件起因

一九七六年九月，华国锋继承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主持中央工作，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广施恩泽，授权乌兰夫在民族工作领域大胆放手拨乱反正，全面恢复党和国家在五十年代初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同时他又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主席批为“扩大化”的“内人党”的存在，搬掉了压在内蒙古人民头上的一块盘石，使内蒙古人民获得第二次解放。一九七八年，华国锋选派时任交通部副部长，原胡

南省委副书记周惠到内蒙古接替军管领导人尤太忠，出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将华国锋赶下台，自任中央军委主席，执掌国柄，指定胡耀邦为总书记。胡耀邦思想活跃，作风民主，勤政爱民，雷厉风行，一九八零年去西藏巡视，俯察民情，按照马列主义民族平等原则，大刀阔斧纠正剥夺少数民族自治权力的“左”倾大汉族主义错误，以(80)31号文件发往全国。文中特别指出“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接着胡耀邦又去新疆视察，进一步放大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力。两地精神传到内蒙古之后，广大干部群众为之振奋，庆幸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

回顾内蒙古，自从五十年代末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间，内地人口流入内蒙古千百万，已成为制约内蒙古向前发展的严重问题。当时内蒙古的生态状况，以自治区党委宣传刊物报导：“长期以来，在左的影响下，我们不顾自然条件，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违反自然规律，大量开荒、滥垦、滥伐，大量林牧资源受到破坏，牧场退化，农田沙化，人均占有牲畜下降，全区沙漠戈壁面积扩大，一亿一千万亩，平均每年扩大五百多万亩，一八十八个旗县中有六十七个旗县已经沙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地阻碍生产的发展，同时威胁到人民的生存”。在经济报刊上有关学者报导“从建国到现在，内蒙古草原进行了五次垦荒运动。其规模远大于以往历史总和，其中有无奈的时代背景，也有政令的偏差，使草原生态系统遭受，致命创伤政府主导下的草原大开垦，除了给生态带来危害外，还给牧区带来沉重的人口负担，大批的盲流和各地的种田能手进入草原，由于他们的开荒种地，春风一起，飞砂走石。几十年间，内蒙古已有207万公顷草原变为耕地，换来的是134万公顷土地的荒漠化”。

由于生态急剧恶化与人口的高速增长，出现巨大反差，如同周惠所说“僧多粥少”的矛盾愈来愈加重。解放后，内蒙古人口一变而为三，北部牧区一变而为六。盲流涌入牧区，大都是去吃“大锅饭”、供应粮，少数是在“文革”和军管中去夺权、“掺砂子”。阿巴嘎旗敖冷宝力格生产队，一九五八年人均占有牲畜114头，到一九七九年下降到17.4头。盲流在“文革”中造反夺权残害、欺辱牧区干部群众，侵占掠夺牧民集体、个人财产。他们在“挖肃”中是“打着要”，军管时期是“骂着要”，撤销军管后是“闹着要”很多盲流是机动灵活的游击队，在这个生产队借钱不还转那个队。这个队吃穷了再找另一个队。那个队吃光了再找另一个队牧区受到干旱、风雪灾害之后，他们就走了，等到生产恢复生活好转了，他们又回来了。

一九七九年周惠来内蒙古，首先下到牧区视察，发现盲流已成为内蒙古一大灾难，于是他根据国务院发布清理流动人口的政策精神，以及一九八零年，中央对西藏、新疆发出的文件指示，决心清理盲流。于是连续发出文件指示，又登报刊。广泛宣传，要求各地对“盲目流入牧区人口，逐人逐户清理”。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四日，乌兰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的文章。全面阐述，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批判了不尊重民族自治权和大汉族主义种种表现。并在文中特别指出“迅速制止人口的盲目流入”。

正当内蒙古上下齐手清理盲流工作之时，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周惠接到中央通知，带着他的大小秘书江渡、田聪明参加中央书记处第111次会议，汇报“内蒙古政治、经济两方面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万里、习仲

勋、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姚依林。列席的有乌兰夫、杨静仁、冯文彬、邓力群、朱穆之。周惠在汇报中重点讲了人口管理中的“盲流”问题，干部工作中的“三方两派”问题，区域自治中的“少数与多数”的问题。中央书记处讨论意见，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以 28 号文件发出。《讨论纪要》给内蒙古做了八条指示。一是表扬周惠到内蒙古干的不错，要再接再厉；二是说外蒙古受苏联的剥削和掠夺，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内蒙古要敢于同外蒙古比赛，要超过它；三是内蒙古在十年内进入全国先进省区行列；四是内蒙古要在十年后牲畜达到一亿头；五是外省区人口流入内蒙古，不要堵，要妥善安置；六是权力机关的干部配备，在少数民族多的地方以少数民族干部为主。在汉族多的地方以汉族干部为主。既要照顾主体二百万蒙族，又要照顾一千六百万汉族。即“双为主”和“双照顾”；七是发展科教事业；八是《纪要》发到全国各省区、中央各部委。

文件来到内蒙古之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这个《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的中央指示精神与不久前发的，全国各民族自治地方通行的西藏、新疆的文件精神大相径庭，各族干部手足无措，感到茫然。人们纷纷议论这是怎么啦，去年 31 号文件刚刚给了点自治权利，今年 28 号文件里都没有了，“盲流”还得接纳安置。乌兰夫发表的文章与 28 号文件相隔只有二十天时间，《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文件是中央发的，都是党中央的声音，可是唱的是南腔北调，极不和谐。例如，区域自治中极为重要的行使自治权力的干部配备问题。乌文中说，我们讲全面落实和推进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基本问题有两个，一个叫民族化，一个叫自治权。民族化是行使自治权利的必要条件。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应当以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关于汉族人口比自治民族人口多，如何自治？我们说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民族”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这“区域”以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为基础；这“自治”，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的自治。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我们说的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要认真做到少数民族为主，汉族为辅”

文件与文章对照，什么“双为主”、“双照顾”的说法相去甚远。乌兰夫的文章是根据华国锋的指导思想起草的，是与胡耀邦总书记西藏、新疆之行的指示精神相呼应的。可是赶到 28 号文件时却走进三岔口了。广大干部迷惑不解，为什么轮到内蒙古，政策就变了呢？为什么还要向内蒙古放进盲流呢？哪儿还有自治权了，哪像个自治区了。不满言论，传闻，街谈巷议，舆论哗然。

内蒙古的清理“盲流”工作，从其启动伊始就不顺利，一开犁就打钯子了。锡盟按照周惠指示刚刚触动几户“打砸抢分子”就反映到冯文彬那里去了，冯文彬认为内蒙古发生了赶汉人运动。乌兰夫说冯文彬胡闹，不行就动用民兵往出赶。28 号文件按照冯文彬的意见发下去了。乌兰夫当即派云北峰去内蒙古抵制。内蒙古的干部群众已是一堆干柴，一点就着。当时的学生情况是“文化革命”结束，“内人党、叛国集团”都平反了，恢复高考招生上来的蒙生，大都是“挖肃”中受害者子女。当年“盲流”如何夺权残害他们父母亲人的惨状历历在目。这些学生一听盲流又要来了，犹如东欧人听到“黄祸”又要来了一样，惶恐不安，奔走呼号，一哄而起，遂发生两个多月的学生运动。

二、事件经过

一九七八年底，华国锋选派周惠来内蒙古，替换军管领导人尤太忠。为了稳定

局势，避免新的动乱，实行交叉换班。周惠已经得知尤太忠回北京人中央党校接受审查与江青、王洪文的关系，所以他来内蒙古，虽然先任第二书记，却无理采尤太忠这个第一书记，一、二书记“参”、“商”不相见，他到全区各地巡视。等到尤太忠离开内蒙古，腾出第一把交椅之后，他才大摇大摆回到呼和浩特上任理事。周惠接任之后，为了制造声势，召开几千人干部大会，号令大家“是骡是马拉出来溜溜看”。大会下来，人们嘲讽新官上任第一场开了个“骡马大会”。周惠也确实想要大干一番，开始干的几件事，受到好评，如积极平反冤假错案，坚决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后来经过一年的工作体会，他深感自己做为第一书记，他的话在内蒙古干部队伍中，远不如副书记王铎的话灵，于是他拜访了“文革”前自治区党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王再天。王再天说，“以派划线”人家(王铎)是“保党派”的领导人，当然说话要灵了。他建议周惠起用廷懋出来协助工作，说他两派都不沾，可在中间持衡。于是周惠决心拆除王铎帮派这一堵墙，在区党委扩大会上提出讨论干部队伍中的“三方两派”问题以克服派性干扰。同时，周惠为了拆“墙”顺利，曾向中央联系将王铎调北京安排中央民委副主任，王铎不去，遂将其分管的干部工作要过来交给了廷懋。并从军区政治部调老干部王桐三来担任组织部长，着手调整干部。周惠授意“要把王铎势力给我削一削”。然而，这项工作刚刚起动，反对 28 号文件的学生事件发生了。

学生事件，按照周惠后来的总结，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中央[1981]28 号文件形成于八月三日，八月十日发到内蒙古。八月十三日自治区党委召开盟市旗县委书记会议进行传达，会场就出现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异常现象。区党委领导上看情势文件下发传达讨论，可能产生不良后果，于是又发紧急通知叫下边暂缓传达。八月二十二日会议结束当晚，就在呼和浩特街头、内蒙古党校院墙上显要地处出现了“要求中央撤回 28 号文件”、“保卫民族自治权力”、“争取民族生存”的大字标语。与此同时在自治区机关干部中也出现了新的动向。

自治区政协主席奎璧在大小会上气愤地讲“什么自治，不堵盲流就不是自治区”。

区党委统战部长克力更召开人口问题座谈会，讨论研究盲流问题。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院长浩帆广发议论：“什么自治啊，自主权啊!什么都没有了，内地汉人多得无法生活就来内蒙呗!这回不用再研究什么自治了!”。

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森在他办公楼前的蒙古包里请来中央《民族团结》杂志记者斯热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室主任茂敖海，掉着眼泪向他们说：“28 号文件把我们老蒙古欺负苦了”，指着茂敖海说：“你这个民族理论专家要评它呀!”，茂敖海从容表示“是要评一评”。李森当场指定民委干部王见喜负责联络各方工作。

九月五日，内蒙古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 28 号文件，立即引起学生骚动：“内蒙古的汉人已经是蒙人的九倍文件说盲流不能堵，这不是鼓励向内蒙移民吗?”、“什么民族关系处理的比较好，民族团结高唱入云，文革中我们蒙古人被整死数“万计，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为什么汉人领导不受任何制裁!”，“为什么蒙古人的自治区非要汉人来当第一把手?滕海清、郑维山、尤太忠、周惠，哪个不

是汉人!”、“内蒙古是我们蒙古人的自治区，我们要保卫自己的土地，保护自己的生存空间!”

这时民族理论权威人士茂敖海的《评因周惠汇报产生的(28)号文件八条》六、七千字的传单也上街了，进了校园了，成了学生运动的行动指南；评论传单开头就说周惠的《汇报提纲》掩盖在内蒙古存在的民族问题，他一个人决定了二百万蒙古人的命运。评论说：

例一、在内蒙古，每建工矿企业，都由外地配备汉族职工，蒙族永远处于落后状态。但周惠在汇报中，把主要是汉族职工队伍的形成，说成是各民族职工队伍初步形成来隐瞒民族问题；

例二、周惠在汇报中说，科学、教育、文教、卫生事业有了，较快发展，内蒙古有高等院校 15 所。他却回避不讲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几十年了，用蒙古语文为主授课的大学一所也没有；

例三、周惠是以个人名义汇报的。这样重大的决策，决定蒙古民族 200 万人命运问题，不经过党委集体讨论，完全由汉族书记一个人决定。这充分说明，内蒙古不是蒙古民族自治，而是由汉族治理蒙古民族，是汉族作主。不仅如此，在内蒙古，蒙古族干部无权坚持马列主义民族平等原则。谁坚持谁就被看成地方民族主义者，不能重用，甚至被压制不起用。谁拍汉族书记的马屁，谁就官运亨通。这能说蒙族自治了吗？

传单接着评论《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的纪要》八条：

第一条指示中，只讲发展生产，但不追究生产落后的根源。实际上否定内蒙古存在民族问题。为什么回避不提呢？这是准备对那些提民族问题、要求民族平等的人，当作破坏民族团结的罪人来整。

第二条内蒙与外蒙比赛问题。外蒙古虽然受苏联的剥削和掠夺，但是形式上还是独立的，内蒙古人口 1800 万，实际已到 2000 万。和外蒙 150 万人比赛，胜败都没有什么意义。内蒙还要安排几百万盲流去搞牧业，这就是要夺取蒙古民族的经济基础了。还谈什么发展民族经济呢？

第三条在如何建设好内蒙古问题上，只讲增加工农业产值，却不讲如何发展民族经济。

第四条讲的发展一亿头牲畜，靠什么？要由外边进汉族来解决。看来不管你蒙古人同意不同意，硬要进大批汉族流民来内蒙了。这是以大压小，以多欺少的霸道主义，典型的大汉族主义。

第五条说，人口的自然流动是堵不住的，这话离谱了。我国是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生孩子都有计划，说堵就堵了，何况人口流动呢！不堵盲流的方针是只考虑汉族利益，不考虑蒙族利益，说穿了就不是以民族平等原则处理民族问题。用大批移入汉人吞没蒙族，即强迫汉化来解决民族问题。

第六条中说，要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却只字不提民族平等。按照马列主义原则，只有坚持民族平等才能有民族团结，不讲平等原则就是叫少数民族服从多数汉族，谁如果不服从汉族利益，提出要求实现民族平等、自治权利，谁就要承担破坏民族团结的责任。

其次，说什么既要照顾二百万主体民族，又要照顾一千六百万汉族的“双照顾”。世界上只有大的照顾小的，多的照顾少的道理。哪有小的照顾大的，少的照

顾多的道理!这意味着要永远保持少数民族的落后,以便由汉族控制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权利。

再其次,在干部配备方面,说什么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少数民族为主。在汉族聚居区,以汉族为主。这个“双为主”方针意味着什么呢?请看内蒙的情况吧!所有二十二个汉族聚居县,早就实行以汉族干部为主了。五十六个蒙旗,现在如果汉族多就以汉族干部为主的话,除了科右中旗、科左中旗之外,全是汉族人口占多数了。那就都要以汉族干部为主了。要采取“双为主”的方针,就把所有蒙旗领导权彻底夺到汉族干部手中了。这样,蒙族在形式上的自治也不存在了。大家知道,解放当初,除土默特一旗之外,各蒙旗全是蒙族占多数。如西苏旗当时共有两千人全是蒙族,但现在早已成为汉族聚居区了。这个“双为主”的方针是极为敏感的问题,但也敢在 28 号文件里明文规定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汉族领导已经感到解放后大汉族进入内蒙古站住脚了,在人数上已占压倒的多数了。内蒙的骑兵已彻底搞掉,部队里的蒙族指战员清理的也差不多了。所以就不怕蒙族的反对了。

第七条只强调科研和一般教育事业,只字未提蒙古民族的教育事业。

第八条规定 28 号文件发到全国各省市,这与第五条规定的“不堵盲流”的方针联系起来考虑,就使人很清楚了。这是号召外省市从此可以合法的、大批自由输出“盲流”来内蒙争夺蒙古民族的土地和经济基础了。

评论传单进入校园,无异是放了一颗巨型炸弹,给请愿学生提供了理论武器,以及他们所不知道的一些政要资料。

第二阶段:

自治区党委传达 28 号文件的会议上已经“风起青萍之末”,会议刚散,街头已经出现大块标语。做为责任书记的周惠他明明知道大风将要起兮,他却不作稳住局势的防范预案,而是学毛主席的策略,躲开走了,到呼和浩特周围旗县转悠去了,窥察形势的发展。

九月十日上午,内蒙古大学蒙生代表十人团到自治区党委请愿,请周惠去学校解释 28 号文件。“冤家路窄”,这一天早晨周惠刚从乌盟凉城县回来,晚上准备上车去北京参观军事演习。他九点回到党委,学生十点就到,碰个正着。秘书长宝音图报告情况,召开书记办公会,又陆陆续续找来了各院校、各有关部门领导人,研究对策。接不接请愿书,谁出去接,成了闷会。直到晚上八点周惠上火车走了之后,宝音图推出副秘书长李俊谭去见学生接了请愿书,说“周惠书记去北京开会走了,区党委在三、五天内召开与学生代表的座谈会”,学生听到答复就回校了。第二天,内蒙古师范学院、内蒙古医学院学生代表也陆续上访,求见周惠,主宰内蒙古的第一书记周惠,已经看到家里着火了,但他不顾,还是去看军事演习走了。一天之后,第二书记廷懋在内蒙古团校毕业典礼讲话中说到“内大学生连文件都没有看,就到党委闹事!”、消息一经传出,党委答复学生召开座谈会之事就成了欺骗。内大学生就炸开了“我们找党委反映情况,怎就成了闹事!”。九月十二日,各大院校蒙生两千人在新华广场集会、演讲,然后游行示威。这时学生领袖开始初露头角,内蒙古大学的特木其乐吐(汉名席海明)、白燎原(蒙名忒木尔)。

九月十五日,内蒙古大学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劝说学生不要上街,有什么意见按组织系统提出来,学校转送上达。可是学生不听,各大院校学生轮番来区党委,定要与周惠对话。其间秘书长宝音图多次出来做闹事学生的疏导工作。学生表

示“周惠不见，我们就天天来”，由是僵持下去。

九月二十八日，周惠返回呼和浩特，听取第二书记廷懋、政府主席孔飞汇报之后，认为学生闹事主要是针对“不堵盲流”问题来的。决定以政府名义发布《关于人口管理问题的指示》，登在内蒙古日报九月二十九日头版头条。布告作了如下指示：

- 一、对已经流入的人口要就地安置；
- 二、对于进来时间短，无户口的，往回动员；要先同原籍协商，慎重处理；
- 三、对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的，要批评教育，消除隔阂，增强团结。个别违法乱纪，打砸抢的人，按政策和法律进行处理；
- 四、今后要严格控制区内外农村人口流入城镇、牧区、林区和猎区；
- 五、国家今后在我区兴办工矿企业所需人员，除区内确实无法解决的、必须的专业技术人员外，要就地解决；
- 六、坚持计划生育。

周惠的这一招术是想以此来釜底抽薪，稳定人心，平息事件。其实布告《六条》是周惠的《汇报提纲》中讲的，与 28 号文件的中央指示精神相悖。

这正是周惠的用心所在。他以此开脱自己，把闹事学生火力引向总书记胡耀邦。“不堵盲流”是中央的指示，告诉学生不要跟我周惠过不去，你要闹就去找胡耀邦闹去。

十月十五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大专院校干部会，周惠、廷懋、云世英讲话。周惠的讲话，不谈主题，没有要领，对闹事学生提出的问题“王顾左右而言他”。廷懋、云世英做为辅佐第一把手的东西部蒙族领导干部，他们的责任是在学生闹事的风浪中，要保驾护航，保全第一书记。他们侃侃陈词，给周惠评功摆好，并且都说“周惠的汇报提纲是经区党委反复多次讨论定的，如有问题我们共同负责”。对他们这种表演，人们想到了“文化革命”中，吴涛帮衬滕海清的故事，完全理解。

第三阶段：

十月十六日，周惠经过区党委会议研究讨论。拿出了态度强硬，压制闹事学生就范的 21 号传真电报发往全区，并报送中央。文件名称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学习贯彻中央 28 号文件的决议》。这份电报内容，一是坚决同中央保持一致，坚决贯彻 28 号文件；二是讲“呼市一两所学校的极少数不明真相的学生出面，散发传单，秘密串连，造谣诬蔑，对抗中央，严重违反了党和国家的民主与法制，破坏了安定团结”。这是周惠耍弄的第二个很毒辣的政治手段，他的用意昭然若揭，“不堵盲流”是胡耀邦总书记说的，学生“不明真相”，要我周惠解释回答。我是“向中央保持一致的”，我要“坚决贯彻 28 号文件”。这是周惠一招未成又来一招，把学生火力引向中央，刺激学生，压迫学生去找胡耀邦闹去。传真电报中还藏有一句埋伏的话，“不明真相的学生出面，散发传单”。周惠在这里已经埋下杀机，暗指学生幕后有指挥的后台。被激怒的学生，从闹 28 号文件转到闹 21 号传真电报，更大规模的来找周惠争辩。看学潮高涨形势，高压措施不见效。周惠向廷懋说：“28 号文件是中央的，不能变。至于我们自己的文件那好说”。学生见不到周惠，通过医学院院长义达嘎提出见廷懋。廷懋欣然答应可以见，在他家里见了学生代表。廷懋劝导学生不要闹了，要听党的话，只要学生停止闹事，对传真电报的说法接受不了，可以考虑。马列主义也不是字字都是真理嘛！这话传出去就走样

了,说是第二书记廷懋代表自治区党委承认 21 号电报错了,以讹传讹。第二天农牧学院院长浩路串连各院校领导人找王铎、王逸伦,通过他们向周惠告廷懋“不怕学生闹事,就怕党委动摇”。于是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廷懋做了检讨,“出言不慎,学生钻了空子”。就在这次会议上,周惠大骂学生闹事是乌兰夫派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云北峰来呼和浩特点火闹起来的。云世英低头不语。21 号传真电报,非但没有压住学潮,反而使它更加猛烈了。十月二十日各院校学生潮水般涌向自治区党委,要求澄清(21 号)传真电报对学生的“诬蔑诽谤”。

面对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区党委决定十月二十一日在内蒙古体育馆召开六千人的高等院校师生大会,由廷懋宣讲中央 28 号文件和自治区 21 号传真电报。会场主席台对面,北台方块是由主管会务的秘书长宝音图安排给闹事蒙生留的。可是周惠秘书田聪明操纵的“政工组”人员,暗中通知医学院,组织动员几千名汉生,会前入场占据了这块方块。等到会议开起来,真正的接受会议教育的对相,两三千闹事蒙族学生开进来时,会场坐位已满。蒙生拥挤在会场通道上。这时廷懋的宣讲已经开始。闹事学生向会议主席台递交了要求澄清诬蔑学生的传真电报的请愿书。会议主持人斥责蒙生破坏会场纪律,汉族学生有组织有准备,有领头的做策应。以维护会场秩序压倒的声势,阵阵起哄,喊场威。在此对立和被压迫的形势下,蒙族学生愤而退场,队伍拉到大街上游行去了。体育馆的宣讲会议照常进行,如同缺席审判的法庭,向那些与事件无关的汉生无的放矢。讲者无力,听者无意,不期而散。从这一天起闹事学生进入新的阶段。

第四阶段:

从体育馆会场退出来的六大院校蒙生,决定从次日十月二十二日起联合罢课,并发表《告全区人民书》,述说他们向区党委领导人提意见要求解释 28 号文件,却被诬陷为对抗中央,并拿一份不明出处的《锡林浩特》传单栽脏镇压他们。由于自治区党委的传真电报措词严厉,闹事学生反抗强烈,上下尖锐对立,两方都不肯让步,很多人士担心出事。青年学生头脑发热起来“初生牛犊不怕虎”。爱护学生的人们具有“护犊”之心。这时社会各界,机关团体声援学生的活动也达到高潮。书信、传单、抗议、请愿满街飞舞。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传单泥沙俱下,说什么的都有。连日的学生运动,呼和浩特全城都开锅了。有些人声泪俱下,联名送上请愿书。他们写道:

我们这些十年浩劫中被挖内人党的伤残者,现在害怕我们的子女再遭镇压。周惠做为第一书记,不敢做学生的思想工作。21 号电报是破坏宪法、镇压学生的文件,这是对整个蒙古民族的镇压。如果不撤回 21 号电报,我们将同自己的子女站在一起,用我们伤残的躯体去迎接蒙古民族的第二次浩劫。

苏尼特左旗旗长苏德宝,组织牧民,准备在必要时带领马队进城支援学生运动。

巴林右旗一中学教师的传单写道:雄鸡已经啼明,黎明即将到来,成吉思汗的子孙,快上马吧!

土默特蒙古族群众准备好三百辆汽车、拖拉机也要进城支援学生。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竟然有二、三十个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联合签署,上书自治区党委、党中央,声援学生运动。

中共内蒙党委并转党中央:

中央 28 号文件下达以后,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工人和群众对文件中的一些内容持有不同的看法。意见很大。28 号文件的一些条款基本上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破坏了我党一贯坚持和奉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剥夺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根本权利。所有这些内容是内蒙古自治区二百多万少数民族所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呼市地区以及其它盟市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就 28 号文件,要求内蒙党委做出解释,并为此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代表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是 28 号文件下达以后的必然反映。他们所提出的要求以及所采取的行动完全是正当的,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是符合我们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我们表示完全支持。

可是时至今日,内蒙党委根本没有满足广大少数民族学生的正当要求,没有对 28 号文件中所存在的问题做出一次解答,反而置若罔闻,置之不理。做为自治区党委,采取这种态度,根本上违背了密切联系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的作风,损害了我党的威望,阻碍了党的工作的顺利展开。我们不理解的是党中央的文件为什么不能很好地给予解释,反而采取欺骗、拖延,甚至是压制的方法呢?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自治区党委于十月十六日发出 21 号文件,公然歪曲事实真相,以此来蒙骗全区各族群众,给数千名少数民族大学生扣上了“造谣、挑拨、攻击、诬蔑、对抗党中央”的大帽子,并要采取“登记”的措施,欲加害于学生,镇压他们的正义行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极大义愤,我们坚决反对这种高压政策。强烈要求内蒙党委撤回 21 号文件。由于内蒙党委所采取的错误决定,导致了令耳的复杂局面,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了,对此内蒙党委,尤其是周惠同志本人应当负责。

内蒙古自治区是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这个地区,主体民族应当享有充分的权利,应当保持名符其实的区域自治。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且关系到马主义民族理论在我国能否真正得到实践的问题。21 号文件中提到的“我区各族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这是一个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更好地坚持和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的提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恳切希望内蒙古党委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真正了解广大少数民族的意愿,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调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六中全会决议的顺利执行。

内蒙古大学 内蒙二毛内蒙体委新华印刷厂 蒙文印刷厂
内蒙报社 内蒙电台呼市铁路局 内蒙歌舞团 内蒙歌剧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教育出牌社 内蒙医院 中蒙医院
内蒙科委 内蒙社会科学院 内蒙师院 内蒙古医学院
内蒙蒙专 内蒙地质局呼市钢铁厂呼市医院内蒙民委
内蒙团委 内蒙团校 内蒙妇联 内蒙纤维局 内蒙农牧学院
内蒙古供销学校 土萌特学校 呼市蒙族中学 内蒙畜牧厅等机关单位部分蒙古族干部、群众

正当闹事学生转入罢课游行的新的阶段,周惠第三次离开区党委机关,跑到赤峰召集全区盟市委书记会议。走时给他守摊的第二书记廷懋也不打个招呼。他在赤

峰会上讲了学生闹事情况之后,通过讨论考察各地来的这些各盟市领导干部们的态度。哲里木盟是蒙古人居多地区,蒙生也多,是重点地方。周惠向盟委书记阿拉坦敖其尔布置,呼和浩特大专院校派人到哲盟串连,叫他把那几名学⽣抓起来。阿拉坦敖其尔认为“看学⽣群众劲头儿,现在抓,更会激化矛盾,而且是上边去的,盟里不好动手,抓也要由自治区去人抓”。周惠在呼和浩特从一开始就想抓人,可是廷懋反对。云世英不表态,抓不了。他想在下边抓,仍然没有人给他动手,深感孤立无援。于是他向全区部署,各级党委,全体党员思想立场都要统一到 21 号传真电报精神上来,县团级以上干部,人人都要亮相表态,是支持学⽣闹事,还是站在区党委立场上来,同中央保持一致。从这些亮相表态的干部中寻找支持自己的干部,以建立自己的队伍。

第五阶段:

从学潮开始那天起,廷懋、宝音图多次创造条件,劝说周惠跟学⽣见见面,然后别人才好开展工作。云世英也赞同疏导方针。可是周惠始终采取强硬态度,没有化解矛盾之意,坚持镇压方针。学⽣非要见他,他就是不见。由顶牛僵持到发出传真电报谴责学⽣,步步激化矛盾,逐渐升级,硬是逼着学⽣就范。于是罢课学⽣做出错误决定,上了周惠的当,按照六条布告、21 号电报周惠策划的导引方向,上北京找胡耀邦闹去了。

十月二十九日下午,几千名学⽣及其声援者,以隆重的民族礼仪,将他们上访的代表团送上进京列车。赴京学⽣请愿团由六人组成:内大自燎原(领队)、蒙专郝继荣、民族师范那仁必力格、师大昭日克图、医学院玉宝、农牧学院阿拉坦达赖。

上访学⽣进京向中央呈上了五千字的请愿书,“要求中央撤销 28 号文件,使少数民族获得真正有法律保障的充分自治”。等待六天,十一月五日由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郑思远、国家民委副主任杨东升出面接见,训示学⽣代表:“中央 28 号文件、内蒙 21 号传真电报是完全正确的。学⽣闹事是错误的。但是只要从现在起停止闹事,一定既往不咎”。十一月七日,周惠向自治区机关、学校领导干部通报“有六名学⽣自称是内蒙大学生代表到北京上访,有关部门责令他们不许串连,否则立即逮捕,已给他们办了学习班,什么时候通了,什么时候放回去”。上访学⽣得悉这个情况之后,认为周惠讲的情况与他们在北京境况不符,质问是否周惠在造谣,与信访局接待人员争吵起来。中央信访局长张成梁暴怒:“你,你们几个蒙古人就是想闹事。老实告诉你们,别说一个内蒙古,就是新疆、西藏一块儿闹,我们也不怕!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

这时。呼和浩特的学⽣,为支援上访代表,运动持续高涨。十一月十三日,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干部、职工举行盛大游行示威。高喊“还我自治权利”、“争取民族生存!”口号。为防镇压,学⽣的游行队伍组织的一次比一次严密,进退有序,行动一致。

上访的学⽣代表,基于中央接待人员的强硬严厉态度,觉得继续坚持下去已不必要,请求中央向内蒙古发个学⽣复课电令。他们的请求遭到拒绝。六名学⽣代表决定集体同时绝食,各自向亲人发了诀别信。中央发现他们动向之后,十一月十三日晚,中央信访局长张成梁、国家民委邢波、国务院干部李建国三人,代表中央宣读了国务院办公厅的复课电令,发到内蒙古。上访学⽣于十一月十五日回到呼和浩特。数千名罢课学⽣及其支持者,在新华广场隆重欢迎他们代表归来。持续七十天

之久的学生运动，到此宣告结束。

三、事件处理

一九八一年发生学生事件当时的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是周惠、廷懋、王铎、孔飞、王逸伦、云世英、张鹏图、杰尔格勒、李文。其中执掌政治实权处理学生事件的是第一书记周惠、第二书记廷懋、副书记云世英。原先掌握实权的王铎，这时因派性问题已坐在了冷板凳。孔飞虽然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但他以其年迈，对学生事件消沉，不怎么说话。秘书长宝音图，虽然不是常委，但他职务所在，常务处理学生事件。

学生事件刚开始，自治区领导上的意见就出现严重分歧。第一书记周惠和他的秘书田聪明俩人主张采取严厉措施，把闹事学生领头的抓起来。第二书记廷懋认为抓起来更会把事闹大，主张疏导。副书记云世英不表态。具体操作学生工作的秘书长宝音图，无所适从。按照通常情况，一把手意见起主导作用应惟命是听。但宝音图也认为动手抓人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无奈遂向中央组织部报告情况，请他们转报总书记胡耀邦。周惠急不可耐地想把闹事学生压下去，可是没有人响应配合。于是他就扔给“老蒙古”去对付“小蒙古”，他到外地回头观察形势，到适当时机再回来收拾。

对此，廷懋说“学生闹起来之后，他要去看军事演习，他是兼职政委，不是军事干部，可以不去，他要干嘛。然后他又跑到昭盟去开盟市委书记会，跟我招呼也不打”。周惠在学生闹事之前认为王铎的帮派体系不听他的号令，妨碍他行使权力。学生事件发生后，他又感到所有做学生工作的机关学校的领导干部都是廷懋体系，不可靠。因而在学生闹事的过程中他所考虑的是如何建立起亲于自己的干部队伍。于是到处找干部谈话，掉眼泪，说他“耳目不灵”、“我是瞎子、聋子，空军司令，什么也不知道”，寻求同情，以发现忠实于自己的人为他所用。周惠首先在自己手下建立了一个叫“政工组”的不公开的秘密组织，暗中察访社会动态，学生动向，特别是学生幕后的支持者，深入机关学校收集情报。

周惠处心积虑，要把学生事件打成“民族分裂”的“反革命”性质。他从赤峰会议带回来一份《锡林浩特蒙古族青年的宣言》手抄反动传单：

锡林郭勒盟广大蒙古族兄弟们！

在锡盟的其他盟的蒙古族兄弟们！

中央 28 号文件所提出的八条，激起了蒙古民族的极大不满。

英雄的呼和浩特蒙古族学生挺身而出开始反对它。在广大的内蒙古草原上已经开始掀起了一场热爱民族、保卫土地的斗争。这个斗争大大得到其他少数民族的支持。

连篇累牍的充满大汉族主义的 28 号文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它公开侵犯民族自主，对少数民族进行压迫。所谓自治，只是名义而已。因此我们向锡林郭勒蒙古族青年呼吁，为了永远维护祖先留下的我们出生的故乡内蒙古，反对日益激化的民族压迫，为支援英属斗争的呼和浩特蒙古族学生的行动而站起来吧！动员广大蒙古民族，斩断伸向蒙古地区民族自由的黑爪！

还我的故乡内蒙古！要收回去 28 号文件！自由自治自主的内蒙古万岁！

九月二十八日，周惠的“政工组”人员从大街上捡来一个手抄蒙文传单，上边写着吓人的民族分裂口号“大汉族主义越来越猖狂地阻碍民族统一和独立！为结束

几个世纪以来的压迫和屠杀而斗争!”。

还有一份传单说“我们蒙古民族自一九四七年成立自治政府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还投有真正实现自主权。28 号文件充满了大汉族主义，侵犯了蒙族人民的利益，危及到蒙古民族的生存”。

茂敖海起草的《评 28 号文件》传单中，王见喜加了些批评中央、攻击周惠的“反革命”内容“蝗虫一样流入的盲流”、“周惠溜内蒙干部是骡子是马，现在内蒙人看出，周惠他本人非骡非马，是头毛驴，内蒙古不要他，请中央拉回去”、“我们要求由蒙族人民和蒙族党员，选出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和内蒙政府主席”、“中国是五十多个民族的国家，不是一个汉族的国家，要改变大汉族专少数民族政的局面，要求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必须由少数民族选出的代表占半数，不然就无法解决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的问题”。

周惠除将这些传单及时报送中央外，又亲自去找胡耀邦总书记报告说，内蒙古学生闹事反 28 号文件的行动是乌兰夫派云北峰去煽动起来的，学生闹起来之后又派他女儿出现在内蒙古大学院里。学生出面闹事，幕后有民族分裂集团在操纵。胡耀邦找乌兰夫谈话，情况汇报到军委主席那里。邓小平做了最高指示。从而学生事件出现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变化。

十一月五日总书记胡耀邦对学生事件做出批示：“对内蒙上访的，要采取严厉的立场，并限期离京，不能采取含含糊糊的软弱态度。这同新疆的民族纠纷不同。否则，我们要上当”。十一月六日，周惠赶回呼和浩特，十一月七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总书记对学生事件批示，然后公布了他从赤峰会议带回来的反动传单。他接着大讲“学生幕后有个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有组织、宣传、理论和情报班子”。会场气氛立即肃然，无人吭气。廷懋插话说：“不能这样估计，不能说庞大”。周惠接着又说“1947 年自治区成立时的斗争就是这样的”。会议下来之后，干部队伍立即发生分野，三三俩俩，议论纷纷。在新的形势下，“三方两派”干部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存在。在讨论会上，“左派”积极分子亮相表态投靠周惠。王铎也不再沉默，他说“在内蒙古，历来有那么一股势力，他们以民族利益代表为幌子，出来蒙蔽，拉拢群众，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活动在内蒙古历史上有过三次。土默特籍干部好闹事，但充其量是个地方民族主义，而民族分裂的危险在东部区干部”。老干部石生荣发言“内蒙古历来反汉排外”，当场受到党校李×校长的批驳。搞文教工作的一位老干部，会议下来拍布赫肩膀，怂恿挑动“布赫，这回该你出来说话啦，你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啊!”。

十一月九日，时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的布赫召开局处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他说：“学生闹事原因是一九四七年自治区两条路线斗争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继续和翻版”、“当时持错误观点的人，以后也大都承认、改正错误，许多人也入了党，担任了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但现在似乎想翻这个案，说他们那时候是正确的，打上民族的幌子，重演故技，招摇撞骗，争夺青少年，制造对汉族人民的不满……”。这个讲话是与周惠讲的“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一九四七年的斗争”相呼应的，首先在呼市地区掀起了新的风浪。他也如同乌兰巴干，引导汉人对东部区干部的不满，把“民族分裂”祸水泼向东部区干部，制造了东西部干部新的矛盾。在东西部蒙族干部中“延安”打“伪满”的一场战役打响了。布赫的讲话传到社会上，没过几天，十一月十三日的学生、市民、干部混合游行的队伍中出现了

横幅标语“乌云翻滚”。东西部蒙古人被挑动之后开始发生对立。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适应周惠讲话，有人捏造学生后台黑名单，他们是巴图巴根、特古斯、宝音图、舍郡木吉拉、巴图、特木日巴根、赛西亚等“七人委员会”。名单是浩路给石琳，石琳给周惠，周惠给布赫，布赫给郝秀山。郝秀山说浩路不是个好东西。

十二月八日，自治区党委在内蒙古军区礼堂召开区直机关党支部书记、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两千人大会。会议由孔飞主持，周惠、云世英讲话。周惠讲了学生闹事经过，闹事的“民族分裂”性质。云世英的讲话，系统地讲了这次学生闹事是内蒙古地区发生的第三次民族分裂主义路线斗争。指出“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九四六年前后我们党领导内蒙古人民同蒙古族反动上层分子斗争的焦点，这就是：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是搞民族独立问题”。大讲西部区是革命的、团结的，东部区是反动的、分裂的。会议一下来，东西部干部都骂云世英胡说八道，土默特籍很多干部也指责他不应该这么干。会议主持人孔飞部署了几天的支部书记学习班，学习讨论周、云讲话，不准请假，做好每个人的发言记录。讨论发言要联系学生闹事和本单位暴露出来的问题，深入排查于部队伍的政治表现。

周、云、孔的讲话都重点讲了“领导思想上的涣散软弱状态的问题”，不点名的暗批了廷懋。这时周惠已经踢开了廷懋，廷也未参加会议。

十二月十九日，孔飞在支部书记会议结束时宣读了周惠的“政工组”班子写出来的讲话稿。指出学生继续再闹怎么办？如果有人目无法纪，继续闹事，有关部门就坚决执行纪律，触犯刑律就要依法处理。不管你是学生、工人、干部，还是哪个民族的，都要依法办事。谈到反动传单，讲稿上说：“这是阶级斗争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正如斯大林指出的那样，在革命的现阶段，要求边疆地区分离是极端反革命的”。会议最后布置，各单位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都要书面写出总结，报上级党委。广大干部结合学习搞好年终鉴定。为下一步整顿调整机关干部做了准备。

周惠为了查出闹事学生幕后策划指挥的“地下黑司令部”、“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启动两套暗班子进行侦察摸排。一个班子是他手下的“政工组”，由其秘书田聪明抽调亲信人员深入各个学校、单位进行明察暗访；另一个班子是在公安厅立“01”专案。通过对反动传单的侦破查出“地下黑司令部”。周惠先是指定公安厅长伍彤来干这项工作，伍彤不干，他不愿当这个打手。副厅长刘志忠欣然领受这项任务。在部署“01”专案任务时，周惠面授机宜，要挖出学生后面的民族分裂集团和老民族分裂分子，要以侦破传单为突破口，深入查出学生后台。“01”专案组刘志忠等人首先从《评八条》传单的打印字迹磨损轻重分析，首先对自治区蒙古语文办公室的打字员反复检查了三次。然后又从区党委统战部调出文件，鉴别断定是在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打印的。于是经与民委领导人研究，将打字员萨仁格日乐，以去京购买新打字机为由骗她上火车，到了旗下营，推下车来，突击审讯。打字员交代是李森副主任和王见喜叫她打印的。专案人员虽然已知李、王所为，可是手中尚无证据，正愁之际，王见喜竟然自己送上来了。在那年代，每年秋冬，人们都要冬储瓜菜。有一天机关分菜，王见喜将手提包放在民委机关楼前的蒙古包上面忘拿，推车子回家了。有人捡去交到办公室主任高力套，发现包内有传单底稿，送到“01”专案组，当夜逮捕王见喜。一经审讯王见喜敢做敢当，从容承认传单是茂敖海起草的，他填加补充，各大院校学生是他去发动的。几句话过去之后，刘志忠按

照周惠指令，立即转题非法突审追查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的廷懋是否学生后台。王见喜轻蔑地斥之以鼻。

逮捕王见喜之后牵出茂敖海。周惠采取“先礼后兵”之策。先派“政工组”的云布龙、鄂云龙二人去茂敖海家谈话摸他的态度。几天之后拘留审查，问清传单的责任之后，改为隔离审查，转到呼和浩特宾馆，审查完了之后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按照周惠指令特设的“01”专案组，经一年时间，仅侦破王见喜这一油印传单。其他几个手抄小传单未能侦破。追查学生幕后“庞大的民族分裂黑司令部”，踪影皆无。专案搞不下去，只好收摊。一年中生产制造出来的一麻袋“黑司令部”嫌疑案材辩，既不能送入档案库，又舍不得烧掉，转这转那，无处存放，留着也许日后还有用处。

对于闹事学生，尽管周惠怎么恨，下不了手，胡耀邦不准他抓学生。为解心头之恨。周惠抓了一个支持学生的“幕后黑司令部”的青年干部呼和宝音。他是内大毕业后在社科院工作的。所在单位离内大很近，他跟学生有所接触。“政工组”情报人员指认他是给闹事学生出谋划策的，处罚劳动教养二年。周惠虽然没有抓学生，可是学生档案里都打进了一道黑杠，永不得重用。

周惠最为痛恨的是王见喜的人身攻击，骂他是“毛驴，请中央拉回去”，一想到这儿，他就伤感鼻子酸，掉下眼泪。逮住王见喜也算报了“一箭之仇”，判了两年之后，王也死去。其他几张小传单，虽然反动，破不破案也就无所谓了，他也知道，那是个别狂热分子所为。遂全力转到整肃干部队伍上来。经过几个月学潮的观察，又通过各级干部的亮相表态，谁是支持学潮，准是支持周惠，干部站队轮廓明显了，戏剧性的怪圈儿出现了。一年前，周惠起用廷懋，叫他把王铎体系削一削。经过学生事件，向周惠投送情报表示效忠的人，大体上都是王铎派系的人。这样，周惠的屁股又回落到王铎体系上了。周惠在他的《汇报提纲》中讲的“内蒙古干部分三方两派”，他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借此建立起自己干部体系。周惠来的当时，内蒙区直机关及西部四盟二市掌有实权的干部队伍大体上是在军管时期形成的“挖肃”体系。东三盟是在东三省辽、吉、黑拨乱反正，搞挖肃的人臭了，被挖的杨眉吐气了，所以不存在西部区问题。周惠削弱和调整这个体系，必然是在“挖肃”中受压挨整的“批滕派”上来。这些挨整受压的干部大都强烈要求恢复“民族自治权利”的人。经过“内人党”错案的平反，刚抬起头来恢复工作的一批干部，更是一腔火火的“民族情绪”。学生闹事主旨是“自治权”、“反盲流”、“惩办滕海清”。他们绝不会站在学生对立面去反对，亮相表态也不会站在周惠一边支持他镇压学生。

周惠在十二月八日支部书记会上，离开讲稿说“这次学生闹事幕后有后台，后台就在党委内部，他们为学生通风报信”。周惠这话是在说谁呢？说的就是廷懋、杰尔格勒、特古斯、宝音图等人。十一月五日周惠从北京回来之后就踢开了东部干部廷懋、宝音图，换了土默特干部云世英、寒峰。整东部蒙古人，寒峰不给动，于是把他撤下来换了别人。从这时开始着手调整干部了。首先是安排石生荣为副书记，将廷懋手中的干部权夺过来给了他。接着提任巴盟造反夺权出身的“保党派”干部刘贵谦为组织部长，不久又提任副书记，将当时的组织部长军区老干部王桐三赶走。这时廷懋还蒙在鼓里，毫不知情，他还在向周惠提出开会研究干部工作。周

惠说,等石生荣把大学班子调整完了由他安排吧,你就别管了。廷懋这才感到自己应该休息了。一九八二年,中央在北京开省市书记会议,那时廷懋还管着“两案”工作,也在北京。周惠在会上谈学生事件,什么也没说清楚。胡耀邦将廷懋找去,叫他也讲讲学生事件。廷懋从容发言,条理清楚,指出学生事件是“文革”后遗症问题,是二十年积累的问题。与会人员一听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各省市书记赞叹,内蒙还有这样水平的民族干部。胡耀邦高兴之余,叫廷懋下午再接着讲。通过这次发言,廷懋把自己也洗刷干净了,周惠再也不敢整他了,继续当他的内蒙人大常委主任。经过廷懋的说明,总书记胡耀邦对学生事件的性质也有所改变了。对周惠其人也有新的感觉了。过了一段之后,没有到换届时候就把他撤回北京,在国务院农业办公室挂个副主任的官,坐冷板凳休息凉快了。

胡耀邦将周惠召回北京之后,派张曙光来内蒙古任第一书记。他遵照胡耀邦指示,念“草术经”兴畜牧业,退耕还牧,种树种草。这个战略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可是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随着胡耀邦的下台,把他轰走了。如果二十年前张曙光的计划得以实现,今天的沙尘暴也许不会发生了。接替张曙光的是楚人王群。他一来,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提出什么“近期奋斗目标”、“超常规发展”,鼓励陈奎元在呼盟岭北高寒地区大量垦荒,说盲流生产商品粮有功,把内蒙古又祸害了一通。

周惠这个人整起人来是够狠的,他逼死了杰尔格勒,气死了宝音图。一九七九年东三盟划回自治区。原呼盟盟长杰尔格勒提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分管文教工作。因为他刚来不久,没有参与学生事件的工作。可是周惠找他谈话要抓他是学生后台。杰尔格勒一气之下,卧床不起,临终还在喃喃自语“周惠说我是学生后台”。

宝音图是在乌兰夫时期就是培养做为后续接班人的。他从巴盟盟委书记任上来自治区党委任秘书长。学生事件一开始,周惠、廷懋二书记意见严重分歧,政法书记云世英不表态。具体操作的秘书长宝音图感到为难,按照《党内准则》向中央组织部反映情况。请向总书记转达解决这个问题。胡耀邦委托中组部一位领导找周惠谈话。周惠抓这件事开始整宝音图,说他这是搞非组织活动。接着审查质问宝音图“我从凉城回来,学生怎么知道了?办公厅有人说周惠跑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去赤峰开会学生为何知道了?传真电报学校还没有收到,学生怎么知道了?”。一连串的发问“为什么”。对他这些非礼问话,宝音图哪儿受过这样窝囊气,辛辛苦苦给他支撑两个月门面,却被怀疑成通风报信搞小动作的人。28号文件传达之后,周惠就躲风跑了,党委机关千百名干部,谁不知道,堵谁的嘴呢!自己跑了,还怕人说跑了,这是贼人怕听喊“贼”。学生开始请愿是九月十日,周惠九点回到党委,学生十点就来党委。这是个偶然巧遇。如有人通风报信,在一个钟头之内,就是军队集合跑步来也不一定那么快,何况乌合之学生队伍。周惠去赤峰开会,跟看家的第二书记廷懋都不打招呼。各盟市、内蒙机关都去人,能瞒了谁呢,他以为很秘密,其实这不是蠢人“掩耳盗铃”吗?内蒙区直机关发文件是通过交换站,运转要比院校要快,上百个部门从哪里漏风,宝音图能撑握的了吗?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晚,周惠刚从北京回来,突然提问宝音图“商业厅××为何没有调来?我成了空军司令了”。周惠要调的这人是个副处级干部,常向他报告情况。周惠要调他来当办公厅副主任。商业厅分管人事的副厅长说这个人历史上

犯过几次错误,受过三次处分,很臭,年龄大、文化低,很多人都知道他给周惠送情报,而他的情报都是不真实的。宝音图认为周惠不应把这样的人拿来当耳目,所以没有给他调来,周惠极为恼火。田聪明是从巴盟来的,与刘贵谦同派观点,周惠要调他来当组织部长,宝音图表示反对,也引起周、田的不满。

做闹事学生工作,宝音图处在二线。有时也出去做学生的疏导工作。学生上访不是列队来的,是一帮,一群,一堆儿。他扎到学生堆里,跟他们对话。在接触中,他曾拍一名学生肩膀说“昂噶伊,哇罕太,亚布!”。这是长者对晚辈训导的语气。意思是,“年青人啊,要明事理,不要胡来”的劝导之言。可是周惠的情报人员汇报上去就变味了。说宝音图拍学生肩膀“同情、勉励”。

周惠将宝音图踢开之后进行审查,晾了半年时间,叫他难受,然后调给政府主席布赫做“助理”。布赫既不叫他“助”,更不叫他“理”。宝音图难以忍受,找周惠理论,为何不明不白地撤他职调他工作。本来周惠是怀疑他与学生“通气”,想抓他为“后台”而踢开的。可是他经过一年的内外调查,没有抓到任何把柄,所以不再提与学生事件有关的问题了,而是转到抓他平时工作上的“错误”。经过一段准备,开书记办公会形式,找来宝音图,叫田聪明数落他“七条错误”:第一件是宝音图派汽车送吴涛去北京看病;第二件是宝音图写条子给民委主任,调王见喜到民委工作;第三件是与杰尔格勒、特古斯提高了蒙生高考招生比例;第四件是周惠提任三名副书记,宝音图说了怪话;第五件是宝音图在新城宾馆讲了内蒙古大学应设蒙语授课,以体现自治区的“错”话;第六件是宝音图向中央组织部反映一、二书记对学生事件意见分歧是非组织活动;第七件是说宝音图的秘书有泄密问题。周惠又将这所谓七条“错误”发了个传单式的不伦不类的白头文件。对这些欺人之谈,宝音图气成心脏病,不久在集宁参加会议猝死。这里有几件事不点明,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吴涛是内蒙古军区政委,“文革”中由上边安排他给“挖肃”司令滕海清做助手。在拨乱反正的大批判中,当时的领导人尤太忠、王铎、云世英三人将他打成滕海清的替罪羊,内蒙古的所有职务全撤了,可是北京军区副政委职务还在保留。这么大的一个犯错误的老革命有了病,派个车送去怎就成了“错误”。周惠免职回北京,半夜装了三大汽车内蒙古财物溜走了,却啥事没有。第二件是,内蒙古高考升学比例,蒙生高了,汉生就低了,是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汉族干部群众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人们忽略没有注意的一点是,内蒙古的汉生升学比例,历来是比区外各省高的。在内蒙古自治区,蒙生的升学比例必须要高,以体现自治民族快步赶上先进民族的政策。除了区内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土著少数民族外,其他任何民族都不能享这个“高”。蒙古民族离开自治区,到其他地方就不能享这个“高”。对此各个民族都应冷静思考,不能有任何“嫉妒”心理。

学生事件发生后,宝音图曾向其一个好友极为气恼地拍着大腿说“刚想干点事,他妈的出来这个事了!王铎的干将刚刚往外请,内人党老爷们还没有进来。唉,都给打断了”。可见,宝音图是不支持学生闹事的。

学生上访开始后,区党委选调干部到门口第一线工作,宝音图指定的是办公厅副主任汉族干部苏瑞峰。分管人事工作的老干部副秘书长李俊谭认为应派蒙族干部出去。他两次找信访处白音太动员,表示了党和组织上的信任。白音太有教训,不愿接受这个担嫌的差事。因为组织决定了,不得不去做这项工作。他每次出去接待学生都带着三、五名干部,其中还有会蒙文蒙语的汉族干部。每次接见之后当时写

出简报送到“政工组”去。一线白音太和二线宝音图之间有汉族干部做联络员。宝音图见不到白音太，在白音太侧后还有周惠的“政工组”人员暗中监视。如此这般小心谨慎，仍然受到周惠的猜疑。事件平息后，他两次秘令时任副书记的千奋勇把白音太清洗出党委机关。因为不说什么问题，千奋勇没有动。周惠第三次向千奋勇和组织部长刘贵谦下令，在七天之内必须清洗出党委机关。刘贵谦在三天内办出“党委决定”，叫白音太去战备办公室挖防空洞。后来，周惠离开内蒙古，千奋勇批示把白音太调回党委机关。可是当时组织部长周荣昌和副部长袁明铎是周惠从包头一机厂提拔起来的亲信，拖了两年才办。

在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中，高锦明是先打西部蒙族干部，后打东部蒙族干部，最后“一灼烩”全部打成“反党叛国的内人党”。周惠耍弄蒙族干部，如同玩麻将牌，打那个吃这个，吃那张，打这张。在学生运动刚起之后，周惠大骂土默特籍干部煽动学生闹事。当总书记胡耀邦交底“乌兰夫这面旗帜要保”之后，他立即调转方向，挑唆土默特籍干部打东部区干部。先是布赫在呼市干部会上讲，后由云世英在自治区干部支部书记会上讲。《新华社内参》登了他们言论之后，过去在东部区工作过的老干部张策、胡照衡等人，大惑不解，惊呼内蒙古怎么啦，“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正在拨乱反正，为何把一九四七年思想认识上的争论，联系到现在学生事件上，把“爷爷”和“孙子”连起来，排列成一、二、三次路线斗争。这不是“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呢吗！况且，一九四七年的争论也没有定成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他们批评周惠不应这么干，这不利于东西部的团结和内蒙古的稳定。周惠推诿说那是云世英他们说的，不是他的意思。然而历史的记载是他周惠在十一月七日的会议上把一九四七年连到这次学生事件上的。当时在土默特籍干部中，云世英是有魄力能干，排在第一位的，大家指望他拨乱反正，期望值很高。可是正因为他能干，周惠怕他抗衡，耍手段征求乌兰夫同意，将云世英送到北京当了一名京官，然后换布赫来坐蒙族干部第一把交椅，接替孔飞当了自治区主席。

当学生事件平息下来，局势稳定之后，在一次会上有人向周惠提问，究竟学生是谁发动起来的。周惠哼哼哈哈，以很不清楚的浊音说“延安来的老同志，算拉！”。他也没有说名字，不知是何人，可也不是指的是李森，他来去延安。受人尊敬的李森老人，是大革命时期的元老，是土默特旗和内蒙机关无人不知的传奇人物。由于他是喇嘛出身，文化不高，然而具有敢做敢当的高贵品德。他几次找周惠“自首”，说学生闹事是他派民委干部王见喜发动起来的，传单是他叫茂敖海写的，你不能处理别人，论罪我一人承当，你也不必费心找“后台”呀、“幕后”啊，我就是后台处理我好了，不要搞扩大化，抓这个怀疑那个。可是一心想要从东部区干部中挖出一个“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的周惠哪能听进他的忠言。李老从此郁郁成疾，不久人世。一九八七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大庆，乌兰夫由京来呼参加庆典，李森老人重病在医院，请求乌兰夫去医院见一面，可能是想谈学生事件的处理问题。遗憾的是乌兰夫没有见他。

受到周惠打击最重的是土默特籍干部锡盟盟委书记赵真北。在周惠的向中央《汇报提纲》中，谈到“人口问题”时，对清理盲流工作有这么一段话“去年曾在个别地方对外省区流入的人口进行往出清理，结果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后经做工作停止了，但事情并没完。而且对上下都有影响，仍是全区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上

边一段话是周惠这个政治骗子在中央面前瞒上欺下，把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推给赵真北的一大杰作。

赵真北是土默特籍干部中蒙汉兼通，解放以来一直做畜牧业工作的专业权威人士。“文化革命”结束以后，于一九七九年底，自治区党委派到畜牧业重点地区锡林郭勒盟任盟委书记。在他去之前，军管时期的前任书记赵会山按照国务院指令和周惠的部署已经开始清理盲流。自从一九七七年拨乱反正以来，中央、国务院为了减轻粮食供应压力发国发(77)140号文件、中发(79)87号文件、国发108号和162号文件、中办40号文件，自治区革发(79)184号文件，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1980年2月9日发的文件，明确要求对流入牧区人口进行严格控制和必要的清理。清理盲流是极为敏感难度很大的工作。对此，周惠曾表示“清理盲流如有问题，区党委承担责任。”锡盟盟委根据上述指示精神，提出清理一批少数表现很坏的打砸抢分子。

这项工作刚刚开展，盲流冯玉根、冀宝新上访北京告到冯文彬那里，于是就造出了危言耸听的“内蒙古赶汉人运动”之说。

对于清理盲流工作，周惠始终是一手操作指挥的。对于冯文彬偏听偏信打砸抢分子的诬告，无端指责内蒙古“反汉排外、驱赶汉人”的错误论点，不敢反驳，顶不住，怕影响自己前程，对自己的事诿过他人，把责任推到下边，装做不知道。并且以撒免赵真北的盟委书记职务来复合冯文彬的无理指控。这种以牺牲部下保全自己名利的作法哪像个共产党的干部。冯文彬做为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偏信一个无赖盲流的偏言诬告，而不听她方党委的正道报告，这除了他的大民族主义偏见以大压小，以上压下，还能说明什么呢！

对于冯文彬的错误指责，当时就有基层生产队的清理盲流情况报告。牧民虽然仅是半通汉语，也算把问题说清了。

锡林郭勒盟正兰旗查干淖尔公社登吉大队于一九八零年六月向中央办公厅冯文彬的汇报：

我们生产队1958年时34户，121口人，到1979年增到376口人，其中汉族189人，蒙族187人。盲流冀宝新来时光棍一人，“文革”中夺权，将其亲属迁来，又娶来媳妇生了七个孩子。他们掌权之后。盗窃挖空生产队财产，牲畜头数大幅度下降，变成了穷队。他们在“挖肃”运动中，大打出手，牛建海去夺了公社的权，冯玉根当了战斗组长和看守所长。将三十多名社队干部集中关押，残酷武斗，挖死了公社德吉书记，打残了好多人。冯玉根说“你们这些蒙古人不值一枪扫射”、“蒙古党员算几个，总算占一小撮”、“杀尽蒙古人对全国还占多少”。李×说“在内蒙古挖出这么多内人党，死了这么多蒙古人，可惜我还未喝够他们的血”。清理盲流工作开始后，大队委员王玉说“你们这些党员没有一个好东西”。

由于当地牧民抬不起头来，难以生存。要求迁往别处去找生活出路。

我们对于遣返几户的经济处理是妥善周到的。他们的自留畜、房屋、拿不走的财产都合理作价，发了路费、生活费、两个月的口粮，并带走七匹耕马。送走时大队出钱租了三辆汽车，途中补助都发给他们了。冯玉根、冀宝新等人向中央说的都是假话。

今天我们遣返几户造反派头头，少数盲流，是为了安定团结，不是他们说的“反汉排外”、“民族分裂”。我们全俸社员和党支部迫切希望上级领导派人来深

入调查。

内蒙古正兰旗查干公社登吉大队。

对于周惠瞒上压下，假话诿过，食言自肥的恶劣行径，原锡盟书记赵真北极为耐心的等到学生事件平息之后，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按党内生活《准则》，心平气和地批评和抨击了周惠的厚颜无耻恶劣的政治品质。一个少数民族党员干部，能否以平等原则去争论是非呢！

一九八〇年，内蒙古团委主办团刊《内蒙古青年》蒙文版发表了“蒙古民族满达”的文章。这在当时“挖肃”灾难刚过，拨乱反正时期，有着“蒙古民族在党的领导下重新振兴”之意。“满达”在汉文中可译为“发达”、“繁荣”、“振兴”、“万岁”、“昌盛”之意，区别是

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学生把这篇文章翻印散发了。王铎在张学良的东北大学边政系学过治理边疆的功课，粗通蒙文蒙语。他在内蒙古的五十年就是观察蒙文报刊动向的。他认为这是以“蒙古万岁”来煽动民族情绪，幕后必定有人指使。于是他想挖出“幕后”在周惠面前露一手，积极行动起来，不顾身份，赤膊上阵。他派车将蒙文副总编乌达尔汉接来，在他办公室，施展他的手段，软硬兼施，追问文章是谁叫写的。乌达尔汉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干部，不吃他那套，没有给他老面子，顶撞起来。王铎一改往日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暴跳起来，拍桌子瞪眼睛。乌达尔汉也站起来，一老一少，四目相对。王铎气急败坏，叫乌达尔汉“滚！”乌达尔汉说，是你派车请来的，你还要把我送回去。王铎有气无力地回到座位上，“你，你和你爹(乌力图)一样僵硬”。王铎向周惠讲了文章的“问题”。周惠决定派出工作组审查。总编舍力布向周惠派出去的几个人郑重提出，你们要审查我，先叫周惠回答我两句问话。一是，他的政策是叫蒙古民族兴旺呢还是灭亡呢？二是，中央提出“振兴中华”，中华民族里包括不包括蒙古民族？周惠要说对蒙古民族是灭亡政策，那我就没有说的，跟你们去接受审查。于是周惠再也没有敢动他，逃过了一劫。

周惠等人口口声声谴责学生搞大民主违反法制，教导学生要按组织系统上达意见。可是他说是这么说，实际上按组织系统提上来也不行，还是照样收拾你，反正是不准你提他不愿听的意见。内蒙古团委书记巴达拉呼向第二书记廷懋报告，在团委领导层和团干培训班内讨论 28 号文件，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廷懋说有意愿就报上来吧。于是将每个人的发言，按照人头分户，将原始发言整理上报。事后周惠拿着这个帐单，说他们是反对 28 号文件，把他们整肃了。同时，还有些人向周惠秘告团委的领导人员支持闹事学生。周惠派出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荆云山和现任区党委常委的尤仁等人去整顿改组团委领导班子。经过一段考察发现，被告发的一些人都是光明磊落正经干事的。而告秘的一些“左”派们却是不地道，搞邪门歪道，汇报情况不实。

周惠整肃干部的重点单位是文教系统。内蒙古大学、师范学院领导班子改组，撤销自治区文教办公室、高教局，教育厅撤换领导。其他各部门也全面调整，以亮相表现搭配班子，有上有下，有进有出。当时农牧林系统各厅局领导班子中，掌有实权的蒙族干部占多数。他们虽然与学生事件无涉，周惠还是不放心的，拆庙搬神，撤厅建委，把他们分散打发了。盟市级领导班子在这次整肃中也有很多人落马。厅局、盟市级干部，大概约有二、三百人之多。

周惠对于全区干部分类排队之后，着手建立亲于自己的干部队伍。他从下边提

上来一批，又从自治区机关放下去一批，从实权岗位上拉下来一批，又补上了忠于自己的一批。周惠叫石生荣分管干部，觉着不得力，又重新起用王铎，叫他参与干部调整工作，于是王铎体系更为强势。首先是组织部的干部重点配备了“保党派”骨干分子。如师范学院“抗大”造反团头成凤霞任一处处长，整顿调配自治区机关厅局班子。巴盟造反夺权的“保党派”头子刘贵谦调任组织部长、区党委副书记，分管干部工作。内蒙古大学“保党派”头赵志宏当了自治区副主席：《无产者》头头张启生当了呼和浩特市长。师范学院“保党派”头任铁当区党委书记，又去包头任市委书记。乌兰夫三儿子乌杰当面骂他是打“黑帮、”黑崽子”的造反派。周惠最为重用的亲信是他的秘书田聪明。田是从巴盟上来的干部，原是新华社记者，是宝音图给周惠配备的。学生事件一开始，他就显露头角，飞扬拔扈。俨然他是“第二书记”，敢在书记办公会上指手划脚。学生事件刚过，直升常委兼秘书长，接着又提常务副书记极为张狂，啥都敢管，说一不二，他为了显山露水，敢在体育馆几千人干部大会上，不打稿讲话，装腔作势，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周惠在整宝音图的时候，故意把田聪明放出来数落他的“错误”，以此来贬低宝音图，想要气死他，解他心头之恨。

周惠、田聪明，胆敢违反《党的准则》，在党的机关组织运行体制之外，建立自己耳目特务组织，派暗探到各大院校，各机关单位搜集情报。这是党纪国法不容许的。

在学生闹事期间，分配来了一名刚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师范学院毕业的，会蒙文蒙语的学生，田聪明放在“政工组”。给他的任务就是到各大院校去搞情报，直接向田聪明汇报。他在周惠、田聪明离开内蒙之后，向所在单位领导人宝音“自首”，说他给田聪明当了特务干了坏事。这真是希罕事，宝音咋处理，一笑了之。田聪明还向自治区机关工委宣传处长李德亮部署，观察搜集宝音图动态，向他报告。

在周惠、田聪明时期，凡在学生事件中送过情报的人，都得到相应的回报，有了提升官职的机会。一九八三年“政工组”收摊关门时，田聪明命名为“民族团结的模范先进单位”。这事干的也真够滑稽的了。手中有权怎干都行。

在周惠的汇报提纲中，有一句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一句话，却被学生发现了。“在各种群众性活动中，不宜过多地组织新的少数民族的团体和活动”。这是周惠制定的限制蒙古人活动的法律。周惠他个人胆敢违宪约法蒙古人，是谁给了他这个特权。这里说的“过多地”是一个煞有介事的措词。蒙古人哪儿有过单独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就是蒙医也不准你单独成立一个医院，必须与汉医合办，称为“中蒙医院”。还有蒙古语文工作办公室也不准你单独存在。民族感情中有个重要内容是对民族文化的爱好。可是连个文化沙龙也不准出现。

四、事件教训

对一九八一年学生运动，当年的周惠以其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绝对权力定了破坏安定团结的民族分裂主义性质，立了“01”专案，挖“幕后黑司令部”、“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不明不白地处理了几百名干部，干完之后既没有结案，也没有得出结论，这算是什么事呢？谁来向历史做出交代！如今事件已过二十多年了，也该有个评论了。历史的是非是由后人评说的，评论历史事件，各类人等可以有不同看法。我从我的角度看问题，你从你的观点论是非。但有一点必须是，不管哪个民族，要

以平等精神去争论。这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别压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孰是孰非,自有历史的公道。

1、学生事件是因 28 号文件发生的,所以首先要评论这个文件是否正确。历史唯物主义者分析任何事物,离不开当时的背景。自从一九五八年后,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左”倾发展,大汉族主义极度膨胀,无视边疆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的问题极为严重。在“文化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时期,胡耀邦总书记视察西藏工作,恢复放宽自治权利,发出 31 号文件,从民族关系的历史发展来看,是完全正确的。可惜受到邓小平批评中止执行了。28 号文件是对 31 号文件的“纠正”,与国家大破“左”倾错误的拨乱反正的政治形势很不谐调。要说它是个正确还是错误文件,从其实施结果来看,似乎有一半实现了,另有一半没有达到。那就是人口早已超过两千万了,政权机关早已实现以汉族干部为主了。没有达到的是一亿头牲畜目标落空了,人均收入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排列更为往后了。学生闹事是为了民族生存权。现在已经到了难以生存的关头,牧民陷入困境,没有退路了,不得不另寻生路。移民垦殖是民族政策问题,同时也是生态政策问题。生态问题比民族问题更为重要。生态破坏了,不单是二百万蒙古人的生存问题,也给老大哥汉民族自己造成沙尘暴的困扰。这样看来,28 号文件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是个错误文件。

2、学生事件的性质怎么定,要看学生运动的主流,看其主要方面。闹事学生向自治区党委提交的请愿书上没有发现任何“民族分裂”的内容。上访北京所提的问题,一是移民流入问题,二是自治权利问题,三是惩办滕海清问题。游行学生高唱“起义暴动的嘎达梅仁是为了蒙古的土地”。学生运动的中心纲领就是抵挡外来人口,反对垦殖,保护草地。因此,顶多也只能定为地方民族主义性质。在学生闹事期间出现的煽动、鼓吹“民族分裂”的反动传单,那是“个”案,是属于个别民族极端分子所为,不能以个别分子制造的传单来定事件的性质。一斗黄豆里进去几粒黑豆,仍碰视为黄豆。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中央领导人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讲话说过“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解决,决不要把个别人或极少数人的问题看成一个民族的问题或民族关系问题”。胡耀邦对学生事件的批示是含糊其词,没有明确讲是什么性质。可是周惠夸大支流,拿个别反动分子的传单当做主流定性,为他所用。一九九四年王群执政时期,内蒙古党委办公厅 8 号文件里讲“一九八一年发生蒙族学生驱赶汉人事件”。这就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民族分裂”了,而是有了明确具体的罪名了。对此,蒙古人要提出质问,在学生闹事的七十天时间里,是哪一家哪一户汉人被驱赶了?周惠、王群及其指使的公安机关如果拿不出被驱赶的人家来,那就是对蒙古民族的诬陷、讹诈、迫害,是凭空制造镇压蒙古人的口实。按照国家法律,定性定罪必须事实准确,否则就是冤案、错案。

3、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民主集中制,与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不同。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有什么意见、要求,要通过组织系统逐级上达。虽然国家宪法有游行、示威自由。但是这个民主权力是有组织纪律制约的。所以,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廷懋一再批评学生“有门不走,为什么非要跳窗户呢!”,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宝音图拍学生肩膀“哇罕台,亚布”也是这个意思。青年学生政治上尚不成熟,容易冲动。所以应听长者的教导,做任何事情都要留有余地,不能走到尽头,更不能走过头。否则就要犯大错误。

对于学生事件的处理,一、二书记从一开始就有分歧,第一书记要抓人,第二

书记要疏导,谁对谁非?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叛乱,都是“恩威并加,抚剿并用”政策。周惠做为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自我感觉马列主义水平也很高,其实他是与滕海清一丘之貉,只能解释为大汉族主义思想在驱使他们那样蛮干。

没有施恩就要加威,没有宣抚就要剿灭。周惠他做为共产党的地方党委书记,却不敢去见群众。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是一次也没有出面去见学生。学生上访要见面对话。他是躲着就是不见,僵持不下,迁延时日,拉长时间,使问题复杂化。周惠如果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不该怕群众。出事当初就应勇于承担责任,有天大事先揽到自己身上,然后慢慢化解矛盾。如果他要出来见学生,还有廷懋、云世英左膀右臂护着他,陪着他,闹事学生不会就把他吃了。只要他肯出面见群众,往下别人也就好做工作了。廷懋、宝音图多次给他创造条件,他都没有表示。他觉得所有参与做学生工作的蒙族干部都不可信,好像要把他推给狼群。一个封疆大吏,如果站在恨所有蒙古人的立场上,那就一切希望都没有了。周惠最怕干部群众对他谴责的一个问题是,他一个人带着秘书向中央汇报。决定“二百万蒙古人的命运”。对此,廷懋、云世英在大小会上一再给他开脱解围,说《汇报提纲》是“经区党委多次研究讨论定的”。其实这是假话,是为了袒护周惠混过昭关。事件过后,廷懋曾说“他那个提纲区党委没有研究讨论。原定一、二把手加主席孔飞去,临到时候是他一人去的”。

在挖“内人党”时滕海清一个人带他的秘书去向中央汇报,后来周恩来训示,从此吸取教训,以后来人汇报,不能只来一个人。可是没有人吸取这个教训。周惠带江波去向中央汇报工作。首先犯了用人上的大错。江波是什么人,他的恶劣品德,自治区机关谁人不知。汉族老干部杨力生当时就曾说过“为什么带江波去,要出事啊!没有个蒙族干部,怎能说好内蒙古的事呢!”

一个派到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汉族领导干部为什么就不能和这里的少数民族干部合作共事呢,为什么就不信任他们呢。这就是周惠所信奉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

4、总书记胡耀邦在学生事件的批示中说“……否则,我们要上当”。其实,他是上了周惠的当。周惠是个要政治手段的老手。在周惠的汇报提纲里讲的是盲流不能再人了。“不堵盲流”是胡耀邦讲的。周惠为了逃避责任开脱自己,来了个“一石二鸟”。他把他那个《汇报提纲》中的人口政策六条,变成布告登在报纸上。他向全区群众表白“不堵盲流”是中央的话,不是我周惠的,要闹就闹中央去。后来,他在学生事件总结大会上非常得意地讲:“布告上说的人口管理指示,本来就是《汇报提纲》中的六条。可有人竟然说布告六条与 28 号文件针锋相对”。他这一手未能达到转移学生方向目的。于是一招不成,又来一计。搞了个传真电报,更为明确地把学生火力引向中央。学生终于上当,去北京闹去了。

周惠不敢挺身而出见群众,不愿替中央承担责任,硬是把闹事学生逼到北京去,表明周惠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客,是共产党的“奸臣”。

周惠在内蒙古工作时间虽然不长,可也充分显露了他的机会主义本色。他一来内蒙古就为了抬高自己身价,宣扬他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派来的”。不久华国锋下台,他又是另一副咀脸,大骂华国锋“他妈是个什么东西,他是个造反派”。周惠在纠正毛泽东的“大锅饭”错误,推行“包产到户”政策上是极为坚决的。但同时

他也搞了“非毛化”。“文革”中，毛泽东塑像搞了很多，不少是所处不当，搬掉是对的。但是一个不留，全要砸烂，才是过头的。内蒙古党委院里的毛泽东，所处得当，在幽深院中，松柏相映，应该留下，他却不听劝阻，硬是用炸药崩的满院开花。

5、这次学生闹事起因很清楚。是乌兰夫派云北峰来，首先在土默特籍干部中动起来，然后学生闹起来，席卷了全区。可是到后来，怎么就演变成了“一九四七年跟博彦满都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了呢？周惠凭什么还要从东部区干部里挖出一个“庞大的地下黑司令部”呢？自古以来，历史上反动统治者整少数民族都是采用“以夷制夷”政策。可是做为共产党员的周惠为什么也要采用这种政治手段呢。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觉悟的从延安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布赫、云世英为何受其利用那么干呢，这是令人费解的问题。他们那么讲，有什么事实根据呢，什么也没有，就是凭空瞪着两眼说瞎话，不考虑后果。一个对自己说的话不负责任的人，官做的越大，为害越大。世界上所有落后民族都有个特点，那就是你攻我斗，永无休止。中华五十六个民族都讲团结，可是一个民族内部却不讲团结，那还能进步吗。

6、内蒙古“地广人稀”问题。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周惠的汇报，谈到自然流人口时，宋任穷说“内蒙古地广人稀，经济发展起来，人力是不够的”。这个论点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举国上下，谁人一看地图就说“内蒙古地广人稀”。中学教师讲人文地理也都讲西北三分之二的土地上仅有百分之十人口，而内地三分之一土地上却生活着百分之九十人口。因此，国人都认为内地人口向边疆流动，寻求汉族人民生存的新的空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少数民族反对这种流向，不是民族分裂主义也是地方民族主义。然而殊不知，内蒙古虽然“地广人稀”，可供人畜吃喝的水草农田却是很少，粮菜瓜果供应不上，“僧多粥少”问题难以解决。汉族是个吃粮的农业民族，从清朝末年移民实边、借地养民到民国年间大量涌入流民。垦荒种田，可耕湿地早已开完。解放后王震开荒，“文革”中郑维山的大兵团垦荒，出现多次垦荒浪潮，大开小开不断地开荒，以致造成今日之沙尘暴。不知情的国人一见黑沙漫天就报怨“内蒙古的风沙又来了”。似乎风沙是内蒙古人造成的。电视台播放因由也只讲“过渡放牧”、“牲畜超载”，却不讲开荒造成的根本原因。

7、主持中央工作的总书记胡耀邦，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变化太快，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是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一九八一年中央发 28 号文件时，西藏、新疆的文件刚发不久，乌兰夫的文章也刚发表，排队汇报赶到研究内蒙古工作的时候，总书记向“左”急转弯了，似乎换了一个人。对于内蒙古学生事件他批示“要严厉”。这和他以前对待少数民族宽厚仁爱的态度判若两人。为什么同一个总书记胡耀邦，一个党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不长的时日里，他的指导思想竟然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胡耀邦对西藏、新疆的让步、放宽政策受到了大汉族主义者的严厉批评和警告。冯文彬也在这时借锡盟清理几户盲流制造耸人听闻的“内蒙古发生了驱赶汉人运动。”总书记的转变是受到了上边的压力，是出于无奈。然而，他是转过来了，可是下边不知情，没有能跟上，连乌兰夫也未曾得招呼，行动未能谐调。如果没有这个变故，少数民族地区贯彻通行 31 号文件精神，就不会发生这次学生事件。

应该说，胡耀邦对自治地方的政策放宽是正确的，受到全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列宁说“对少数民族多让步些，多温和些，要比让步不够，温和不够

要好些”。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功在华夏。遗憾的是他对边疆民族却没有说过一句开恩的好话。一九八七年当有人向他反映“文革”中边疆少数民族受害严重时，他不以为然地说“中国没有民族歧视，文革中受害最大的是汉族”。对此，少数民族是难以认同。“文化革命”是华夏民族的内乱，祸及边疆民族。受害者按绝对数，当然是汉族多，而按人口比例，少数民族则是灾难性的。少数民族小兄弟并未伤害过汉族老大哥。

8、周惠为了建立自己体系的干部队伍，为了他一己之利，把潜在的已被人们逐渐淡化的，以前的领导人从未明讲的所谓“三方两派”明朗化，加深了矛盾。28号文件下来之前，他为了建立自己体系打击削弱王铎的“保党派”体系；学生事件发生后，他又挑动指引土默特籍西部区干部攻打东部区干部。内蒙古干部队伍的“三方两派”问题，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有其历史原因。一九五四年蒙绥合并时，绥远干部不愿合并，抵制时间很长。乌兰夫“借荆州”在张家口等待。毛泽东主席发怒，谁反对开除谁的党籍。乌兰夫这才开进归绥市，做为内蒙古首府，改为呼和浩特。内蒙古的解放是从东向西展开的。干部、军人都是东部居多。东部区干部有学历文化高。西部区、绥远干部工农出身多。这就出现了“西部成分好”、“东部文化高”的差别。有人在蒙族干部中又分为“延安出身”和“伪满出身”。这个矛盾是东西部干部之间在“文化革命”前出现的，以后愈演愈烈。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出身不好的总是处于劣势。这是两代人三代人的斗争，能容许这样下去吗？但愿以后不要再继续下去。希望当领导干部的不要再挑动这个矛盾。

9、民族团结的基础是民族平等，平起平坐才能讲团结。在周惠的《汇报提纲》里说“遣返盲流，要先同其原籍协商，并请中央主管部委和有关省区予以协助”。这里哪有平等可讲。盲流他来时没有协商，为何去时要协商呢？来时没有条件，去时却有条件，这叫平等吗！按常理，对于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主人端茶送客，打开门请他出去就是了，还要先找他家同意才可送回家去。世间有这个道理吗！周惠所定遣返程序是先找盲流的原籍，县、乡、生产队，然后又找省，再到北京找有关部委协商同意，然后才能遣返这个盲流。这是政策上可以遣返，但叫你遣返不成。周惠制定这样繁杂难办的政策就是为了讨好冯文彬那样一些人的。

28 号文件中讲，对流人人口内蒙古“要妥善安置”、“搞好民族关系”。这是内蒙古难以接受的强制政策。草原牧民长年劳苦与风沙灾害搏斗而得来的一点牛羊肉，还要把不请自来的盲流当客人招待共享。在这种不平等的状况下，能“搞好民族关系”吗？

内蒙古地广人稀，又落后，需要学习先进民族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牧区、林区、工矿区也缺少劳动力，自然流入也是正常的。但是党和政府不能硬性规定，不分好赖都要接受安置。移民亦应实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表现好的自然能留下，而且牧民也可能招赘为婿。赖的坏的非但不留还要拿棒子打出门去。这才合情合理，体现平等。

10、经过这次学生事件，内蒙古干部的最大教训是，以后再发生类似蒙族学生闹事，蒙族干部不能出面，要回避。谁干谁沾包，谁受怀疑，没有好下场。周惠他怀疑所有参与做闹事学生工作的蒙古族干部都有问题。宝音图、杰尔格勒、特古斯，文教办、高教局、教育厅，各大院校接触学生工作的人都受到处理。但也不能

说绝对，不乏也有个半像乌兰巴于那样的蒙古族干部编造虚假情报，受到宠信，也是有的。在处理学生事件中充当“积极分子”上来的还真有那么几个蒙古人。不过，他们的灵魂受到了谴责。像马振铎那样蒙古人受到周惠赏识，提任自治区副主席之后，忘乎所以，与河北省谈判边界纠纷，竟然毫无原则地慷慨大方地，按照周惠旨意将内蒙古固有土地拱手奉送，低三下四的在饭店服务台上给签字，写上了他的挨骂臭名。留下了“拉格旦”，很难处理。

一九九四年二月，内蒙古党委办公厅 8 号文件传达中央领导重要指示中说“出了民族问题，口 q 他们出去工作，要比汉族干部有效”。且看今后出事，区党委将如何使用民族干部了。

在“文化革命”中，内蒙古自治区成了滕海清和他秘书陈晓庄俩人对蒙古人的“专政区”了。“文化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内蒙古自治区又成了周惠和他秘书田聪明俩人的“专治区”了。

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是民族平等的体现。过去华北局领导人批判乌兰夫时说过“反汉就是反华反共”，这种说法是把汉人列在统治民族位置上，把蒙古人放到屈从民族地位。这是汉族祖先“华夏居中，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大汉族主义霸权者的反动谬论。

按照马列主义原则，要想真正实现民族团结，那就要以平等精神去批判两种民族主义。如果只反一面，那就是政治和法律上的不平等，也就存在着民族压迫。